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政坛丑闻内幕



## 序

政治腐败是世界性公害，是人类社会的一大顽症。可喜的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类的良知，近些年已促使反腐倡廉的风暴此伏彼起，席卷全球。林存柱同志编著的这部《世界政坛丑闻内幕》，记述的都是反腐败案例，范围涉及各种社会制度和各种发展水平的几十个国家，读后会使你对腐败的严重性和反腐败的紧迫性产生深切的认识。

### 一

何谓腐败？通常是指公共权力的蜕变，亦即公职人员或公共机构，违反公认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运用或滥用其职务和权力，为私人或小团体谋取不适当的利益，而不顾或侵害他人、社会和国家的权益。以权力换金钱，换取各种物质利益，是腐败的一般表现形式；凭借权力捞取各种光彩的头衔、称号和荣誉，满足各种精神的和肉体的欲望和享乐，也属于腐败的范畴。《内幕》一书为世人提供

了各方面的例证。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腐败是公共机关和“常设公职人员”的伴生物，早在氏族社会末期就有了；待到阶级消亡、国家消亡、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腐败才会被连根拔除（参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看来，反腐败任重而道远，人类应为此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 二

环顾全球，眼下我们还搜寻不到一个绝对清廉的政府，腐败现象倒是所在多有。无论是什么社会制度，无论是什么党执政，无论是大国小国、穷国富国，没有一个当权者敢于夸口，说他治下的政府白璧无瑕。经验告诉人们，所有国家在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发生严重的腐败现象。而今大多数国家都在向现代化迈进，腐败如此多发也就不足为奇了。二次大战后刚刚形成两大阵营对峙态势的一二十年间，两边都有人把自己国家的毛病归咎于对方的污染和渗透，而不大注意反躬自省。还是生活教育了人们。50年后的今天，大家都清醒得多了，开始认识自身机体的不足之处了。这是人类的一个进步。

虽然到处有腐败现象，其程度、其内容、其后果、其纠正方式却不甚相同。这是由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等诸种因素决定的。总的看，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尚欠发达、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较多、新旧体制正处在交替过程中的国家，其腐败问题较为严重，治理起来也难见显著成效；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其腐败问题则相对较轻，且揭露得较快、较深，惩罚得较重。这一点，看看《内幕》你就会一目了然。

有些国家，新闻媒体不断披露和抨击一些政坛丑闻，哪怕是部长、总统、大臣、首相，也休想受到“为尊者讳”的优待。这，一方面说明那里确有腐败问题，衙门里水浑风歪；同时说明，那里治腐促廉的社会机制比较有效。倘使长了脓包而讳疾忌医，藏头护尾，不敢痛下针砭，甚至还装作没事儿一般，那其实是愚昧落后的反映，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对于这些，东西方世界的多数人似乎也渐渐形成共识了。

### 三

尽管腐败现象量大面广，难纠难治，人们却不必悲观绝望。须知，人类社会从来就是在摧枯拉朽、流血流汗的拼搏中前进的。统治者可以肆无忌惮地穷奢极欲、鱼肉百姓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已经被人类踢进了历史的垃

圾堆。发达国家当初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导致腐败泛滥的一些体制性弊端，本世纪某些国家内存在过的易于孳生腐败的社会制度，也已经成为记忆中的陈迹。正如“内幕”中所述，现在，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即便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等级观念依然浓烈的东亚，当权者意欲为非作歹而不受惩处的时代，恐怕也快要完结了，田中角荣、金丸信、全斗焕、卢泰愚等人的下场即是明证。事实上，欧洲发达国家瑞士，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新加坡，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智利，目前已经鲜见政坛丑闻了，这使我们看到了希望。

据理论家和实践家的一致看法，仅靠道德说教，仅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能震慑腐败分子于一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建立一套适合本国国情、便于操作的强制性廉政机制。如果在防腐反腐工作中无法可依，执法不严，随意性很强，弹性很大，甚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么，腐败分子不仅不会收敛，还可能受到鼓舞，变本加厉地胡作非为，并可能诱使一些“边缘”分子起而效尤。这是不少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可悲情景，人们想必不会忘却这种沉痛教训。

总结历史经验，对比各国现实，举世公认，在人类历史进程的现阶段，较为有效的廉政机制大体须包括这样几个最基本的环节：1. 以权力制约权力。“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不应使任何公共权力处于失控失察状态。各政治团体之间，立法、行政和司法各权力系统之间，必须有强有力的互相制约和监督。2. 实行较为彻底的市场经济原则。政府应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力促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而对微观经济的管制则应降到最低限度，少给人留下“寻租”的机会。3. 实行普选制，让公民定期地依法决定政府的组成。4. 政府运作增加透明度，按法定程序尽可能广泛地实行公开性原则。5. 给公职人员较高的待遇，以利广揽贤才。6. 给新闻媒体较大的自由度，让“政治家无隐私”的达摩克利斯剑时时提醒公职人员抑腐养廉。当然，这一切只有在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逐步实现。

#### 四

我们正处在迅猛推进经济国际化、信息全球化和文化交融化的时代。人无分种族，国无分方位，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当此之际，各国的志士仁人，均应立足本国，放眼世界，不囿成见，虚怀向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熔全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于一炉，力争在抑腐养廉、反腐促廉的进程中走得快一些，步子迈得大一些。有鉴于此，这本《世界政坛丑闻内幕》无异是一面颇有助益的镜子。

鲁仁

1996年5月28日于济南



## 世界政坛丑闻内幕

## 韩国前总统全斗焕 1996 年法庭受审

1995 年，韩国政坛风雨飘摇。11 月 16 日韩国警方刚刚以藏匿巨额政治资金和接受贿赂的罪名逮捕了前总统卢泰愚，12 月 3 日又以“叛乱主谋”罪名拘捕了卢泰愚的前任——全斗焕。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独裁者全斗焕，在风烛残年终于落入法网。

全斗焕，1931 年 1 月 18 日生于庆尚南道陕川郡的一个中农家庭。1940 年全家曾迁至中国吉林省，1943 年返回朝鲜，定居庆尚北道的大邱市，靠其父经营汉药房为生。1947 年，全斗焕从大邱喜道国学校毕业，入大邱市工业高等学校学习。1951 年，从大邱工业高等学校毕业。1952 年 1 月，他考入南朝鲜陆军士官学校。1955 年 9 月，从汉城陆军士官学校第 11 期毕业。毕业后全斗焕进入韩国军界，曾任排长、连长。1959 年，他又入韩军副官学校学习一年。1960 年，他被送往美国陆军步兵学校进修，并于同年毕业回到韩国。1961 年任伞兵部队上尉连长时，参加了朴正熙发动的“5·16”军事政变。政变后，于同年 9 月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议长室秘书官。1963 年 1 月，全斗焕任中央情报部总务局人事课长。1963 年 9 月，任陆军本部人事参谋。1964 年 9 月至 1965 年 6 月，他又入陆军大学学习。1966 年 8 月，全斗焕任第一伞兵部队副团长。1967 年 8 月，任汉城警备司令部第三十营中校营长。1969 年 12 月，任陆军参谋总长室首席副官。1970 年 11 月，参加侵越战争，任韩国白马部队（相当于师）29 团上校团长。1972 年 11 月，晋升为准将。1973 年，任第一特别空运旅旅长。1974 年，任“总统警卫室”副室长。1977 年，晋升少将。1978 年，出任韩军王牌部队第一师师长。1979 年 3 月，任陆军保安司令。

全斗焕是从 1979 年才开始成为韩国风云人物的，当时他年仅 48 岁。

1979 年 10 月 26 日，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由于对总统朴正熙和总统警卫室室长车智澈不满，在晚宴上将朴正熙、车智澈击毙。

全斗焕是效忠于朴正熙的“少壮派”高级军官，与朴正熙的忠实走狗车智澈的关系极为密切。朴正熙被枪杀前，全斗焕已察觉金载圭等人在军内有反朴迹象，并发现金载圭经常同郑升和、李建荣、张泰琬等人在一起，于是派人暗中盯梢。朴正熙、车智澈被刺杀的当晚，全斗焕确认朴正熙已毙命后，未经郑升和批准，私自召来车智澈嫡系部队头目、汉城城防部队司令全成珪、陆军第九师师长卢泰愚、二十六师师长裴贞道以及空降特种战斗部队头目等，在陆军本部另立临时指挥所，准备调动汉城及汉城周围的部队。郑升和虽为陆军参谋长，有权调动全军兵力，但全斗焕等已抢先包围陆军本部，监视着郑升和、卢载铉。只要郑升和、卢载铉一动，马上就有被捕的危险，郑升和想调动前线嫡系部队第三军解围，但鞭长莫及，远水救不了近火。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卢载铉、郑升和被迫切下令逮捕金载圭。由于金载圭在击毙朴正熙后未能控制住军队高层的局势，他在击毙朴正熙后的第二天 0 时 40 分就被戴上了手铐，他的夺权设想只完成了第一步就成了泡影。

朴正熙毙命后，军方两股势力一直在聚集力量，进行拼死的权力争夺。

“稳健派”实权人物郑升和，利用其陆军参谋长兼军事管制司令的权力和美国的支持，协助崔圭夏总统实行了一系列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以安抚民心、缓和矛盾、稳定局势。崔圭夏在当选为“过渡总统”的第二天（12 月 7 日），宣布废除第九号“总统紧急措施”，解除了对金大中的软禁，释放了

一些“政治犯”，并表示今后继续进行政治改革，为选举正式总统、建立民主政府打好基础。同时，郑升和在军内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驱除朴正熙的“强硬派”势力。首先，郑升和撤销了军内“强硬派”中坚分子全成珪中校的汉城城防部队司令的职务，让他的亲信张泰琬中将来接替。接着，又任命自己的亲信郑炳宙少将为空降特种作战部队司令；委任金载圭的亲信、军内“稳健派”实力人物李建荣中将为第三集团军司令，统帅四个军十三个师的前线部队。接着，准备对“强硬派”关键人物全斗焕及其中间分子下手，以彻底清除朴正熙在军内的“强硬派”势力。

朴正熙死后，以金钟泌为首的“5·16”政变主体势力和以全斗焕为头目的军内朴正熙羽翼，对郑升和等军内“稳健派”势力的迅速膨胀深感忧虑和不安。他们对郑升和、卢载铉等否定“维新宪法”和“维新体制”，要建立民主政权，表示强烈不满；特别是对崔圭夏按照美国意图过早地废除朴正熙的第九号“紧急措施”，释放“政治犯”，以及新出现的“汉城之春”的政治气氛，极为愤慨。同时，对于金大中、尹谱善等在野民主人士和起来为民主而斗争的示威学生和群众，则恨之入骨。正在此时，全斗焕又通过特务手段掌握了郑升和的动向，得悉郑升和已通知卢载铉（国防部长）、李建荣、郑炳宙等人，要在最近清洗全斗焕等“强硬派”的计划。

在这“不是鱼死便是网破”的紧要关头，金钟泌、全斗焕决定抢先一步行动。经老奸巨猾的金钟泌在幕后精心策划，全斗焕串连了陆军士官学校第8期和第11期“强硬派”中坚分子，于1979年12月12日发动了军事政变。

12月12日晚8点，全斗焕伙同陆军参谋次长兼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李喜性（第8期）、第一军军长黄永时、首都军军长车圭宪（第8期）、军需次官助理俞学圣（第8期）等人，背着“韩美联合司令部”，调动了武装部队，突然袭击郑升和官邸，经过一场激烈的枪战，逮捕了郑升和。与此同时，调动守卫汉城的首都军和卢泰愚（第11期）指挥下的第9师等一万多人，进入汉城。陆军空降特种部队副司令开枪打伤其司令郑炳宙，率领部队同政变部队汇合。汉城城防部队，虽然奋起同象潮水般拥来的全斗焕部队拼死抵抗，无奈寡不敌众，城防部队司令张泰琬中将被捕，其余均被缴械投降。随后，全斗焕部队封锁了所有汉江桥梁，切断了在前线的郑升和实力部队进入汉城的通道。郑升和的得力干将、第三集团军司令李建荣也遭到逮捕。

12月13日1时，全斗焕指挥的部队冲进汉城市中心，包围了“总统府”、“国务大厦”和所有政府官邸，控制了广播电台和各报社。他们在市中心配备了五六十辆坦克、装甲车及十几门野炮，还在“国务大厦”后院排满了军用卡车，以防备郑升和的部队反扑。

国防部长卢载铉听到郑升和官邸的枪声后，急忙通过地下通道跑到美国第八军司令部地下室避难。

至此，全斗焕政变成功，形势为之大变。

12月13日上午，总统崔圭夏被迫任命李喜性为陆军参谋长兼军事管制司令，并提升为陆军上将。11时30分，总理申铉碯召集5分钟的内阁紧急会议，履行对李喜性的任命手续。

12月14日，在政变部队包围下，崔圭夏、申铉碯又按全斗焕等人的要求，任命前空军参谋长周永福为国防部长，金钟泌的亲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金钟焕为内务部长官，国防部次长金容体为总务处长官。崔圭夏内定留任的国防部长卢载铉，因为与郑升和关系密切而被解职，外务部和财务部部

长留任，还起用了经济专家、大学教授等组成“看守内阁”。金钟泌、全斗焕占据了国防、内务、总务等关键部门，实际已控制了崔圭夏过渡内阁。

在这次政变中，全斗焕、李喜性等人逮捕了李建荣中将、张泰琬中将、郑炳宙少将，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本部长文洪球中将与总统警卫室次长李在田等16名“稳健派”高级将领。同时，任命“强硬派”的黄永时中将为陆军参谋次长兼军事管制副司令，白锡朱中将为“美韩联合司令部”副司令，柳炳贤上将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尹成敏中将为前线第一集团军司令，柳学松中将为第三集团军司令，卢泰愚少将为汉城城防部队司令。接着，在军队、师一级中实行大清洗，把郑升和的“稳健派”势力统统赶出军队。

美国政府对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大为不满，向全斗焕集团施加了种种压力。但是，全斗焕等人也不甘示弱。最后，经过讨价还价，美国只好默认既成事实，以不让全斗焕他们插手政治作为交换条件。

全斗焕、李喜性等人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也不得不接受交换条件。1979年12月17日，李喜性代表军部宣布：“军方将不干预政治事务，政治将交给爱国的、明智的政治家去处理。”

1980年1月14日，金钟泌、全斗焕等人在陆军本部举行了盛大的“新年联欢会”。应邀参加的有陆、海、空三军的500多名现役将军和退役将军。

庆功会后不久，全斗焕晋升为陆军中将。1980年4月14日，他作为现役军人破例兼任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这样，军队、保安、情报的指挥权全部落到了全斗焕手中。

老谋深算的金钟泌，通过全斗焕、李喜性发动的政变，清除了军内“稳健派”的势力，他的腰杆子硬起来了。不久，他宣布参加竞选总统，并着手整顿朴正熙执政以后建立起来的党、政、军、财、文化界及各御用社会团体，继承朴正熙的独裁事业，妄图建立一个“没有朴正熙的朴正熙独裁政权”。

1979年12月20日，全斗焕在公开审判金载圭一案无法进行下去的情况下，指使汉城军事法庭判处金载圭等人死刑，法庭只用了19分钟的时间便草草收场。

1980年初，南朝鲜学生和宗教界人士掀起了对金载圭等人的救命运动，阻止军方处决金载圭等人。

与此同时，韩国爆发了反独裁、要民主的学生运动。运动首先从岭南大学开始，很快发展到整个南朝鲜。学生们起初要求解散“学生护国团”、赶走学校的御用校长和教授、组织自主的学生组织，后来便转到政治上，要求崔圭夏、全斗焕等“维新”残余辞职、撤消“维新宪法”等等。他们从原来的示威、静坐，逐渐发展到暴力斗争。他们焚烧了崔圭夏、申铉碯和全斗焕的画像，缴获警车，设置路障，占领警察派出所。到1980年5月12日时，汉城、大邱、釜山和仁川等80所大学和10所高等学校的25万青年学生投入了斗争。这样大的规模，是李承晚倒台以后所没有的。

工人和农民也起来为生存权利而斗争。1980年4月21日，江原道旌善地区7000多煤矿工人为了要求提高工资，赶走御用工会头目，开始了大规模的暴动；接着许多工厂企业的工人纷纷响应。到5月中旬，已有8个地区70多个工厂参加了斗争，工人人数多达4万余人。仅在京畿道，就有1万多农民要求补偿农作物损失，抗议当权者实行残酷的掠夺政策。

在野领袖和民主人士的斗争气势也日益高涨，他们主张宪法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禁止一人独裁和长期掌权、由国民直接选举来产生总统。



1980年5月17日，全斗焕抛弃了“不介入政治”的诺言，不顾政界人士和人民的反对，颁布了“第10号非常戒严令”，宣布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关闭所有大专院校，逮捕学生领袖和金大中，金钟泌也未能幸免。有人认为，这是全斗焕发动的第二次政变。

1980年5月17日晚至5月27日，金大中的家乡光州市爆发了反对独裁政府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示威群众曾一度多达35万人（占光州市民总数的1/3以上），曾一度控制了光州市。全斗焕调动数万名军警镇压了这场群众性民主行动，致使近千名群众丧生、上万人受伤。这就是著名的“光州事件”。

在这种形势下，申铉碯内阁于5月20日总辞职。崔圭夏在5月21日宣布“改组内阁”，指定前总理朴忠勋为代理国务总理，并任命内阁各部部长。

全斗焕凶相毕露，在5月24日，下令绞死了金载圭等人。

1980年5月31日，全斗焕以“在非常戒严时期，为了便于总统指挥、监督戒严工作及加强内阁与戒严当局的合作关系”为借口，强迫政府成立“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全斗焕任常务委员长。这时的军政大权被全斗焕一手独揽。

此后，全斗焕又迫使金泳三辞去新民主党总裁的职务。

1980年8月，全斗焕强迫徒有其名的傀儡总统崔圭夏“引咎辞职”，同时强令国会将自己选为第11届总统。这位标榜“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治一无所知”的“职业军人”，终于自己脱下军装，换上西装，继承了朴正熙独裁与铁腕两样法宝，攀上了权力的顶峰。

全斗焕在当上总统以后，为了确立他的军事独裁体制，1980年10月22日采取“国民投票”的方式，对“维新宪法”进行了修改。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取消了“统一主体国民会议”；把总统的任期改为7年；把“选举”总统的办法，改为由选民先选举“总统选举人”，再由“总统选举人”选举总统。

1980年11月21日，全斗焕宣布，准许进行“以建党为目的”的政治活动，并决定在1981年6月以前举行第12届总统“选举”和第11届“国会”议员的选举。

从1980年年底开始，全斗焕便为他再次当选总统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并派他的亲信权正达、李钟赞等人组织了“民主正义党”（全斗焕任该党总裁）。1981年2月25日，全斗焕在“总统选举人大会”上得到90.23%的选票，出任第12届总统。在3月25日举行的第11届国会选举中，全斗焕领导的民主正义党自然而然地占据了“绝对的多数”（151/276）。

在全斗焕执政的“第五共和国”时期，南朝鲜经济上的强劲增长和政治上的专制腐败恰成鲜明对照。全斗焕继承了朴正熙的独裁传统，以“刷新政治”、“净化社会”为名，对政界人士大肆清洗、逮捕，在野党遭到的迫害尤为严重。和平民主党总裁金大中和统一民主党总裁金泳三都曾长期身陷囹圄，金大中还一度被判处死刑。把“第五共和国”时期称为“黑暗时代”，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1986年初，南朝鲜的反对党发动了1000万人的“改宪”签名运动，要求立即修改现行宪法，改总统间接选举为直接选举，实际上是要打碎全斗焕军人集团长期维持独裁统治的“法律”依据。全斗焕把“改宪”运动视为洪水猛兽，立即出动军警镇压，并软禁了签名运动的领导人金大中和金泳三。

恰在这时，菲律宾马科斯独裁政权垮台（1986年2月25日）的消息传到了南朝鲜，它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极大地鼓舞了南朝鲜人民的斗志。在此形势下，韩国反独裁运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

1987年上半年，韩国爆发了80年代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全国性抗议示威活动，形势极其严峻。全斗焕集团内的强硬派主张武力镇压，以卢泰愚为代表的温和派力主以“说服和对话来克服这次危机”。57岁的全斗焕为内外压力所迫，接受了卢泰愚温和派的主张。全斗焕宣布，到1988年任期届满时他将“自动退位”。

为了使民主正义党继续执政，全斗焕集团确定卢泰愚为总统接班人，接任民主正义党总裁职务。

全斗焕集团在内部已经作出实行政治改革的决断后，卢泰愚于1987年6月29日发表了包括“同意修改宪法，改组内阁，直接选举总统，赦免金大中并允许其自由参政”等内容的“民主化宣言”，博得朝野上下的赞扬，并引起极大轰动。此后，事态渐渐平息，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卢泰愚的政治形象也因此树立起来。

那么，靠政变起家、曾下令镇压光州人民起义的全斗焕为什么能同意不连任总统并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呢？

这个问题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估计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汉城在1988年9月要承办奥运会。如果不答应民众的民主要求，社会矛盾势必激化，汉城举办奥运会的资格有可能被国际奥委会取消。如果这样，韩国将会在上出丑。

全斗焕企图换汤不换药，继续在幕后操纵韩国政坛，实行“垂帘听政”。

害怕自己重蹈朴正熙当年被刺杀的覆辙，害怕出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那样的下场。

在任总统的几年中，其民主法治意识有所提高。

对卢泰愚能当选下届总统有充分的把握、措施（如做好了在统计选票时进行舞弊的准备）。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果然，在1987年12月举行的总统直接选举中，卢泰愚当选韩国总统。

1988年2月25日，全斗焕总统任期届满，离开了总统府青瓦台，卢泰愚正式就任总统职务。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全斗焕“自动退位”说明他比朴正熙明智。卢泰愚当上总统以后，并没有成为全斗焕的傀儡，反而巧妙地在职内外取代了全斗焕。

全斗焕完全没有料到，在他卸任之后对他过去罪孽的“因果报应”会来得这么快！

1988年3月，卢泰愚批准司法机关以特殊经济犯罪的罪名，将全斗焕的胞弟全敬焕逮捕归案。

全敬焕生于1942年。1964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以少尉军衔入“首都警备司令部”服役，后调入青瓦台警护室。1968年退役，在一家大企业当保镖。1972年去美国一所大学做柔道教练，回汉城后又在青瓦台警护室作副官。

80年代以前，南朝鲜人不知道全敬焕是何许人也。随着全斗焕1980年登上总统宝座，全敬焕也于1981年1月至1987年2月，先后出任“新村运动”中央本部事务总长和会长，一跃而成为声势赫赫的人物。

“新村运动”是朴正熙为所谓振兴农村地区经济、进行文化建设于70

年代初成立的一个有官方背景的团体。其宗旨是：培养民众勤勉、自立和合作精神，促进工农业均衡发展，净化社会，摒弃愚昧，走向现代化。为支援“新村运动”，南朝鲜当局每年都要拨出一笔专款，并允许其无偿使用“国有设施”，可谓优厚至极。

全敬焕在“新村运动”中央本部任职期间，凭借哥哥全斗焕的势力，到处伸手，无所不为。几年来，“新村运动”成了一股无所不在的强大势力，有“政府中的政府”之称。对全敬焕这个能随意出入青瓦台的“皇亲国戚”，各部官员争相笼络、逢迎，致使国库中的钱财源源不断地流入“新村运动”的小金库；一些财界大亨也纷纷捐献钱款。全敬焕不仅巧立名目“集资”，而且强买强卖、逼迫银行向面临倒闭的企业贷款。他利用职务之便，置房、买车、购股票、贪污受贿，成为有名的暴发户。

全斗焕下野前夕，韩国新闻媒介就陆续报道了全敬焕任职期间利用全斗焕的地位和影响力，胡作非为、侵吞公款的舞弊行为，但当时全斗焕尚在台上，这起案件以撤销了一位“替罪羊”的职务而草草收场。

全斗焕下台以后，全敬焕预感到在劫难逃，准备到日本躲避。1988年3月1日，全敬焕夫妇用假名订票，准备飞往日本大阪；不料，在汉城金浦机场登机时被人认出，暴露了行踪。此事立即引起舆论界的强烈反应。各报均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全敬焕大阪之行的消息，纷纷猜测他是为逃避审查而出走的。有的报纸还指责当局失职，让有重大经济舞弊行为的嫌疑犯逍遥法外。3月19日，南朝鲜三个主要在野党发表声明，要求当局立即召回全敬焕，并对他的犯罪事实进行彻底追查。迫于舆论的压力，刚刚卸任的全斗焕也放出风声，说他同意让当局对“新村运动”领导人立案调查，以辨明是非，做出一种“大义灭亲”的姿态。

1988年3月20日，全敬焕夫妇从日本回到南朝鲜。三个主要在野党再次呼吁当局立即拘捕全敬焕。在这样的形势下，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不得不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对“新村运动”领导人舞弊案进行调查，并禁止全敬焕再次出国。此后，总检察厅传讯了200多名政府官员和“新村运动”职员，初步掌握了全敬焕贪污巨额公款的重要线索，其中包括他在汉城各银行和投资信托公司用假名或亲友名义开立的10多个存款户头。3月29日，总检察厅正式传讯全敬焕。在检察厅门口，愤怒的群众把全敬焕层层围住，痛骂不止，还有人打了他一记耳光。据参与审讯全敬焕的检察长康一元说，全敬焕起初拒不承认自己有罪，在连续侦讯20个小时后，特别是检察官出示了他的秘密帐簿和一些证人的口供后，他才作了部分招认。

1988年3月31日，警方以“特殊经济犯罪”的罪名逮捕了全敬焕。同时被捕的还有：“新村运动”中央本部的前任经理郑章熙、宣传部长文清，“社会体育振兴会”前经理课长宣柱润及全敬焕的两个亲戚，“新村运动”新闻社前总务部长黄兴植和福利机构“青松院”的理事金胜雄等多人。

检察当局公布的调查报告说，全敬焕在“新村运动”中央本部任职期间，共挪用公款173次，贪污受贿金额达78亿韩元（约合1040万美元）。参与全敬焕犯罪案的有63人，与这些案件有关而被调查的共有218人，包括全敬焕的亲友、财经界的知名人士和前政府官员。其重大违法舞弊行为有：

1. 骗取国有土地，进行违法开发。位于仁川湾的永宗岛上约有250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全敬焕以“新村运动”名义向当局申请到无偿使用这块土

地的许可，转手就交给了由他任会长的、与“新村运动”毫无关系的“指导者育成财团”开办“青少年综合训练所”。因为土地不敷使用，他还压价强行征购民地，并在永宗岛沿海非法填海造地。借口兴办“青少年综合训练所”向各大企业募捐来的24亿韩元的款项，也全部塞入私人腰包。

2. 勾结政府官员，用公款资助私人企业，并偷税漏税。他一上任就强买原属私有的“新村新闻社”，成了拥有51%股份的控股老板。然后，他串通“内务部”的人用公款包销他的《新村周报》，用于赠送“新村运动”各级干部。6年间，共耗用国库资金88亿韩元。此外，他还借“政府宣传物”的名义，胁迫“文化部”出资32亿韩元出版其《新村月刊》1005万份；让“国防部”用军款买下他的《社会体育》杂志作为军队的政训材料，然后采取虚报销售数的办法逃税10亿韩元。

3. 擅自挪用“大韩体育会”经费。在全敬焕的指使下，“大韩体育会”累计有16亿韩元的经费被挪用于“新村运动”中央本部举行各种体育比赛。致使该会财力枯竭，不得不从1983年起中断其社会体育振兴事业。

4. 侵吞“新村运动”海外研修费用。1981年至1987年，“新村运动”中央本部共选拔6000名基层活动分子到国外考察进修，这项活动的专款余额约有4.7亿韩元，绝大部分被全敬焕挪作私用。1986年，全敬焕举办“新村运动干部培训班”，被迫受训的2400多人每人出资30万韩元，这笔收入就是笔无头帐。他还从各官方部门抽调175名亲信到其中央本部工作，而让原单位支付这批人的工资。

1988年4月2日，总检察厅对全敬焕等人提出起诉。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审理，1988年8月22日汉城刑事地方法院对全敬焕作出了判决，判处全敬焕15年徒刑，罚款21.4亿韩元，并且追加征收税金13.4亿韩元。

全敬焕不服判决，提出上诉。最后，汉城高等法院改判全敬焕7年徒刑、罚款32亿韩元。

全敬焕是全斗焕家族中第一个落入法网的成员，他的受审标志着全斗焕“第五共和国”的黑幕即将揭开。

全敬焕一案被法院判决后，人们的注意力便转向追查全斗焕家族其他成员的舞弊行为。在新闻媒介和在野党的推动下，全斗焕家族、亲戚的舞弊丑行一一大白于天下。到1988年底，除全斗焕夫妇外，被点到名的还有全斗焕的哥哥、弟弟、堂弟、岳父、外甥、妻叔等10多人，其中有9人相继入狱。他们侵吞公款数额之巨，手段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

李顺子——全斗焕的妻子，她早在数年以前就因叔父的经济犯罪而引起人们的注意。有关她本人利用特权的犯罪问题，也是在全斗焕下台后才陆续被揭露出来的。全斗焕当上总统的第二年，即1981年，出身名门、喜弄权势的李顺子就建立了了一个名叫“新一代育英会”的妇女团体，她自任会长。该会以振兴幼儿教育为名招收会员，募集资金。这个“育英会”很快就在各市、郡、区建起了组织网，会员达1.5万名。一般会员入会后每年要交会费1万韩元，终身会员则要一次性交纳20万韩元的会费。名誉会员多是各财团、企业的会长、社长等，他们要交比会费多得多的“赞助金”，据说这样的名誉会员共有900多名，其赞助金是由李顺子本人亲自掌管。“育英会”究竟接受了多少“赞助金”，谁也搞不清楚。这个组织自称到1987年底拥有总资产215亿韩元。但据人们推算，这个数目与实际金额至少相差几百亿韩元。

以帮助治疗幼儿先天性心脏病为名建立的“新一代心脏财团”，也是李顺子的聚财机构。她自任理事长，其组织形式与筹资方式与“育英会”大同小异。

在担任上述两个团体的会长期间，李顺子共接受了 160 多次捐款，款额达 223 亿韩元。1988 年 10 月 14 日，李顺子因涉嫌贪污“育英会”捐款宣布辞去该会会长职务。

**全基焕**——全斗焕的哥哥，他 50 年代当过兵，60 年代当过交通警察，70 年代回家种地养猪。1980 年全斗焕出任总统后，他随即迁入汉城，与上“泛韩旅行公司”副总经理，每月工资 170 万韩元。他不仅利用权势扶植自己和亲戚的企业，而且干顶警察局的人事安排和借款事务。1983 年至 1988 年 5 月，他先后捞取好处 27 亿韩元，其中包括强夺汉城鹭梁津渔业市场经营权的回扣、利用公款购买小汽车、贪污公款。1988 年 11 月 12 日，汉城地方检察厅南部支厅在传问全基焕后，决定对他以“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法”的“业务上滥用公款罪”嫌疑予以拘捕。1989 年 5 月 9 日，全基焕被汉城法院判处 4 年徒刑和罚款 10 亿韩元。

**全淳焕**——全斗焕的堂兄，他原是大田市经营水产的一个小批发商，1983 年一跃成为大田市水产市场株式会社总经理。1986 年他利用权势批给三德建筑公司建造高尔夫球场（占地 1282 亩）的许可证，受贿 3700 万韩元。他还以帮助别人打官司为名，收取贿赂 2 亿韩元。1988 年 11 月 7 日，67 岁的全淳焕以受贿和违反律师法罪被捕。此后，法院以初犯、高龄、患病为由判处全淳焕 1 年 6 个月徒刑，缓期 3 年执行，罚款 1000 万韩元。

**全禹焕**——全斗焕的堂弟，他原在乡村经营碾米作坊，全斗焕上台后，他迁入汉城，当上了“全国粮谷加工协会”会长。他通过帮助一些公司获得高速公路休息站的建立许可证和购买国有水面的许可证，收贿 1.75 亿韩元。1988 年 11 月 12 日，54 岁的全禹焕以诈骗罪和违反律师法罪被捕。经审讯，法院判处他 10 个月徒刑，退赔 550 万韩元。

**李昌锡**——全斗焕的内弟，原为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1983 年依靠全斗焕的权势创办东一公司，大发横财。调查发现，他还贪污了公款 29 亿韩元，偷税 17.7 亿韩元。他于 1988 年 11 月 15 日被捕。1989 年 2 月，法院一审判处 38 岁的李昌锡 3 年徒刑，缓期 5 年执行，罚款 35 亿韩元。

**李圭升**——全斗焕的妻叔，他在为三湖财团说情延长银行贷款偿还期时，收取了 5 亿韩元的贿赂，后退还 4.5 亿韩元。法院判处 69 岁的李圭升 2 年徒刑，缓期 3 年执行，退赃款 5000 万韩元。

**洪淳斗**——全斗焕的连襟，他以说情不调查某企业的纳税情况为条件，收取航空货物协会该企业代表的好处费 3.16 亿韩元。1988 年 11 月 13 日，49 岁的洪淳斗被依法逮捕。1989 年，他被法院判处徒刑 1 年 6 个月，退款 3.16 亿韩元。

**金永道**——全斗焕的外甥，他原本是一个木匠，1988 年 1 月至 4 月期间，他先后以说情打通关节释放 6 名刑事犯人为诱饵，共诈骗罪犯家属钱款 2850 万韩元，于 1988 年 10 月 26 日被捕，被判刑 1 年 6 个月。

自从全斗焕家族成员和亲戚的舞弊丑行陆续被新闻媒介披露以后，民众和在野党要求追查全斗焕营私舞弊内情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很快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潮。

1988 年 4 月韩国国会大选之后，三位在野党领袖金大中、金泳三、金钟

泌在国会内组成了反对党联盟，使国会于6月份通过了调查光州事件和全斗焕是否有营私舞弊行为的提案，并设立了调查此案的国会特别委员会。由此，对全斗焕的调查拉开序幕。

1988年10月2日，汉城奥运会结束。此后，全国上下的注意力又转向全斗焕案情的追查，反对党与执政党在此问题上的角逐也日趋激烈，国会特别委员会开始传讯有关证人。

1988年11月3日是韩国“学生节”，这一天，汉城、大丘、光州等地的许多大学纷纷成立“逮捕光州事件和第五共和国舞弊事件主犯全斗焕、李顺子斗争本部”，下设“特攻队”、“敢死队”、“义勇队”等组织，声称要站在国民前列，一直斗争到全斗焕夫妇受到国民的严正审判为止。11月6日和19日，韩国20多个在野的政党和政治团体在汉城、釜山、光州等地举行集会和示威，要求政府逮捕、惩处全斗焕夫妇。他们表示，“逮捕惩处全斗焕夫妇是国民不可逆转的意志”。在汉城和某些城市，参加示威的学生、市民与警察发生了冲突，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汉城延禧洞全斗焕的私宅所在地附近，一度成为冲突的现场。

为了平息民愤，稳定政局，为了削弱全斗焕的势力，为了从轻了结全斗焕的“历史问题”，总统卢泰愚经过再三斟酌，推出了名为“政治解决全斗焕时期后遗症”的方案。

首先，卢泰愚劝说全斗焕向国民道歉，交出财产，退隐乡里。

全斗焕起初拒绝向国民道歉，但慑于民众的抗议怒潮日益高涨，加上卢泰愚三番五次派人游说，直至亲自给他打电话讲明得失，最后只得在1988年11月23日通过电视发表了向国民道歉的声明。

1988年11月23日下午3时，全斗焕缓步从汉城延禧洞私邸的内室走出，表情漠然，微微低头，一改他过去主动与记者打招呼的习惯，径直走到早已准备好的话筒前，拿出了讲稿。

他说：“我以十分凄怆的心情，站在各位国民的面前。在过去的9个月里，我日日夜夜都沉浸在痛苦的反省和刻骨铭心的悔恨之中，深感自己罪恶深重，难谢国人，……。”他为自己执政期间的种种罪行向国民赔礼道歉，承认他执政的“第五共和国”是“黑暗时代”，宣布交出他的“全部财产”和政治资金，他将隐居乡间，“静静地反省过去的错误”。他宣布交出的政治资金为139亿韩元（约合2000万美元）。他宣布交出的财产有：汉城延禧洞豪华住宅一处（占地1270平方米），其子女所住的小楼两栋，瑞草洞地皮一块，龙平地区别墅一栋，私人存款330万美元。

在宣读其道歉声明的27分钟之内，他几次停下来，似乎在强忍夺眶而出的眼泪，并两次凄然泪下泣不成声。当念到最后的“各位国民，我实在罪不容恕。”时，他似乎悲伤难以自持，急忙转身离开话筒而去，把当初安排的回答记者现场提问的计划忘得一干二净。

20分钟后，全斗焕夫妇走出了他们的延禧洞私邸，要动身去隐居。为他们送行的人，只有执政党的代表尹吉童夫妇等几人。在迈出大门时，李顺子失声痛哭，双手遮面，全斗焕表情木然，双唇紧闭。

他俩乘坐的轿车在军警的严密保护下离开了汉城，驱车前往在汉城东方约120公里远的“百潭寺”。到达终点时，早有长老在寺门口迎接。全斗焕面向长老，双手合十，忏悔地说：“在下罪孽深重，愿在长老门下每日在佛像前祷告，为我执政时牺牲的亡灵忏悔，以求革心洗面。并愿后人慎受此教

训，勿蹈覆辙。”

全斗焕向国民公开道歉的第二天，卢泰愚总统发表电视讲话，恳请公众不再追究已经“认错”的前总统的刑事责任。他说，全斗焕“所承受的痛苦已经足够了，对他的任何起诉都将是不公平的政治惩罚”。为了表明当局的公正，卢泰愚还提出了赦免释放全斗焕时期关押的所有政治犯，对光州事件的受害者恢复名誉、职务和给予经济补偿等一系列措施。他宣布，为防止再度发生此类事件，将对《国家安全法》和《社会保安法》等有碍民主化的法律予以修改，为政治资金透明化制定法规。在作出这些承诺后，卢泰愚表示希望“国会”对全斗焕问题的调查听证能在1988年底结束。

为配合以上两项措施（全斗焕认罪、卢泰愚要求国民豁免全斗焕的刑事责任）的实现，卢泰愚又对“内阁”和执政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大幅度的改组。1988年12月5日和8日，卢泰愚分别公布了改组后的内阁名单和执政的民主正义党领导班子名单。1988年2月底成立的内阁中，除了“动力资源部”和“国土统一厅”等4个部门首脑留任外，其余21名内阁成员（包括总理、副总理以及屡遭非议的全斗焕旧班底的7名阁员）全部予以撤换。新任“内阁总理”姜英勋原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曾因抨击朴正熙发动的“5·16”政变而被指控为“反革命”下狱。新内阁中还包括一名在野党“统一民主党”政务委员，以示笼络。

卢泰愚的“政治解决全斗焕时期后遗症”的方案虽然收到良好的效果，但不少人则认为一纸道歉根本抵偿不了全斗焕在执政期间欠下的万千罪孽。金大中等在野党领袖尖锐揭露和批评全斗焕的道歉声明回避了事实真相，他公开的个人资产是一个大大缩小的数字。韩国“要求逮捕全斗焕斗争本部”也发表声明说，全斗焕的道歉纯属欺骗，没有一点忏悔之意，是一种纯属形式的政治游戏。对卢泰愚呼吁豁免全斗焕的罪行，在野党没有作出积极反应，仍坚持由“国会”出面传讯全斗焕，直至弄清真相为止的立场。全斗焕虽然远遁百潭寺，但在野党和广大民众并没有就此罢休。

1989年1月31日，韩国检察厅公布了对全斗焕有关问题的调查结果。

1. “日海财团”是全斗焕执政时期组织的一个智囊机构，专门为全斗焕的内外政策出谋献策，全斗焕自任财团董事会会长。据说，在该组织成立之初，全斗焕曾要求各大财团捐款赞助，并将这些款项作为全斗焕的“政治资金”。检察厅的调查报告认为，捐款确有其事，但未发现资金挪作它用。

2. 关于全斗焕之妻李顺子贪污“育英会”公款问题，检察厅宣布说，她直接经手的223亿韩元加利息共374亿韩元，除2.69亿韩元赠给了养老院外，其余部分全部转交，未发现有贪污问题。

3. 关于全斗焕父母坟地超过规定面积问题，检察厅宣布的确有其事，并已构成犯罪，但起诉期限已过，起诉自然失效。

总之，检察当局的调查结论与卢泰愚的指导思想“不谋而合”。

由于调查没发现犯罪问题，所以，检察厅宣布，对前总统全斗焕免于起诉，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韩国检察厅对全斗焕问题的这一处理结果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在野党都表示不接受检察当局的调查结果，认为这一调查未能突破卢泰愚政府的阻挠，要求当局重新进行调查。

国会特别委员会对“光州事件”的调查，也是阻力重重。

光州事件的调查，包括查清当时发布镇压命令的最高负责人是谁，现场

执行命令者下达命令的经过。但是，军方拒绝提供任何当时的记录资料，拒绝出席国会的听证会；国会3次要求全斗焕到国会出席作证，都遭拒绝。1988年12月，几名下级军官在国会作证后，国防部长官李相薰对国会施加压力，威胁说如果国会一意孤行军方将采取别的行动。因此，“国会”的调查同样毫无进展。

为了应付在野党的一再要求，1989年12月全斗焕曾回汉城到国会出席作证、接受质询。此后不久，国会于1989年12月宣布对第五共和国的政治清算正式结束。

从1988年11月23日开始，全斗焕夫妇开始了他们的“自我流放”的隐居生涯。

据知情人透露，全斗焕决心离开汉城去隐居，是在1988年11月19日。此前，当局曾提出让全斗焕“告老还乡或隐居”的方案，但遭到全斗焕拒绝。1988年11月中旬，出访东南亚的卢泰愚归来同全斗焕多次电话交谈后，全斗焕便改变了初衷，表示愿去过隐居生活。

可是到哪里去隐居呢？全斗焕的心腹、前“文公部”次官许文道劝说全斗焕放弃休养院或私人别墅之类的地方，并向他推荐了百潭寺。全斗焕选择百潭寺的用意在于这里生活十分不便，普通人难以忍受，这易激起国民的同情。同时安全也易于保障。百潭寺背靠险山，寺前横一条溪谷，从山外进入寺庙仅有一条可供一辆小轿车通行的小路，只要封锁住溪谷入口，外人则无法接近寺庙。

在百潭寺，全斗焕夫妇深居在一间面积7平方米的禅房里，那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更没有暖气，房间内摆设十分简单，特意为他们准备的家具仅有一张矮小的书桌和一对充气沙发。这与昔日的青瓦台总统府和延禧洞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1988年11月23日，在摄氏零度以下的气温中，全斗焕夫妇度过了隐居生活的第一夜。次日清晨，全斗焕夫妇鸡鸣即起，按照寺规随同众僧一起4点半开始在正殿拜佛念经。此后，这已经成为全斗焕每日生活的第一课，从不间断。为了表示虔诚，他每次都跪拜108回。而李顺子在坚持了几天之后，便称病不来跪拜了。

全斗焕每天清晨诵经1小时，然后回到主持的房间里喝茶、交谈，7时半进早餐。早餐是用大豆、大麦做的“杂粮饭”和大酱汤、盐渍野芝麻叶等。早餐之后，一整天便是全斗焕的“自由时间”。全斗焕有时到饭灶去烧火，有时则到大雄殿的后院劈柴。据说，最令这对夫妇烦恼的，莫过于上厕所和洗澡。这里山高风寒，冬天蹲在用木条搭就的厕所里，实在难耐。每逢洗澡，夫妇二人又得轮流蹲伏在大木桶里，用山上接来的雪水擦洗，其中的苦楚可想而知。这一切，对于从小受过磨难、如今身体健康的全斗焕来说，还能较快适应。而自小过惯了豪华生活的将门之女李顺子，面对这种“非僧非囚”的生活，似乎感到人生的末日已经来临。

隐居以来，前来拜访全斗焕夫妇的人寥寥无几。往日难以计数的追随者，同他的权力一道消失了。当然，这可能也与全斗焕“闭门谢客”的重要信条有关，这多半是出于安全和避嫌的考虑。全斗焕的唯一常客，是他的女儿和女婿。1988年11月26日，当女儿全孝善和女婿、外孙女第一次来百潭寺探望时，全斗焕夫妇迎出寺庙，李顺子一见到女儿、女婿便搂住女儿痛哭起来。是夜，全斗焕夫妇室内的烛光彻夜未熄。女儿、女婿每次上山，总要给父



母带些换洗衣物、书籍和食品，当然也不会忘记传递一些重要信息。至于陪同全斗焕前来的原总统府警卫室长安贤泰，在山上住了不长时间便径自离去了。另一位来访者是全斗焕当政时的“文公部”次官许文道，此人在寺内与全斗焕一起叙谈，彻夜饮酒，但只小住两日，便匆匆下山。1988年底，全斗焕的这位心腹也已悄然飞往海外。

上山之后，全斗焕养成了一些新习惯：不读报，不听广播，更不看电视。他怕听到学生们“要求逮捕全斗焕”的呼喊，怕看到国会要他出面作证的场景，更怕听到知情人的证词。为了打发时光，他只得读书和练字消遣。但决不看政治书籍，因为他不想怀旧，也不愿直面现实。他读得较多的，要算佛经方面的书了。实在无聊难耐时，他便带上几名贴身警卫，游览远近寺庙。有座距百潭寺15公里的寺院，100天之内他已光顾过4次。

全斗焕上山之后，四周戒备森严，游客大减。历来靠向旅游者提供服务为生的山民们因此而怨声载道：“要人上山，警察设岗，财源断绝，日子难过。”他们甚至已将此事上告到江原道政府。

全斗焕夫妇隐居百潭寺，也引起了佛教界部分人士的抗议。一些佛教徒认为，“神圣的寺院收留镇压佛教徒的独裁者有悖圣训”。有的佛教团体还发表声明，称“佛教界把最大的强盗奉为宾客不可容忍”，“在寺院周围部署大量兵力，把寺院变成军事要塞，意味着剥夺佛教徒的信仰生活”。攻击的矛头直指当局。

一些僧侣和大学生还以集会、绝食的方式向当局表示抗议。1988年12月10日，4名僧人和18名大学生冲过警察的外围封锁线，行至百潭寺入口处，要求把全斗焕夫妇从百潭寺驱逐出去。大学生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有4人受伤。

从1989年2月6日起，全斗焕为他执政期间无辜牺牲的人作了历时100天的佛教祈祷活动。5月16日，百潭寺为全斗焕举行了结束100天静修的大法会，全斗焕夫妇和包括佛教僧侣在内的大约600人出席了法会。在仪式上，全斗焕围绕佛塔漫步时，泪流满面。参加这次仪式的一位高僧说：“全斗焕已成为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了。”

1990年7月，卢泰愚总统宣布：全斗焕可以结束隐居生活。但由于在野党的抗议声势很大，韩国政坛是“朝小野大”（即在野党势力很强大），卢泰愚建议全斗焕不要回首都，最好找一个“政治上安全”的地方暂时栖身。

但全斗焕已不是1988年“抬不起头”的处境了，态度也强硬起来。他公开对卢泰愚表示不满说，“这两年，政府和执政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结果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侮辱”，“我被某些人利用了”。并且说，卢泰愚名义上允许他下山，实际上又不让他回汉城自己的家，是在作表面文章，为自己脸上贴金。他甚至以“拒绝下山”相要挟，摆出“老上司”的架子放风说：“卢泰愚不来接我，我就不离开百潭寺。”

卢泰愚一向处事圆滑，并不愿意将此事弄僵闹大。在1990年12月24日“辞旧迎新”的记者恳谈会上，卢泰愚再次表示：希望全斗焕结束隐居生活。他说：“从宪政史的传统和发展民主政治的角度讲，全斗焕不应再过隐居生活，而应该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并且，对全斗焕的要求作了让步，允许他回汉城延禧洞私邸居住。

1990年12月30日，全斗焕在百潭寺度过了2年零37天的隐居生活后，又回到了汉城延禧洞的私邸居住。此后，虽然民众和在野党要求追究全斗焕

历史问题的呼声时强时弱，但在卢泰愚任内没再进一步追究。

1990年1月22日，卢泰愚的民主正义党、金泳三的统一民主党、金钟泌的新民主共和党，三党合并为“民主自由党”。金泳三被选为卢泰愚的接班人。1992年8月25日，卢泰愚辞去了民主自由党总裁职务，把党内大权交给了金泳三。1993年2月25日，卢泰愚5年总统任期届满，退出总统府，把权力移交给新当选的总统金泳三。

1995年的夏秋之际，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国家大检察厅对1979年的“肃军政变”和1980年的“光州事件”再次进行调查。当时，金泳三总统公开表示，对于这两起事件，“还是让历史去审判吧。”

或许也正是因为有金泳三总统的这一基调，大检察厅不久便作出决定，不追究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以及其他50多名当事者的法律责任。检察当局解释说，当时他们（全斗焕等人）是按照权力程序采取行动的，超越了法律关系的范围，所以检察部门无权对他们采取法律行动。

反对党对检察当局的决定反应强烈，认为这是金泳三总统有意掩盖历史。作为最大的反对党“新政治国民会议”总裁的金大中，曾在议会中先后提出了三个议案，要求推翻大检察厅的决定，组成一个特别调查机构，调查1979年军事政变及1980年“光州事件”。然而，金泳三政府坚持其“不予法律追究”的立场，并不打算理会反对党的要求。

就这样，第二次追究全斗焕历史问题的调查，又不了了之。

然而，就在反对党对追究全斗焕历史问题一筹莫展的时候，韩国政坛突然出现了重大变化。

1995年10月，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丑闻曝光，在舆论的强烈要求下，检察机关于1995年11月16日逮捕了卢泰愚。卢泰愚承认，他在执政期间从经济界收取了大约5000亿韩元（约合6.5亿美元）的政治资金，卸任时尚剩有1857亿韩元。

1995年11月24日，总统金泳三突然改变以往有意袒护全斗焕的立场，宣布要制订“5·18特别法案”，以重新调查1979年12月12日军事政变和1980年5月18日全斗焕当局镇压光州民主化运动事件。

总统金泳三的这一决定，出乎各方人士的意料，特别感到震惊的当然是全斗焕。

据说，全斗焕对金泳三的决定毫无思想准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全斗焕一时不知所措。在与亲信紧急磋商后，他通过其律师很快发表了一个讲话。该讲话声称，“制定特别法，将会给宪政史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因为它允许出于政治报复追溯既往的法律。”根据宪法第十三条，任何人不能因为追溯既往的法律而受到惩罚。全斗焕方面表示，光州事件的真相已经在1988—1989年持续18个月的议会听证会上得以解决，而且今年检察当局也作出决定不追究当事者的法律责任；根据法律，对全斗焕指控的公共行动到1995年8月已告终止。

卢泰愚方面也作出了一些支持全斗焕的表示。卢泰愚的一位律师说，“不惩罚成功的政变者是一个法律惯例。”与此同时，很多与全斗焕、卢泰愚有直接间接关系的现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政治家、军界要员，对金泳三的决定也表示了极大的不安，他们无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表示担忧。

然而，这时候的舆论对金泳三极为有利。一些学生趁热打铁，继续举行各种示威活动，甚至跑到全斗焕家门口示威，要求立即逮捕全斗焕。律师界

也驳斥了全斗焕方面关于法律时效的立场，认为对于类似这种叛乱、非人道罪行，宪法没有规定追究时效的限制。

1995年11月30日，韩国检察机关宣布，取消以前作出的对事件主谋免于起诉的判决，重新调查全斗焕等的历史问题。

1995年12月1日，一张传票送到全斗焕手里，要求他于12月2日下午前往汉城地方检察厅接受传讯。

但是，全斗焕的态度非常强硬，他断然拒绝检察当局的传讯，并于当日上午9时在他的家门口面对数以百计的记者和摄像机，向全国发表了一个《全斗焕对国民声明》。这位前总统指责检察当局重开了一个了结的案子，说这仅仅是为了金泳三总统的政治需要。他表示，他的这一案子，已经经议会听证会和检察当局的调查而告终结。在他的声明中，他大肆攻击了金泳三总统。他说，如果象金泳三总统声称的那样他被怀疑破坏了宪政秩序，那么金泳三自己也应该承担作为一个“曾经与叛军结盟的人”的责任。全斗焕说，“这位差不多当了三年总统的金泳三，居然以指责我为叛军头子而全盘否定历史”。

在发表了他的这一声明之后，全斗焕前往国家公墓拜谒了先烈，然后前往庆尚南道陕川郡他的老家。显然，全斗焕对出尔反尔的金泳三表示了极大的鄙视。

对于全斗焕蔑视检察当局的挑战性行为，国家大检察厅作出强烈反应，当天就签发了对全斗焕的逮捕令状。

1995年12月3日凌晨，在绝大部分人还在梦乡的时候，执行逮捕令的警察已赶到离汉城约300公里的陕川，把全斗焕逮捕，押往汉城郊外的汉养拘留所。一位检察官说，在全斗焕声称完全不与检察当局合作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采取必要的法律步骤而别无其他的选择。”逮捕令状指控全斗焕为叛军首领，涉嫌主谋了1979年的武装政变并镇压了1980年光州民主化运动。

在收押全斗焕的当天，特别调查小组就对全斗焕进行了持续11个小时的审讯。然而，这位前总统在许多实质性问题上行使了“沉默的权利”，因而使审讯收效甚微。从发表“声明”到拜谒国家公墓，接着回老家，一大早又被捕，并接受了11个小时的审讯，如此折腾了三天的全斗焕在拘留所里显得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从这一天开始，他拒绝拘留所提供的饭菜，以绝食显示他的强硬立场。据说，全斗焕告诉他的律师，在第五共和国以及有关问题的历史被歪曲的情况下，他没有理由再活下去。

两位前总统被送进监狱之后，执政的民主自由党内掀起了一股小小风波，因为毕竟在这个党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卢泰愚和全斗焕的势力。不几天，民主自由党在南部两个道的地方领导人宣布退出民主自由党；党内的第二号人物金润焕向金泳三递交了辞呈，表示不能继续与金泳三合作。然而，金泳三挽留了金润焕，并同他一起把他们的民主自由党改成了“新韩国党”。

1995年12月5日，卢泰愚由于涉嫌犯有“特别受贿罪”被韩国大检察厅起诉，其非法财产将通过法律程序予以没收。

1995年12月7日，《韩国日报》说：政界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全斗焕任总统期间共积累了1万亿韩元左右的秘密资金，已经花掉的有7000亿韩元，现在隐匿起来的有3000亿至4000亿韩元；如此算起来，全斗焕的秘密资金是卢泰愚的两倍。

1995年12月18日，卢泰愚第一次出庭受审，卢泰愚对收受巨额资金供

认不讳，但不承认这是“受贿”。

1995年12月19日，韩国国会表决通过了“5·18特别法案”，将对发动1979年12月12日军事政变和导致1980年5月18日光州事件的主犯和从犯的诉讼期限推迟，以便追究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等人的刑事责任。国会通过的这项特别法案将这两次事件中被告人的诉讼有效期定为1993年2月24日至2008年2月24日。此外，国会还一致通过了《关于破坏宪政秩序犯罪及诉讼时效的特例法》，该法废除了刑法上的内乱外患罪、集体杀害罪、军事刑法的叛乱罪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即诉讼时效永远不适用于上述犯罪。

1995年12月21日，全斗焕被检察机关正式起诉。检察机关指控他犯有特别受贿罪、军事叛乱罪、非法调动军队罪等罪状。当天，绝食18天的全斗焕由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被送往汉城警察医院治疗。12月31日，全斗焕停止绝食。

1996年1月9日，汉城地方检察厅透露，全斗焕在1980年至1988年担任总统期间建立的秘密资金可能会超过5000亿韩元，全斗焕秘密资金使用较多，余额比卢泰愚的要少。

1996年1月15日，汉城地方法院就秘密政治资金一事第二次审判前总统卢泰愚。

1996年1月23日，汉城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本部发布了“12·12政变”及“5·18光州事件”调查结果，认定“这一事件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内乱”，并以“内乱”罪对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追加起诉。同时，还起诉了参与内乱的核心人物第三军司令官俞学圣、陆军参谋次长黄水时、当时的国防部长官周水福、戒严司令官李喜性、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车圭宪等6人。

1996年2月26日，全斗焕因被起诉犯有“受贿罪”第一次出庭受审。10时2分，汉城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审判全斗焕等6名被告。检察官在法庭上列举了全斗焕在执政期间利用职权从40多家大企业收受7000多亿韩元（约8.7亿美元）秘密资金，其中259亿韩元为“贿赂金”的事实细节。全斗焕承认收取过“礼金”，声称已记不清收了多少和从何而来了，但不承认这是“受贿”。下午5时，汉城地方法院宣布4月15日将再次开庭审判全斗焕等6名被告。

1996年3月11日，全斗焕和卢泰愚因被起诉犯有“军事政变和内乱罪”而同时出庭受审。上午10时2分，汉城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审判全斗焕、卢泰愚以及其他14名被告。当检察官宣读了全斗焕、卢泰愚等被告的指控后，全斗焕等被告人的辩护律师立即进行了全面否认。3月18日，汉城地方法院第二次就“军事政变和内乱罪”审讯全斗焕、卢泰愚。3月25日，汉城地方法院开庭审讯参与“12·12政变”的9名被告，但被告仍否认“12·12”事件是有预谋的军事政变。全斗焕、卢泰愚和其他2名已经受审的被告列席了这次审理。

1996年4月11日，韩国举行第15届国会大选。次日，选举结果揭晓。在国会299个议席的角逐中，执政的新韩国党获得139席，未能达到半数；新政治国民会议（金大中任总裁）获得79个议席，自由民主联盟（金钟泌任总裁）获得50个议席，民主党获得15个议席，无党派人士获得16个议席。

1996年4月29日，汉城地方法院第三次审理全斗焕秘密资金一案。根据全斗焕等人的受贿事实，法院宣布全斗焕受贿事件是一起“高级官员有组

织的、权力型、钱权交易性质的腐败”事件。法院没有对全斗焕进行判决，其原因是全斗焕除犯有受贿罪外，还被指控犯有“军事政变和内乱罪”，待全部案情查清后再进行最终判决。

由于此案尚处于审理阶段，全斗焕何时将被定罪？他将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下场？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鉴于此案案情性质严重，与执政党关系密切，而且 1997 年韩国将举行总统大选，估计此案难以在短时间内结案。而且，政治分析家们普遍认为，全斗焕没有生命危险。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对于韩国人民来说，全斗焕最终受到法律的惩罚是件大快人心的事。

## 韩国前总统卢泰愚 1996 年出庭受审

1995 年秋，一个偶然的机使国会议员朴启东发现了卢泰愚藏匿的 100 亿韩元秘密政治资金，才使卢泰愚的巨额秘密资金丑闻败露。1995 年 11 月 16 日，韩国警方以接受贿赂和藏匿巨额政治资金的罪名逮捕了前总统卢泰愚。

这一丑闻的曝光，终于使人们看清卢泰愚总统的全部面目。

卢泰愚显得比他的实际岁数年轻。他在 1988 年 2 月 25 日就任韩国第六任、第十三届总统时，年仅 56 岁。在他当政的 5 年中，朝鲜半岛形势朝着缓和的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很好地完成了“军人执政”向“文官执政”的过渡。卸任时依然那么精神抖擞的卢泰愚也因此受到世人的瞩目。

卢泰愚，1932 年 12 月 4 日出生于庆尚北道达城郡。庆尚道也是总统朴正熙、全斗焕的出生地。卢泰愚比全斗焕小接近两岁。卢泰愚的祖先在朝鲜王朝时曾是达官显贵，到卢泰愚的祖父这一辈，家道中落。卢泰愚的父亲卢秉寿是位农民，靠自学得了初中文凭，被村里人称作“博学多才的人”，在卢泰愚 7 岁时他不幸死于车祸。家庭中良好的文化气氛对幼年时的卢泰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卢泰愚上小学时，到学校要走 20 多里艰险的山路，6 年里他上学风雨无阻，没有旷过一天课。1945 年，卢泰愚靠叔父的资助考入大邱工业中学，后又考入当时一流的庆尚北道高中。那时，年轻的卢泰愚立志当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

朝鲜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卢泰愚的“医生梦”。1950 年，卢泰愚参军入伍。1951 年 10 月，他考入陆军士官学校。1955 年，卢泰愚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与全斗焕同是第十一期学员。毕业后，卢泰愚曾赴美国专修特别战争心理学。1968 年，卢泰愚从韩国陆军大学毕业。从 1955 年到 1978 年，卢泰愚在军界历任军事情报队英语翻译、反间谍科科长、首都师团大队长、步兵联队长、空军运输特战旅旅长（1974 年）、总统警卫室作战次长助理（1978 年）。1979 年，卢泰愚晋升为少将师长，率陆军第 9 师驻扎在三八线一带。1979 年 12 月，卢泰愚接受全斗焕的调遣，率领第 9 师从前线赶回汉城，积极参加了全斗焕 12 月 12 日发动的“肃军政变”。政变成功后的第二天，卢泰愚就升任首都（汉城）警备司令。1980 年，卢泰愚又出任陆军保安司令。1981 年 7 月，卢泰愚以上将军衔退出现役，结束了 30 余年的军人生涯，出任政务第二长官。1982 年初，卢泰愚代理体育部长官，同年又出任内务部长官。1983 年，任汉城奥林匹克组织委员会委员长。1984 年，任“大韩”体育会长兼“大韩”奥林匹克委员长。1985 年，卢泰愚任第十二届国会议员，同年任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

卢泰愚 60 年代就是全斗焕领导的陆军士官学校同窗会——“北极星会”（后改名为“一心会”）的领导人，1979 年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后卢泰愚与全斗焕的关系更加密切。1982 年卢泰愚任内务部长时，在政策问题上与全斗焕发生重大分歧，渐渐失去全斗焕的宠爱。但是，处世圆熟的卢泰愚，对全斗焕的尊重效忠依然如故。他精心培植自己的势力，广泛笼络党、政、军、财等各方人士，成为民主正义党内唯一能与全斗焕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

1986 年初，南朝鲜的反对党发动了 1000 万人的“改宪”签名运动，要求立即修改现行“宪法”，改“总统”间接选举为直接选举，实际上是要打碎全斗焕军人集团长期维持独裁统治的“法律”依据。全斗焕把“改宪”运

动视为洪水猛兽，立即出动军警镇压，并软禁了签名运动的领导人金大中和金泳三。

恰在这时，菲律宾马科斯独裁政权垮台（1986年2月25日）的消息传到了南朝鲜，它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极大地振奋了南朝鲜人民的斗志，反独裁运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

1987年上半年，韩国爆发了8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全国性抗议示威活动，形势极其严峻。全斗焕政府内的强硬派主张武力镇压，以卢泰愚为代表的温和派力主以“说服和对话来克服这次危机。”

铁腕人物全斗焕为内外压力所迫，接受了卢泰愚温和派的主张。全斗焕宣布，到1988年任期届满时他将“自动退位”。

面对严重的政治危机，全斗焕只好把权力向卢泰愚方面转移。1987年，卢泰愚接任民主正义党总裁，并被全斗焕集团内定为下届总统。

卢泰愚被全斗焕确定为接班人，对全斗焕来说，是企图保持一个没有全斗焕的全斗焕政权。换言之，全斗焕推出卢泰愚的目的，是要尽可能维持军事独裁统治。

为了提高卢泰愚的威信，经全斗焕集团同意，卢泰愚于1987年6月29日发表了包括“同意修改宪法，改组内阁，直接选举总统，赦免金大中并允许其自由参政”等内容的“民主化宣言”，博得朝野上下的赞扬，并引起极大轰动。此后，事态渐渐平息，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卢泰愚的政治家形象也因此树立起来，为他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打下了良好基础。

这一重大决定的宣布，是南朝鲜人民在反对党领导下几十年争民主争自由并付出血的代价取得的成果。它决不是卢泰愚或全斗焕的恩赐。这一决定宣布后，韩国上下立即转入总统选举的热潮中。

当时，有实力与卢泰愚竞争总统职位的主要有三人——金大中、金泳三、金钟泌。

金钟泌是前总统朴正熙的侄女婿，曾参与1961年朴正熙发动的“5·16”军事政变，70年代曾任南朝鲜总理，后被朴正熙抛弃而退出政界。朴正熙1979年10月被刺杀后，金钟泌被执政的民主共和党推举为该党总裁。他积极支持全斗焕的夺权行动，企图由他填补朴正熙死后留下的总统职位。全斗焕政变成功后，把他抛弃。金钟泌在韩国的影响远不如金大中、金泳三，当选总统的可能性非常小。卢泰愚、金大中、金泳三都不把金钟泌放在眼里。

卢泰愚竞选总统的真正对手是领导韩国几十年反独裁运动的两位著名领袖——金大中、金泳三。为了迎接大选，金泳三与金大中携手合作，共同组成统一民主党。在他们看来，这次总统选举他们领导的统一民主党获胜无疑，那么，就出现了他们两人谁当总统的问题。也正是在谁当总统的问题上，金大中和金泳三两人闹翻了。两人的资格、地位、知名度、立场，均旗鼓相当，而且两人都想当总统。

金大中比金泳三大两岁，他为反对军人专制独裁政权受过绑架、软禁和多次被捕，并被当局以“阴谋内战”的罪名判处死刑，后在美国的调解下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因病获保外就医；曾背井离乡，流亡美国多年。他几乎是用哀求的口气对金泳三说：“我为民主而斗争了几十年，这是我最后一次竞选的机会，你就让给我吧！”话虽说得感人至深，但金泳三怎么舍得让他梦寐以求的总统职位呢？由于达不成协议，两人只好分道扬镳，各干各的。金大中退出统一民主党，重新组建自己的政党——平民党。金大中与金泳三

的破裂，无疑给卢泰愚竞选总统创造了良机。

在总统竞选期间，卢泰愚提出的“在稳定中实现民主”的竞选口号，既抓住了中上层人士求稳怕乱的心理，也迎合了广大群众希望汉城奥运会如期顺利举行的愿望。此外，他又突然出访美、日两国，争得主要盟国的支持，在外交上捞了不少的分。再加上执政党掌管各种权力的有利条件，在1987年12月举行的总统直接选举中，卢泰愚终于当选韩国总统。

主要候选人的得票比率是：卢泰愚35.9%，金泳三27.5%，金大中26.5%，金钟泌7.9%。卢泰愚所得票数远未达到半数。这就清楚地表明，卢泰愚虽然为改善个人形象做了不少努力，却仍然得不到多数选民的支持。投票结果也显示，金泳三与金大中的分裂促成了卢泰愚当选韩国总统。

1988年2月25日，全斗焕总统任期届满，离开了总统府青瓦台，卢泰愚正式就任总统职务。

面对国内人民争取民主的大潮，本来就有民主倾向的卢泰愚认识到，轻描淡写地同全斗焕拉开距离是不行的，必须彻底改弦更张，否则就没有出路。于是，卢泰愚以就任总统为契机，大力塑造政府的民主形象。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出，新政府在政治上将致力于开创一个民主团结的新时代，逐步实现民主化。他强调，“军队必须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得介入政治。”他宣布，新政府将大赦政治犯，同青年学生对话，谋求与在野党合作，邀请在野党成员入阁。他同时宣布，总统任期5年，不得连任；并提出“清算权威主义”、“下放权力”，扩大总理及内阁的权限，实行“言论自由”等。

卢泰愚执政以后，的确为推进韩国民主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实现了他在就职演说中确立的目标。如，释放了100多名“政治犯”，在新内阁中启用了一些学者，同青年学生和反对党对话。尤其是在1988年3月，卢泰愚批准司法机关以特殊经济犯罪的罪名，将全斗焕的胞弟全敬焕逮捕法办。等等。

全斗焕推举卢泰愚做他的接班人，本来是想“换汤不换药”，继续在幕后操纵韩国政坛，实行“垂帘听政”。但是，足智多谋的卢泰愚上任不久，便打破了他的美梦。

1.全斗焕是军人出身，靠政变起家，在军队中有强大的势力，卢泰愚最担心的是全斗焕故伎重演，再次发动政变。为此，卢泰愚利用自己军人出身、对军界有相当影响的优势，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他一方面连夜召开秘密会议，任命自己心腹军官控制军队；一方面请美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因为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还驻在韩国，韩国军队也受美军控制。美国已看到全斗焕人心丧尽，表示支持卢泰愚政权。显然，稳定军队的这些措施，如果换成金大中或金泳三，是很难做到的。

2.卢泰愚知道财界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而全斗焕的三个重要心腹在财界很有影响，即前总理申铉镐、前外相朴东镇、前总统府秘书长金润焕。于是，卢泰愚就用重金和高官把他们收买在自己的门下，从而取得了财经界对新政府的支持。

3.全斗焕精心设计了一个“元老咨询会议”，并自任主席，企图借此操纵实权。但卢泰愚上台后，独立决断，根本不把“元老会议”放在眼里。全斗焕自知上当，但也无可奈何。

但是必须看到，卢泰愚之所以能够很快摆脱全斗焕的操纵，主要原因是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对他十分有利的变化。第一，美国早就敦促韩国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体，结束韩国的独裁统治。第二，金大中、金泳三领导的民主



化运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涨时期，广大人民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强大力量。这就为卢泰愚的民主改革提供了坚强的后盾。第三，民主思想在军人中有广泛传播，并且为广大中层军官、相当一部分高层军官所接受。这就使重新发动军事政变的代价，显著增加。也就是说，发动军事政变越来越不得人心。

1988年4月，韩国举行了国会选举。卢泰愚领导的民主正义党赢得125席，不足半数；金大中领导的和平民主党获70席，跃为第一大在野党；金泳三的统一民主党、金钟泌的新民主共和党也分别获得59席和35席。

1988年6月，金大中、金泳三、金钟泌在国会内结成反对党联盟，硬是排除执政党（民主正义党）的百般阻挠，设立了调查“光州事件”和第五共和国权力型舞弊案的国会特别委员会，以追究全斗焕的历史问题和以权谋私问题。

1988年9月、10月，汉城举办了第24届奥运会。

1988年11月，韩国各地爆发了要求追查全斗焕历史问题和营私舞弊问题的民众运动。为了平息民愤、稳定政局，卢泰愚多方协商，提出了“政治解决全斗焕时期后遗症”的妥协方案。其内容是：

1. 劝说全斗焕向国民道歉，交出财产，隐居乡里。

2. 为光州惨案的受害者平反。在全斗焕做电视道歉讲话的第二天（1988年11月24日），卢泰愚发表“特别讲话”，恳请民众不要再追究已经“认错”的前总统的刑事责任。他说：“全斗焕所承受的痛苦已经足够了，对他的任何起诉都是不公正的政治惩罚。”为了表明诚意，也是为了树立自己“民主总统”的形象，卢泰愚宣布：赦免、释放全斗焕时期关押的所有政治犯，为光州惨案的受害者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并给以政治、经济补偿；为了防止再度发生妨碍民主、助长营私舞弊的事件，立即着手对过去的《国家安全法》、《社会保安法》、《政治资金法》进行修改。

3. 为了表示和全斗焕政权彻底划清界限，卢泰愚对执政党领导班子和内阁进行了大改组，撤换了原总理、副总理及全斗焕时期的7名部长等共21名党政要员，任命曾反对朴正熙独裁统治、有民主形象的姜英勋为总理，并吸收一批在野党人士参加内阁。

卢泰愚的这“三步曲”可以说是一部政治杰作。它既使民主正义党和新政府卸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又使卢泰愚赢得了选民的信任，而且还根除了国内矛盾激化的隐患。全斗焕问题的政治解决，扫清了卢泰愚总统成功的最大一个障碍。

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在国会的议席不占多数，处处受到在野党的牵制。为了结束这种“朝小野大”的被动局面，1989年下半年卢泰愚开始谋求政党联合。

本来，卢泰愚只要能与金钟泌的新民主共和党实现联合就可以形成议会中的多数，但是，卢泰愚看得更远，他还企图将金泳三的统一民主党纳入执政党联盟中来。

要不要与卢泰愚联合、接受卢泰愚的“招安”，对于驰名韩国内外的金泳三来说，的确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但在恪守政治贞操与实现总统梦之间，金泳三断然抛弃了前者。他的理由是，他自己不接受“招安”总有别人被“招安”，那时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去做下届总统。

1990年1月22日，卢泰愚的民主正义党、金泳三的统一民主党、金钟

泌的新民主共和党，三党合并为“民主自由党”。

这一合并是卢泰愚的胜利，它使韩国的黑白政治势力一下子变得混沌不清了。这一合并也给金泳三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他摇身一变，从第二大在野党的领袖变成了地位仅次于总裁卢泰愚的执政党的“代表最高委员”。但有得必有失，金泳三也在韩国国民中留下了不良印象，被在野人士贬为“叛徒”、“投机主义者”。

然而民主自由党内的一些头面人物不能容忍平步青云的金泳三，更不愿听他颐指气使，他们变着法子给金泳三出难题，设卡刁难他。后来，卢泰愚苦口婆心地说服了各派系头头，金泳三才在民主自由党内掌握了实权。

1992年，韩国将举行总统大选。

1992年5月19日，民主自由党举行了全党大会，金泳三以66.3%的得票率击败本党议员李钟赞当选为民主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其实，这一胜利来得太容易了，因为李钟赞在全党大会前两天就以“选举委员会处事不公”为由宣布放弃了竞选。

1992年8月25日，卢泰愚辞去了民主自由党总裁职务，把党内大权交给了金泳三，自己只担任名誉总裁职务。1992年9月18日，卢泰愚又宣布他退出民主自由党，并准备组建中立内阁，“以便于进行公正的总统选举”。10月9日，卢泰愚改组了内阁，更换了与选举有关的内务、法务、公报和政务等4名内阁成员，以及安全企划部长官，并命令其他拥有党籍的内阁成员一律退出所属政党，成立了以无党派人士玄胜钟为国务总理的中立内阁，以管理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

参加1992年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共8名，其中最有力的是“二金一郑”。金泳三与在野党领袖、和平民主党总裁金大中一决雌雄，早已是人们预料中的事了，没有想到会突然杀出一个郑周永来。郑周永是韩国最大的工业集团“现代集团”的创建人，在韩国70年代以来的经济起飞中起了重大作用。这位工业巨子仗着财大气粗，他领导的统一国民党虽在国会选举（1992年3月）前一两个月才匆忙起灶组建，却一举成为韩国的第三大党。

1992年12月19日，韩国总统大选揭晓，金泳三一举囊括2940万张选票中的42%，当选韩国第十四届总统。

1993年2月25日，卢泰愚5年总统任期届满，退出总统府，把总统职位移交给了金泳三。

在任总统5年中，卢泰愚成功地完成了由独裁政府向民主政府、由军人政府向文官政府的平稳过渡，解开了全斗焕的历史“死结”（也是他自己的历史“死结”），应该说卢泰愚在政治上是非常成功的。

卢泰愚没料到的是，他在总统任职期间一帆风顺，却在下台以后出了个大丑，而且事情来得那么突然。

秘密政治资金在韩国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人们感觉到它的存在，也猜测到了它的存在，但是一直没有查出它的下落。

1995年8月，前总务处长官徐锡宰曾透露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人有人在银行以假名帐户存储了大约4000亿韩元（约5.2亿美元）的秘密政治资金。检察机关的调查结果认为证据不确凿，徐锡宰被罢官免职。

1995年10月19日以前的一天，有一个人收到了一张催交巨额存款利息税的通知，他一时不知所措。这个人找到了国会议员朴启东，请求朴启东的帮助，说他帐上的100亿韩元来历不明，怀疑是别人利用他的帐户存入了这

笔钱。朴启东对此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发现，这笔钱是卢泰愚在 1993 年 2 月 25 日卸任前一个月存入该帐户的。于是，朴启东找到了证据，如获至宝。

1995 年 10 月 19 日，和平民主党议员朴启东在国会出示了卢泰愚在新韩银行利用假名帐户存有秘密政治资金的证据。第二天，国务总理李洪九就在议会表示，政府将着手调查此事。在调查过程中，曾做过卢泰愚总统警卫室室长和安全部部长的李贤雨承认，在新韩银行以假名存放的钱就是卢泰愚的政治资金。于是，1300 亿韩元的秘密资金相继被发现。

在证据面前，一度以“我也想知道银行的巨额秘密存款的主人是谁”而矢口否认的卢泰愚再也无法掩盖存款真相了。1995 年 10 月 27 日，卢泰愚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他在 1988 年至 1993 年当政期间从经济界收取了大约 5000 亿韩元（约合 6.5 亿美元）的政治资金，主要用于政党运营和各种政治活动。他承认这些秘密资金是非法的，对此他甚感羞愧，愿意负“全部责任”，接受任何处罚。在向检察机关提交的交待材料中，他承认在他卸任时尚剩有 1857 亿韩元。

此事一暴露，立即在韩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卢泰愚在卸任总统后再次成为焦点人物。

这起政治丑闻曝光后，“新政治国民会议”（在野党）总裁金大中立即宣布，他在 1992 年总统竞选时曾接受过卢泰愚提供的 20 亿韩元（约合 250 万美元）的政治资金，接着他指控金泳三总统所接受的政治资金更多。这样，卢泰愚巨额秘密资金案与各政党、各政党首脑又纠缠在一起。

在迫切要求查明真相的呼声中，总统金泳三于 1995 年 10 月 30 日否认曾经接受卢泰愚的巨额政治资金。在此之前，他发誓要公正地查明这桩丑闻，以证明他的政府是公正的。

但反对党立即予以反击，他们说金泳三本人也与这桩丑闻有牵连，金大中也声称金泳三在 1992 年的总统大选中花费了 12 亿美元，这些钱大多来自卢泰愚。后来，金泳三承认他在 1992 年的总统竞选中可能得到过前总统卢泰愚的资助，但他否认自己知道这件事情，说这可能是卢泰愚主动为党提供资助，但他金泳三从来没碰过一分钱。

检察机关分别于 11 月 1 日和 11 月 15 日传讯了卢泰愚，并对 30 家大企业集团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卢泰愚在当政期间，向这些企业收取少则 5 亿、多则 250 亿韩元的资金，总额达到 2358 亿韩元（合 3.1 亿美元）。但卢泰愚在接受调查过程中拒绝承认他所收的资金是贿赂。对于资金的使用以及是否向政界人士提供选举资金等问题，卢泰愚总是以“我不知道”、“记不起来”或“我不能说”搪塞。

在舆论的强烈要求下，检察机关于 1995 年 11 月 16 日拘捕了卢泰愚，关进了位于汉城近郊的仪旺市拘留所。检察机关指控卢泰愚接受贿赂和藏匿巨额政治资金。

这个时节，金泳三的日子确实不太好过。分析家认为，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丑闻的曝光，是金泳三执政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危机。开始，对于卢泰愚一案，金泳三态度鲜明，一再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后来在检察当局传讯卢泰愚并且面临反对党要他公开与卢泰愚政治资金的瓜葛的情况下，有几天他一直保持沉默，而且几次打破常规安排，到郊外度假。人们认为，此时的金泳三已陷入了一个严重的政治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中。很多韩国人相信，尽管检察当局声言要进行“彻底、公正的调查”，但是卢泰愚的

法律命运最终还是取决于总统金泳三。然而，金泳三如何以适当的分寸来处理卢泰愚，这将直接关系到他自己的政治命运。

首先，如果金泳三对卢泰愚过分，超出了卢泰愚及其亲信所能接受的限度，那么他将毫无疑问地会面临卢泰愚阵营对他们过去政治纽带的“吹哨”警告；其次，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金泳三自己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期间接受了卢泰愚的大笔政治资金，尽管金泳三否认有此事实。因而，如果卢泰愚方面提供了任何有关竞选经费以及他们过去结盟时其他黑暗交易的具体证据，那么这必将给号称清廉、道义的金泳三以致命的打击。另一方面，如果金泳三对卢泰愚的问题采取轻描淡写的处理，公众、舆论绝对不会答应，也过不了反对党的压力关。

在处理卢泰愚一案上，金泳三已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如果继续在卢泰愚身上纠缠下去，金泳三领导的民主自由党（1995年12月更名为“新韩国党”）不仅要在1996年4月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出丑，而且会在1997年的总统选举中栽跟头。根据韩国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任，金泳三只能当一届（5年）总统。虽然金泳三不必担心连任问题，但如果其政党在1996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失利太大，谁又能保证不会发生金泳三被罢免的悲剧呢？

在卢泰愚一案上走投无路的金泳三，于1995年11月24日突然调转枪口、转移视线，提出要追究全斗焕的历史问题。金泳三企图象他的前任卢泰愚那样，把一切问题都混合起来。此举真称得上是狗急跳墙。

1995年的夏秋之际，在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国家大检察厅再次对1979年的“肃军政变，和1980年的“光州事件”进行调查。1995年7月，大检察厅以“军事政变创建了新的宪政秩序”和“被告已超过了起诉期限”为由，宣布对包括两位前总统在内的58名与“光州事件”有关的当事人免于起诉。检察当局解释说，当时他们是按照权力程序采取行动的，超越了法律关系的范围，所以检察部门无权对他们采取法律行动。当时，金泳三总统也谨慎地主张，对于那次事件，“还是让历史去审判吧”。当时，反对党对检察当局的决定反应强烈，认为这是金泳三总统有意掩盖历史。

1995年11月24日，总统金泳三突然改变以往的立场，宣布要制订“5.18特别法案”，以重新调查1979年12月12日军事政变（即肃军政变）和1980年5月18日全斗焕当局镇压光州民主化运动事件。

总统金泳三的这一决定，出乎各方人士的意料。诚然，金泳三的决定符合了绝大多数韩国人的意愿，但绝大多数人对金泳三的决定表示震惊，很多人捉摸不透他究竟要干什么。

特别感到震惊的当然是全斗焕，据说全斗焕对金泳三的决定毫无思想准备。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全斗焕一时不知所措。在与他的亲信紧急磋商以后，他通过他的律师很快发表了一个讲话。该讲话称，“制定特别法，将会给宪政史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因为它允许出于政治报复追溯既往的法律。”根据宪法第十三条，任何人不能因为追溯既往的法律而受到惩罚。全斗焕方面表示，光州事件的真相已经在1988—1989年持续18个月的议会听证会上得以解决，而且今年检察当局也作出决定不追究当事者的法律责任；根据法律，对全斗焕指控的公共行动到1995年8月已告终止。卢泰愚方面也作出了一些支持全斗焕的表示，卢泰愚的一位律师说，“不惩罚成功的政变者是一个法律惯例。”

与此同时，很多与全斗焕、卢泰愚有直接间接关系的现政府官员、议会

议员、政治家、军界要员，对金泳三的决定也表示了极大的不安，他们无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表示担忧。

然而，这时候的舆论对金泳三极为有利。一些学生因势利导，继续举行各种示威活动，甚至跑到全斗焕家门口示威，要求立即逮捕全斗焕。律师界也驳斥了全斗焕方面关于法律时效的立场，认为对于类似这种叛乱、非人道罪行，宪法没有规定追究时效的限制。

1995年11月30日，韩国检察机关宣布，取消以前作出的对事件主谋免诉的判决，重新调查全斗焕等的历史问题。

1995年12月1日，一张传票送到全斗焕手里，要求他于12月2日下午前往汉城地方检察厅接受传讯。

但是，全斗焕的态度非常强硬，他断然拒绝检察当局的传讯，并于当日上午9时在他的家门口面对数以百计的记者和摄像机，向全国发表了一个《全斗焕对国民声明》。这位前总统指责检察当局重开了一个了结的案子，说这仅仅是为了金泳三总统的政治需要。他表示，他的这一案子，已经经议会听证会和检察当局的调查而告终结。在他的声明中，他大肆攻击了金泳三总统。他说，如果象金泳三总统声称的那样他被怀疑破坏了宪政秩序，那么金泳三自己也应该承担作为一个“曾经与叛军结盟的人”的责任。全斗焕说，“这位差不多当了三年总统的金泳三，居然以指责我为叛军头子而全盘否定历史”。

在发表了他的这一声明之后，全斗焕前往国家公墓拜谒了先烈，然后前往庆尚南道陕川郡他的老家。显然，全斗焕对出尔反尔的金泳三表示了极大的鄙视。

对于全斗焕蔑视检察当局的挑战性行为，国家大检察厅作出强烈反应，当天就签发了对全斗焕的逮捕令状。

1995年12月3日凌晨，在绝大部分人还在梦乡的时候，执行逮捕令的警察已赶到离汉城约300公里的陕川，把全斗焕逮捕，押往汉城郊外的汉养拘留所。一位检察官说，在全斗焕声称完全不与检察当局合作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采取必要的法律步骤而别无其他的选择。”逮捕令状指控全斗焕为叛军首领，涉嫌主谋了1979年的武装政变并镇压了1980年光州民主化运动。

在收押全斗焕的当天，特别调查小组就对全斗焕进行了持续11小时的审讯。然而，这位前总统在许多实质性问题上行使了“沉默的权利”，因而使审讯收效甚微。从发表“声明”到拜谒国家公墓，接着回老家，一大早又被捕，并接受了11个小时的审讯，如此折腾了三天的全斗焕在拘留所里显得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当然，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劳累，而在于对他自己未卜的前途的诚惶诚恐。从这一天开始，他拒绝拘留所提供的饭菜，以绝食显示他的强硬立场。据说，全斗焕告诉他的律师，在第五共和国（1981—1988年）以及有关问题的历史被歪曲的情况下，他没有理由再活下去。

两位前总统被送进监狱之后，执政的民主自由党内掀起了一股小小风波，因为，毕竟在这个党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卢泰愚和全斗焕的势力。不几天，民主自由党在南部两个道的地方领导人宣布退出民主自由党：党内的第二号人物金润焕向金泳三递交了辞呈，表示不能继续与金泳三合作。然而，金泳三挽留了金润焕，并同他一起把他们的民主自由党改成了“新韩国党”。

全斗焕、卢泰愚两人的命运几乎是一生中都连在一起。1955年，他们同

时在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79年，他们又合伙发动了肃军政变；1995年，他们下台后又一同被捕入狱。而且，他们两个的年龄相差不到两岁。这真是令人吃惊的历史巧合。

1995年12月5日，卢泰愚由于涉嫌犯有“特别受贿”罪被韩国大检察厅起诉，其非法财产将通过法律程序予以没收。

12月5日下午2时，韩国大检察厅中央搜查部部长安刚民在发表“卢泰愚秘密资金案”初步调查结果时说，经检察机关的调查与核实，现已初步查明卢泰愚在从1988年至1993年的5年期间，利用总统职权非法受贿4100多亿韩元巨额资金，其中从35家大企业中共受贿2838.96亿韩元。卢泰愚利用职权在批准核电站、军事基地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上向企业界施加影响，以听取企业经营情况和企业的政策建议为名单独会见企业界人士，向他们索取资金。卢泰愚把这些资金用假名和借名分别以37个户头存入9家银行，其中一部分以不动产方式或转入企业名下隐藏起来。安刚民强调说，目前调查核实的结果与卢泰愚本人交代的5000亿韩元数额还有一定的差距，调查将继续进行。韩国检察当局已同美国和瑞士有关部门联手开始调查卢泰愚是否把资金转移到了海外银行。

1995年12月7日，《韩国日报》放风说：政界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全斗焕任总统期间共积累了1万亿韩元左右的秘密资金，已经花掉的有7000亿韩元，现在隐匿起来的有3000亿至4000亿韩元，如此算起来，全斗焕的秘密资金金额是卢泰愚的两倍。

1995年12月18日，卢泰愚第一次出庭受审，卢泰愚对收受巨额资金供认不讳，但不承认这是“受贿”。出庭受审的，还有与此案有关的5名财团老板、9名前政界人士。

1995年12月19日，韩国国会表决通过了“5·18特别法案”，将对发动1979年12月12日军事政变和导致1980年5月18日光州事件的主犯和从犯的诉讼期限推迟，以便追究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等人的刑事责任。国会通过的这项特别法将这两次事件中被告人的诉讼有效期定为1993年2月24日至2008年2月24日。此外，国会还一致通过了《关于破坏宪政秩序犯罪及诉讼时效的特例法》，该法废除了刑法上的内乱外患罪、集体杀害罪、军事刑法的叛乱罪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即诉讼时效永远不适用于上述犯罪。

1995年12月21日，全斗焕被检察机关正式起诉。

1996年1月15日，汉城地方法院就秘密政治资金一事第二次审判卢泰愚。卢泰愚表示愿意接受法庭的判决，决定放弃辩护权。

1996年1月23日，韩国检察当局以“内乱罪”对全斗焕和卢泰愚追加起诉。同时，还起诉了6名当时参与“内乱”的军官。

1996年1月29日，汉城地方法院对与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案有牵连的14名被告进行量刑审判，卢泰愚也被带上法庭受审。

在量刑审判中，大宇集团会长金宇中、东亚集团会长崔元硕、韩宝集团会长郑泰守、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真露集团会长张震浩5名财团老板因行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和3年。卢泰愚执政时的总统府警护室长李贤雨，因犯有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被处以80万美元的罚款。前国会议员、前总统府经济首席秘书等与此案有关的其他8名被告，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至5年。本案主犯卢泰愚因同时犯有受贿罪、军事叛乱罪和内乱罪，法院对他的判决推迟。

1996年2月26日，汉城地方法院就秘密资金问题开庭审判全斗焕等6名被告。这是全斗焕第一次出庭受审。

1996年3月11日，全斗焕、卢泰愚因被指控犯有“军事政变和内乱罪”而同时出庭受审。出庭受审的还有与此案有关的其他14名被告。3月18日，汉城地方法院第二次开庭审讯全斗焕、卢泰愚。3月25日，汉城地方法院开庭审讯参与“12·12”政变的9名被告，但被告仍否认“12·12”事件是有预谋的军事政变。全斗焕、卢泰愚列席了这次审理过程。

1996年4月11日，韩国举行第15届国会大选。次日，选举结果揭晓。在国会299个议席的角逐中，执政的新韩国党获得了139席，未能达到半数；新政治国民会议（金大中任总裁）获得79个议席，自由民主联盟（金钟泌任总裁）获得50个议席。民主党获得15个议席，无党派人士获得16个议席。著名政治家、新政治国民会议总裁金大中在竞选国会议员中落选，爆出了这届选举的最大冷门。此外，被认为有可能成为他接班人的三位议员也都失去了他们在国会中的席位。

1996年4月29日，汉城地方法院第三次审理全斗焕秘密资金一案。由于全斗焕还被指控犯有“军事政变和内乱罪”，法院没有对全斗焕进行判决。

目前，卢泰愚、全斗焕两案还处于案理阶段，法院对他们的判决很可能要到1997年韩国总统大选结束以后。

## 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的一串丑闻

自 1992 年第 62 届总统选举以来，有关克林顿总统的丑闻接连不断。先是竞选期间暴光了克林顿的桃色丑闻、白水事件，克林顿就任总统以后，又传出了克林顿夫人的两桩丑闻和克林顿涉嫌性骚扰案。这几桩丑闻事件，弄得克林顿夫妇精疲力竭、负债累累。

起初，克林顿的理想是当一名牧师、音乐家或者记者。17 岁时，他代表阿肯色州的中学生去华盛顿参观，受到年轻的肯尼迪总统的接见。尔后，他的理想转向当一名政治家或法官。读完乔治敦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之后，他开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后又被聘为阿肯色大学法学教授。1974 年，克林顿竞选联邦议员失败。1976 年，任阿肯色州司法部长。1978 年，32 岁的克林顿成为美国当时最年轻的州长——阿肯色州州长。1982 年以后，一直任阿肯色州州长。1992 年，威廉·杰弗逊·克林顿参加美国总统竞选。1992 年 11 月 3 日，46 岁的克林顿战胜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当选为美国第 52 届总统。1993 年 1 月，克林顿宣誓就职。克林顿是民主党党员，先后担任过全国民主党州长大会主席、全国州长协会主席、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的任期为 4 年，克林顿总统的任期到 1997 年 1 月为止，1996 年美国将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

### 一、克林顿的婚外恋风波

1991 年 10 月 3 日，克林顿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宣布参加 1992 年的总统选举。克林顿把小石城的州府老楼作为竞选总部，并成立了由乔治·斯蒂法诺波罗斯、贝特西·赖特(女士)等人组成的竞选班子，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也是竞选班子的重要成员。

在克林顿对外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之前，前参议员保尔·聪格斯、参议员汤姆·哈金、参议员鲍勃·克里、弗吉尼亚州州长道格拉斯·怀尔德、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埃德蒙·布朗，先后宣布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 6 名民主党候选人中，克林顿起先并不格外被人们注意。但是，他迎合选民们对现状严重不满的心理，在公众面前标榜自己是“变革的代言人”。加之他在阿肯色州出色的政绩，民主党政治活动家们对他给予了很高的信任。1991 年 12 月 15 日，1768 名民主党政治家在佛罗里达举行中期大会，在对民主党 6 位候选人的意向性投票中，克林顿意外地获得了 54% 的票数。这一结果使克林顿喜出望外，也更增加了当选总统的信心。

1992 年 1 月 16 日，竞选办主任乔治·斯蒂法诺波罗斯打电话给竞选总部的詹姆斯·卡维尔说：“最新消息，刚刚出版的《明星》周刊中有一篇文章，称克林顿有 5 桩婚外恋情。”卡维尔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克林顿。

克林顿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意识到碰到了重大麻烦。他深知，《明星》周刊虽然品位不高，可在超级市场上销售量很大，所载内容多是些名流人士的花边消息。如果任其传播下去，对自己的总统选举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清楚地记得，在这些年的总统选举中，几乎每次都有人因桃色新闻而痛失良机。1988 年总统选举中，民主党人哈特就是因桃色新闻不得不中途退场。

早在 1991 年 9 月，即克林顿宣布竞选总统前夕，为了避免被人纠缠于桃色丑闻之中，他便和妻子希拉里订立了攻守同盟，未雨绸缪。9 月，克林顿夫妇参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专栏作家戈弗雷·斯珀林主持的早餐会，有记者问及克林顿对妻子不忠的问题。克林顿夫妇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的婚



姻并非完美无缺，可目前却是非常稳固的。克林顿甚至公开说：“即便我与另外的女人有染，可我的妻子原谅了我，与别人有何相干？何况事情已经过去。”但是，记者们并没有因为克林顿的“公开化”而放弃对他的追踪报道。

1992年1月17日，对《明星》周刊的报道，克林顿立即予以否认并进行谴责。

1992年1月23日，《明星》周刊发表文章说，克林顿与夜总会的歌星吉尼弗·弗劳尔斯12年来一直有婚外情，他们两人1990年12月到1992年1月间的电话录音已经被搞到。

面对《明星》周刊的发难，克林顿急急火火地召集竞选班子成员开会，商讨对策。竞选策划人物詹姆斯·卡维尔提醒克林顿去求告他的妻子希拉里。克林顿请求希拉里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不要背叛自己，要为他辨清是非曲直帮上一把。

1992年1月26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电视节目中，克林顿一方面否认与歌星吉尼弗·弗劳尔斯私通，同时又说：“我承认我做过错事，承认使我的婚姻受过挫折。我认为大部分美国人明白我说的话，会感到我是一个十分坦率的人。”希拉里面对4000万美国观众，以她律师的辩才说：“我认为我们夫妇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及细节如何，与其他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我爱我的丈夫，我尊敬他，珍惜我们走过的路。假如这还不够使你们信任克林顿的话，那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希拉里的深明大义、出色表现，使克林顿本人和他的支持者们信心倍增。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克林顿吩咐人们复制2万多盒个人演讲广告录像带，挨家挨户送到选民手中，极力避免因桃色丑闻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冲击。结果，选举得票率还是比以前的39%下降了14个百分点，比支持率占33%的保尔·聪格斯低8个百分点。

克林顿险些因自己的桃色丑闻在民主党候选人预选中被淘汰。

预选之后，克林顿的桃色丑闻一直是民主党其他候选人攻击的借口。为了尽量摆脱这一丑闻的干扰和影响，他不得不靠着金钱的优势，花更大的气力为自己辩解。

在妻子希拉里的协助下，克林顿四处游说，使出浑身解数与对手们顽强抗争，先后战胜民主党其他5名候选人，终于在1992年7月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民主党参加总统竞选的唯一候选人。

1992年11月3日，经过与共和党的一番较量，克林顿终于击败原总统、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当选美国第52届总统。

## 二、克林顿夫妇与白水事件

白水事件是发生在克林顿夫妇身上的最大丑闻事件。出任美国总统以来，克林顿始终没有摆脱这一案件的困扰。

1978年，当时任阿肯色州司法部长的克林顿打算参加当年的阿肯色州州长之位的竞选，他急需大量竞选资金。

一天，克林顿应一位老朋友的邀请在阿肯色州州府小石城的黑豌豆饭店用餐。这位老朋友名叫詹姆斯·B·麦克道格尔，是一位房地产商人，专爱结交显贵人物。

席间，麦克道格尔告诉克林顿，在阿肯色州风景如画的白水河畔有一大片已荒置多年的土地，总面积约有3600英亩。不久前一批阿肯色商人已经把这一大片地买了下来，这批商人中包括富力宾镇银行家詹姆斯·帕特森以及

克林顿竞选州长班子的主管克尔尼·卡尔顿。现在这批商人正准备把其中地段最好的 230 英亩土地出售。如果把这 230 英亩土地买下来，然后把它再分成若干小块出售，赢利必定十分丰厚。麦克道格尔力劝克林顿一起合伙投资入股做这笔生意。

克林顿正为无处筹集竞选资金而发愁，现在有这么一笔赚头很厚的生意送上门来，岂有白白放过之理。于是，克林顿夫妇决定与麦克道格尔夫妇合伙做这笔生意，于 1978 年 8 月买下了这块 230 英亩的土地。

不过，克林顿夫妇和麦克道格尔夫妇没有拿出一分钱，交易所花费的 20.3 万美元全部是借来的。其中 18.3 万美元是以抵押贷款形式借自帕特森的银行，另外 2 万美元从另一家银行借得。

几个月后，克林顿如愿以偿当选为阿肯色州州长。上任后不久，克林顿任命麦克道格尔出任州商务部和公路处的联络员。随后，克林顿夫妇和麦克道格尔夫妇再度借得 4.7 万美元用于平整土地的道路以及勘测地基，并且成立了“白水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始对外出售宅基地。

一开始，白水公司的前景似乎很不错。公司投入大笔资金在芝加哥等北方繁华大都市作了许多诱人的广告，许多有钱的退休人员纷纷南下察看虚实，想来买地的人也不少。但是，没过多久，由于银行贷款利率上升，白水公司财务枯竭，房地产买卖很快就歇业了。

1982 年，即白水公司房地产买卖失败 3 年后，麦克道格尔买下了拥有 300 万美元固定资产的麦迪逊储贷担保公司。这本是一家专门帮助经营业绩不善的公司进行储蓄和贷款以摆脱资金困难的联邦金融机构。

由于麦克道格尔到处宣传他的储贷公司的利息为全州最高，因此麦迪逊储贷公司的储蓄业务激增，从当初的 600 万美元存款很快增加到 1.23 亿美元。

麦克道格尔考虑到白水公司经营业绩不佳，随时有破产的可能，为了不让自己的好朋友克林顿在经济上受损失，用麦迪逊储贷担保公司的资金将克林顿夫妇手中的白水公司 50% 的股份购买过去。

麦迪逊储贷公司拥有大笔存款后，麦克道格尔动用数百万美元做了几桩投机性的房地产买卖。由于其动作过大，美国联邦家庭借贷银行董事会开始注意上他。1984 年，该董事会对麦迪逊储贷公司作了一番调查后得出结论，认为该储贷公司“贷款程序严重混乱”，已经危害了其作为金融机构的信誉。

然而，麦迪逊储贷担保公司并未因此而关闭。相反，由于有关部门把对该公司进行全面清查的时间推迟至 1986 年初，中间留下了 26 个月的时间，麦克道格尔便趁此机会大耍花招，试图向联邦管理部门证明他的储贷公司有足够的偿还存款的能力。其手法之一便是将希拉里任职的小石城罗斯律师事务所聘为法律顾问单位，并支付聘用定金。

在这期间，阿肯色州金融管理机构曾要求麦克道格尔为其储贷公司筹集更多的资金，为此麦克道格尔打算出售储贷公司的优先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得到州证券管理局的批准。于是，麦克道格尔找到当时任州长的克林顿，建议让曾为储贷公司担任法律顾问的比佛利·巴塞特出任该局局长。克林顿果真在 1985 年 1 月下达了任命。

紧接着，作为储贷公司法律顾问的罗斯律师事务所向州证券管理局提出申请，要求批准麦迪逊储贷公司公开出售优先股。两个星期后，巴塞特直接致函给克林顿的妻子希拉里律师，表示同意申请的要求。这样，根据阿肯色

州的法律，麦迪逊储贷公司可以准备出售股权。

不过，由于其他原因，股权还没来得及出售，储贷担保公司就被勒令关闭。

这样，克林顿和妻子希拉里不但介入了白水公司的经营，而且还与麦迪逊储贷公司的事务有着密切的关系。

1986年4月前后，麦克道格尔试图向联邦管理部门证明麦迪逊储贷公司有偿付能力的企图最终没有成功。1986年8月，麦迪逊储贷公司被勒令关闭。联邦调查人员在清理麦迪逊所有帐务后确定，其亏损高达6880万美元，几乎是储贷公司存款数的一半。此后，麦迪逊储贷公司破产倒闭。

1989年，麦克道格尔被起诉，罪名是欺诈，不过很快就被无罪释放。

由于管理不善等多种原因，白水公司于1991年9月申请破产，最终倒闭。

问题在于，克林顿夫妇在这两家破产公司以往的活动中，有没有利用克林顿手中的权力得到非法收入？得到多少非法收入（包括非法得到的竞选活动经费）？这两家公司破产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个骗取大量金钱的阴谋？

1992年，克林顿出马角逐美国总统。就在大选期间，《纽约时报》记者杰夫·格恩把克林顿在白水公司的土地买卖予以曝光，暗示克林顿夫妇在这桩生意中有过不正当收入。对于这一指控，克林顿马上予以断然否认，声称：“在这桩生意上我们亏掉了2.5万多美元。我从来没有在这笔生意上赚过一分钱。”在这之后，有关这桩投资生意的说法一变再变。最后克林顿夫妇委托丹佛的一位律师詹姆斯·林恩斯起草了一份报告，改口说克林顿夫妇在白水房地产生意上的亏损高达6.89万美元。

克林顿怎么也没料到，这时，他的白水公司的合伙人麦克道格尔会站起来出他的丑。麦克道格尔向新闻界宣称，当时用来购买土地的那笔抵押贷款的大部分是由他而不是克林顿夫妇来偿还的。迫于舆论压力，克林顿夫妇最后不得不出示了夫妇俩在1977年至1979年期间的纳税申报单，试图澄清是非。

在出任美国总统后，克林顿再一次改口称他的亏损为4.3万美元，而这时麦克道格尔也突然推翻早先的说法，与克林顿保持一致。

“白水事件”事发后，以克林顿为首的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掩人耳目，虚假地成立了所谓主持公道的民间机构坚毅信托公司，专门负责调查这一事件。实际上，这家公司的调查人员乃克林顿夫妇所指定，其负责人、财政部副部长罗杰·沃特曼即是克林顿的亲信。为保持表面上的“司法独立”，司法部陪审团在摸清总统意图的基础上，要求对“白水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1994年1月5日，正式给克林顿总统发出传票，要求克林顿总统夫妇将与白水事件有关的一些文件交给司法部陪审团。当天，克林顿便指示白宫发言人，称总统“自愿交出那些文件”。

他们打算，这样做既可以让克林顿夫妇在政府机关内部巧妙地过关，又可以向国民宣布对“白水事件”的调查、追究是认真的，没有任何欺骗和敷衍。

然而，国民们并不买司法部陪审团的帐，他们认为，克林顿夫妇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什么大事瞒着公众。

在1992年总统竞选中败下阵来的共和党人，这时显得格外活跃。早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他们原本可以利用“白水事件”对克林顿展开强烈攻击，但考虑到容易引起民主党人指责共和党人出于政治目的而发难，因此没有一

味地坚持要求有关部门对“白水事件”进行刑事调查。随着案情调查、记者追踪的进展，共和党见时机成熟，于是从口气上提高了嗓门，强烈要求司法部任命一位真正能够主持正义、公道的独立性较强的特别检察官，摆脱任何干扰和阻碍，专心致力于“白水事件”的全面调查。

对民众的呼声和共和党人的要求，司法部没有迎难而上，而是采取了迂回拖延的策略。针对来势汹汹的压力，由克林顿总统亲自任命的司法部长雷诺屡次表明态度说，司法部“没有任命特别检察官的计划”。实际上，司法部是在根据克林顿的旨意行事。

这时，克林顿总统也意识到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僵持下去，不但会妨碍他正常的工作安排，而且会造成很坏的政治影响。他愈来愈觉得应该避开一直不让任命特别检察官的希拉里，赶快定下此事。

1994年1月11日，克林顿在布拉格与北约领导人会晤期间，专门给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白宫打了越洋电话，称他完全同意由司法部任命一名专门调查“白水事件”的特别检察官。接到通知后，司法部长雷诺紧张工作一个多星期，于1994年1月20日作出决定，任命前纽约联邦法官、现年63岁的罗伯特·菲斯克为特别检察官，全权负责调查“白水事件”。

罗伯特·菲斯克上任以后，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取证工作。调查人员仔细查阅了希拉里的有关白水公司的记录材料，寻查希拉里担任小石城律师时办理有关案件的利益冲突的证据、税务申报表的证据以及麦迪逊储贷担保公司的老板麦克道格尔将公司的资金转付给希拉里和她的家庭的证据。通过这些查证的材料，初步确认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在白水公司的交易、业务合伙关系及利用权力的影响经商的过程中，是个起着穿针引线作用的人物。

与此同时，白宫并没有对“白水事件”的调查放任不管，而是想方设法通过不同渠道了解调查的进展情况，以便在必要时采取相应对策。早在坚毅信托公司正式要求调查麦迪逊储贷担保公司之前，白宫就派人私下里会见信托公司的财政部法律顾问琼·汉森，探听有关指控和调查的情况。在特别检察官菲斯克等人着手调查“白水事件”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白宫法律顾问努斯鲍姆（先前是希拉里的老朋友，在希拉里的帮助下谋得此职）、白宫及财政部的10多名高级官员先后召开数次会议，探听消息，密谋对策，试图插手这件事。这些官员中，包括白宫办公厅副主任伊基斯、白宫通讯主任吉拉安、白宫高级顾问林赛、希拉里办公室主任威廉斯、希拉里的新闻秘书卡普托等人。

据报道，特别检察官菲斯克接受任命之前，努斯鲍姆就从司法部的调查人员那里获悉了有关麦迪逊储贷担保公司的调查文件的详细内容，其中提到克林顿夫妇是疏于管理、漏洞百出的麦迪逊储贷担保公司的最大受惠者。而这种“刑事介绍”的文件材料是应该绝对保密的，对涉及到的有关人员尤其应当如此。

按照联邦的法律，进行类似“白水事件”这样的调查，必须是在十分秘密的状态下进行，政府、国会及任何党派团体或个人，均不得加以干预或阻止。然而，白宫的一些做法与联邦的法律却是完全相违背的。

白宫暗中干预司法部门对“白水事件”调查的消息，很快被新闻机构当作特大新闻对全国公众做了报道。美国的社会舆论和反对派人士，甚至将“白水事件”和尼克松时代的“水门事件”联系在一起加以评论和攻击。有的则干脆说“白水事件”和“水门事件”是一路货色。这就把克林顿夫妇推向了

一个可怕的境地。

这样，公众所关注的热点又多了一个白宫干扰对“白水事件”进行调查的问题。

来自新闻界、社会公众的舆论以及国会中共和党方面的信息，使特别检察官菲斯克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和肩负的重要责任。他清楚地表示，“白水事件”无论涉及到谁，都要坚决一查到底。

1994年3月4日晚，菲斯克以特别检察官的名义下令向克林顿的6名高级助手、4名现任及前任财政部官员发出传讯通知，要求他们到联邦法庭接受调查。在这些被传讯的人员中，其中有4位是希拉里的盟友或雇员，也包括克林顿的高级顾问。

菲斯克的传票发出后，曾任“弹劾尼克松委员会”成员、现任白宫法律顾问的努斯鲍姆，似乎有种不详的预感，在接到传票的当晚即致信克林顿总统，要求辞去法律顾问的职务。

1994年3月8日，克林顿总统在接受努斯鲍姆的辞呈后，任命美国公认的华盛顿圈内人物、76岁的卡特勒为白宫法律顾问。卡特勒曾是卡特当政时期的白宫法律顾问，曾帮助卡特渡过了几次严重的政治危机。

白宫法律顾问的匆匆变更，引起了人们的重重疑虑。一向关注白水事件问题的美国新闻界，此时忽然联想到原白宫法律副顾问、克林顿夫妇的好友文森特·福斯特的突然自杀一事。

福斯特曾是希拉里在小石城罗斯律师事务所的同事，也是白水公司许多内幕的知情者，克林顿当选总统后被委以白宫法律副顾问（即助理法律顾问）一职。现在有证据表明，在国会开始对白水事件的听证调查后，福斯特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一直在努力使克林顿夫妇摆脱困境。

1993年7月20日，福斯特在其白宫办公室内先后接到小石城罗斯律师事务所昔日同事以及詹姆斯·林恩斯律师打来的电话：下午1点35分，一位联邦检察官签发了搜查令，联邦调查局准备查封戴维·海尔（曾与麦克道格尔夫妇有过经济上的来往）的“小型企业投资公司”的全部文件和帐册。

当天下午傍晚时分，在弗吉尼亚州的一座公园内，有人发现了福斯特的尸体，死因是头部中了一枪。警方赶至现场察看一番后断定福斯特为自杀。可是，当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特工随后赶往福斯特在白宫的办公室时，他们发现由他保管的有关白水事件的文件已全部被转移，去向不明。

因此，有人质问：福斯特究竟是他杀还是自杀？

联邦调查人员在特别检察官菲斯克的领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调查，找到了有关“白水事件”的一些可供作证的资料。为更加确保案件调查的严肃性、可靠性，联邦陪审团于1994年3月10日开始对“白水事件”举行秘密听证会。之前，调查人员向白宫和财政部的一些知情者和参与者发了传票，接到传票的人均须按照要求向陪审团交送有关的文件，对涉及“白水事件”的情况和事实加以说明和澄清。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在对“白水事件”的调查问题上，尽量地减少外界的干扰，没有彻底查清有关事实以前，防止任何渲染的成份。这种谨慎的做法，也是白宫克林顿所希望的。

此后，虽然调查一直在继续进行，但并无突破性的进展。

1996年是美国新一届总统的选举年，这次选举将决定克林顿总统是否能获得连任。新年伊始，竞选已紧锣密鼓地展开，但“白水事件”仍然是迷雾一团。

1996年1月初，一份失踪已久的备忘录和161页希拉里担任律师时的帐本副件却被希拉里的助理卡罗林·休伯找出，并通过白宫律师上交联邦陪审团。这样，克林顿夫人希拉里便不得不接受传讯，“被迫”出庭向联邦陪审团作证。

据白宫知情人披露，希拉里与克林顿曾就出庭事宜商谈了一个多小时，就陪审团可能提出的问题作了种种猜测，甚至连希拉里回答问题时的语气、手势都作了商定。

1996年1月26日，穿戴整齐、略施粉黛的希拉里来到联邦法院，传讯是不公开的，随后她进入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希拉里是作为一名证人参加这次秘密听证会的，她要接受4个小时的质询。

听证会结束后，希拉里在法院发表了声明：“我很高兴有机会向大陪审团提供我给你们反复讲过的情况，那就是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不知道那些材料为何突然出现在白宫。不过，我很高兴找到了它们。”

显然，希拉坐没有让陪审团从她嘴里掏出什么。

“白水事件”异常复杂，与克林顿夫妇的命运关系重大，也将影响到克林顿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能否连任。

### 三、解雇白宫职员风波

“白水事件”还未了结，与希拉里有牵连的解雇白宫职员事件又闹得满城风雨，使希拉里这位第一夫人的声誉再打折扣。据白宫最近交出的前白宫助理沃特金斯的备忘录显示，希拉里是1993年5月解雇白宫旅行办公室7名工作人员的幕后主使人。

美国政论家罗森塔尔指出，克林顿就任总统以后，希拉里在权力上已变成美国第二号人物，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克林顿指派希拉里统筹保健改革，严格而言已违背了宪政体制的基本伦理性。这种第一夫人捞世界的具体事例是，1993年白宫一次开除了7名承办施行业务的职员，而代之以她们家的亲信托马森。而直接或间接下令开除的人，则是总统夫人希拉里。希拉里不具备公职身份，却扯上开除公务人员之事，又代之以亲信友人，是自找麻烦。

在过去两年里，希拉里一直否认这种指控，只表示自己关注旅行业务部门的管理不当，但并未下令开除什么人。

但就在最近，连续发现白宫助理的三件备忘录。这三件备忘录是希拉里助理苏珊·托马斯、白宫前助理沃特金斯等人所记。上面有这样的记载：“希拉里要开除这些人”、“我们将付出可怕的代价……如果不能快速决定以符合第一夫人的意愿”。

对此，希拉里声称：“不记得有这样的要求。”

专栏作家约德等人也为希拉里辩解，认为开除7名公务员乃是白宫下属拿鸡毛当令箭所造成的结果，他们知道希拉里对旅行业务部门不满，遂开除以邀宠。

然而，无论如何辩解，希拉里终究难洗刷她滥用职权及捞世界的形象。而她坚决否认自己曾下过命令，反而惹上说谎的嫌疑。

有人著书说，希拉里解雇差旅办公室雇员的可能性与威尔逊夫人的所作所为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安东尼说，威尔逊夫人在其丈夫中风后基本上主持着国政，她曾使得两位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和罗伯特·蓝辛被解职。

由于克林顿给了希拉里太多的介入白宫事务的权力，使她成了倍受攻击

的目标。对此，称希拉里为“天生的撒谎者”的美国保守派专栏作家萨菲尔指出：希拉里自称未下令开除白宫的7名当事人，其实仍是在掩盖她用联邦调查局胁迫这7名当事人，并让她的亲信友人接办白宫旅行业务的谎言。

#### 四、《拥有庄园》风波

希拉里的儿童作品《拥有庄园》一书上市前，华盛顿一片流言，说希拉里的这部新作是她出高价让人代笔写的！美国著名女作家巴巴拉·费恩曼声称要状告希拉里在出版《拥有庄园》一书上不守信用。

消息传开后，舆论大哗。为了澄清事实，希拉里亲自出马邀请好几位知名记者参观她的私人工作室，并向他们展示了《拥有庄园》一书的手稿及笔迹鉴定。事情似乎对她很有利。

但是，1996年2月3日，意外的事又出现了，白宫有人向新闻界透露，巴巴拉·费恩曼受“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委托去帮助希拉里组织全书，并负责《拥有庄园》一书前几章的拟稿。费恩曼说，希拉里非常欣赏她写的那几章。随着《拥有庄园》一书写作的全面铺开，费恩曼常常整夜整夜地呆在白宫里。1995年10月，希拉里还给费恩曼去了个电话，夸她写得很不错。然而就在费恩曼从意大利访问回国后，她与第一夫人的关系突然发生了变化。希拉里对她很不满意。

有消息灵通人士称，那是因为费恩曼拒绝继续充当希拉里报纸专栏的“捉刀人”。也有人认为是希拉里过河拆桥的缘故，因为《拥有庄园》一书的初稿已经完成，希拉里完全可以甩开费恩曼单干。

来自出版界的消息说，《拥有庄园》一书出版后，希拉里让助手告诉“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别向费恩曼支付120万美元的稿酬。因此，费恩曼一气之下决定状告第一夫人，并扬言要把事情真相捅给新闻界。

面对此尴尬的场面，白宫派人出面调解，承认费恩曼是《拥有庄园》一书前八章的合作者，但希拉里后来对这些章节做了重大修改。

目前，费恩曼对白宫调停人的解释仍表示不服，声称继续打算状告希拉里。如果此事件成讼，无疑对第一夫人希拉里是雪上加霜。

#### 五、性骚扰案

1995年，一名女子波拉·琼斯控告克林顿性骚扰，宣称在1991年克林顿任阿肯色州州长时，她在州政府任职，克林顿向她提出非分要求遭她拒绝，于是遂被开除。

对于这起讼案，克林顿的律师争辩说，作为总统克林顿不能在誓言的约束下接受关于这个问题的询问，希望法院能援用1982年最高法院对尼克松的一项判例，现任总统的公职身份可豁免民事诉讼。

但就在最近，圣路易的上诉法院却以2比1通过了另外的裁定。裁定中说：“总统象其他所有政府官员一样，应受用于我们社会其他所有成员的同样法律的约束。作为一名现任总统，并不能使他的非官方行为免于民事起诉。”

现任总统非关公职的行为不能豁免于民事诉讼，这意味着有关这起性骚扰案，克林顿已无法脱身。无论是否诬告，他都必须面对诉讼。一个寻求连任的现职总统有这种案子一路纠缠，麻烦是可想而知的。克林顿自己也承认，“此案可能对我造成严重伤害”。

最近，克林顿在接受《货币》杂志专访时透露，他的家庭收支已到了破产边缘。在1992年时，他们家还有69.7万美元存款，而现在不但存款用尽，

还积欠各种律师费 160 万美元。

目前，1996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还未进入最后决定时刻，选民们能否原谅克林顿的过错使他连任成功，还无法断定。涉及克林顿的两起案子最终如何了结，现在也只能说是个未知数。



## 被指控与黑手党有来往的意大利前总理安德烈奥蒂

1995年9月26日，意大利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市的乌恰尔多内监狱法庭正式开庭，开始审理前总理朱利奥·安德烈奥蒂参与黑手党活动一案。人们没有忘记，正是在这座监狱法庭里，475名黑手党分子在1986年2月被送上了审判台。

朱利奥·安德烈奥蒂，1919年1月14日生于罗马，1941年毕业于罗马大学法律系。1938年他念大学期间，与后来成为意大利总理的天民党（天主教民主党）元老德·加斯贝利相遇。当时，德·加斯贝利为躲避法西斯分子的迫害逃到了梵蒂冈，在梵蒂冈图书馆担任职员。在他的影响下，安德烈奥蒂投身于学生运动，后来担任了天主教大学生联合会的主席。二战结束后，德·加斯贝利请安德烈奥蒂做了他的助手，对其十分器重。1946年6月2日，意大利举行全民公决，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制，安德烈奥蒂在同一天的选举中当选为意大利立宪会议议员。1947年，他当选为众议员，并被提升为总理府副部长。这虽是个副部级职务，但可参加内阁会议和部际委员会会议，是总理协调各部关系的主要助手和代言人。其时，安德烈奥蒂只有28岁。

1954年，安德烈奥蒂任内政部长。1955—1958年，任财政部长。1958—1959年，任国库部长。1959—1960年、1960—1966年，任国防部长。1966—1968年，任工商部长。1968—1972年，任天民党众议院党团主席，1972年2月17日—26日，出任第29届政府总理。1972年6月—1973年6月，连任总理。1974年，任国防部长。1974—1976年，任负责南方发展基金的顶算和经济计划部长。1976年7月—1978年1月、1978年3月—1979年1月、1979年3月20日—31日，再度连任第35、36、37届政府总理。1983年8月—1987年3月、1987年7月—1988年3月、1988年4月—1989年7月，分别在克拉克西政府、戈里亚政府和德米塔政府中连任外交部长。1989年7月22日，安德烈奥蒂再次出任政府总理。1991年，他被总统任命为终身参议员。1992年，当时任总理的安德烈奥蒂曾想在议会选举后出任共和国总统，为自己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没想到就在那次大选（4月）前夕，“米兰丑闻”引发了一场打击行贿受贿的廉政运动，一大批政治家五花八门的丑闻纷纷暴光。传统执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安德烈奥蒂领导的天民党，得票不足30%，失去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安德烈奥蒂的总统梦也成了泡影。

在战后以来意大利的52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的寿命约为11个月）中，安德烈奥蒂共参加过34届政府，曾在6届政府中任副部长，在21届政府中任部长，1972年至1992年他先后共担任过7届政府总理。安德烈奥蒂在其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在意大利政坛上举足轻重，被视为意大利权力的象征。

如果说安德烈奥蒂在意大利是大名鼎鼎，那么黑手党则是在国际上赫赫有名。

黑手党起源于16、17世纪西班牙统治时期的意大利，以西西里岛为活动中心。当初，黑手党是一个带有劫富济贫、反抗暴政、主持公道等浓厚封建色彩的穷苦农民的秘密组织。19世纪中叶，黑手党蜕变为一个以敲诈勒索、绑架、走私、贩卖人口等活动为主的刑事犯罪组织。19世纪末，意大利开始大量向外移民，黑手党的活动范围也逐渐扩大到西欧、美国和加拿大，成为

跨国性的犯罪集团。

1922年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后，因不容任何异己力量与其分庭抗礼，黑手党也遭到毁灭性打击，许多成员被监禁或逃亡美国。

1943年夏天，美军打算在西西里岛登陆。尽管事先派遣了侦察部队潜入该岛，但是美军仍然担心因缺乏足够的内应而造成重大伤亡。在这种情况下，美军找来一些关押在美国监狱里的黑手党骨干分子，派遣他们回西西里岛作内应。合作的条件是，在登陆成功以后免除这些人的徒刑并允许他们留在意大利。

这种合作的效果堪称奇迹。美军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情报，而且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西西里岛。美军给黑手党的报酬似乎远远超过了原来的条件。从美国回来的那批黑手党骨干和当地的“朋友们”组成了后来在意大利黑社会中赫赫有名的一个派别——“我们的事业”。1946年地区自治法通过的时候，充斥西西里岛各级公共机构的官员中90—95%是“我们的事业”的成员、他们的朋友或者亲属。因此，整个西西里岛实际上是在黑手党的控制之下。

40和50年代是意大利的左右翼力量激烈交锋的时期。然而碍于议会民主的招牌，意大利的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不能对左翼力量公开镇压。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黑手党成了意大利右翼势力镇压左翼力量的得力工具。1944年，唐·卡洛盖罗·维齐尼及其门徒对意大利共产党在维拉尔巴市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开枪扫射，造成18人死亡，其中包括正在大会上发言的意共全国总书记齐洛拉莫·利·维齐尼。事后，尽管维齐尼等数人被法院判决犯有谋杀罪，但是他们连一天牢房都没有坐过。

在美国的支持下，“我们的事业”曾一度想使西西里岛摆脱意大利的管辖而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在美国因担心意大利发生共产党和右翼之间的内战而撤消对西西里岛的分裂主义的支持以后，“我们的事业”就转而与天民党结盟。他们的合作条件是：“我们的事业”胁迫选民投天民党的票，天民党则利用其执政地位将大量“肥得流油”的建筑工程、金融机构、运输业和国营企业承包给“我们的事业”。天民党副主席帕拉左洛曾在1951年亲自给黑手党头目弗朗克·考波拉写信，请他设法保证天民党在大选中获胜。考波拉后来被发现是一个走私海洛因的罪犯。

先后当过意大利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的天民党政治家阿蒂利奥·卢菲尼，是在得到黑手党的大力支持下才登上政治舞台的。他在1976年的选举中仅仅得到10.9万张票。然而，在他成为著名的黑手党家庭英采利洛和斯帕托拉的座上客以后，在1979年的选举中就得到了14.4万张票，从而击败其他的竞争对手而当选为议员。但是，好景不长，在斯帕托拉被捕以后的1983年的选举中卢菲尼的选票就跌至7.7万张，从此他就在政坛上一蹶不振。失去政治家保护的斯帕托拉后来因犯有贩毒罪而被判处13年监禁。

同黑手党“合作”的政党并不仅仅是天民党一家。共和党副主席阿里斯蒂·贡内拉曾给黑手党头目朱塞贝·迪·克里斯蒂纳介绍了一份“工作”，而这位黑手党头目则保证他在选举中获胜。1978年，克里斯蒂纳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打算到警察局去登记，他的这一想法不慎被同伙知道，于是他被其黑手党同伙谋杀。在他的故乡利埃西，几乎所有的政界名流都参加了他的葬礼，当地的天民党总部还降半旗致哀。1988年，贡内拉与黑手党的关系被揭露，贡内拉丢掉了政府部长的职务。

1986年意大利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是大金融家米盖利·欣杜纳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个案子颇能说明意大利黑手党、政界、经济界三者的关系。

象战后大多数西西里岛上的黑手党分子一样，欣杜纳的发迹最早也应该归功于美军。1943年，欣杜纳从美军那里搞到一辆卡车以后就偷偷摸摸地开始做贩运谷物的生意。当战争结束时，他已经靠这种黑市交易积累了一笔资金，在墨西拿当上了“金融业的顾问”。他于50年代移居米兰。在米兰这个意大利最大的工商城市里，他的“金融天才”得到了充分的施展。1960年，欣杜纳一鸣惊人地买下了私人金融银行。从此以后，他那个包括控股公司、银行和房地产公司的金融王国，就不可遏制地膨胀起来。他还利用与梵蒂冈的秘密关系打入了国际金融界，同英国银行家汉勃罗斯买下了梵蒂冈的房地产总公司，在瑞士金融业大量投资，还在美国购买了排行第19位的弗兰克林银行的产权。欣杜纳为了帮助天民党顺利通过“离婚法”，一次就捐助天民党20亿里拉。连希腊的军人政权也得到过他的“慷慨解囊”。在70年代中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欣杜纳的金融系统资助意大利的“亲西方”组织和个人，以便阻止意大利共产党在大选中获胜。欣杜纳的“不安分”的行为令他的合作伙伴都感到害怕。英国银行家汉勃罗斯在70年代初宣布中止了同他的合作关系。

当然，欣杜纳的主要活动还是黑手党的老本行——洗钱。他在阿格利肯托城开设的银行提供的利率比正常利率高出一倍。他帮助天民党参议员、西西里岛矿业公司董事长格拉齐亚诺·维尔左托把公司的利润变成了瑞士银行的私人存款。“我们的事业”从贩毒、买卖武器及其他各种非法活动中赚来的大笔黑钱，都是通过欣杜纳的“金融王国”流进了万无一失的瑞士银行，或者变成了在欧洲美元市场的投资。

在欣杜纳鼎盛时期的1973年，他的各家公司的交易额占米兰证券交易额的一半左右。据说，他的一举一动足以影响意大利货币——“里拉”的国内外地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时任政府总理的安德烈奥蒂称他是“里拉的救星”。事实上，曾经使里拉地位不稳的一些金融投机活动中都有欣杜纳的黑手。

大概是他过于偏袒天民党而得罪了其他政党，当他急需政府提供资金保证的时候，担任财政部长的共和党人乌阜·拉·马尔法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欣杜纳的“金融王国”因严重透支而崩溃了。美国的司法部门还因为他犯有欺诈、贪污、行贿、伪证等罪行而发出拘捕他的命令。为了替他开脱，安德烈奥蒂亲自出马，多次与欣杜纳的律师会面，还要求意大利中央银行出面干涉。后来在一份由罗马最高检察长和米兰市著名的企业家签署的证明信中，竟然称欣杜纳“一生清白和正直”，他是因为反对共产党才受到“迫害”的。而欣杜纳本人还担心政治家们不够尽心尽力。他在牢房里给他的律师写信时声称，如果他被判刑的话，他将“被迫”招供出“令不少人难堪的事实”，并且将交出一份包括著名政治家在内的长达500人的名单。

老奸巨猾的欣杜纳居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的这一威胁使不少大人物认识到“他已经从一个有用的人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了”。1986年，米兰法院宣布欣杜纳因在1979年下令谋杀意大利私人银行的官方接收入阿姆勃洛索利而被判处终身监禁。几天以后，欣杜纳在沃格拉监狱服氰化钾“自杀”了。然而，欣杜纳的死并没有使某些政治家完全摆脱干系。调查阿姆勃洛索利谋杀案的检察官在报告中说，如果安德烈奥蒂没有在1974—1979年期

间支持和保护欣杜纳的话，阿姆勃洛索利谋杀案可能就不会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黑手党与天民党的关系后来发展到难分彼此的地步。西西里岛天民党领导人、巴勒莫市市长、政府驻西西里大区代理总督萨尔沃·利马，就是一个例子。此外，还有萨尔沃·利马的两个同党——维托·蓄齐米诺和乔瓦尼·乔依亚。

利马、蓄齐米诺、乔依亚是天民党在巴勒莫的三个干将，他们在 50 年代后半期和整个 60 年代把持了巴勒莫市的政权。利马还是长期担任意大利外交部长和政府总理的安德烈奥蒂的密友和亲信。但是，利马生前差一点被作为黑手党送上被告席。1976 年议会反黑手党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提到利马的名字达 149 次。1983 年有两份经济警察的报告声称利马涉嫌向黑手党走私武器。意大利宪兵称利马是在著名的黑手党家族——巴尔贝家族的帮助下当上巴勒莫市市长的，他的保镖也是这个家族提供的。利马还同“我们的事业”的 5 个成员合伙开设了巴勒莫人民银行，同乔依亚和尽人皆知的黑手党分子瓦萨利开了一家建筑公司。但是，1992 年 3 月 12 日，利马却被黑手党暗杀了。利马被谋杀的直接原因是他违背了以前的诺言，未能使当地的黑手党“教皇”米凯尔·格雷科免于刑事处分。更深的原因或许是利马知道的秘密太多了。安德烈奥蒂在事后则说，黑手党谋杀利马的矛头是针对他本人的。

蓄齐米诺在 1959—1964 年期间利用职权将 2500 个建筑项目承包给 3 个没有什么建筑能力、但是有明显黑手党背景的养老金机构。当时，人们都说蓄齐米诺将整个巴勒莫市都卖给了黑手党。由于他干得太“出格”，天民党不得不在 70 年代初把他开除出党。1984 年蓄齐米诺被捕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失业者”除了拥有大量的不动产外，每年从蒙特利尔、洛桑和罗珈诺等地银行收到的利息高达 7 亿里拉。法院的判决书称蓄齐米诺是在“我们的事业”的彻头彻尾的犯罪活动和表面上似乎是合法的经营活动之间的一个联系环节。

乔依亚后来当过天民党的省委书记和政府部长。他除了前文提到的与黑手党合伙经营建筑公司以外，最出名的一项“政绩”就是把大批的黑手党头面人物拉入天民党。当时甘波利亚勒市市长阿尔梅利考反对这种做法。乔依亚就当着他的面撤掉了他的市长职务，并当着他的面批准黑手党分子入党。事后不久，在该市发生的一次神秘的停电事故中，正直的阿尔梅利考被暗杀了。当时一片漆黑，谁也无法看清凶手的真面目。

80 年代以来，黑手党的暗杀行动愈演愈烈，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自 1982 年至 1985 年的四年内，仅巴勒莫及其附近地区被杀的有影响的人物每年都超过 100 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那些“妨碍了黑手党”的警察、法官和国家政府官员。

1982 年 9 月 3 日，黑手党分子使用苏制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暗杀了巴勒莫省督、原宪兵副司令达拉·基耶萨将军。

善良的人们愤怒了，在基耶萨将军的葬礼上，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10 万群众在巴勒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要求严惩黑手党。总统佩尔蒂尼面对人群，哽咽着发誓：“我们已经忍无可忍，黑手党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必须由所有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一致把它打垮！”

巴勒莫红衣大主教打破了宗教的沉默，大声疾呼：“杀害将军的毒蛇注定要下地狱，永远得不到神的宽恕！”

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颁布了五项特别反黑手党法令，这些法令授权警

方窃听所有黑手党嫌疑人物的电话、审查嫌疑犯及其家族的银行帐目、检查其企业的生产情况。

接着，政府又委任全意大利公认的被誉为“反黑手党勇士”的司法部刑务司长乔瓦尼·法尔科内主管反黑手党事务，以完成达拉·基耶萨将军的遗愿。

乔瓦尼·法尔科内，1939年3月20日出生于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大学法律系毕业。6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打击黑手党的活动，他曾多次发誓要铲除黑手党这个社会毒瘤。作为意大利反黑手党的中坚力量，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打击黑手党的各个势力。在他前往巴勒莫赴任不久，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1983年10月25日，巴西警方逮捕了一个持假护照的意大利人。巴西警察根据特征，怀疑这个自称约塞·罗贝托·埃斯科巴尔的人就是受到意大利在世界各地通缉的黑手党头目托马索·布谢塔。经过百般盘问，这位一脸横肉的“老板”终于开了口：“我就是托马索·布谢塔，你们开个价吧，要多少钱才肯放我走？我的自由是无价之宝！”但是，巴西警方并没有见钱眼开，他们立即扣留了布谢塔，同时马上与意大利警方取得联系，通报了这一情况。

意大利警方得到消息喜出望外。因为布谢塔是一条“大鱼”，有了他就有可能攻破黑手党的防线。法尔科内法官和他的助手杰拉奇立即飞往巴西里约热内卢。经过中间人，他们终于与布谢塔达成协议，即意大利警方保护他的安全，他提供黑手党的内部情况。

1984年7月15日，法尔科内将布谢塔从巴西引渡回意大利。几天之后，布谢塔在意大利警方的严密保护下，决定背弃黑手党的信条向警方提供证言。

在长达45天的坦白中，布谢塔交待了黑手党在意大利和美国犯下的具体罪行，提供了122个意大利和美国黑手党头目、成员的名单，解释了其密码和决策制度。布谢塔的交待揭发材料长达400页，说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黑手党内幕。

法尔科内开始部署行动。首先他组织了一个由各类司法人员参加的反黑手党小组，大家互通情况，互调案卷，如果其中有人遭遇不幸，其他人就会递补上去。

1984年9月29日清晨，“圣·米歇尔行动”开始了。这是战后意大利政府对黑手党党徒最大的一次围捕。警察握着法尔科内签署的366张逮捕令，封锁了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市的大街小巷。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装甲车往来巡逻。许多黑手党党徒被从床上拖了起来，戴上手铐，押上囚车。在这次行动中，70多名黑手党头目落网，其中包括黑手党最大头目之一的米凯莱·格雷科。一个月后，第二次闪电行动开始了，又一批黑手党头目遭到围捕。到1984年底，警察和宪兵对500多名黑手党党徒发布了逮捕令。此外，法官和警察也开始对纵容和保护黑手党的政客和商人们采取了行动。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维托·西扬希米诺就在这次行动中被逮捕。巴勒莫市前市长钱奇米诺（70年代初被开除出天民党）也于1984年11月被捕入狱。

另一方面，黑手党在这次大搜捕后的500多天里，竟然又暗杀了400多人作为报复。许多军警、司法人员、政界要人和新闻记者被列入黑手党下一批暗杀的名单。

由于害怕黑手党报复，审判黑手党分子的预审法官和陪审团竟然迟迟组

织不起来，巴勒莫法院的庭审工作不得不一拖再拖。

直到 1986 年 1 月，巴勒莫法院才组成了预审法官和陪审团。1986 年 2 月 10 日，巴勒莫法院开始了对 475 名黑手党分子的大审判，对黑手党分子的指控材料多达 1 万余页。

在审讯过程中，黑手党又制造了多起杀害反黑手党工作人员、证人的暗杀事件，妄图中断审讯工作。但是，法尔科内法官不为黑手党的恐吓威胁所吓倒，一方面坚持不懈地开雇调查取证工作，一方面继续搜捕黑手党分子。

经过长达 22 个月的审讯，1987 年 12 月 18 日，由法尔科内和保罗·博尔塞利诺等法官主持的巴勒莫法庭终于接受了西西里地方检察院对大部分在押黑手党党徒的主要指控，认定黑手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犯罪集团，判处 19 名黑手党头目终身监禁，其他 319 人总共被判将近 3000 年的徒刑。

1988 年 4 月 16 日，法尔科内又主持了对第二批黑手党分子的审判，判处一名黑手党头目终身监禁，判处另外 52 人总共 650 年徒刑。

黑手党受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打击，意大利人民欢呼雀跃，法尔科内法官也为这次成功欢欣鼓舞。法尔科内乐观地预言：“黑手党不是不可战胜的。它既然是一种人类的活动，那么它就会像所有人类活动一样，有开始，也会有终结。”

然而，黑手党的势力比想象的还顽固。1992 年 5 月 23 日，法尔科内法官和他的妻子莫尔维诺被黑手党分子在公路上炸死。另一名主持审判黑手党党徒的著名法官保罗·博尔塞利诺，于 1992 年 7 月 19 日，也被黑手党分子炸死。对此，意大利人民群情激愤，纷纷谴责政府的无能。曾同法尔科内、博尔塞利诺两位法官一起进行调查工作的 8 名年轻检察官为表示抗议，也宣布辞职。

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严厉行动。

1992 年 6 月 8 日深夜，意大利宪兵和警察采取突击行动，在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和西西里、那不勒斯、卡拉布里亚等地区逮捕了约 600 名黑手党头目和骨干分子。

意大利内政部、国防部和宪兵司令部联合向西西里增派了 7000 多名军人，以打击黑手党猖獗的活动。意大利政府还调换了军事安全情报局和国内安全情报局局长以及巴勒莫警察局长、省督和法院院长。

与此同时，警方对黑手党头目的追捕也在悄悄地进行。1992 年 9 月 6 日，黑手党第二号人物朱塞佩·马多尼亚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琴察附近被捕。1993 年 1 月 15 日，黑手党第一号人物托托·里纳在巴勒莫被抓获。1994 年 12 月 3 日，黑手党另一个大头目米凯布杰洛·担巴尔贝拉也被警方抓获，此外还有他的部下乔瓦尼·布谢东。至此，被抓获的黑手党党徒达 7000 人，其中大头目 400 人，坦白悔过者 800 人。

意大利巴勒莫市检察院正是在黑手党头目纷纷落网的背景下，开始指控前总理、终身参议员安德烈奥蒂涉嫌参与黑手党活动的。

1993 年 3 月 27 日，安德烈奥蒂的新闻官斯泰法诺·安德列阿尼宣布，安德烈奥蒂已经收到了巴勒莫检察院的通知，检察院要对安德烈奥蒂涉嫌参与黑手党活动问题进行调查。这一消息立刻轰动了意大利全国。

此前不久，长期关押在美国的黑手党失势头目托马索·布谢塔、原黑手党头号首领斯泰法诺·邦塔特的亲信马里诺·曼诺亚以及其他几名在押的黑手党骨干分子在美国向巴勒莫市检察长贾恩卡洛·卡塞利等法官交待说，安

德烈奥蒂是黑手党的“代理人”，在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他与黑手党头目进行过3次高级会晤。

第一次会晤在70年代初，黑手党头目巴达拉门蒂为感谢安德烈奥蒂“纠正”了一名黑手党分子的判决而登门拜访，安德烈奥蒂便在罗马会见了她。

第二次会晤在70年代中期，身为总理的安德烈奥蒂在西西里会见了黑手党头目邦塔特。邦塔特要求安德烈奥蒂处置一个他们不满意的天民党人，安德烈奥蒂在会晤时许诺解决。但后来还是黑手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三次会晤在80年代初，这是安德烈奥蒂及其在天民党内的同派人物与黑手党联手召开的一次“首脑会议”。会晤的目的是修复黑手党上次擅自“解决”问题而在双方之间产生的“裂痕”。

布谢塔等人还交待说，安德烈奥蒂通过其亲信、西西里天民党领导人萨尔沃、利马长期与黑手党合作，进行利益交换。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1993年出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弗里思，早在80年代就知道意大利天民党同黑手党之间的关系。弗里思曾同意大利法官法尔科内密切合作，一起调查过黑手党走私贩卖毒品的罪行，他当时十分赞赏布谢塔的观点。布谢塔认为，如果过早揭露意大利政界人士（即“第三深层”人物）同黑手党之间的关系，那么他本人和法尔科内法官就将会被“粉身碎骨”；所以，他一直等待时机。法尔科内被杀害后，布谢塔决定进一步坦白，“以此赎罪”。1992年10月11日，他在美国秘密关押所里交待了安德烈奥蒂在西西里岛的代理人萨尔沃·利马（欧洲议员）同黑手党的关系，作为试探，未提及安德烈奥蒂本人。1993年春天，关押在美国的另两名黑手党骨干分子曼诺亚和迪马焦首先指控安德烈奥蒂同黑手党的关系。对此，美国当局并未出面袒护安德烈奥蒂。这样，布谢塔才揭发了安德烈奥蒂指使黑手党杀害《政治观察》杂志社社长米诺·佩科雷利（1979年3月20日被杀）和达拉·基耶萨将军的内幕：因为他俩掌握了大量有关天民党前主席阿尔多·莫罗被杀（1978年5月9日）的材料，涉及到安德烈奥蒂本人。

1993年3月27日以后，巴勒莫检察院检察官卡塞利和3名副检察官联合签署了长达200多页的报告，分三次提交给意大利参议院，列举了安德烈奥蒂涉嫌参与黑手党活动的事例以及几名黑手党头目和骨干分子交待的材料，他们要求参议院取消安德烈奥蒂议员的豁免权，以接受法律审查。

1993年4月14日，在意大利参议院审议取消安德烈奥蒂议员豁免权问题的会议上，安德烈奥蒂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70多页的申诉材料。他愤怒地声明说，他是无辜的，他在担任上届政府总理期间首次制订了有效地打击黑手党的法律，黑手党分子的指控是对他的“报复”；并认为这些指控是具有国际背景的政治阴谋，是某些势力企图通过黑手党分子打击天民党，破坏意大利的国际形象。

1993年5月13日，意大利参议院批准撤消安德烈奥蒂的议员刑事豁免权，允许巴勒莫检察院着手调查他与黑手党的关系。一场意大利前所未有的司法审查开始了。

经过两年多的司法调查，巴勒莫检察院于1995年5月11日宣布，决定对安德烈奥蒂提起公诉。以卡塞利为首的4名检察官向法院提交了长达8000页的起诉书，找到证人400余名。

根据起诉书的指控，安德烈奥蒂曾与黑手党相互勾结，黑手党得到了安

德烈奥蒂的庇护，安德烈奥蒂则得到了黑手党的支持。主要有这么几个例证：一，天民党安德烈奥蒂派的势力从 1968 年的 2% 发展到后来的 10%，是天民党西西里负责人利马等人为安德烈奥蒂争取到黑手党支持的结果。二，指使最高法院法官卡尔内瓦莱为被巴勒莫法院判刑的黑手党分子开脱罪行。据黑手党分子交待，他们在大审判时曾得到保证，案子到了最高法院罪行就会勾销。三，米诺·佩科雷利被暗杀与安德烈奥蒂有关。佩科雷利掌握了对安德烈奥蒂不利的材料，而杀害佩科雷利的黑手党分子萨尔沃兄弟与安德烈奥蒂关系密切。四，亲自与黑手党首领邦塔特、圣塔保拉、里纳会见，黑手党分子曼诺亚和迪马焦对会见的情况有详细的描述。曾为黑手党党魁里纳开车的司机迪马焦说，1987 年他曾开车陪里纳去另一名黑手党要人伊尼亚齐奥·萨尔沃在巴勒莫的住所，会见了安德烈奥蒂及其亲信，他亲眼见里纳与包括安德烈奥蒂在内的 3 人物面致意（这是黑手党头目之间最高的礼仪）。据说就是在这次会见中，安德烈奥蒂答应，受审黑手党分子的判决到了最高法院将得到“纠正”。安德烈奥蒂的亲信利马被杀，则是对其未能履行诺言的警告。

1995 年 9 月 26 日上午，安德烈奥蒂与黑手党关系一案在巴勒莫市乌恰尔多内监狱法庭正式开庭审理，前总理安德烈奥蒂终于被推上被告席。

巴勒莫检察院检察长强调，这是刑事案件审判。可是，此间舆论仍然认为，此次审判明显带有政治和刑事案件两重意义。因为审判所涉及的不仅是安德烈奥蒂个人与黑手党之间的关系，也是战后以来天民党与黑手党之间的关系。因此，就其规模和意义来说，这是意大利的一次“世纪性”审判。

安德烈奥蒂曾通过辩护律师企图将此案归属和移交部长法庭审理。但巴勒莫检察院预审法官认为，鉴于安德烈奥蒂与黑手党的主要活动都在巴勒莫进行，而且巴勒莫又是黑手党的老窝，因此坚持此案在巴勒莫审理。

鉴于此案内容重大、双方证人众多，法院计划庭审 150 次，预计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得出结论。所以，有不少人预言，1995 年已经 76 岁高龄的安德烈奥蒂能否看到这起审判的结果还难说。



## 意前总理克拉克西的悲剧

1992年4月5日议会大选之前，意大利前总理、社会党总书记克拉克西曾公开对记者说，内阁总理一职非他莫属。没想到越揭越大的米兰贿赂丑闻却把他无情地卷入反腐败漩涡。在米兰贿赂丑闻的冲击下，他鸡飞蛋打一无所获，忍痛放弃总理一职的角逐。此后，在一份接一份的“接受审查通知书”面前，他又被迫于1993年2月辞去了担任16年之久的社会党总书记的职务。在以后的审判中，克拉克西多次被判刑，成为意大利旧国家体制的殉葬品。

贝蒂诺·克拉克西，1934年2月24日生于意大利米兰市。父亲是一位律师，曾任米兰省副省长。他毕业于米兰大学法律系，曾任意大利学联主席。1951年参加社会党，1957年当选为社会党中央委员。1960—1964年任社会党米兰省委书记。1968年当选为众议员，历任众议院国防、外交、移民委员会成员和社会党众议院党团主席。1970年当选为社会党副书记，1976年当选为社会党书记，兼任《前进报》社长。1977年当选为社会党国际副主席。1983年8月出任政府总理，成为意大利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任社会党总理，也是近20年来最年轻的总理，同时还使意大利出现总统、总理均由社会党人担任的局面。1985年10月，美国截夺载有劫夺意大利游船的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人员的埃及飞机事件发生后，辞职。同年11月，再次组成5党联合政府，续任总理。1986年6月再次提出辞职，但总统科西加第三次任命他组阁，并先后获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信任票。1987年3月3日他向科西加总统第三次提出辞呈，并宣布政府辞职。他担任总理的政府连续执政3年半（1983年8月—1987年3月），成为战后意大利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府。1992年米兰贿赂丑闻曝光时，他仍担任社会党总书记职务，并且有望再次出任政府总理。

1992年2月17日，意大利米兰市巴吉纳养老院院长马里奥·基耶萨，不知是做贼心虚还是提前知道了他被人告发的消息，他慌慌张张地将最近接受的4200万里拉贿赂分成两部分。其中的700万里拉（约合5600美元）他以为构不成犯罪便存放起来，另外的3500万里拉（约合2.8万美元）因数目较大被他撕碎后放入马桶用水冲掉。刚做完手脚，数名意大利警察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将他逮捕，并从抽屉里搜查出700万里拉现金。多年的耳濡目染，使他深谙官场之道和权力的重要性。70年代初期他投靠当时的社会党书记德马尔蒂诺，后来跳槽到克拉克西的自主派。经过一番苦心经营，他控制了社会党在米兰市的一个基层组织，从而掌握了7000多张选票，在省议会中崭露头角。自1986年起，他担任巴吉纳养老院院长，在收取“回扣”方面为社会党效力多年。他羽翼丰满后，自信可以主宰事态，遂于1990年底决定不再给社会党交纳经费，所得赃款悉数供个人使用。基耶萨被捕后，警方查出他有价值300亿里拉（约合2400万美元）的财产（包括现款、存款、外汇和房地产），其中大量现金被分别存在保险柜里、意大利和瑞士银行中，或存在以其朋友、女秘书、情妇名义和化名开办的公司里。基耶萨向共和国副检察官迪彼得罗的交待，拉开了米兰贿赂案的序幕。

迪彼得罗是意大利一位年轻的检察官，1950年出生，多年的检察官生涯使他具有了丰富的办案经验。他拿到基耶萨的交待材料后，感到这个案子份量重大，没想到此案竟然会牵连到这么多社会党、天民党、左翼民主党的实权人物和企业界人士，这在意大利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司法部门更是如临大敌，他们怕发生意外，专门为迪彼得罗配备了最好的防弹车和寸步不离的警

卫人员。

迪彼得罗为办好这个案子，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政客们毕竟不那么好惹，他就先从企业家入手。他知道，企业家大都是百万富翁，过惯了舒服生活，最怕蹲监狱，关不上几天就会开口。只要一交待，就放他回家，改坐牢为软禁。这一招还真奏效，涉嫌人物纷纷跑来交代；本来门可罗雀的法官办公室门口一下子排起队来，来人等着交代问题。

随着案情的发展和企业家的揭发，许多政府要人和企业界大亨纷纷落网，锒铛入狱。到1992年6月12日为止，被捕者已达42人之多。行贿受贿总金额达1500亿里拉（1.2亿美元）。贿赂的来源是机场、停车场、地铁、体育馆、医院、剧院等一系列公共建筑工程。由于这些工程的国家拨款中的相当一部分变成“回扣”流入负责拨款的官员腰包，所以工程预算经常是不够用。米兰国际机场的预算为1450亿里拉，结果用了4000亿里拉才完工；米兰体育场的预算为670亿里拉，实际开支1600亿里拉；米兰地铁第3路工程预算为3700亿里拉，但实际开支达25000亿里拉时仍未完工。

由于社会党人自1978年以来一直担任米兰市长，控制米兰市政，最早受到米兰贿赂案的冲击。

社会党人、意大利政府旅游戏剧部长卡洛·托尼奥利，从1976年至1986年担任米兰市长期间，曾多次接受过“回扣”款，特别是在1984年竞选欧洲议员时，基耶萨一下就给了他5亿里拉用作竞选费，结果他获得了创历史纪录的32万张选票。托尼奥利的受贿总额为120亿里拉。

社会党人、克拉克西的内弟、新当选的众议员保罗·皮利泰里，1986年至1991年任米兰市长，在1990年进行地方选举中用受贿款参与竞选，曾在萨科医院艾滋病治疗中心、重建米兰小剧院等多项工程中受贿，受贿总额达116亿里拉。由于他在米兰小剧院工程中受贿10亿里拉，使预算费用仅90亿里拉的该工程在实际支出800亿里拉后仍未完工。

其实，利用职权索取“回扣”并非社会党的专利，意大利的其他政党也无不如此。意大利社会学家1976年至1986年10年的调查研究发现：贪污腐化现象涉及所有政党，社会党在西北部，天民党在东北部、中部及西西里，社会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左翼民主党）在中北部，社会党和天民党在南部的贪污腐化现象尤为严重；社会党的贪污腐化现象多在承包工程方面，天民党多在国家拨款多的重大工程方面和大企业的重要职务方面，意共（左翼民主党）多在社会福利机构、服务部门、建筑许可证审批部门等。基耶萨被捕后供认，当权者与经济集团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共生”现象，政府官员通过招标向中标者索取“回扣”，企业家则为了能中标而情愿支付“回扣”。这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习惯做法，彼此心照不宣。这种“回扣”一般为招标合同价格的3—4%，也有高达10—15%的。一位已退党的天民党政界人士披露，天民党、社会党和其他党之间分配“回扣”的原则是5：3：2。

被捕入狱的米兰天民党行政书记、ATM运输公司董事长毛里奇奥·普拉达交代，在米兰，社会党、天民党、前意共之间分配所得回扣的比例是各1/3，或者社会党一半，天民党和前意共各得1/4。后来，共和党也参加分赃。例如，米兰地铁工程造价原估计3700亿里拉，后来增加到25000亿里拉，中标者支付“回扣”为工程总价的4%，由中标的建筑公司分批支付现金。社会党得其中的一半，天民党和前意共各得1/4，后来又给共和党10亿里拉。

由于意大利有各政党联合分赃的传统，故因“米兰丑闻”而被捕者之中

也不乏天民党等其他党派的成员。天民党米兰地方委员会主席罗伯尔特·蒙季尼在米兰机场扩建工程中受贿4亿里拉，左翼民主党（前意共）领导成员贾尼·切尔维蒂利用米兰地铁工程捞取7000万里拉，共和党前议会党团主席安东尼奥·德尔·佩尼诺和社民党国会议员雷纳托·马萨利均在地铁工程中收受“回扣”10亿里拉。

随着案情的深入，检察官迪彼得罗开始把矛头指向政界的大人物。据基耶萨供认，1990年米兰进行地方选举时，他曾要求克拉克西支持他当米兰市议员和市政委员，并保留养老院院长职务。但克拉克西只答应他继续担任养老院院长职务，作为交换条件，克拉克西要求他解决其儿子参加竞选的费用。1992年6月4日，意大利各报纸都在重要位置刊登了克拉克西及其儿子与“米兰丑闻”有染的法官报告，尽管还未对克拉克西提出受贿的指控，但社会党和克拉克西本人在政治上所受到的损害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在1992年意大利大选中，克拉克西本来是最热门的入选之一。即使当不上总统，在天民党人出任总统，共和党人、左翼民主党人分别担任参、众两院议长的情况下，由社会党人出任内阁总理是天经地义的。作为社会党的总书记，克拉克西曾认为总理一职非自己莫属。早在大选之前的4月5日，克拉克西就信心十足地宣布：自己是唯一的总理候选人。不久，他又提出以精干的原则组阁，内阁仅20人，一半是政党领袖、一半是专门人才，直视总理之职为囊中之物。但在丑闻的冲击下，却鸡飞蛋打一无所获，不得不主动放弃角逐总理一职，由社会党的第二号人物米利亚诺·阿马托出任总理，以免这一要职落入他党之手。

面对报纸的揭露，克拉克西像是一头被激怒的狮子，他愤怒地说：“这个消息早就刊载过了，像犹太的假话那样，为什么现在又重新登出。另外，我在市政选举中仅用我的姓氏帮助了自己的儿子。”他还说，发表这类消息只不过是一种“对我，对我的儿子、女儿和妻子最新的攻击与流氓行为罢了。”克拉克西并未就此罢休，他公开宣布：如果有人利用米兰事件对他和他的家人进行政治陷害，他将在国会作证，把各大政党以非法手段获取经费的种种内幕公诸于众。这一声明震撼了意大利政坛，因为几乎所有政党都是不干净的。假如克拉克西真的孤注一掷，就会把大批位高权重的各界要人送上被告席，轻者断送锦绣前程，重者饱尝铁窗之苦。

克拉克西的声明并没能阻止对他和社会党高官的追查。

刚卸任外长职务不久的德米凯利斯称得上是克拉克西的铁哥们，他这时也卷入行贿受贿丑闻。德米凯利斯是化学教授出身，威尼斯人，40岁时开始出任部长，1988年曾任副总理兼外长，后来虽不再任副总理但一直担任外长职务，1992年6月政府更迭后他不再在政府内任职，开始担任社会党副书记职务，以填补社会党人阿马托出任总理后留下的空缺。1992年7月14日，威尼斯法官向德米凯利斯发出了接受审查的通知书，并在7月16日向议会递交了要求对德米凯利斯进行审查的报告，理由是德米凯利斯在威尼斯机场公路衔接工程、排污设施工程等项目涉嫌受贿，并逮捕了德米凯利斯的特别秘书办公室主任乔治·卡萨代伊，而且还搜查了德米凯利斯派在威尼斯的办公室，这对克拉克西的社会党来说又是一次打击。

对社会党总书记克拉克西来说，1992年12月15日是个不祥的日子。这天，米兰检察官迪彼得罗向克拉克西发出首份接受审查通知书，并向议会建议取消克拉克西的议员豁免权。

1993年1月29日，检察官派警察搜查了社会党总部和该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报社，再次轰动意大利。罗马新闻媒介称，这是战后意大利历史上和社会党建党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事件”。为此，作为社会党总书记的克拉克西立即发表声明，称这是“一种无法无天、不仅有损于社会党而且也有损于国家尊严的犯法行为”。随后，检察官又发出了14份逮捕令，逮捕了包括伦巴第大区政府前副主席和该区议会议长在内的7名社会党要人。

但真正把克拉克西置于死地的还是他的密友、前政府国库部长、涉嫌米兰受贿案的关键人物西尔瓦诺·拉里尼。1993年2月7日，拉里尼因米兰事件潜逃数月后，主动向米兰检察院自首，交了很多行贿受贿的内幕。根据他提供的材料，米兰法官又到瑞士监狱审讯了在押犯弗洛里奥·费奥里尼，弄清了瑞士卢加诺银行里同克拉克西和司法部长克劳迪奥·马尔泰利有关的一笔700万美元的存款。

费奥里尼曾任埃尼集团的财务经理，据他交代，多年来埃尼集团一直给政府各党派“活动费”，具体分配比例是，天民党40%，社会党40%，社民党和共和党各10%。这些钱在埃尼集团的正式帐面上是没有的，它们来自在国外建立的金融机构，由费奥里尼专人负责。这个复杂机制的中心是索费德投资公司，埃尼集团给政党的所有秘密资金的周转（支付）均通过这个公司进行。在瑞士苏黎士的一家国际碳化氢公司是索费德公司的上级，这个上级还控制着特莱丁维斯特信贷银行。费奥里尼既是索费德公司的常务董事，又兼任国际碳化氢公司副董事长和特莱丁维斯特信贷银行董事长。他一身三任，“工作”起来极为方便。克拉克西在瑞士的700万美元存款，正是借助费奥里尼的手获得的。

在克拉克西的幕后策划下，埃尼集团让特莱丁维斯特信贷银行给米兰的安布罗夏诺银行汇入资金5000万美元，安布罗夏诺银行再把700万美元的“回扣”款转入克拉克西在瑞士银行开设的秘密帐户。1981年，在调查别的案子中这些勾当眼看就要败露，于是克拉克西下令给安布罗夏诺银行“把所有的钱全取出来”。

安布罗夏诺银行董事长罗贝布托·卡尔维马上接受克拉克西的命令，开始行动。他先是让本银行向梵蒂冈的约尔银行提供贷款，然后约尔银行又把钱转移到瑞士。通过这一系列暗地里的向外“调拨”，安布罗夏诺银行共调走了约500亿里拉的资金。再加上过去“消失”在国外的3亿多美元，安布罗夏诺银行成了一个空壳，于1982年6月宣布“破产”，董事长卡尔维也于同年6月18日在伦敦一座桥下“自杀”身亡。克拉克西接受的700万美元中，只有100万美元转入社会党的帐户，其余部分落入了克拉克西和马尔泰利等人手中。

知道此事再也无法掩盖，社会党副书记、司法部长马尔泰利于1993年2月10日宣布辞去自己的司法部长职务。克拉克西也撑不住了，于1993年2月11日辞去了已担任16年之久的社会党总书记职务。

米兰贿赂案对意大利政坛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截至1993年4月，共有1356人被逮捕、1116人接到受审通知。其中，有152名议员、852名国家机关官员、1487名企业家，意大利5大政党的书记全部被卷了进去：社会党书记克拉克西1人就接到了14份受审通知，天民党全国书记福拉尼也因本派系接受了12亿里拉的贿赂款而受到审查；天民党元老、意大利终身参议员、前总理安德烈奥蒂竟被巴勒莫市检察院指控有参与黑手党活动之嫌，并收到米

兰检察院的审查通知；共和党书记乔治·拉马尔法因涉嫌不得不宣布辞职；左翼民主党在贝林格任总书记的70年代，曾被人们看作是清廉的典范，在不足20年后的米兰审判中，竟然也同天民党一样腐败，其受到拘捕和审查的人数竟然位居第三。米兰贿赂案充分暴露了意大利国家体制的弊端和急待改革的必要。

1993年10月28日，米兰法庭审判了库萨尼一案。1989年12月15日，国有埃尼集团与私营蒙爱集团决定合并，建立埃尼蒙爱公司。合并后双方各持有公司40%的股份，其余20%的股份投放股票市场。但是，蒙爱集团的“朋友”买下了10.8%的上市股票，因而在埃尼蒙爱公司中实际上蒙爱集团控制了绝对多数的股份。只过了一年多时间，双方突然决定分手，蒙爱集团40%的股份和上市的20%的股票全部转让给国有的埃尼集团。在洽谈股份转让的价格时，私下达成了给“回扣”的交易。即由国家拨款出资给埃尼集团购买转让的那部分股份，价格为每股1650里拉（在成交前数日，股票市价为每股950里拉），蒙爱集团以“回扣”方式给予当时埃尼集团董事长卡利亚里（受贿额高达160亿里拉，约合1000万美元）和几个主要执政党“报酬”，实为贿赂。从中斡旋及经手交付这些“回扣”的是埃尼蒙爱公司的顾问库萨尼。据法官估计，这一案件行贿总额高达2500亿至2800亿里拉（双方股份转让交易额高达2.8万亿里拉，当时合22亿多美元）。天民党书记福拉尼派系、安德烈奥蒂派系及整个党共获“好处”287亿里拉，克拉克西的社会党获得了75亿里拉，库萨尼本人独吞了1000多亿里拉。检察官迪彼得罗经过长期调查和周密准备后，在法庭上宣读了长达7000页的起诉材料，出庭作证的共177人，包括意大利政坛所有最重要的头面人物，唯一未出庭的是克拉克西，他躲在突尼斯的别墅里，害怕回国后被捕入狱。此案审理时间长达400多小时，开庭51次，持续了整整半年时间。意大利报刊称这次审判是“政治大审判”，此话颇有道理。虽然被告只有库萨尼一人，出庭作证的却是意大利五大执政党书记、卸任总理、外长以及部长，表面上他们都不是被告，但他们要证实自己受贿的数目，实质上处在被告地位。意大利电视、广播和报刊每天进行实况报道，政界和企业界丑恶的内幕暴露无遗。1994年4月28日法庭作出判决：库萨尼被判处八年监禁和1600万里拉的罚款，五年不准担任公职，两年不准经商，同时还得偿还蒙爱公司和国际公司1680亿里拉。

1994年7月29日，米兰法庭判处克拉克西八年半徒刑，并终身不得任公职，因为他曾支持埃尼集团借给濒临破产的安布罗夏诺银行5000万美元，以供救急之用，并从中受贿700万美元存入瑞士银行里，但是，在社会党的帐户上只收到100万美元，其余部分落入了克拉克西和党的副书记等人手中。

克拉克西通过律师交给法官的书面材料承认，仅1987—1990年间，社会党非法谋得了近1870亿里拉的金钱。

1994年12月初，克拉克西又被米兰法庭判处五年半徒刑并终身不得任公职，因为他在埃尼——萨伊一案中受贿110亿里拉。

1995年10月29日，克拉克西和其他四个原执政党的书记、北方联盟书记博西等23人，因为在埃尼蒙爱一案中受贿，被判处六个月至四年不等的徒刑，克拉克西被判处四年徒刑，他们总共受贿达1500亿里拉。克拉克西始终坚持这样的论点：“回扣”人人拿了，不算犯罪，他是为党谋“利益”，不承认自己受贿了。

耐人寻味的是，克拉克西的“最后一个”情妇、36岁的委内瑞拉前“美女之皇后”罗罗·德弗朗切斯科于1994年11月初公开说，1991年克拉克西在其下榻的罗马一家饭店里，通过旅馆服务员牵线，私下同她保持联系达一年之久，他人一无所知。她承认自己是克拉克西的最后一个情妇。她向克拉克西的所有情妇们发出呼吁：将克拉克西用受贿款买的已赠给她们的珠宝首饰，全部退还给米兰副检察官迪彼得罗。

1994年10月初，根据米兰法官的要求，瑞士法官还没收了存在瑞士国际机场保险柜里的属于克拉克西的15公斤黄金，价值约达2.5亿里拉。据经手人说，这属于受贿款之一。克拉克西怎么否认也无济于事。

米兰贿赂丑闻再次证明，如果缺乏有力的外在力量的监督，任何人、任何政党都会走向腐败。

1996年4月16日，意大利米兰法院又对克拉克西做出了新的判决。法院认为克拉克西在米兰地铁项目建设中收受贿赂构成犯罪，判处克拉克西8年零3个月徒刑，同时判处克拉克西向米兰地铁公司偿付2300万美元的损失费。

克拉克西在另外几个受贿案和为社会党非法集资案中已被判处过18年徒刑。这样，他至今（1996年4月）共被判处26年零3个月监禁。目前，还有他涉嫌的几个案子正在审理之中，估计他还将被判处新的徒刑。

为逃避意大利司法部门的追捕，克拉克西自1993年以来一直流亡在突尼斯。数月前，意大利曾向突尼斯提出引渡克拉克西的要求，但突尼斯至今（1996年4月）未作答复。

## 菲律宾马科斯夫妇腐败录

菲律宾是 1946 年宣告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作为菲律宾独立后的第六任总统，马科斯没有顺应时代的潮流领导菲律宾人民走向民主与富强，却在菲律宾建立了一个长达 20 年之久的腐败王朝。1986 年 2 月 25 日晚，众叛亲离的马科斯夫妇，在人民群众的愤恨声中，仓皇逃往海外，其腐败王朝终于覆灭。

1917 年 9 月 17 日，费迪南德·埃曼努尔·马科斯出生于菲律宾伊罗戈省的塞特镇。

马科斯的祖父法比安·马科斯，年青时当过教员、法官，还当过农场主；1889 年被任命为伊罗戈省已达市市长。在这样优越的家庭环境中，马科斯的父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高中毕业后，马科斯的父亲到菲律宾最高学府马尼拉师范学院深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过许多奖章和奖状。

马科斯的母亲约瑟法·爱德拉琳，是一个农场主的女儿，与马科斯的父亲是同乡，也是同学，同样受到过良好的教育，1916 年 4 月与马科斯的父亲结婚。

马科斯的父母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员。后来，马科斯的父亲又学习法律；在菲律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一面当律师，一面从事政治活动，曾被选为北伊罗戈省第二区议员。在政界闯荡了多年以后，马科斯的父亲被任命为达沃省省长。他非常希望马科斯将来也成为一名律师，然后跻身于政界。

在如此优越的家庭环境中，马科斯从小就受到精心的培养和良好的教育。1934 年，他考入菲律宾大学法律系，走上了他父亲希望他走的路。在大学期间，他学习成绩优异，有很多特长，曾获得军事体育最高国家奖。1939 年，在马科斯即将毕业时，因涉嫌谋杀他父亲的政敌胡利奥·纳隆达桑而被捕。后来，马科斯被宣告无罪释放。在被捕期间，马科斯参加了全国性的律师会考，并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这两件事一度使他成为菲律宾的新闻人物。被释放以后，马科斯便穿上了律师的黑袍。律师事务，使他的政治洞察力、演说才能和逻辑推理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创造了日后跻身于政界的条件。

1941 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入侵菲律宾，马科斯脱下了律师的黑袍，毅然从军，并参加了菲律宾有名的巴丹保卫战。在战争中，马科斯的确立下了一些战功，但决非是几十年后他自己或别人所吹嘘的那样：“为最终胜利作出贡献，对全世界都有巨大影响”，“曾在贝桑格·帕斯单枪匹马击溃 50 名日军，是“菲律宾历史上受勋最多的战士（32 枚勋章）”，等等。

马科斯有正式记载的政治生涯是从 1949 年他刚刚 32 岁时参加众议院的竞选开始的，这次竞选的成功使他成为众议员。以后，在 1953 年和 1956 年马科斯连续当选众议员职位。在此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前总统罗哈斯的特别助理、众议院工商委员会主席和自由党领导人。1959 年，马科斯走进了参议院，并于 1963 年当上了参议院议长。这时的马科斯雄心勃勃，公开宣称要登上国家元首的宝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马科斯与曾为之奋斗 14 年之久的自由党一刀两断，然后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以此换取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并成为国民党的唯一总统候选人。1964 年 4 月，选举第六任总统的大选开始，马科斯竭尽全力参加竞选，并得到夫人伊梅尔达的大力协助。

伊梅尔达，1929 年 7 月 2 日出生于马尼拉。她母亲特立尼达是一个小珠宝商的女儿，是她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她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有 5 个子女，她母亲生了 6 个子女。伊梅尔达是母亲的长女。

伊梅尔达 9 岁那年，她的母亲离开了人世。为了摆脱丧妻后的悲伤，改善生活环境，1938 年伊梅尔达的父亲带着全家，从马尼拉迁往莱特省省会塔克洛班居住。这以后直到 1952 年伊梅尔达 23 岁，她一直生活在塔克洛班。高中毕业后，伊梅尔达考入圣保罗学院教育系，她父亲当时就在圣保罗学院任教。因家庭人口众多、经济困难，为了维持学业，伊梅尔达只好过半工半读的生活。虽然家庭经济条件不太理想，但伊梅尔达却十分坚强，她恪守一句格言：“要永远在嘴角挂着微笑，要永远把泪水藏在心底。”随着年龄的增长，伊梅尔达变得越来越俊俏美丽，一副大家闺秀的派头。伊梅尔达不但相貌美丽，而且还有甜美的歌喉和出众的表演才能，这一切使她在塔克洛班颇有名气。她 17 岁那年，曾与一位美国少女并肩坐在一辆花车上，参加 1946 年 10 月 20 日庆祝美军在莱特省登陆两周年游行，出尽了风头。一年以后，在 1948 年的花卉节上，伊梅尔达幸运地被遴选为“塔克洛班的玫瑰花”。此后，伊梅尔达更加引人注目，同时也招来了许多好色之徒的纠缠。这时有许多好心人向她父亲吹风说：“伊梅尔达居住在莱特简直是浪费才华，她应该到马尼拉去。”此时，在马尼拉当议员的伊梅尔达的堂兄丹尼尔，看中了伊梅尔达出众的交际才能，主动邀请她到马尼拉去住，并答应支付她去马尼拉的旅费。在征得了父亲的同意后，1952 年，23 岁的伊梅尔达带着 5 比索只身去闯大都市马尼拉了。

来到马尼拉后，伊梅尔达寄居在堂兄丹尼尔家，并找到了一份音乐书店售货员的工作。丹尼尔在马尼拉竞选议员时，曾带着她到各地帮助竞选。伊梅尔达充分发挥自己貌美、善于演讲、歌喉甜美的特长，为丹尼尔拉了不少选票。从此，伊梅尔达在马尼拉开始小有名气。1953 年 2 月 15 日发行的《本周》杂志情人节专刊的封面，采用了伊梅尔达的大幅头像。刊物投递到千家万户之后，作为“封面女郎”的伊梅尔达名声大振。

为了摆脱困境、出人头地、进入上层社会，伊梅尔达暗暗地把希望寄托在争当马尼拉小姐的选美比赛上。她报名参加了 1953 年的菲律宾全国选美比赛，比赛结果令她大失所望。落选的结果让她难以接受，痛哭一场后她决心抗争一番。她直接找到当时的马尼拉市长拉克松那里，百般纠缠后，终于争到了一个“马尼拉女神”的称号。

1954 年 4 月的一个傍晚，25 岁的伊梅尔达跟着堂嫂去国会看望当时任议长的丹尼尔堂兄。当天晚上，与任众议员的马科斯相遇。马科斯为伊梅尔达出众的容貌、气质所吸引，两人一见钟情、相见恨晚。经过 11 天的热恋，1954 年 5 月 1 日他们在马尼拉圣米格尔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伊梅尔达想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贤妻良母，但马科斯却不以为然，他鼓励伊梅尔达要胸怀大志，成为他攀登权力顶峰的伴侣和助手。

在和马科斯结婚的时候，伊梅尔达的一个叔叔是菲律宾最高法院的法官，另一个叔叔是马尼拉市的市长。与马科斯结婚后，美丽聪明而在政界又有亲属关系的伊梅尔达，为马科斯的政治地位积极奔忙，不遗余力地把马科斯推向菲律宾政治的高层。在伊梅尔达的协助下，马科斯 1959 年进入参议院，1963 年当上参议院议长。

1964 年 4 月大选开始后，伊梅尔达全力配合马科斯竞选总统。她为马科斯修改讲话稿，参与制定竞选计划，接待社会各界的来访者。

为了扩大马科斯的影响，伊梅尔达推出一部史诗性影片《光荣的人》，为马科斯歌功颂德。影片情节曲折、富于感染力，曾轰动一时，马科斯的声



望因此急剧提高。伊梅尔达还陪同丈夫四处奔波，笼络人心。他们夫妇几乎走遍了菲律宾的所有城镇，在各种场合向群众发表演说，甚至在尘土飞扬和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徒步行走，同满身泥土的农民握手拥抱。伊梅尔达对所到之处选民们要她唱歌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她还成立和领导一个“蓝衣妇女助选团”，向选民们散发传单，赠送钢笔、帽子、牙刷、手绢等小礼品，以收买人心。伊梅尔达组织宣传才能的出色发挥，为马科斯赢得了大量选票。马科斯自豪地称，伊梅尔达是他的秘密武器，用他自己的话说：“她至少为我争取到一百万张选票。”

1965年11月，马科斯竞选获胜，当选为菲律宾独立后的第六任总统。马科斯夫妇如愿以偿，于1965年12月30日搬入总统官邸——马拉卡南宫，开始了他们长达20年之久的统治。

马科斯上台之初，还是颇有作为的。菲律宾是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基于这样的同情，马科斯深知农业是立国之本，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实行了“土地改革”，采用向地主购买土地然后低价转卖给农民的办法，解决了40多万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菲律宾过去是殖民地经济，主要种植美国所需要的经济作物，如甘蔗、烟叶、马尼拉麻、椰子，而粮食却长期依靠进口；马科斯意识到了不生产粮食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便下决心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农业结构。从70年代初，马科斯领导开展了一场“绿色革命”，在全国推广“奇迹稻”（优良稻种）的种植。在马科斯的领导下，菲律宾的农业大有起色，1976年粮食已能自给，1977年粮食开始少量出口。

按照菲律宾宪法规定，总统任职每届四年，只能连任一届。马科斯的第一届总统任职，到1969年为止。如果马科斯只任一届总统，他的婚姻生活和政治生涯都将是完美的；因为权力对人的腐蚀，在短短的四年中是不可能达到多么严重的地步的。

不幸的是，在1969年的总统竞选中，马科斯再次获胜，开始了他的第二任总统任期。这届总统任期，按宪法规定到1973年为止。从后来马科斯彻底被权力所腐蚀的悲剧来看，马科斯连任总统不仅是菲律宾人民的不幸，也是马科斯本人的不幸。

1970年初，一群游行者在公然对马科斯总统提出指责；一伙加入新人民军的大学生冲进马拉卡南宫，烧毁了两辆小轿车。从那时起，菲律宾社会暴力冲突接连不断，逐步升级，马科斯政权日益不得人心。

1971年8月21日，自由党群众大会正在基阿波教堂前的米兰达广场上举行，突然，3颗手雷在人群中爆炸，致使几十人身亡，数百人受伤，8名反对党领袖被当场炸死。这一阴谋得逞之后，马科斯在第二天宣布：中止不可非法逮捕人的“人身保护权”，获得了不经司法机关批准便可随便抓人的权力，开始执行他对人民的高压政策。

到1972年夏天，马科斯感到他的地位受到了反对党领袖阿基诺的咄咄逼人的挑战，为了达到他长期统治菲律宾、建立马科斯王朝的目的，他公开宣称：“为了菲律宾的长远利益和稳定”，他必须继续执政。为此，他于1972年9月21日签署了“军事戒严令”，宣布在全国实行军管，并颁布了1081号公告，开始了长达10年的军事管制。

在军事管制期间，菲律宾人民生活高压政治之下：新闻和集会自由被取消，众多的社会团体被解散，政治清洗，逮捕政敌。在短短的几年内，菲

律宾至少有 6 万名“破坏分子”被捕入狱，几百甚至上千名可疑分子死于军人和警察之手，或无声无息地销声匿迹。这些被秘密逮捕或处死的人中，有工人、农民、学生、记者、教士和律师。

不仅如此，马科斯还要了许多政治手腕来使他的独裁统治合法化。1973 年，马科斯政权搞了个新宪法，把菲律宾的美国式总统制改为英国式责任内阁制，并规定现任总统在军管时期兼任总理，直至临时国会选出新政府为止。1978 年 6 月，临时国会开幕，马科斯宣誓就任总理，正式行使总统兼总理职权。1981 年，马科斯宣布取消军管。为了确保长期垄断国家权力，同年 4 月又通过公民投票再次修改宪法，把政体改力法国式总统制。新宪法规定总统在非常时期拥有绝对权力，总统任期改为 6 年，不受连任一次的限制。

搞独裁必然要任人唯亲，马科斯也不例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马科斯重用亲信，包庇亲属。马科斯任命伊梅尔达担任环境保护和安置部长、全国妇女委员会主任、马尼拉市市长，儿子邦格是北伊罗戈省省长。其他亲属也大沾其光：母亲约瑟法拥有一家海运公司和两个木材加工厂，叔父皮澳·马科斯是铜矿和金矿的业主，侄子马里亚诺主管唱片公司和娱乐中心，姐姐福尔图纳控制着旅行社、海运及货运公司，弟弟帕西菲科为 20 多家公司的总裁。在国会，马科斯的新社会党控制了 88% 的议席，90% 的省长、市长也都是新社会党成员。马科斯对作为政权支柱的军队严加控制，陆海空三军司令、总参谋长、总统府警备司令、国家安全情报局局长和首都警察部队司令等要职，都是由马科斯亲自挑选的绝对忠于马科斯的人担任。军队中大量的高级军官都是马科斯安插的他的伊罗戈省同乡，三军和保安部队 90% 的将级军官都是伊罗戈省人，保安军 22 名将军中就有 18 名伊罗戈省人。驻守马尼拉周围的卫戍部队中伊罗戈省人占绝大多数。

在政治上搞独裁的同时，在经济上马科斯采取了利用外资、鼓励赋税、利润自由、保护资金回收、生产面向出口等经济政策。由于政府的管理能力低下、贪污腐败泛滥，国民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外国银行的巨额贷款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繁荣，反而使菲律宾债台高筑，外债高达 256 亿美元。石油和肥料价格飞涨，使那些凭着农业改革自立起来的小耕种者难以生存。经济衰退使工人大量失业。

马科斯的独裁腐败统治，一步步把人民逼向绝路，也注定了自身的灭亡。贝尼格诺·阿基诺，就是马科斯的死对头。

贝尼格诺·阿基诺，1932 年生于打拉省康塞普西翁镇。亚典尼奥大学和圣贝达学院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1950 年担任《马尼拉时报》驻朝鲜战地记者，1951 年任驻东南亚国家新闻记者，1953 年任该报国际栏编辑。1955 年当选康塞普西翁市市长，但因年龄不够而被最高法院取消该职务。1956 年任麦格赛赛总统特别助理，1957 年继续任加西亚总统的特别助理。1959 年当选为打拉省副省长，后任省长，并担任省市长联盟秘书长。1963 年 11 月再次当选打拉省省长，并以自由党身份当选参议员。1966 年任自由党秘书长。阿基诺晋升速度之快，在菲律宾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54 年 10 月 11 日，他与科拉松·苏木隆·科胡昂科结婚，婚后生有 4 个子女。

科拉松·阿基诺夫人，1933 年生于马尼拉，出身于打拉省科胡昂科家族。1946 年她随家迁到美国，在美国读完了高中和大学，1953 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回到菲律宾，进入马尼拉大学学习法律。1954 年与阿基诺结婚后，她便当起了家庭主妇。

阿基诺是菲律宾最著名的反对党领袖，马科斯对他又恨又怕。1972年9月22日，即马科斯宣布军事管制的第二天，马科斯以颠覆罪、叛逆罪等罪名逮捕了阿基诺。次日晚，阿基诺被转押到戒备森严的博尼费乔堡。1973年8月，阿基诺被推上军事法庭，指控他犯有谋杀、颠覆和非法拥有武器罪。阿基诺对这些指控给予了驳斥。1974年4月，法庭第二次开庭，阿基诺以绝食40天表示抗议，最后被送进医院，强制进食。1975年初，为了向马科斯表示抗议，阿基诺又一次进行绝食，绝食31天后，体重减少了三分之一，两腿不能站立，两眼视物不清，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1977年11月25日，军事法庭认定阿基诺有罪，并宣布对他判处死刑，由行刑队处死。由于阿基诺患有轻微的心肌梗塞和美国的干预，这一判决没有执行。因为阿基诺长期坐牢，心脏受到损害，需要做心血管搭桥手术，也由于各方面的压力，1980年3月18日马科斯被迫同意暂时释放阿基诺。在获释几个小时后，阿基诺就在夫人和孩子们的陪同下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去美国治病，做完心血管搭桥手术后，阿基诺一家便在美国波士顿住了下来。等身体康复以后，阿基诺立即撕毁马科斯强迫他作出的不发表政治言论的承诺，谴责这一协议是“同魔鬼签订的条约”，并警告马科斯总统：“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菲律宾的一些理想主义者团体准备打击独裁统治，“用爆炸、暗杀和绑架军政要员的方法迫使马科斯政权屈服”。

此后不到3个星期，打击便开始了。9座建筑物同时发生了炸弹爆炸。因事先通知居民撤离，所以没有人受伤，但在世界上造成了巨大影响。1980年10月，“美国旅游协会”来到菲律宾旅游观光，行将结束时，他们在马尼拉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议，马科斯应邀参加并讲话。在他讲话时，一颗微型炸弹在距他10米远的座位上突然爆炸，一位坐在那座位上的官员被炸得血肉横飞，周围多人受重伤。马科斯被气浪冲倒，失魂落魄，瘫倒在地。此后，合法的、非法的反抗马科斯独裁政权的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到1983年，马科斯肾病严重的消息传到美国后，在美国过了两年多流亡生活的阿基诺，不忍坐视他的祖国被独裁政府继续统治，不顾马科斯夫妇的威胁和利诱，执意回国，欲与马科斯夫妇一决雌雄，推翻他们的独裁统治，拯救祖国人民。

1983年8月21日，阿基诺在美国乘坐767飞机，转道台湾，冒险回国。他曾经想到，很可能一下飞机就被马科斯送进监狱，却没有料到一下飞机就中弹身亡。飞机刚刚着陆，就被保安警察围了起来。发动机刚刚停转，就有三位警察冲进飞机客舱。他们径直走到阿基诺面前，两人架起阿基诺的胳膊，连拉带拖地向机舱门走去。就在走下飞机的舷梯上，阿基诺被人用枪打死。机舱里的记者透过窗口看到，阿基诺四肢分开，脸朝下趴在地上，鲜血从脖颈向外喷涌。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分钟的瞬间。

阿基诺被谋杀，激起了人民群众对马科斯独裁统治的愤怒。1983年8月31日，举行阿基诺的遗体安葬。在灵柩经过的街道、公路两旁，站满了悼念、送别阿基诺的群众，人数约达200万人。整个马尼拉城犹如一座浓烟翻腾的活火山，各式各样的人们有的站在房顶上，有的从窗户中探出身子，有的爬上汽车车顶，大家挥舞着手臂，高喊着口号，悼念阿基诺，谴责马科斯。“正义属于阿基诺，正义属于祖国”的口号声，惊天动地、响彻云霄。葬礼之后，成千上万的愤怒群众向包括总统府在内的政府机关投掷石块和瓶子。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就有几十人在同警察的冲突中被打死。

为了平息严重威胁马科斯独裁统治的群众风暴，马科斯很快成立了以最高法院法官阿格拉瓦女士为首的五人调查委员会，调查阿基诺被杀一案。

1985年1月，菲律宾检察院正式向法院控告马科斯最得力的鹰犬——武装部队参谋长贝尔等25名军人及一名政府官员，指控他们与阿基诺谋杀案有牵连。1985年2月，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此案的审判对象主要是军人，可想而知绝不会有什么公正的结果。几位重要证人，都先后遭到杀人灭口的下场。1985年12月，法院正式作出判决，宣布贝尔等人无罪。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人们的不满情绪进一步高涨。

根据马科斯提议修改的新宪法规定，马科斯任期要到1987年8月结束。但由于多种原因，马科斯在1985年11月3日宣布提前一年半举行大选，大选日期定于1986年2月7日。

科拉松·阿基诺在丈夫阿基诺遇刺身亡后，对马科斯独裁政府更加愤怒，她发誓要团结人民推翻马科斯政府。开始，阿基诺夫人并没有想亲自去参加竞选，后来，在同仁们的支持下她征集到120万人的签名后，才下决心参加竞选。反对党内部也通过协商达成协议，承认阿基诺夫人为反对党领袖，确定她为总统候选人。1985年12月3日，阿基诺夫人正式宣布，“为翻开20年独裁统治后新的一页”，她愿意作为候选人参加1986年2月7日的大选。

开始，马科斯对阿基诺夫人参加竞选并不介意。他嘲讽阿基诺夫人只是一名家庭主妇，毫无从政经验。

阿基诺夫人不为污辱、诽谤、恶意攻击所动，她全力以赴投入竞选活动，几乎每天都工作16小时。她的双脚踏遍了整个菲律宾，每到一处，她都慷慨陈词，发表演讲，接见选民。逐渐地阿基诺夫人赢得了选民的信任，博得了全国13个党派的支持。越是临近大选，阿基诺夫人的信心越足。

阿基诺夫人在菲律宾的声望越来越大，马科斯感到形势有些不妙。待与阿基诺夫人几经交手并连连败北之后，马科斯才醒悟过来，但已经为时过晚。困兽犹斗的马科斯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不择手段地与阿基诺夫人较量。

1986年2月7日，投票正式开始，选举任期为6年的总统和副总统各一人。共有5500万人口的菲律宾，选民为2600万人。这次投票共设85000个投票站，遍及全国74个省的60个城市、1532个乡镇和自治市。

为了赢得大选的胜利，马科斯在投票、计票中大做手脚，利用自己有权、有钱的优势，千方百计地拉选票。他们一伙用金钱收买选民，用武力威胁选民，对不投马科斯票的人无端取消选民资格。但是，多数人仍坚持选阿基诺夫人。

在菲律宾，天主教徒占人口的90%，教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了争取教会的支持，一天晚上，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急匆匆赶到红衣主教海梅·辛的家里，献上了带去的金质礼物，恳求主教的支持。红衣主教不为所动，伊梅尔达只好悻悻而去。

按选举法规定，投票一结束，就应立即开始计票并公布选举结果。然而在投票结束8小时后，政府仍未公布选举结果。迟迟不公布选举结果的原因是，马科斯的手下正在大做手脚。他们在用电子设备修改得票数，设法将阿基诺夫人领先的15万张选票改在马科斯名下。1986年2月8日晚，当正式宣布马科斯领先15万张选票时，选举委员会计算中心的41名统计人员愤然离去，以示抗议，并向社会揭露了涂改选票的情况。于是，在这天晚上，便出现了两名总统候选人都宣布自己竞选获胜的奇闻。

在这关键时刻，菲律宾主教会议通过了一份主教宣谕书。宣谕书中说，政府“收买选票，威胁恫吓，实行国家恐怖主义，谋杀成风，利用权力进行犯罪活动”，缺乏基本的道德准则。教会的主教宣谕书，使更多的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纷纷倒向阿基诺夫人，谴责马科斯。

1986年2月15日，菲律宾议会宣布马科斯在竞选中获胜，再次当选总统。消息传出，国内外舆论哗然。第二天，阿基诺夫人在马尼拉市的萨尔公园举行了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抗议集会。会上，阿基诺夫人宣布，拒绝承认议会公布的选举结果，号召人民用非暴力手段迫使马科斯下台。

面对全国多数人的反对，马科斯一面表示愿意与反对派和解，一面向美国政府许愿，说他将进行许多革新以安抚群众。他还宣布，打算建立一个“国务委员会”，让科拉松·阿基诺参加，新政府将优先治理目前的经济危机。对马科斯的上述许诺，阿基诺夫人不予理睬。

美国对菲律宾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这次总统之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面对马科斯的许诺，美国总统里根改变了态度，由原来偏向反对派转而支持马科斯政府。里根发表谈话说，选举中有舞弊行为，这是小事；关键是要稳定国内形势，避免流血。他劝阿基诺夫人要通力与政府合作，不要再搞游行示威。里根的建议，遭到科拉松·阿基诺的拒绝。在美国国内，里根的讲话也受到国会议员的普遍批评。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里根只好派他的外交官哈比卜赶赴马尼拉。

哈比卜名义上是去了解菲律宾的情况，实际上是去探查马科斯和阿基诺夫人之间的实力差别和人心向背，以便向美国提供在他们之间作出选择的情报。哈比卜在菲律宾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了解，他先后几次会见马科斯和科拉松·阿基诺。此外，他还秘密会见了国防部长恩里莱、代理参谋长拉莫斯等人。

1986年2月22日晚，国防部长恩里莱和总参谋长拉莫斯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脱离马科斯，支持科拉松·阿基诺当总统，恩里莱和拉莫斯说，他们不满于马科斯的专断独裁，憎恶他在大选中的舞弊行为，表示要誓死为阿基诺夫人而斗争。阿基诺夫人立即发表声明，支持这次兵变。

马科斯听到这消息后，恼羞成怒，下令派空军十五攻击联队去轰炸恩里莱和拉莫斯的营地，不料执行命令的人却驾机投奔恩里莱和拉莫斯去了。

美国白宫发言人斯皮克斯，对记者发表了里根总统要求马科斯下台的声明，敦促他立即向新政府和平移交权力。斯皮克斯给马科斯发来电报，建议他到美国政治避难，马科斯拒绝了 this 建议。

1986年2月25日凌晨2时，马科斯已感到败局难以挽回，对美国的态度也缓和了下来。他打电话给美国参议员拉克索尔特，提议成立菲律宾联合政府，由他任名誉总统，阿基诺夫人任总统。凌晨3点，拉克索尔特在会见里根总统后，又与马科斯通了电话；正式通知马科斯说，里根认为现在提分权是行不通的。这时，马科斯对美国的支持彻底失望。

2月25日上午9时30分，马科斯打电话给恩里莱，提出成立临时政府，由恩里莱、阿基诺夫人和他组成三人执政小组统治菲律宾，被恩里莱拒绝。

2月25日上午10时，在马尼拉郊区“菲律宾俱乐部”，科拉松·阿基诺举行了总统就职仪式，两三百万群众拥上街头，欢庆马科斯王朝的倒台。

2月25日傍晚，马科斯打电话给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要求提供帮助，尽快派直升飞机将他们从被群众团团围住的马拉卡南宫运走。晚上8时许，围

在总统府外的群众涌到大门附近，高呼“打倒马科斯”、“反对独裁统治”等口号。

2月25日晚上9时，马科斯一家及其随从、亲密朋友等90人，分乘四架直升飞机，飞往距马尼拉80公里处的美国驻菲律宾的空军基地克拉克。1986年2月26日，马科斯夫妇一行飞往美国檀香山，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活。

从马科斯逃往美国后揭露出来的马科斯夫妇的丑闻来看，马科斯夫妇的贪污腐败程度，是当代世界所罕见的。

马科斯当国会议员时，就有人给他送了个“百分之十先生”的绰号，意思是凡是让他办理的事务，都要收取10%的回扣。当上总统之后，他一方面明目张胆地接受回扣、贿赂，一方面大肆侵吞公款。仅从日本的一些公司，就接受了450万美元的回扣和贿赂，全部转到瑞士银行的私人帐户上。他侵吞的公款包括：菲律宾财政部的拨款，退伍军人福利金，情报基金，美国的经济援助款，日本的战争赔款，以及世界银行的开发计划贷款。例如，在对越南战争期间，菲律宾派兵去越南的所用经费全部由美国负担，为了训练新兵，美国国防部又拿出2200万美元给菲律宾；马科斯拿到这笔钱以后，又列出上述项目要求国会另行拨款，将多出的一份经费全部据为己有，存入了银行的个人帐户。

马科斯夫妇当政期间所搜刮的巨额财富，一部分被化整为零地分散存入外国银行，一部分作现金持有，还有一部分转化成了固定资产。

据后来查证，他们自1968年开始，就在瑞士的苏黎士信用银行开设了秘密户头，化名威廉·桑达斯和简·安娜开始存款。后来，又在瑞士连续开了10多个秘密户头。存款总额达50亿美元。除瑞士外，他们还在澳大利亚银行存入5亿多美元；在巴西银行存入3亿多美元，在香港、荷兰、巴哈马的银行和美国的花旗银行，也分别存有巨款。

马科斯夫妇在国内持有的现金，在搜查时已达10亿美元。

马科斯夫妇在菲律宾拥有房地产4500亩、土地5000亩、农场23处、公司232家、椰子油工厂10家、电视台18家、广播电台36家、飞机29架、游艇13艘、珠宝价值10亿美元、黄金数吨。马科斯夫妇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区有4栋办公大楼，洛杉矶有一所比佛利别墅，夏威夷有檀香山别墅，长岛有房地产，纽约第五街有3间公寓，总价值7亿多美元。

此外，1986年马科斯出逃时，随身携带了多达300箱的行李。这批行李在进入美国时，海关进行了登记。据海关登记册揭示，其中的珠宝、黄金、艺术品、证券、房地产契装了278箱，其余的22箱装的全部是菲律宾比索，折合美元100多万。1986年3月，美国将登记的长达2300页的资产清单中的1500页的复印件，交给了菲律宾政府，供他们作追查之用。

后来，经过极为复杂的秘密侦察，菲律宾政府缴获了马科斯隐藏在外国的1241吨黄金。数量之大，更加令人惊讶。

这批黄金，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占领军山下奉文大将在撤离菲律宾时，秘密隐藏在这个岛国的。马科斯上台以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秘密地展开了广泛的搜寻活动。结果，真的找到了这批黄金。当时，由于这些黄金质地不符合1974年实行的国际标准，他们便在国内特地建起了一个精炼加工厂进行加工处理。随后，便将这些黄金运到香港，经美国纽约，最后转运到瑞士，极其秘密地隐蔽在苏黎士一个地下的免税仓库里。

据菲律宾调查委员会查证的数字表明，年薪只有 5.7 万美元的马科斯夫妇，用各种手段攫取、聚敛的财富，多达 100 亿美元。这 100 亿美元，相当于菲律宾三年的财政预算，或相当于菲律宾外债的 40%。

侵吞了巨额财富的马科斯夫妇，在生活上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国内到处是他们的行宫，国外许多地方都有他们的豪华别墅。

伊梅尔达外出旅游时，总有一队警卫、记者、服务负和马尼拉的贵妇组成的浩荡队伍随行，前呼后拥。1981 年，仅出访肯尼亚、墨西哥和美国的一行费用就达 80 万美元。在纽约，她下榻的饭店每晚收费 1700 美元，小费每次给 100 美元，并且每天要订购 1000 美元的鲜花。有一天，她上午买了 100 万美元的珠宝，下午又买了 200 万美元的古董。1978 年在保加利亚，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竟买走了价值 25 亿里拉的珠宝。1986 年她出逃菲律宾后，人们在她的居室里看到的日常用品令人吃惊。在卫生间梳妆台上，摆满了法国香水，她的面盆镀了一层纯金。在衣橱里，有 2000 副手套，3000 双皮鞋，1700 个小提包，5000 条短裤，500 个胸罩，200 双袜子，数百件出自欧洲时装大师之手的名贵服装，等等。

马科斯的生活极度奢淫。1968 年，美国的一个影片摄制组来到首都马尼拉拍摄《晨韵》影片。在一次酒会上，马科斯和一个女演员不期而遇。这个女演员名叫维娜格兰，早年当过舞女，后来跻身于好莱坞，渐渐在电影界有了名气。马科斯很快看上了维娜格兰，维娜格兰很快就成了马科斯的情妇之一。两人频频幽会，双出双宿，在绵绵情话时，马科斯向她透露了菲律宾政坛内幕及种种机密，而这些话统统被维娜格兰录进了藏在枕头下的微型录音机中。在其后的 15 年间，她以此相要挟，陆续从马科斯那里索取了上千万美元，成了洛杉矶最富有的女人。

与马科斯一家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菲律宾经济形势逐年恶化，人民的生存难以维持。1984 年国民经济下降 5.5%，1985 年下降 4%，通货膨胀率 63.8%，工厂开工率 40%，1000 多万人失业或半失业，外债高达 256 亿美元，全国人口中约有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如果再考虑马科斯总统腐败对各级政府官员的示范作用，不难发现，腐败是马科斯执政期间菲律宾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纽约时报》曾经载文说：“马科斯一家已成为菲律宾人的沉重负担。”

马科斯来到美国檀香山后，一住就是三年多。病入膏肓的马科斯多次提出想回国，但都被阿基诺政府拒绝。1989 年 9 月 28 日，马科斯死于檀香山，葬身外国。1992 年，菲律宾举行总统大选，伊梅尔达得票 100 万张，不仅远远少于当选总统的“廉洁先生”拉莫斯，也远远不及圣地亚戈夫人。1995 年 11 月 6 日，66 岁的伊梅尔达正式就任众议院议员，但仍被指控犯有 10 项刑事罪。她是否能够东山再起，仍然是一个疑问。

马科斯总统走向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菲律宾政治体制存在重大缺陷是不容忽视的。如果这个国家不能堵塞体制上的漏洞，谁能说马科斯的腐败悲剧不会重演？

## 天堂与地狱只此一步——齐奥塞斯库被处决

1989年，东欧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政权更迭变化之快令人眼花缭乱。其中，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垮台，是东欧一连串事变中最迟发生、最出人意料和最激烈的。经过一场血与火的激战，执政长达25年的齐奥塞斯库不仅丢失了政权，而且还被军事法庭处决。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成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中最可悲的人物。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1918年1月26日生于罗马尼亚奥尔特县斯科尔尼切什蒂村一个贫农的家庭，在兄弟姐妹10人中，他排行第三。1929年，他从家乡来到布加勒斯特谋生。开始，他好不容易才在一家鞋铺当上了学徒工；不久，进工厂当了工人，并开始投身于工人运动。1933年，他积极参加罢工斗争，当选为全国反法西斯委员会委员，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不久，转入罗马尼亚共产党。同年11月，当局指控齐奥塞斯库犯有“煽动罢工”和张贴“扰乱国家秩序”的传单等罪名，将他逮捕。

获释以后，他继续参加革命活动，又连续两次被捕。反动当局视他为“危险的共产主义煽动分子”，把他驱逐出布加勒斯特市，押回原籍。

1936年，18岁的齐奥塞斯库已担任共青团普拉霍瓦州州委书记。这一年，他又一次被警察局逮捕。他被判刑2年，关押进布加勒斯特的多夫塔纳监狱。

1938年12月，他获释出狱。出狱后，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为反对法西斯统治，他组织领导了多次群众集会。1939年9月，他当选为罗马尼亚共青团中央书记。1940年6月，他第5次被捕，被关押在日拉瓦堡监狱。

1943年，他被作为政治要犯转押到卡兰塞贝什监狱特尔古日集中营，同乔治乌·德治等罗共领导人关在一起。在集中营中，他参加了罗共领导核心的工作。

1944年8月30日，罗共领导布加勒斯特市爱国武装力量，举行了反法西斯起义。经过5天5夜激战，推翻了安东尼斯库反动政权。齐奥塞斯库在起义的当天即被营救出狱，参加了新政权的筹建工作，并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1945年10月，在罗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46年秋，在大国民议会选举中，他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代表。

1947年12月30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1948年2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了罗马尼亚工人党（1965年7月更名为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合并代表大会上，齐奥塞斯库当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此外，齐奥塞斯库还在政府中担任农业部副部长职务。

1950年4月，党派他到军队工作；在布加勒斯特军事学院专修班学习后，他以人民军中将军衔担任了国家武装部队副部长和罗军总政治部主任。1952年，他被补选为党中央委员，继而又被选为党中央组织局委员。1954年4月，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1955年12月，在罗工人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37岁的齐奥塞斯库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从而进入罗工人党的前十名领导人的行列。

1965年3月，乔治乌·德治逝世，47岁的齐奥塞斯库由毛雷尔举荐接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7月，党的九大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罗马尼亚共产党、把党中央第一书记改为总书记。自1965年起，罗共总书记一直由他担任。



1967年12月，他担任罗国务委员会主席。1968年11月，他又担任团结阵线主席。1969年，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1973年5月，任经济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从1974年3月起，成为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从此，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身兼7大要职，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

1968年8月20日晚，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50万大军，悍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齐奥塞斯库不仅坚决谴责，而且还在国内实行全民总动员，准备抵抗苏联入侵。齐奥塞斯库不畏强暴，捍卫独立和主权的正义行动，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受到世界各国的称赞。

在外交上，齐奥塞斯库继续贯彻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原则，积极推行同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政策。1968年，罗马尼亚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还邀请法国总统戴高乐、奥地利总理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导人访问罗马尼亚。美国的理查德·尼克松1967年春在罗马尼亚进行私人访问后，又于1969年8月以美国总统的身份正式访罗。同时，齐奥塞斯库率团访问世界诸国，进行广泛接触。从罗共九大齐奥塞斯库任党中央总书记至70年代初，罗马尼亚同9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100多个国家保持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协作关系。1975年，罗马尼亚获得美国最惠国待遇。进入80年代后，西方国家对罗马尼亚国内政策日益不满，罗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关系开始变冷、经济关系不断下滑。

齐奥塞斯库登上权力顶峰之后，俨然以人民的统治者自居，他甚至仿效封建王朝实行家族统治。这是齐奥塞斯库为人民所抛弃的主要原因之一。

权力高度集中，党政融为一体，本是斯大林模式的最主要特征。二战以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南斯拉夫外都照搬了这种模式。随着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特别是国民文化素质的大幅度提高，这一模式的诸多弊端渐渐暴露出来。从60年代开始，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发起了冲破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浪潮，在政治体制中开始实行党政分工、减少兼职、不允许突出个人等重大措施。而罗马尼亚却与东欧国家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驰。他们虽然在理论上提出过党主要是在政治上进行领导，只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发展方向起决定性作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取代国家机构，不干涉具体的行政工作和立法工作；然而，在实际上，他们越来越强化党政一体这种关系，强化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兼职的领导制度。正是借助了党政融为一体这种制度，齐奥塞斯库逐渐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个人独揽了7个要职。

不仅他个人大权独揽，他还在罗马尼亚的领导机构中，建立了一个以本家族为主的领导集团。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原任中央化学研究所所长，1972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任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1977年又提升到政治执行委员会常设局委员、罗共中央干部委员会主席，并兼任政府第一副总理，是罗马尼亚的第二号人物。小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1979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82年底升为中央委员，1983年任中央政治执委会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罗共锡比乌县委第一书记、社会和经济最高委员会委员。大儿媳波利亚娜·克里斯泰斯库，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全国少先队委员会主席。哥哥马林·齐奥塞斯库，任罗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弟弟伊利埃·齐奥塞斯库，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弟弟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任内务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

罗马尼亚的经济体制是 50 年代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实践证明，这种高度集中伪计划经济体制不利于调动劳动者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浪费惊人，经济效益低下，无法实现持续高速发展，更不适应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1967 年和 1978 年，罗马尼亚先后两次对经济体制进行过“完善”，但“完善”的结果是使罗马尼亚经济成为世界上最集中的经济。

计划经济与集权政体相结合，是一种劣势复合（劣势加劣势）。这种劣势复合，如果再加上追求经济发展高速度的经济政策，就更是雪上加霜。如果再依靠外债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后果就更加严重。遗憾的是，齐奥塞斯库执政时期，这几种不利因素恰好结合在一起，并最终动摇了他的独裁统治。

齐奥塞斯库的最大失误在于：他不顾人民生活和国家实力，片面追求高积累、高指标、高速度，忽视农业生产，特别是靠借外债支持这种高积累、高指标、高速度。

在 1965 年举行的罗共九大上，齐奥塞斯库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计划，要求在短期内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到 1985 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到 1990 年或 2000 年建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要求通过提高积累比例，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1965 年至 1980 年，罗马尼亚一直将国民收入的 1/3 左右用于积累。历年的积累率为：1961—1965 年为 25.5%，1966—1970 年为 29.5%，1971 年—1975 年为 33.7%，1976—1980 年为 35.3%。在 70 年代的大部分年份中，罗马尼亚经济曾经达到过两位数的高增长率，高于东欧所有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为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 2 倍多。于是，从 70 年代中期，在罗一些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作品中，出现了“齐奥塞斯库时代”的提法。从 70 年代末罗农业总产值在 10 多年中翻一番的情况来看，1965—1980 年间罗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不断提高的。

70 年代，罗马尼亚大量引进国外工艺技术，发展了相当规模的石油化工、钢铁和机器制造业，为此借入大量外债。据国际金融界统计，1971 年罗马尼亚外债额为 12 亿美元，1981 年骤增至 102 亿美元，其中相当部分是短期贷款。

70 年代中期，国际上爆发能源危机，石油价格飞涨。罗马尼亚此时已经发展了能够加工 3500 万吨原油的石油化工工业，原料 2/3 依靠进口。而罗马尼亚的产品又由于质量问题和西方国家经济萧条的影响难以出口，对外贸易连年出现逆差（进口大于出口）。加上国际金融利率上升，罗马尼亚陷入债务偿还危机。

齐奥塞斯库执政的前 15 年（1965—1980），是罗马尼亚经济社会发展的“蜜月”时期，从外观的经济指标看来也的确值得齐奥塞斯库自豪。但是，不要忘记，15 年的辉煌是以大量借入外债为代价的。换句话说，罗马尼亚 70 年代的繁荣是以牺牲 80 年代的发展换取的。在经济学家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

到 1980 年，罗马尼亚已经种下了经济危机的恶果，已经面临两难选择。由于外债沉重，罗马尼亚要么选择借新债还旧债的债务偿还危机，要么选择勒紧人民的裤腰带偿还外债的短缺危机。

齐奥塞斯库目睹了波兰几乎是靠拖欠大笔外债过日子的危机，以及随后波兰经济的崩溃，他认定罗马尼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出现同样的情况。于是，从 80 年代初期开始，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目的是想赶在 1990 年前

还清外债。

自 1981 年起，罗马尼亚大力削减进口，增加出口，以偿还外债。1981—1989 年，罗对外贸易顺差累计达 214 亿美元。1989 年 3 月，罗马尼亚宣布全部偿清 210 亿美元的外债本息。

罗马尼亚是一个小国，面积 23.75 万平方公里，人口 2270 万（1984 年），国内资源并不丰富。一个 2270 万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不到 10 年时间内还清 210 亿美元的外债，是非常困难的。罗马尼亚经济专家曾建议齐奥塞斯库延长还清外债的期限，以减少还清外债的国内代价。齐奥塞斯库不听专家的劝阻，执意要在 1990 年之前还清全部外债。齐奥塞斯库当初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是政治运动式的，现在偿还外债又是政治运动式的。

根据 1990 年 3 月罗马尼亚统计委员会公报的看法，“加速还债”至少产生了以下副作用：

1. “减少进口以偿还外债的政策使经济出现失衡”，“由于过分出口而使群众最低限度的饮食、穿着和其他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进入 80 年代以后，“压缩居民消费”、大量出口农产品换取外汇还债的作法，使国内市场食品供应连年紧张，群众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肉、蛋、奶、咖啡、大米、面粉、食用油、糖等，有的凭票供应，有的得不到保障。能源供应——尤其是民用能源供应持续紧张，多年冬天群众住宅缺少暖气，室温很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到文明生活限度以下”，“而且 1989 年初还清外债之后，罗马尼亚全国人民期待的结果，即经济的活跃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并没有到来。”根据罗马尼亚统计资料，罗马尼亚 1989 年部分食品和消费品的市场供应量与 1980 年相比，肉仅为 49%，鲜奶为 39%，奶制品为 60%，黄油、糖为 82%，冰箱为 44%，电视机为 64%。公共照明和居民用电非常紧张，1985 年这两项分别只占总用电量的 0.1% 和 6.4%，而 1980 年为 0.3% 和 7.2%。作为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电视，每天只播一个半小时，老百姓只有星期六晚上才能看到一次电视剧。难怪一些老年人抱怨说，罗马尼亚在战争时期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困难。

2. “对国民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尤其在技术设备方面”。由于严格限制用外汇进口产品，罗马尼亚 80 年代以来基本上停止了从西方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工艺和零部件，原有设备无法更新改造，“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必要原材料进口的大量削减，迫使部分企业停工待料。

3. 外贸增长速度下降，外贸出现萎缩。根据罗马尼亚统计年鉴，罗马尼亚外贸在 1966—1980 年间年度平均增长 15.5%，而在 1981—1985 年间年度平均下降 0.5%，1988 年外贸总额比 1980 年仅仅增长 0.34%。

如果说罗马尼亚在 70 年代就存在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那么 80 年代 9 年的突击还债则使这种比例失调更加突出。因为罗马尼亚能够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原材料和附加值很低的初级加工产品。9 年突击还债对罗马尼亚人民带来的危害，是任何一场自然灾害都无法比拟的。为追求高速度大量举债，是齐奥塞斯库丧命的最根本的原因。当齐奥塞斯库 1989 年 3 月向人民宣布已还清全部外债的时候，罗马尼亚人民因无法忍受他的统治而于 1989 年 12 月将他处决。

罗马尼亚经济走向危机，与齐奥塞斯库的独裁和瞎指挥是密不可分的。自从齐奥塞斯库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便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不容忍不同的意见。1974 年以来，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成了“纲领性文件”，各报纸均要

登载，都要贯彻执行，谁要提出不同意见，就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置。曾经同齐奥塞斯库在革命年代、建设新政权时期共患难、同战斗的战友，因忍受不了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而离开了齐奥塞斯库。如众所周知的扬·格奥尔基·毛雷尔。伊利埃斯库在1971年，因反对齐奥塞斯库提出的“文化革命纲领”而遭到公开点名批评；1972年春被解除中央书记职务后，又因几次与齐奥塞斯库意见不同，多次受贬，从县委第一书记、全国水利委员会主席被贬为技术出版社社长。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

在70年代后期，人们对齐奥塞斯库的不满已经显露。1977年8月，乌日谷的3万名矿工举行了罢工。1979年2月，罗马尼亚劳动者自由工会建立。为了阻止人们的反对，齐奥塞斯库在上层排斥异己、培植亲信，在社会则依靠保安部队、警察对人民实行高压统治。

1978年，罗马尼亚颁布了赋予警察调查“图谋犯罪的证据”权力的法令。保安机关还在机关、企业普遍建立了情报员制度，使群众敢怒不敢言。任何敢于批评齐奥塞斯库政权的人，随时都可能被扣上“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遭到逮捕。罗马尼亚《刑法》规定：国家机密包括当局认为应当保密的一切东西。个人的通信自由也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连私人打字机也要到警察局备案登记。

进入80年代后，随着罗马尼亚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人们对齐奥塞斯库的不满与日俱增，反对齐奥塞斯库政策的人越来越多。

1982年，40多名知识分子联名致信齐奥塞斯库，要求他同社会对话，强烈地要求进行经济改革。他们在信中写道：“我国目前的形势是令人不安的。一些工业部门完全依赖进口物资，这笔钱可以用来提高农业生产，解决全国的吃饭问题。社会状况非常严重。我国的前途处于危险之中。”信中还罗列了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如责任不明、贪污腐化、工作无能、管得太死等，并说：“只有在一种真诚的气氛中，人民才能参与国事和真正勇敢地对付我国社会可能出现的灾难。”

1984年，一些高级军官开展了“反齐奥塞斯库运动”。

80年代后期，罗马尼亚的全面危机引发了长期潜伏在人民心底的强烈不满，打破了过去敢怒不敢言的局面。

1987年8月16日，罗共中央委员、特尔古穆列什市一家罐头厂的领导人基拉利，致函齐奥塞斯库，要求“采取必要的步骤”，使“糟糕的经济局面”迅速改变，并说齐奥塞斯库被“一些毫无责任心的野心家和冒险家”所包围。

1987年11月15日，罗马尼亚第二大城市布拉索夫的工人，发动了街头的示威游行和罢工。工人们抗议削减工资，反对齐奥塞斯库推行的拆毁全国近半数村庄重新组建“农工中心”的政策，要求“增加食品和改善取暖条件”。齐奥塞斯库承认减少工人的工资没有正当理由，违反了法律，但同时也谴责了工人的抗议是“无政府主义行动”，当局逮捕了带头抗议的人，并出动坦克和使用催泪弹来平息动乱。

1988年，一个由“扎尔奈斯蒂兵工厂”组织的新独立工会向西方透露，动乱正在“齐奥塞斯库王国最虚弱的地方”酝酿形成。同年6月，独立工会的积极分子在布拉索夫的工厂里散发传单，抗议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但很快被保安局逮捕并遭毒打。与此同时，另一个名叫“自由”的独立工会的领导，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

1989年3月11日，自由欧洲广播电台播发了国内六名罗共前重要领导人联名致齐奥塞斯库的公开信，在罗马尼亚国内外引起震动。

这六名领导人是：前罗共领导人之一康·帕尔伏列斯库，前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格·阿波斯托尔，前政府第一副总理亚·伯尔拉德亚努，前外交部长科·曼内斯库，前驻美和联合国大使、党报总编西·布鲁坎，前外交部长格·勒恰努。

这封公开信列举罗政治、经济、法律、民族、外交等方面面临的严峻形势，抨击当局的现行政策使社会主义理想在罗信誉扫地，尖锐地指出罗在欧洲大陆乃至世界被孤立。为改变目前的形势，他们呼吁齐奥塞斯库立即放弃“乡村规范化”计划，重新确定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停止威胁民族生存的食品出口等措施。

六名罗共前领导致齐奥塞斯库的公开信发表后，立即受到西方国家的声援。美国取消了原定的美罗高级外交会晤，并警告罗马尼亚如果对公开信作者采取行动，将对美罗双边关系产生直接影响；欧共体中断了同罗马尼亚的贸易谈判；法国除召回大使外，还推迟了原订3月在巴黎召开的法罗混合委员会会议，密特朗总统在内阁会议上对公开信作者亲自表示支持；英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谴责罗马尼亚侵犯人权；149名瑞士议员发表公开信要求罗马尼亚放弃农村规范化计划；联邦德国召回了驻罗大使，并推迟了德罗经济委员会会议日期和外交部国务部部长对罗马尼亚的访问，暂停执行两国经贸合作计划。

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纷纷在各自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讽刺挖苦或谴责齐奥塞斯库的政策。匈牙利官方报纸发表评论说：“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罗马尼亚那样侵犯人权。”还说他们期待总有一天“布加勒斯特的理智将占上风”。

作为报复，罗马尼亚当局逮捕了把公开信交给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记者的西·布鲁坎，后来又把这6名公开信作者软禁起来，断绝了他们同外界的各种联系。此外，还逮捕了格·勒恰努的儿子——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米·勒恰努，指责他从1974年起就成为外国间谍机构的代理人。

1989年9月，罗马尼亚国内反对派组织“全国拯救阵线”也发出了一份呼吁书，它号召结束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呼吁书说：“齐奥塞斯库下台也许是避免发生重大社会冲突和流血的唯一方法。”因为“齐奥塞斯库及其家属所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和无能已使全部经济生活陷入瘫痪状态。”呼吁书揭露齐奥塞斯库建立起“令人作呕的个人崇拜”，它使政治生活降为“神秘主义和偶像崇拜”。

1989年10月5日，齐奥塞斯库访问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婉言劝齐奥塞斯库进行改革，齐奥塞斯库不以为然。

1989年11月20日，齐奥塞斯库在罗共十四大上表示，罗共不想成为“改革党”。

在齐奥塞斯库眼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波兰匈牙利的改革，都是对社会主义的离经叛道；他批评这些国家的改革是“为资本主义各种形式复辟开辟道路”。他只想舒舒服服地躺在那套僵化的旧体制上，永远充当罗马尼亚人民的“国父”。他害怕改革，害怕改革打破本家族一统天下的局面，害怕改革打破他的君王梦。他决心抵制改革，决心不惜动用国家的暴力机关来对付一切敢于反对他统治的人们。这样，他与人民群众的尖锐矛盾，已经没有

调和的途径。

1989年12月，他的末日终于来临。

匈牙利族神父特凯什·拉斯特，是维护罗马尼亚少数民族匈牙利族利益的持不同政见者，曾对外国新闻媒介发表过批评罗马尼亚政府及其政策的谈话。政府当局对他十分不满，解除了他的神父职务，令其退出供神职人员居住的公宅。从1989年11月20日起，拉斯特遭到秘密警察的日夜监视，秘密警察还不准他同教徒甚至父亲和兄弟接触。11月28日，蒂米什瓦拉市法院判决拉斯特迁出公宅。拉斯特神父为此迁入教堂居住。

12月5日，匈牙利议会主席黎勒什致函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要求恢复拉斯特的神父职务，取消对他及其家属所作的各种限制。罗马尼亚置之不理。

12月10日，拉斯特神父告诉教徒，他将被强迫迁居。12月13日，当地法院向拉斯特发出通告，责令他12月15日前离开住所、辞去神职，否则将强制执行。12月15日下午，约200名教徒聚集在拉斯特住所前，围成一圈，阻止强迫拉斯特迁居。

12月16日晚，几百名市民在教堂四周拉成人链，反对强制搬迁。人群中喊出“自由”和“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抗议活动发展成数千人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游行街上街后，打碎了书店玻璃，撕毁了齐奥塞斯库的著作和画像。游行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几小时内，警方用消防水龙将游行队伍驱散，一些人被捕，不少人受伤。

当天夜里，罗共政治执行委员会举行紧急碰头会，齐奥塞斯库命令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列亚次日在蒂米什瓦拉市中心举行坦克和装甲部队示威。为此，罗共政治执行委员会17日凌晨2、3、4点连续三次碰头，商量对策。

12月17日中午，蒂米什瓦拉市1万多人再次上街游行，呼喊“要自由”、“要面包”、“要热水”、“要暖气”、“打倒齐奥塞斯库”等口号，部分示威群众冲进地方政府大楼，市政府被袭击，玻璃被打碎，有的汽车被推翻。蒂米什瓦拉局势急剧恶化。

为此，罗共中央政治执委会召开紧急会议，齐奥塞斯库在会上严厉申斥国防部、内务部没有执行他的命令，没有派坦克部队、摩托化部队进行示威、镇压，批评他们在事件中表现了“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的软弱态度。这次会议按齐奥塞斯库的意旨决定对群众“采取最严厉的措施”。随后，内务部部队和军队开始对示威者进行镇压，蒂米什瓦拉市与外界的交通和电讯联系断绝，罗马尼亚关闭了边界，停止接纳外国游客。

西方国家和苏联东欧国家新闻媒介广泛报道了蒂米什瓦拉事件。法国《解放报》曾报道事件中有4000多人死亡。事后进行的调查表明，蒂米什瓦拉事件中有97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蒂米什瓦拉事件，是继1987年11月布拉索夫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后，罗马尼亚国内发生的第二次大规模冲突。

12月18日，蒂米什瓦拉市仍有小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附近的阿拉德市约1000人举行了游行示威。12月18日，齐奥塞斯库按原计划对伊朗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因为国内形势紧张，他的妻子埃列娜一反常规没有陪同他一起出访。

12月19日，克鲁日市又发生了群众示威游行事件。

12月20日，蒂米什瓦拉市5万人上街游行示威，但这次军队未进行干

预。一些示威者不知从哪里弄来了武器，同保安警察发生了零星交火。雅西在 12 月 20 日也发生了游行示威。

齐奥塞斯库访问伊朗回国后，于 12 月 20 日晚 7 时，在罗马尼亚电台和电视台，就蒂米什瓦拉事件发表讲话。他说：“一些流氓团伙以不让执行法庭判决为幌子寻衅闹事，攻击了一些国家机关，捣毁和抢劫了一些建筑物、商店和公共设施。”“12 月 17 日，针对包括军事单位在内的国家机关的行动加剧。这些团伙的目的是制造混乱，破坏该市机关和公共财产，并鼓动其他城市也这样做。”“12 月 17 日晚，受到攻击的军事单位向攻击军事单位和国家政权机关的人鸣枪警告。”“在蒂米什瓦拉市发生的恐怖主义行动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领土收复主义和沙文主义集团以及一些外国间谍机构有密切关系。这些反民族行动的目的是制造混乱，使政局不稳，搅乱经济，为分裂罗马尼亚领土、破坏社会主义祖国独立和主权创造条件。”

齐奥塞斯库同时签署法令，宣布蒂米什瓦拉市和该市所在的蒂米什县进入紧急状态，驻在蒂米什县的军队、内务部单位和民兵组织“爱国卫队”处于戒备状态；在紧急状态期间严禁任何集会，禁止五人以上同行，夜间 23 时后除上夜班者任何他人不得外出。

齐奥塞斯库的讲话使得矛盾进一步激化。戒严令实际上也毫无结果。12 月 21 日，蒂米什瓦拉市和阿拉德市工人举行总罢工，工人们占领了工厂，要求追究造成蒂米什瓦拉市人员伤亡的党政领导人的责任，要求军队撤离城市。在罢工工人的压力下，军队开始撤离蒂米什瓦拉市。

12 月 21 日中午，罗马尼亚官方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罗共中央和罗政府所在地共和国广场，组织了近 2 万人的群众大会，企图造成虚假声势，向国内外表示广大群众支持党的政治路线。罗共布加勒斯特市委书记及各界代表讲话后，齐奥塞斯库在大会上就蒂米什瓦拉事态发表讲话。讲话刚刚开始几分钟，广场一角的与会人群中便发生了骚动并发出嘘声，有人呼喊“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安全部队鸣枪警告。电视实况转播一时中断。

官方组织的这次集会刚散，部分学生、市民和参加大会的群众便在离罗共中央和政府所在地不远的市中心主要街道马盖鲁大街以及附近的大学广场、洲际饭店，开始举行反对政府和齐奥塞斯库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规模逐渐扩大，最多时发展到数万人。官方紧急出动警察、军队、装甲车和坦克，封锁了示威游行现场，与示威群众形成对峙，施放了催泪弹并鸣枪警告，试图驱散游行队伍。22 日凌晨 2 时左右，游行队伍一度被驱散。

22 日清晨，游行罢工蔓延至外地。首都及全国不少企业工人宣布罢工，布加勒斯特 10 万多人重新涌向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和主要街道，并设置路障，与警察和军队再次形成对峙。尔后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

首都的示威游行规模越来越大。22 日 11 时，齐奥塞斯库颁布法令，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罗马尼亚电台宣布国防部长米列亚将军是“叛徒”，“已经自杀”。

但此前罗马尼亚国防部关于军队不再向示威者开枪的命令已传达到部队。11 时，在首都市中心执行任务的国防部部队接到“撤回营区”的命令。11 时左右，布置在罗共党中央大厦周围的国防部军队开始撤离。11 时 45 分，挤满了整个共和国广场的群众冲进了罗共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大厦。

22 日 13 时，罗马尼亚电视台和电台被群众占领并由群众主持广播。罗马尼亚电视台更名为自由罗马尼亚电视台。此后，电视台成为罗马尼亚新政

权救国阵线委员会所在地。

15 时左右，罗马尼亚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罗马尼亚军队总参谋长古沙少将，前罗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退役上将米利塔鲁，防化兵司令兼首都卫戍区司令基察克中将，第一集团军司令沃伊内亚少将，空军司令鲁斯少将等，先后在电视台露面，正式宣布国防部军队不再向示威群众开枪。

12 月 22 日，首都布加勒斯特成立了由 39 人组成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23 时 35 分，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发表公告，宣布接管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和罗马尼亚政府的一切权力。

22 日 19 时，首都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和电视台附近，安全部队（包括特种部队）与国防部军队开始交火，战斗激烈。位于市中心的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大厦和布加勒斯特大学图书馆烈火熊熊。外地的罗马尼亚大城市（如锡比乌、布拉索夫和蒂米什瓦拉等），也发生猛烈交火。

据罗马尼亚和各国新闻媒介报道，在罗马尼亚首都进行的战斗相当激烈。在罗马尼亚电视台附近，为争夺电视台大楼进行的战斗最为激烈。罗共党中央大厦、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国防部大楼和市中心的部分居民区，枪声不断，不时可以听到炮声。特种部队通过地下通道攻击军队和战略目标。

12 月 23 日，罗马尼亚内务部安全总局局长尤利安·弗拉德上将呼吁内务部部队（包括安全部队）与国防部军队合作，要求内务部部队“站在军队和人民一边”。同日，罗马尼亚军队总参谋长宣布，国防部军队已控制绝大部分国土。蒂米什瓦拉、锡比乌、布拉索夫、克鲁日等地，仍然在进行战斗。

12 月 24 日，首都的形势逐渐平静，军队控制了局势。25 日以后，除零星战斗外，罗马尼亚首都和全国的局势逐渐趋于正常。罗马尼亚新闻社宣布，罗马尼亚各县均已宣布站在救国阵线一边。救国阵线开始在各地建立机构。

在这次剧变中，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是在 12 月 22 日被捕的。

12 月 22 日上午，国防部部队从罗共党中央大厦周围撤离后，示威者占领了党中央大厦。齐奥塞斯库在总统府前再次打算向示威群众发表讲话，但他的声音被人群中发出的“打死他！打死他”的高呼声压了下去。眼看民心已失，大势已去，齐奥塞斯库夫妇通过总统府内的地道仓惶出逃。12 月 22 日 12 时 15 分，齐奥塞斯库夫妇等乘总统专机（一架法国制松鼠 SA355F 型直升飞机）离开了罗共中央大厦。开始齐奥塞斯库乘直升飞机到首都机场准备外逃，不料机场已被封闭。他们乘直升飞机，向博泰尼军用机场飞去。

布加勒斯特驻军司令通过电视台下令：封锁齐奥塞斯库夫妇逃往地区的各条道路，通缉捉拿齐奥塞斯库夫妇。

齐奥塞斯库夫妇乘坐的直升飞机在飞行途中被雷达发现，遂提前降落在离首都约 50 公里的蒂图镇附近。在那里齐奥塞斯库夫妇换乘安全部队征用的红色达契亚私人小汽车，向特尔戈维什泰方向驶去，后在沃克雷什蒂征用并换乘了工人彼得里绍尔的汽车。齐奥塞斯库夫妇乘坐彼得里绍尔驾驶的汽车，试图到齐奥塞斯库视察过的特尔戈维什泰特种钢厂和罗共特尔维什泰市党委落脚，但都被罢工工人和游行队伍挡住，遂将汽车驶向附近的一家种子中心。种子中心的塞伊内斯库农艺师将齐奥塞斯库夫妇留在办公室里，并打电话通知了上级。

12 月 22 日 15 时 20 分，两名警察将齐奥塞斯库夫妇带走，起先欲送往市警察局，但途中被群众发现，警察便将齐奥塞斯库夫妇送至特尔戈维什泰附近的国防部部队兵营。在那里他们被正式逮捕。



12月23日，电视台宣布了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捕的消息。

12月23日凌晨和白天，关押齐奥塞斯库的兵营受到忠于齐奥塞斯库的特种部队攻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24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转移到一辆装甲车内。

12月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在一个秘密的军事设施里，由三名军事法官和三名民事法官进行了数小时的秘密审判。审判中，齐奥塞斯库夫妇拒绝对他们的指控，只承认大国民议会而不承认该法庭的合法性，并指责“国家的叛徒”和“外国间谍机构”挑起了这次“政变”。

特别军事法庭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162、163、165以及357条，宣布被告犯有屠杀、危害国家政权、破坏国家财产、破坏国民经济、在国外存款10亿美元、企图外逃等罪，并宣布终审判决：没收全部财产，处以死刑。

1989年12月25日16时，军人行刑队将齐奥塞斯库夫妇枪决。

12月28日，罗救国阵线委员会便让西方记者首次参观了齐奥塞斯库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市的住所，其豪华水平让人震惊。一位记者感慨地说：“他们生活得真像当代的罗马帝王！”

齐奥塞斯库由一个革命者堕落成一个现代帝王再次表明，如果在权力宝座上呆得久了，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体制，任何好人都会成为一个腐败者，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哥伦比亚总统桑佩尔涉嫌在大选期间接受毒品资金

众所周知，哥伦比亚是世界上有名的“毒品大国”。尤其是分别盘踞在麦德林和卡利两市的两大贩毒集团，堪称世界超级贩毒集团。哥伦比亚还是南美洲古柯主要产地，以古柯为原料加工提取的可卡因每年数以百吨计地输往国外。70年代以来，古柯种植泛滥成灾，政府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目前，哥伦比亚古柯种植面积达8——10万公顷。此外，还有的2万公顷的用于生产海洛因的罂粟和5千公顷大麻。

贩毒集团靠非法经营毒品暴富，财力倾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作。贩毒集团黑手伸进国家经济部门的现实令人触目惊心。该国10家最大企业中，有6家从事毒品交易。20年来，以麦德林和卡利为核心的贩毒集团进行的交易额高达1500亿美元到2500亿美元。毒品交易的日渐膨胀加剧了哥伦比亚的经济畸形现象，国家金融管理长期混乱不堪，“毒品美元”和“洗钱”行为充斥许多经济部门。据统计，80年代贩毒活动每年为哥伦比亚注入资金约25亿美元，是1994年该国得到的13亿美元外国投资的近两倍。

随着1993年12月2日麦德林贩毒集团大毒枭埃斯科瓦尔被警方乱枪击毙，麦德林集团毒品交易的霸主地位很快被地处考卡山谷省的卡利集团所取代。卡利集团目前（1995年）垄断了美欧80%的可卡因市场，每年获利高达30亿美元。另据统计，卡利集团毒枭罗德里格斯兄弟的非法收入高达50亿美元，登入美国《福布斯》杂志每年一度的富豪排行榜。卡利集团不惜重金收买政府、军队、海关等部门的公职人员，换取毒品交易的保护伞。哥伦比亚被贩毒集团拉下水的“贪官”不胜枚举。仅1995年4月，就有23名政府重要公职人员被宣布为涉嫌受贿者。1995年5月，麦德林、卡利两城的200多名警察因与贩毒集团有瓜葛而被除名，贩毒集团还不择手段地肆意进行暗杀、绑架、爆炸等恐怖活动，居民不堪其扰，深受其害。政府的缉毒斗争到了加大力度“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

1995年以来，桑佩尔政府的缉毒战攻势猛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辉煌战果。

1995年6月9日，政府军警在接到匿名举报电话后，直捣卡利集团的老巢——卡利市圣莫里卡区，迅速包围了该区一幢破旧的公寓楼。搜查中，缉毒人员无意中发现了—面空墙，拆掉后只见里边有一间2米高、1米见方的密室，大毒枭、卡利集团一号头目希尔韦托·罗德里格斯就躲在里边。他只说了句“枪下留情”便束手就擒。1995年8月6日，希尔韦托之弟、卡利集团二号头目米格尔·罗德里格斯在鼾然大睡中被惊醒，警察冷冰冰的枪口已对着他的脑门儿。

至此，卡利贩毒集团7名头目除一名在逃外，已有6名落入法网。桑佩尔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发表讲话，称政府的这一战果“意味着卡利集团的末日和哥伦比亚新时代的开始”。

正当桑佩尔政府的缉毒战连连得手之际，不料一起怀疑桑佩尔在大选期间接受贩毒集团资助的贿赂案突然向他袭来。

自由党人桑佩尔于1994年6月19日大选第2轮投票中当选为哥伦比亚总统。大选揭晓后不久，反对党保守党曾指控桑佩尔大选期间接受了卡利集团的贿赂，但终因缺乏证据而不了了之。

1995年7月，进展顺利的反毒斗争忽然横生枝节。在对卡利集团的搜捕中，警方发现了一张由隶属于卡利集团的“拉埃斯特拉加工农产品贸易公司”签发的转帐支票，签收人是企业家圣地亚哥·梅迪纳。此人在1994年的大选中是桑佩尔总统竞选班底的司库（财务总监）。这张支票金额约4.7万美元，数额虽不多，但它有可能是证实自由党在竞选中接受贩毒集团贿赂的第一个证据。

从此，这张支票为桑佩尔惹出一系列麻烦。

1995年7月18日，梅迪纳被总检察院传讯，承认签收了这张支票。但有关这张支票的使用情况，在桑佩尔的竞选帐目上并没有记载。由于“查无实据”，正想借机大作文章的反对党只好按兵不动。但首先倒霉的是梅迪纳，警方于7月26日以“非法致富”的罪名逮捕了它。

1995年7月28日，梅迪纳主动要求检察官对他传讯，并且发表了近10个小时“证词”。证词很快被首都一家电台张扬出去，一时弄得满城风雨。梅迪纳在证词中揭发的主要内容是：自由党在竞选期间接受的各种捐助数额超过选举法的规定，也与该党向选举统计部门申报的数额不符；1993年桑佩尔在任驻西班牙大使期间曾试图与卡利集团达成资助他参加竞选的协议。梅迪纳还将正在任国防部长、竞选时掌管桑佩尔竞选班底财务的费尔南多·博特罗和正在任内政部长、原桑佩尔竞选办公室负责人奥拉西奥·塞尔帕供了出来，揭发他们在大选中受贿。

事情越闹越大，桑佩尔、博特罗、塞尔帕以及桑佩尔的夫人和邮电部长贝尔德蒂等人均不同程度地卷入贿赂案。反对派终于等到了向桑佩尔发难的良机。保守党乘机要求内政部长、安全局局长等人辞职。紧接着，众议院调查和控告委员会及总检察院均宣布对大选贿赂案进行调查。至此，桑佩尔陷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境地。

调查曲折而复杂，其中交织着各种势力的明争暗斗，政府与检察部门的矛盾也日益突出。1995年8月2日，博特罗在总检察院要求最高法院对他进行调查后，辞去了国防部长职务。两周后，博特罗被捕。此案终于导致桑佩尔政府的一场政治危机，也为桑佩尔总统的命运笼罩上厚厚的阴影。

1995年8月28日，哥伦比亚反对派首领、前司法部长恩里格·帕雷霍举行记者招待会。他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桑佩尔在竞选时确实接受了卡利贩毒集团的金钱”，“既然他的亲密助手、前国防部长博特罗和他竞选班底的司库梅迪纳因接受毒品美元进了监狱。那么桑佩尔就应当负有道义和政治的责任”。他要求总统采取措施，“举行公民投票，由选民决定总统应当留任还是辞职”。

桑佩尔接受毒品美元案，成了一个令哥伦比亚人十分尴尬的事件。因为，恰恰是桑佩尔执政以来，哥伦比亚的反毒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擒获卡利贩毒集团头号大毒梟罗德里格斯兄弟和另一头目，另有3名头目投诚，7大头目6名在押，卡利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在哥伦比亚的可卡因生产也已锐减40%。哥伦比亚内政部长将其总统誉为“反毒世界冠军”。哥伦比亚的绝大多数州长和2/3以上的普通民众也都支持桑佩尔。有人甚至说，即使桑佩尔接受了毒品美元也不必辞职。桑佩尔多次坚决否认他与卡利集团有过任何协议，表示“为了继续为哥伦比亚人民的利益服务”，他绝不辞职。

1995年9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称，哥伦比亚卡利贩毒集团总

会计师、智利人吉列尔莫·帕略马里于8月中旬向美国当局自首。

1995年9月27日，桑佩尔的律师安东尼奥·何塞·坎西诺遭枪击。他在波哥大的圣菲一所大学讲课出来乘车离去时，早就尾随在其车队后面的一辆汽车中的6名枪手，突然向他们开枪扫射。结果，在其警卫车中的两名保镖死亡，一名受伤；坎西诺律师大难不死，胳膊和脚中弹负伤，在医院接受治疗。刺杀案发生后，哥伦比亚秘密警察安全管理部部长立即发表讲话，他说，此暴力活动是针对桑佩尔总统的，目前有一个企图把总统赶下台的阴谋，策划者甚至预言了桑佩尔下台的确切时间。当天，内政部长塞尔帕则直截了当地点了美国的名。他说，美国缉毒总署和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是阴谋的支持者。

1995年9月29日，哥伦比亚检察院代行最高检察长职务的检察官萨拉曼卡在波哥大宣布检察院的调查结果。他说，桑佩尔总统及其副总统确是用毒品美元当选的，“显然，毒品美元被应用在了（桑佩尔的）整个竞选活动中和全国范围内”。对这一事态，哥政府当即表示“惊愕”。内政部长塞尔帕说，萨拉曼卡一人就把调查结了案，宣布了定案判决，这破坏了国家法制和司法管理的基础。

1995年11月2日白天，哥伦比亚76岁的资深政治家、前总统候选人、保守党领袖阿尔瓦罗·戈麦斯、乌尔塔多在首都波哥大的塞尔西奥大学讲演后，走出大门刚登上自己的汽车时，突然遭到两个凶手的排枪扫射，戈麦斯当即身负重伤，谋杀者随即乘车逃逸。戈麦斯在送进医院不久死亡。

1995年12月初，当众议院负责调查桑佩尔大选受贿案的“指控委员会”要求梅迪纳提供证据时，梅迪纳却推翻了自己先前的指控，承认他“没有证据”能证明其事。为此，“指控委员会”主席莫戈利翁在其报告中强调，梅迪纳的揭发“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杜撰”。与此同时，罗德里格斯两兄弟、已在押的卡利贩毒集团的其他头目，均否认他们曾用贩毒美元资助过桑佩尔竞选。

在这种情况下，“指控委员会”于1995年12月14日正式宣布：由于证据不足，要求议会对桑佩尔总统进行政治审判的提案已被否决，委员会决定封存这一提案。这不仅意味着桑佩尔个人摆脱了政治审判的威胁，国家也终于渡过了一次政治危机。不过，“指控委员会”主席莫戈利翁还说，此案并没有“终结”，如果今后发现确凿证据，并不排除再次审理的可能性。

然而，进入1996年后，风云突变。1月22日，去年8月被捕的前国防部长博特罗与检察官进行了一次“爆炸性的谈话”，宣称桑佩尔“确实知道”卡利集团向自由党“赠送数百万美元”一事，并“认真地承担过这件事的责任”。同日，他对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说，他决定和盘托出自由党接受贿选金详情的原因是他“不想当总统的替罪羊”，因为桑佩尔至今还在“掩盖事实”。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6年1月26日，桑佩尔竞选班子前司库梅迪纳在被拘留6个月后再次打破沉默，向检察院提供了他掌握的能证明桑佩尔与贩毒集团“早有联系”的3个证据。其中之一是毒枭希尔韦托·罗德里格斯兄弟1984年任命桑佩尔为工人银行行长，尽管桑佩尔后来没有赴任，但工人银行股东会议的复印件落在了梅迪纳手里，上面有桑佩尔和罗德里格斯兄弟的签名。

博特罗和梅迪纳两人反戈一击，桑佩尔又成了反对党攻击的目标。桑佩

尔不得不取消他的欧洲之行，他既未能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也未能按计划分别会晤法国总统和西班牙首相。

1996年1月31日，议会检举委员会决定重新对桑佩尔是否接受贿选金一事进行调查。

1996年2月6日凌晨，在狱中8个月缄口不言的希尔韦托·罗德里格斯首次开口招供，3年来他和他的兄弟米格尔签出1万多张银行支票，“赠送”给哥伦比亚政界领导人，其中有用来资助现总统桑佩尔的自由党的竞选活动支票。随后，哥伦比亚银行根据国家检察院的要求出示了这些支票，并提供了取款人的姓名。国家检察院总检察长阿方索·巴尔迪维索已决定于2月13日向议会呈递贿选案调查所取得的证据与证词，并正式指控桑佩尔与贿选案有染。

1996年2月14日晚，哥伦比亚总检察长巴尔迪维索向议会众议院调查和控告委员会正式起诉总统桑佩尔。起诉书指控他在1994年大选活动中非法致富、伪造私人文件、营私舞弊，隐瞒罪证。这是哥检察院经过三周调查取证后，向议会提交的指控总统正式起诉。

在这种形势下，国内又响起一阵阵要求桑佩尔总统辞职的呼声。

桑佩尔在得悉检察院提交正式指控后当晚发表讲话说，他感到很平静，他唯一要等待的是允许为自己辩护，相信能够表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要求公开全部有关案情，保障案件审理的透明度；他依然坚持自己绝不辞职的立场。

1996年3月15日，哥伦比亚总检察院决定对桑佩尔政府三名涉嫌贿选案的部长进行审查。这三名部长分别是，内政部长奥拉西奥·塞尔帕、外交部长罗德里戈·帕尔多、通信部长曼努埃尔·图尔瓦伊。

1996年3月19日，罗德里戈·帕尔多宣布暂时辞去外交部长职务。

面对毒品美元贿选案的强大冲击，桑佩尔能否在总统的宝座上坚持到1998年8月任期届满，将取决于事态的发展。

## 古巴军官贩毒集团覆灭记

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的岛国古巴，1989年7月7日传出了一则轰动世界的大新闻：古巴军事法庭以贩毒和叛国等罪名，宣判以奥乔亚为首的4名军官死刑，其他10名军官分别被判处30年、25年和10年徒刑。这是古巴1959年1月1日推翻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府、建立革命政权以来，由古巴政府自己揭发出来的第一宗大贩毒案。

过去，古巴未曾发现过政府官员走私毒品。然而，一段时期以来，有关古巴政府官员参与国际贩毒的传闻不绝于耳，这引起了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警惕。他认为，不能排除古巴官员与贩毒分子合作的可能性。

1989年4月24日，古巴情报监听人员突然收到一个可疑的无线电信号，这个信号发自古巴领土，传往哥伦比亚和美国。经破译，此信号与国际贩毒集团有关。情报人员迅速将情况向国家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内政部报告，菲德尔·卡斯特罗立即指示内政部组织调查小组，对这一可疑情况进行秘密侦查。

根据南部非洲停战协议，古巴于1989年4月开始从安哥拉撤军。当时在安哥拉担任古巴驻军司令的阿纳尔多·奥乔亚中将奉调回国，奥乔亚早年参加革命，为革命和建设立下赫赫战功。他回国后，立即被卡斯特罗任命为古巴西部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担负着保卫首都哈瓦那和与美国隔海相望的西部地区的使命，在古巴22万武装部队所设的3个集团军中，力量和装备最强。奥乔亚得知这个任命后，欣喜若狂。他为此大摆宴席，招待亲朋好友，还向他们馈赠珍贵物品，其中有钻石戒指、金银首饰、象牙雕刻等，让他们分享自己荣升的喜悦。

奥乔亚的花天酒地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和怀疑，因为古巴军政官员收入并不高，馈赠如此大量贵重的礼品远远超过他本人的工资收入水平。调查小组根据奥乔亚这一情况，再联系到那个与国际贩毒集团有关的无线电信号，便不管证据是否充足，决定先逮捕他再说。

1989年6月12日，奥乔亚在参加一个隆重的军人庆典活动时突然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最亲密助手豪尔赫·马丁内斯上尉。

据马丁内斯交待，奥乔亚从1986年开始走私贩毒活动，当时奥乔亚负责武装部队与外国军队的联络工作。1986年期间，奥乔亚为了弄钱，打起了走私贩毒的主意。他先是派助手马丁内斯去找寻关系，以便联系货源和贩运渠道。在一个偶然场合里，马丁内斯遇到下一个为贩毒集团作外应的美籍意大利人。此人建议马丁内斯参加贩毒集团的“洗钱”活动。所谓“洗钱”，就是把贩毒得来的非法收入通过某种方式变成合法收入，是贩毒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马丁内斯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奥乔亚，奥乔亚欣然同意。但由于他们不懂“洗钱”，此事只好作罢。

后来，在奥乔亚的授意下，马丁内斯很快结识了哥伦比亚贩毒分子法贝尔·巴雷哈，并通过此人与臭名昭著的哥伦比亚“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建立了联系。麦德林卡特尔是哥伦比亚最大的贩毒集团，西方世界20%的大麻和可卡因、美国80%的可卡因都是来自哥伦比亚，而这些毒品的绝大部分是通过这个贩毒集团贩运的。该集团1984年曾向哥伦比亚政府提出，只要承认其财产合法，他们愿意替政府偿还108亿美元的外债，可见其实力强大。

1987年11月以来，奥乔亚到安哥拉指挥作战，虽然战事频繁，但他仍

念念不忘做毒品生意。1988年4月，他派马丁内斯回国。这时，4名哥伦比亚贩毒分子也以旅游者身份来到古巴，双方在哈瓦那面商合作事宜，决定由奥乔亚在非洲建立一座可卡因加工厂，准备将毒品销往欧洲。另一个计划是经墨西哥向美国偷运毒品，后因参与此事的墨西哥人变卦导致计划搁浅。

1988年5月，马丁内斯持假护照进入哥伦比亚，在戒备森严的麦德林郊外的一座庄园里会晤了“麦德林卡特尔”头目埃斯科瓦尔。根据双方的协商，古巴人帮助转运毒品到美国，每公斤可卡因可获得800至1200美元的酬金。哥伦比亚运往美国的毒品一般是用小型飞机和小型快艇偷运，因此他们还商定，将哈瓦那以北140公里的古巴旅游地巴拉德罗作为中转站，古巴方面的任务主要是提供后勤服务，毒品由来自美国迈阿密的小型飞机、快艇和游船运往美国。另一种合作方式是，古巴方面负责在古巴沿海水域接收哥伦比亚发来的毒品，然后送往古巴马坦萨斯省的安全地点，等候美国快艇前来装运。埃斯科瓦尔最后要求马丁内斯帮助购买一架直升飞机和一些地对空导弹，用来加强“麦德林卡特尔”贩毒集团大本营的安全，因为它经常遭到哥伦比亚政府缉毒直升机的袭击。

马丁内斯从哥伦比亚回到古巴不久，不明国籍的小型飞机和快艇便不时往来于哥伦比亚、古巴、美国之间。奥乔亚就这样背着古巴政府，干起了肮脏的贩毒生意。

当时，古巴实际上有两个贩毒集团在秘密进行贩毒活动。一个是以奥乔亚为首的古巴武装部队5人贩毒集团，另一个是以安东尼奥·德拉瓜尔迪亚上校为首的内政部9人贩毒集团。两个贩毒集团14名成员中，有中将一名、少将一名、上校4名、中校3名、少校3名、上尉2名。奥乔亚中将是古巴武装部队中声誉很高的少数将领之一。而内政部参谋长帕特里西奥·德拉瓜尔迪亚少将是内政部贩毒集团头目安东尼奥上校的哥哥，他们哥俩控制着内政部MC局。

MC局是古巴为打破美国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而设立的一个特殊的秘密机构，专门从非官方渠道购买美国的医疗器械、药品、电子计算机、零部件和科技资料等。它进行的活动，海岸边防部队、海关和航空部门必须给予配合，对其所进口的物品不得随意检查。MC局就是利用这些特殊权力，干起了走私贩毒勾当。起初古巴的这两个贩毒集团并没有瓜葛，都是独往独来，后来两个贩毒集团勾结在一起开始合伙行动。

据供认，1986年，MC局驻巴拿马官员在谈生意的机会，与贩毒分子、古巴侨民鲁伊斯建立了联系。1987年1月，鲁伊斯来到古巴和安东尼奥谈判。经过秘密商谈，成交了第一笔贩毒生意。1987年4月，一架MC局的小型飞机载着国际商用机械公司的电脑包装箱，直飞巴拉德罗海滩。包装箱里装的是什么，根本无人过问。原来，安东尼奥同鲁伊斯达成协议，由古巴方面负责将400公斤可卡因装箱空运到古巴的巴拉德罗海滩，等待美国迈阿密方面的快艇、游船接走。电脑包装箱里装的正是来自鲁伊斯方面的可卡因。毒品运到巴拉德罗后，连续两周都是大风恶浪的天气，直到20天以后这批毒品才被运走。首战告捷，安东尼奥一伙分得赃款32万美元。

贩毒获得的巨款，就象是给安东尼奥一伙注射了吗啡剂，他们贩毒的数量越来越大，贩毒的手段也越来越狡猾。海上贩毒受风浪影响太大，他们便采用防潮包装，每个毒品包装袋上都安放有磷光装置，用飞机将毒品空投到约定海域，以便让接收毒品的快艇及时发现和迅速运走。如果快艇遇到不测，

就把毒品沉入浅海中，用他们的行话来说就是“钉”在海里，等待机会合适再去打捞。

据古巴政府贩毒调查小组的侦查：从1987年1月至1989年4月，古巴两个贩毒集团互相勾结，合伙搞了19次贩毒活动，其中4次失败、15次成功，偷运毒品6吨多，价值约1亿美元，从中获利340万美元。

奥乔亚和安东尼奥等人被捕后，警方搜查了他们的住所、秘密仓库及其亲密朋友、亲属的家，搜出了135万美元现金、42万比索（古巴货币，1比索约合1美元）、39辆汽车、一辆摩托车、186件武器。奥乔亚还供认，说他以马丁内斯的名义将20万美元存入了巴拿马的一家银行，另把安东尼奥交给他的5万美元存放在古巴驻巴拿马的一位官员的保险柜里。

案件发生后，古巴政府立即对内政部作了清查，撤了内政部部长何塞·阿夫兰特斯的职，同时任命政治局委员阿维拉多·科洛梅陆军中将为新的内政部长。所有与贩毒有关的官员都被关了起来或被撤换掉。国家元首卡斯特罗在谈到改组内政部时说：“被帕特里西奥等人糟踏得名声扫地的内政部，必须彻底更新才能取信于民。”

奥乔亚被处决时57岁，他高高的个子，身材魁梧且富有幽默感，曾经有过光辉的历史。他立过3次大功，获得过10枚功勋奖章，在古巴5名“共和国英雄”中排名第四。奥乔亚是古巴革命开国元勋之一，20岁出头就参加了反对巴蒂斯塔的游击队，在马埃斯特腊山区长期浴血奋战，屡次建立战功。当时除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兄弟俩及格瓦拉之外，他也被视为革命英雄，最受古巴青年崇拜。

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成了古巴领袖，其弟为国防部长，奥乔亚为国防部副部长。60年代初，他因革命需要被派往苏联军校受训。学成回国后，1965年当选为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之后不久，被派往委内瑞拉领导游击战争。1975年古巴出兵非洲后，他又于1978年1月转战埃塞俄比亚，在埃塞俄比亚和苏联军事人员的援助下，把索马里军队赶出了埃索两国存有争议的欧加登地区。1985年，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在美国的支持下向尼政府军发动猛烈进攻，奥乔亚被卡斯特罗任命为古巴驻尼加拉瓜高级军事顾问，协助尼加拉瓜政府粉碎了反政府军的攻势。1987年，安哥拉政府军吃紧，请求古巴帮助击退反政府军的进攻，卡斯特罗又想到奥乔亚，抽调他去安哥拉担任古巴驻军司令。

奥乔亚征战两大洲，出生入死，战功赫赫。然而，他在誉满名噪之时，却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跌进了贩毒的深渊，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除从事贩毒外，他在安哥拉担任古巴驻军司令期间，还倒卖过食糖、象牙、钻石、贵重木材、石油、水泥、武器、鱼干等。

据古巴军人证实，奥乔亚指使他们把古巴军人吃不完的食糖拿到黑市上卖给安哥拉、法国和刚果商人，糖的销路很好。仅1988年，他们就卖了990袋，每袋35美元，共得3.4万美元。另外，用300袋食糖换了30颗钻石，其中奥乔亚私吞了7颗。为了确定钻石质量和价值，他们专门从国内弄来了鉴别工具。

奥乔亚还倒卖过象牙。他派人去刚果购买象牙，拿到罗安达出售，共倒卖3批，约300公斤。他手下的人在采购象牙时，对刚果人谎称古巴全国各地博物馆都需要象牙，一个地方需要一根。而奥乔亚却欺上瞒下，对部下说这些交易是经过上司同意的。至于交易的目的，奥乔亚也自有其说：“这些



钱将用来修建安哥拉飞机场，改善通讯设备，还要支援国内建设。”

奥乔亚等人的倒卖活动引起了安哥拉人民的不满。

奥乔亚在走私贩毒、倒买倒卖商品的同时，还贪污和挪用友好同家的军费。1987年3月，尼加拉瓜要求他帮助购买联邦德国生产的迫击炮弹和火箭发射器等，交给了奥乔亚12万美元，但奥乔亚后来只交给了尼加拉瓜价值7.5万美元的武器。安哥拉政府也曾交给奥乔亚500万美元，要求他帮助购买5架美国制造的大力神C—130军用运输机，这笔钱也被奥乔亚赚去了相当一部分。奥乔亚爱财如命，为了聚敛钱财，竟走上了走私贩毒、贪污堕落之途，且越陷越深，终于不可救药，由一个受到最高统帅倚重甚殷的将军、“共和国英雄”，蜕变成了一个罪犯，最后毁了自己。

古巴两个贩毒集团的罪行被揭露后，成了西半球的一大新闻。刊登奥乔亚一伙罪状和审判情况古巴《格拉玛报》一拿上街头就被抢购一空。人们对这两起案件感到十分吃惊，因为这是自古巴革命胜利后发生的最大的贩毒案件，且案情又与美国和拉美国家敏感的国际贩毒问题相关。不少群众组织愤怒声讨案犯的罪行，驻扎在安哥拉的古巴军队打电报给国内，拥护政府审判曾经指挥过他们作战的奥乔亚，不少哈瓦那市民强烈要求法庭依法惩办罪犯，保证革命的纯洁性。

奥乔亚于1989年6月12日被捕，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在月底他的党籍、军籍、党内外一切职务被剥夺精光。

1989年6月25日，由47名将军组成的荣誉法庭，在哈瓦那正式审判与此案有关的奥乔亚等14人。

1989年7月7日，古巴特别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判处奥乔亚、马丁内斯、安东尼奥和其助手阿马多死刑，其余10名罪犯判处30年、25年、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奥乔亚等4人被判死刑后，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大赦国际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和知名人士纷纷致电古巴，要求赦免他们的死罪。但是，古巴领袖卡斯特罗兄弟俩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不徇私情、严惩不贷。

奥乔亚毕竟是卡斯特罗兄弟俩的亲密战友之一，如果不是参与国际贩毒罪恶行径，这兄弟俩说什么也不会让奥乔亚去死的。

作为古巴武装部队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在案发以前曾与奥乔亚谈过两次话，希望他洗手不干，承认错误。在得知奥乔亚参加国际贩毒集团的严重罪行后，劳尔·卡斯特罗还在办公室里禁不住动起感情来。但为了惩前毖后，他毅然主张依法判处奥乔亚死刑。他说：“如果我们不对其中4人执行死刑，那么我们国家就要考虑彻底取消死刑。”

古巴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自奥乔亚被捕后曾一度在办公室连续呆过7个昼夜，亲自处理奥乔亚的案子。1989年7月9日，他主持召开国务委员会会议，对军事法庭的判决进行审核。面对某些组织和人士的求情，他说：“如果不对那些背叛革命、给祖国脸上抹黑的人严厉制裁，他们就会危及革命的未来。”

1989年7月13日凌晨，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响，奥乔亚等4名高级军官在刑场上应声倒下。

以查处贩毒罪犯为契机，卡斯特罗在古巴开展了一场肃贪反腐运动。

1989年6月13日，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交通部长托拉尔瓦被解职。7月24日，因滥用职权、非法占用资金和物质、生活腐化等罪行，被判处20年

有期徒刑。

1989年6月29日，内政部部长何塞·阿夫兰特斯被解职，因为他严重失职，内政部9名军官参与贩毒长达两年半之久竟未被发觉。7月31日，他因严重失职、非法占用国家资金、未经许可在外贸领域成立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等问题，被警方逮捕。7月14日，因为类似的问题，包括内政部副部长在内的7名军官被更换职务。

这期间，受到撤职处分甚至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高级官员还有MC局、移民局、民航局、情报局、边防局、消防局、财政局的局长及海关总署署长。

古巴开展的肃贪反腐败运动，许多国家的权威报纸都纷纷发表评论。普遍认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古巴政府采取如此严肃的反腐败举措，这在古巴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在国际上也是令人瞩目的。

## 北约秘书长克拉斯辞职内幕

1995年10月9日，比利时议会通过决

议，决定以涉嫌受贿和伪证罪将比利时人、北约秘书长威利·克拉斯送交比利时最高法院审查。1995年10月20日，克拉斯不得不宣布辞去北约秘书长职务。克拉斯因经济丑闻而被迫辞职，使得已经受到诸如波黑问题、东扩及与俄罗斯的关系等问题困扰的北约组织平添了一层忙乱。

“北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北大西洋公约的简称。1949年4月，美国同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北大西洋公约。土耳其、希腊于1952年2月，联邦德国于1955年5月，西班牙于1982年，正式加入。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实行“集体防御”；任何缔约国同他国发生战争时，缔约国必须给予援助，包括使用武力。1949年8月条约生效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负责条约的执行。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后，为适应新的形势，北约调整了职能和作用，1991年11月制订了《北约战略新概念》，但未能提出包括政治在内的总纲领。1994年8月，北约秘书长德国人曼弗雷德·韦尔纳病逝。1994年10月17日，原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威利·克拉斯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正式就任北约秘书长一职，按北约章程规定，新秘书长任期4年。

1938年11月24日，威利·克拉斯出生于比利时林堡省哈瑟尔特。父母的自由主义思想及社会党人的影响使他很快就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他年纪轻轻就成为社会党活动的积极分子。克拉斯17岁就当选为社会党青年组织林堡分部主席。中学毕业后克拉斯进入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攻读外交学和政治学。毕业后重返林堡省从事社会党组织工作。1968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时年30岁。从此，他仕途一帆风顺，1972年首次出任教育大臣，成为当时比利时最年轻的政府阁员。两年以后，他又成为社会党两主席之一。以后，克拉斯先后出任经济事务大臣、副首相兼经济事务大臣，并一度兼任国民教育大臣。1992年3月担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他还是欧洲社会党首届主席。

克拉斯精明能干，颇具口才，是谈判好手。1973年石油危机时，比利时经济面临困难，为解决通货膨胀等问题，克拉斯想方设法缓解因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由于他工作出色，被评为比利时当年的“风云人物”。他还参与解决了多项国内棘手问题，如钢铁工业和海军造船业危机。1993年下半年比利时出任欧共体主席国期间，克拉斯为欧共体各国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做了大量工作，受到欧共体国家一致好评。法新社称赞他为“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

克拉斯自小酷爱音乐，尤其爱好爵士乐。他在大学求学时曾参加爵士乐乐队。他本人还是位挺不错的钢琴手，并创作出《小红人》等乐曲。他在出任政府大臣后，业余时间还兼任交响乐队指挥。1993年在比利时接任欧共体主席国的仪式上，克拉斯指挥蒙奈交响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以示祝贺。

克拉斯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主张建立联邦式的欧洲联盟，实施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款，制定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并认为欧盟应有独立的防务体系，欧盟的当务之急是加强成员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协调，实现该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为此，他曾提议欧盟设立一个“胚胎式的”欧洲外交部，以

便把对外政策的某些方面（如国际维和行动）的责任从欧盟各国移交给一个共同的权威机构。

克拉斯主张扩大北约，吸收东欧国家加入。他在出任北约秘书长的就职演说中即声称，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使这个政治军事联盟扩展到东欧。但他指出，北约东扩不应孤立俄罗斯，北约应与俄罗斯发展密切的合作关系。但他又声言，北约不会允许俄罗斯对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一事投否决票。

克拉斯赞同维护大西洋联盟的团结，加强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他认为欧洲的安全与防务永远不能替代一个强大联盟所包容的跨大西洋纽带。

北约对克拉斯担任秘书长一职的任命虽是一致同意的，但并不认为他是理想的人选。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称，他所以被选上，是因为他的当选不会引起争吵。比利时是北约的一个不太显要的角色，比起美、德、法、英等大国来，比利时人担任秘书长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

克拉斯辞去北约秘书长职务，不是因为北约对他的工作有什么非议，而是被国内的“旧案”掀翻的。

1991年7月，比利时副首相科尔斯被谋杀，在调查这一案件时牵出了前比利时政府内许多达官贵人营私舞弊、收受贿赂的线索。在比利时素有“政客杀手”之誉的女法官韦尼克·安西亚在对案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后，从中揭露出两桩震惊比利时政坛的受贿大案。一桩是在1988年，当时比利时军方向意大利阿古斯塔公司订购了46架军用直升飞机，该项军火合同价值120亿比利时法郎，为了尽快敲定这宗生意，阿古斯塔公司向当时的比利时执政党弗莱芒社会党提供了5100万比利时法郎的“捐助”。当时，克拉斯任政府经济大臣。第二桩是在1989年，比利时军方又向法国达索飞机公司订购用于比利时空军F—16战斗机上的电子设备，为此达索公司向弗莱芒社会党支付了6000万法郎的佣金。而当时克拉斯正任副首相兼经济大臣的要职。

1978年10月，比利时社会党因民族矛盾分裂成两个政党。其一是法语社会党（亦称“瓦隆社会党”），其二是弗莱芒社会党（又译“荷语社会党”），克拉斯是该党领导之一。社会党分裂后，两个社会党仍一起执政。阿古斯塔贿赂案，涉及两个社会党。

阿古斯塔贿赂案发生于1988年，当时比利时政府决定为本国军队装备46架军用直升机。法国的宇航公司和意大利的阿古斯塔公司为此展开了激烈竞争，最后阿古斯塔公司获得了这笔总金额达120亿比利时法郎（约合3500万美元）的军火合同。当时，具体负责这笔交易的是任国防大臣的法语社会党人科姆。1991年7月15日，法语社会党领袖、国务大臣科尔斯在寓所前被刺身亡，警方在调查中发现法语社会党有收受阿古斯塔公司提供政党活动赠款的嫌疑。1993年5月，法语社会党内部发生分歧，当时任政府副首相的法语社会党副主席穆罗退出政府并要求调查科尔斯遇难与直升飞机合同的关系。

1994年1月，随着警方对受贿案调查的一步步深入，有报道说，法语社会党收受了阿古斯塔公司1500万比利时法郎的贿赂。在舆论的压力下，涉嫌此案的法语社会党在政府内的三位大臣：副首相兼交通和公共企业大臣科姆、瓦隆区政府的首席大臣斯皮塔尔斯、内政大臣马多先后被解除议员豁免权，并被迫辞职，接受司法审查。紧接着，法语社会党主席布斯坎也宣布辞职。

1995年1月，案情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弗莱芒社会党财政负责人等三人被指控收受阿古斯塔公司5100万比利时法郎“捐款”而遭警方逮捕，并供认当时任政府经济大臣的弗莱芒社会党领导人克拉斯和当时任弗莱芒社会党主席、时下为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的范登布鲁克均知晓此事。1995年3月，比利时前空军参谋长勒费尔中将因涉嫌此案而自杀。1995年3月22日，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范登布鲁克被迫辞职。

随着范登布鲁克的下台，新闻媒介自然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克拉斯。有的政要在接受采访时甚至明确表示，克拉斯还是“主动辞职为好”。但克拉斯却一再重申自己是“清白的”，并表示“决不会辞职”。然而多数人怀疑克拉斯。比利时一家报纸的调查结果表明，96.4%的人认为克拉斯应辞职。1995年4月7日，比利时警察搜查了克拉斯的住宅。4月8日，比利时议会又同意法院对克拉斯进行讯问。5月，最高法院对克拉斯进行了三次询问，其中的一次长达12小时。

克拉斯对此极为恼火。他一方面多次向新闻界表白，另一方面赶紧向北约理事会做说明解释，争取理事会的支持。比利时最高法院5月份的调查没有获得明确结果，此案被暂时搁置下来。而北约及其各盟国政府，对克拉斯涉嫌丑闻一直持静观态度；克拉斯继续担任北约秘书长。

但是，比利时最高法院对克拉斯的调查并没有放弃。到了1995年9月份，案情急转直下，总检察长吕蒙认为已掌握了足够证据，证明克拉斯涉嫌两桩贿赂案，要求比利时议会同意将克拉斯提交最高法院审查。方寸已乱的克拉斯在10月19日议会就此事进行表决前还偕律师赴议会进行情况说明，竭力表白自己是“无辜的、清白的”。然而议会最终还是以97票赞成、52票反对和1票弃权决定以受贿罪和伪证罪将克拉斯送交最高法院审查。克拉斯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在次日宣布辞去北约秘书长之职。

##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为何成为被告

贝卢斯科尼是在以“肃贪反黑”为主要内容的“廉洁运动”中上台的。他领导的政府由于是意大利旧政体崩溃、选举法修改后成立的第一届政府，故也被称作意大利“第二共和国”的首届政府。较之以往历届政府，这届政府的主要特点是：它不仅由清一色的右翼党派组成，而且内阁成员几乎全是新人新面孔。然而，由于总理贝卢斯科尼的作为未能脱胎换骨，他不仅被迫辞职，还成为法庭上的被告。

那么，贝卢斯科尼是如何出任意大利总理、又是为何成为被告的呢？

1992年“米兰贿赂案”曝光后，意大利朝野上下开展了以肃贪反黑为主要内容的“廉洁运动”。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因涉嫌贪污公款、行贿受贿、以不正当手段获得非法经济收入以及参与黑手党等黑势力活动而受到司法机关审查或传讯的政界、实业界、军界、新闻界、宗教界、司法界要人已达6000多人。其中，仅议会议员就多达400多人，约占参、众两院议员总数（945名）的2/5。那些原为执政党领袖的政界显赫人物也先后纷纷落马，其中包括7次出任政府总理的天民党元老安德烈奥蒂和3次出任政府总理的社会党总书记克拉克西。天民党和社会党等大党因党内主要人物退出舞台而分崩离析或一蹶不振，阿马托内阁、钱皮内阁接连倒台。人们迫切要求变革旧体制、建立新政府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按照意大利宪法，只有通过提前举行大选，重新组成一个新政府的目的才能尽快实现。

1994年1月16日，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签署了解散议会的法令，内阁会议决定第12届议会选举提前两年多举行，选举日期为1994年3月27日和28日。

1994年1月，意大利大企业家、新闻媒体巨头贝卢斯科尼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意大利力量党，表示要代表右派，防止左派执政。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第二大私人企业集团——菲宁韦斯特集团的总裁，是意大利顶尖的富豪。他的企业集团垄断着几乎与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平分秋色的全国最大的3家私人电视台（不包括其在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电视台），规模位居全国之首，并开设有涉及新闻、出版、金融、投资、保险、商场、房地产等领域的300多家公司，有雇员4万人，年营业额达74亿美元。他的影响犹如他操纵的传播业一样无处不在，许多城市的影院是他出钱开的。他还是全球著名足球队——AC米兰队的老板。

据说，贝卢斯科尼是靠个人奋斗而白手起家的商界巨子。意大利新闻界人士说：“仅他的经营之道就足以编纂一部长达千页的书。历史学家塞尔德·罗马诺给他下的结论是：“在生财方面，他是最具代表性的伦巴第企业家的象征。”

贝卢斯科尼的父亲是米兰一家银行的经理，耳濡目染使贝卢斯科尼从小练就了精明的从商技巧和灵活的经济头脑。上中学时，他替别的孩子做家庭作业，以换取一定的零用钱。在大学读法律时，他常到海滨俱乐部或夏日的游船上低声吟唱感伤的流行歌曲，或走家串巷、不惜口舌地推销吸尘器，以换取酬金支付学费和生活费。1961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后，便开始了他的经营生涯。

精明的贝卢斯科尼瞄准了人们对廉价住房的强烈需求，他以父亲的积蓄作为资本，并依靠大量的风险贷款，建起了米兰郊区住宅群。这使他大发横

财，赢得了巨额利润。80年代中期，他把注意力转向对公众最具影响力的传播业，开始投资影视、广告和出版业，他的三大电视网播放的体育比赛、肥皂剧和童星表演的节目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吸引了45%的意大利电视观众，使3家国有电视台的收视率锐减，贝卢斯科尼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传媒巨子。

这位敛财有道的阔佬不但成就了令人羡慕的事业，而且在生活中也非常幸运。他有个和睦温情的家庭，两次婚姻带给他5个子女。他的年轻的第二任妻子维罗尼·卡拉里奥原是一名演员，为了支持夫君的事业，她忍痛告别了舞台，甘当贤内助，养儿育女。

这样一个出则豪华轿车、入则锦衣美食，外有金元滚滚、内有娇妻婀娜的人物，在人生征途上应该满足了。可贝卢斯科尼又有了新的目标，他决心投身政坛，把他的疆域扩展到意大利政治生活中去。

象贝卢斯科尼这样的成功商人为什么会一跃跳入政治舞台呢？人们有种种分析和说法。

一位米兰的时装设计师说：“他的集团摇摇欲坠，他从政是为了挽救自己。”又有人统计说，菲宁韦斯特集团债台高筑达20多亿美元，只要银行收紧信贷，它立即就有崩溃的危险。另一种说法是，大选前为舆论所看好的左派对贝卢斯科尼这位传媒大王向来没有什么好感，一旦左派上台，自然会进行立法限制，缩减贝卢斯科尼的地盘。贝卢斯科尼自己则解释说，现在意大利的政治现状极不合理，很多政治家都不负责，都有一种说了跟没说一样的说话艺术。因此，现在已到了由那些诚实而有能力的企业主和实业家来掌管国家命运的时候了。

1994年1月的一天，贝卢斯科尼率他的部下在足球场露天的阶梯看台上为他的AC米兰队加油助威。球迷们如痴如狂地为AC米兰队呐喊：“意大利加油！”“意大利加油！”。这使为琢磨政党名称而苦思冥想的贝卢斯科尼突发灵感，他决定把这个以菲宁韦斯特集团为核心的政党命名为“意大利力量党”。两个月内，该党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4700多个分部，成员达22万人。同时，贝卢斯科尼频频在自己开办的电视上露面，发表演说，接受采访，使用夸张、形象、简明的语言来宣传鼓动，与其他传统政治人物大相径庭。“意大利力量党”的广告通过电视，深入到每一户人家。在各地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千娇百媚的女接待员代替了横眉竖眼的纠察大汉，增加了竞选的优美气氛。

为了适应意大利新选举法所确立的多数选举制，贝卢斯科尼需要和其他政党结成联盟。于是在短短几天内，他说服了两个本来形同水火的右翼党派——“北方联盟”和“全国联盟”同“意大利力量党”一起组成“自由联盟”参加大选。与此同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贝卢斯科尼找到250个候选人，代表“意大利力量党”竞选。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政坛新面孔，是用商业招聘的方法，有针对性地选拔出来的。

左派力量意识到贝卢斯科尼已成为他们竞选中的最大的政敌，集中火力对他进行攻击，并暗示意大利黑手党是贝卢斯科尼的后台。但这些指责并没有能击倒贝卢斯科尼，攻击的发起人“反黑手党委员会”主席反倒因此被迫辞职。

还有人攻击贝卢斯科尼和在肃贪反黑运动中被击垮的旧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传，前总理克拉克西是他的好朋友，曾经经手把法庭冻结的电视

发射台还给他。正是凭借过去的政界要人的种种支持，他方能在短短十多年间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王国。可是，意大利人对这些攻击毫无反应。

1994年3月27日和28日，意大利4000多万选民参加了全国大选。选举结果，由意大利力量党、北方联盟、全国联盟组成的自由联盟（右派）获胜，左翼进步联盟（左派）和中间派联盟（中间派）败北。在参、众两院的315个席位和630个席位中，自由联盟分别赢得135席的相对多数和366席的绝对多数，左翼进步联盟分别夺得122席和213席，中间派联盟仅获得31席和46席。

由于1993年4月公民投票通过的新选举法规定，大选中得票数额不足4%的政党不得进入议会，这次议会选举只有7个政党进入议会。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一跃成为第一政党（得票率为21.1%），左翼进步联盟为第二大党（得票率为20.4%），全国联盟、北方联盟和“重建共产党”分别居第三、第四、第五位，从原来第一大党“天民党”垮台的废墟上组建起来的人民党则降为第六位，沦为无足轻重的小党。社会党、网络党、绿党等左翼党派都未能进入议会。

据舆论分析，贝卢斯科尼领导新成立的“意大利力量党”在第一次大选中一举获胜，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意大利传统上是一个中间偏右的国家，贝卢斯科尼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填补了旧政权留下的政治真空，继承了天民党和社会党的基本选民。

2. 贝卢斯科尼顺应和利用了选民求变求新的心理。政治学家马内梅教授在大选前这样说：“左右两派的分歧被新旧之争所代替，所有政党都想表现得比其他一方更为崭新。这种不遗余力的求新，是因为在普通选民心目中，‘旧’意味着不诚实，‘新’则代表了诚实。”贝卢斯科尼早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他采取的竞选手法和推出的人选，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3. 迎合了选民对经济改革的要求。当时，意大利债务累计已高达1800万亿里拉（约合1.1万亿美元），每年的财政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失业率超过11%，失业人员达200万之多，名目繁多的税赋使人们不堪重负。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贝卢斯科尼发誓般地向选民们许诺，他上台以后将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改革，把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42%的税收降至30—33%，并将目前200种税减少至10种，同时许诺将给100万失业者找到新的工作岗位，使意大利再次步入50年代末至60年代的“黄金般的经济大繁荣”状态。这些画饼充饥般的新经济政策和措施，本来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然而经过贝卢斯科尼绘声绘色的渲染，吸引了众多的选民，尤其是青年选民。

4. 贝卢斯科尼的个人魅力及其私人新闻媒介也起了很大作用。他在商道上成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意大利人认为他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最适当人选。另外，他利用自己的新闻宣传工具为自己造声势，比其他竞选者更为有效。

在大选中获胜之后，贝卢斯科尼立即以“胜利者”、“第一大党”领导人的身份，提出应由他担任新政府总理出面组阁。全国联盟书记菲尼表示支持贝卢斯科尼出任总理，但北方联盟坚决反对。北方联盟领导人博西指出，在议会中北方联盟所获议席最多，应由北方联盟的人出任总理；况且贝卢斯科尼是私营企业家，掌权必有维护自己利益之嫌，因此不宜出面组阁当总理。

最后，经过反复的争夺、协商、交换，各方不得不承认贝卢斯科尼是最合适的总理人选。根据法定程序，斯卡尔法罗总统提名贝卢斯科尼为总理，并授权他组成战后第53届内阁。



1994年5月11日，贝卢斯科尼政府宣誓就职，并公布了内阁组成名单。从名单公布前后的反映来看，贝卢斯科尼内阁似乎一开始就不受社会欢迎。

首先，贝卢斯科尼将他领导的菲宁韦斯特集团的律师、顾问等原班人马拉进政府内担任外交、国防、外贸部长等要职，舆论怀疑这么做是否会由于“政企不分”产生用国家行政权力来维护菲宁韦斯特集团私利的弊端。

其次，北方联盟的第二号人物马罗尼出任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而北方联盟的主要纲领之一就是倡导在意大利实行联邦制，因此国内相当一部分人担心由北方联盟领导人出任内政部长会使国家统一受到损害。斯卡尔法罗总统也曾“警告”说，担任内政部长者应“在维护意大利统一和遵守共和国法律方面起带头作用”，不应采取违背“只有一个而且不可分割的意大利的原则”的立场，这种原则是意大利宪法的灵魂。

第三，“全国联盟”是由“新法西斯党社会运动”更名而来，鼓吹法西斯主义，强调国家与领袖的权威，近年内声势日盛。这次“全国联盟”有5名成员进入内阁，顿时在西方世界引起一片骚动。法国总统密特朗在5月10日发表电视讲话，对意大利新法西斯党参政表示“遗憾”。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公开呼吁意大利人和欧洲人抵制“法西斯的挑衅”。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警告意大利政府中出现法西斯部长的文件，指出欧洲联合的条约基础已被破坏，不能由一个法西斯部长代表联合的欧洲去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并代表欧洲讲话。面对国际社会的指责，贝卢斯科尼无言以对，幸而意大利总统、两院院长给了他有力的支持。意大利总统、议会两院院长发表声明指出，欧洲议会在新法西斯党入阁问题上的做法是干涉意大利内政。但这只是意大利国家领导人的外交立场，并不表示国内政治力量支持“全国联盟”入阁。事实上，国内对此问题表示不安和反对的大有人在。

执政刚过了两个月，贝卢斯科尼又遇到了“比翁迪法令”政治风波。

1994年7月13日，贝卢斯科尼主持内阁会议通过了由其好友、司法部长比翁迪提出的一项关于“预防性拘留”的新法令。7月14日，政府颁发了这项法令。

这项新法令将预防性拘留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组织的破坏性行为、恐怖活动、行凶杀人、绑架、大型走私贩卖毒品与武器等，可实行拘捕；另一类为国家公务员违法贪污受贿、行贿、侵吞公款、造假帐目、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等，对这一类犯罪行为禁止实行预防性拘捕。贝卢斯科尼称，此举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权，对目前仍在进行的反贪运动实行“政治解决”，以结束司法当局“管理国家和议会”的不正常局面，“不让预防性拘捕成为逼人供认自己和别人的手段”。该法令下达后仅4天时间内，就有1165人获释，其中156人涉嫌贿赂案，包括前卫生部长、自由党人士德洛伦佐和社会党原副书记迪多纳托。据估计，根据这项新法令，将有4000多名在押犯要出狱。

政府出笼的这项“比翁迪法令”，立即招致了米兰等地检察官和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法令颁布的当天晚上，以在“廉洁运动”中清查大案有功而闻名国内外的检察官安东尼奥·迪彼得罗为首的米兰检察院4名检察官宣布集体辞职，表示这项法令使他们无法工作。这更加激起了全社会的不满情绪。一时间，声援米兰法官的信件、传真雪片般飞向全国各地报社、电台和通讯社。罗马群众在司法部门前抗议，那不勒斯市长组织了群众性的抗议游行。

意大利有识之士普遍认为，贝卢斯科尼之所以一上台就仓促推出“比翁

迪法令”，其目的在于保护一些政界要员的亲朋好友，使一些过去有权有势、贪赃在法的显赫人物逃脱法律的制裁。舆论抨击该法令是一项彻头彻尾的公然保护“富人犯罪”、专门“惩罚穷人”的法令，因为它“使穷人留在狱中，让富人回到家里”。有些人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这样做显然与米兰检察官们正在调查菲宁韦斯特集团的贿赂案有关。

愤怒的检察官们决心同贝卢斯科尼对着干，就在法令颁布的当天，米兰检察院下令拘捕了49名贪污受贿的财政警官和工商界要人。贝卢斯科尼对此十分恼火，指责这是“完全蔑视政府通过、总统签署的措施”，检察官“滥用权力”，“将司法用于政治目的”。他接二连三地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他颁布的法令不是为了庇护哪一个行贿受贿分子，而是为了使意大利的法律符合欧洲联盟的要求，是为了维护人权。法官们则针锋相对地指责“政府阻止调查”是想庇护包括贝卢斯科尼的弟弟保罗·贝卢斯科尼在内的菲宁韦斯特集团被捕的领导人和其他嫌疑犯。

就在政府与法官们较量正酣时，贝卢斯科尼内阁中出现了“反对派”。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北方联盟第二号人物马罗尼7月16日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政府颁布的这项法令与他在内阁会议上看到的文本不同，是15天前他反对的那个文本，他受了蒙蔽，中了“圈套”。并说，据此法令，两三万在押犯可能获得自由，这会给公共秩序构成威胁；政府必须撤销这一法令，不然他就辞职。

贝卢斯科尼闻讯后勃然大怒，指责马罗尼的话“不符合实际，是对政府和总理的肆意攻击”，勒令马罗尼“要么公开承认自己撒谎，要么立即引咎辞职”。北方联盟书记博西坚决支持马罗尼，指责贝卢斯科尼是“独裁者”，说“如果贝卢斯科尼想辞职，请便！意大利会有一个新政府”。而全国联盟的领导人菲尼也对“比翁迪法令”持有异议：“我不知道贝卢斯科尼想干什么！……，法令必须修改。”贝卢斯科尼则干脆表示“宁折不弯”，法令不容收回；并威胁说，“将在执政联盟党内进行政策性调查，最终结果要么是坚持此法令，要么是大家散伙回家。”

随着执政三党争论的白热化，政府危机一触即发。7月19日中午，国家电视台被告知，总理将于13时向全国发表讲话。人们预料，贝卢斯科尼将宣布内阁危机的消息。到了12时50多分，政府的一位副部长宣布，总理取消这次讲话。后来才弄清，执政三党的对话渠道重新又打开了。下午，三党为了保住统治地位，终于达成妥协：“较量已经结束，既无胜者，也无败者”，“是国家获得了胜利”。傍晚，内阁开会一致决定：撤销“比翁迪法令”，经修改后作为法案向议会提出，由议会讨论拍板。

7月21日，议会否决了这项法令。贝卢斯科尼在电视台宣布撤销这项法令时，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承认犯了一个政治错误，但又说：“其实，我本人对这项法令中的部分条款也持有异议，禁止预防性拘捕的罪犯中不应当包括腐败分子和营私舞弊者。”

意大利舆论认为，贝卢斯科尼之所以在这项法令上改变立场，是担心北方联盟改弦易辙，转而同左翼民主党结成联盟，从而把他赶下台。贝卢斯科尼收回成命，从而把政府从危机的边缘拉了回来。

然而，贝卢斯科尼的麻烦并没有就此了结。

“比翁迪法令”刚一撤销，米兰等地的司法机关便立即发出数以百计的拘捕令，许多在法令有效期间获释的嫌疑犯重新被捕入狱。7月23日，在事

先没有通报贝卢斯科尼的情况下，米兰市检察院下令搜查了菲宁韦斯特集团的财务部，并逮捕了财务部经理萨尔瓦托雷·夏夏及另一名工作人员。米兰检察院的发言人说，该企业集团的最大股东是现任总理贝卢斯科尼，该企业集团的财务部不但涉嫌一起行贿案件，而且还有逃税漏税的嫌疑。同一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市检察院下令逮捕了 7 名卷入卫生系统行贿案件的政治家、企业家和行政人员，其中包括前国防部长萨尔沃·安多等。尽管米兰检察院一再重申，这是在执行正常的公务，然而意大利力量党的许多议员认为，这是法官们“对政府颁布那项法令的报复。”

7 月 24 日晚，贝卢斯科尼在距米兰约 40 公里的阿尔科雷镇的私人别墅内召开了“秘密智囊团”会议，研究当前时局的对策。出席这次晚餐的除其胞弟保罗外，还有国防部长普雷维蒂（原来是菲宁韦斯特集团律师）、政府内阁秘书长莱塔（原来是菲宁韦斯特集团副董事长）和菲宁韦斯特集团董事长孔法洛涅里以及财务部经理夏夏的两名律师。这个阿尔科雷晚餐虽然进行得极为诡秘，但还是被新闻界捅了出来。

“阿尔科雷晚餐”的消息一传开，立即在意大利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贝卢斯科尼解释说，这“纯属朋友间的一次小小聚会，大家共进晚餐聊聊天而已”。司法机构却认为，总理不早不晚单单在米兰检察院对菲宁韦斯特集团行贿嫌疑进行调查时搞这次聚会，目的是订立攻守同盟。反对党人士进一步指出，虽然贝卢斯科尼在出任总理时辞去了菲宁韦斯特集团总裁职务，委托他的弟弟保罗管理该集团，但事实上至今他仍然在垂帘听政，他和政府官员一起与这个集团的负责人、律师聚会，使政府和个人利益搅和在一起难以分清。

7 月 25 日，菲宁韦斯特集团财务部经理夏夏自首，供认该集团曾向税务警察行贿 3.3 亿里拉（约合 20 万美元），钱款均由保罗·贝卢斯科尼提供。7 月 27 日，在米兰检察院下令拘捕保罗时，保罗却神秘地失踪了。这一下又增加了人们对贝卢斯科尼总理的指责。

7 月 29 日，“失踪”两天多的保罗在他的两名律师的陪同下突然出现在米兰检察院，向检察官自首，把向税务警察行贿的责任全部包揽下来，随即被软禁在家。他的被捕又一次使贝卢斯科尼总理陷入尴尬的境地。

为了摆脱困境，贝卢斯科尼连忙同北方联盟书记博西和全国联盟领导人菲尼举行会议，商讨政治对策。博西毫不客气地要求他将商业利益同其政治作用截然分开，博西和菲尼一致要求贝卢斯科尼将其商业上的合作伙伴清除出内阁，以免再招惹是非。

为了使自己从菲宁韦斯特集团问题上解脱出来，贝卢斯科尼于 7 月 29 日宣布断绝他同该集团的关系，并向斯卡尔法罗总统提交了一个“委托管理菲宁韦斯特集团”的方案。根据这一方案，总统、两院议长和反托拉斯机构可联合任命一个委员会，监督菲宁韦斯特集团。贝卢斯科尼很为他的方案得意，说这是一种“彻底的、新颖而公平的”解决办法。

但是，斯卡尔法罗总统不以为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方案。他说：“从宪法的角度讲，我无权任命监督委员会来监督菲宁韦斯特集团的经营。”北方联盟领导人博西公开表态说，“这个方案根本站不住脚，必须在管理者 and 需加托管的财产之间划清界限。”

与此同时，以左翼民主党为首的反对党则一致要求贝卢斯科尼全部或部分出售他在菲宁韦斯特集团所拥有的股权，这自然是总理所不能同意的。贝

卢斯科尼回答说，“意大利宪法没有授予任何人剥夺他人私有产业的权力”。8月2日，他在议会接受议员们的质询时，表态说：“企业经营自由不能碰”，“工作自由不能碰”。言下之意，他既不打算辞职，也不打算放弃大股东的身份，他的用意只想“冻结”股东的身份。他还威胁反对派议员们说，“本届政府是选民直接授权的，要么继续维护下去，要么提前大选，没有别的选择”。

由于贝卢斯科尼的双重身份并不违反宪法以及其它法律，既然各党派不打算马上提前大选，也只好由贝卢斯科尼继续担任总理。这样，贝卢斯科尼又躲过了这场信任危机。

同贝卢斯科尼较上劲的米兰检察院，仍然不甘示弱。米兰总检察长博雷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意味深长地透露，米兰检察院反腐败行动小组的调查工作将涉及一些高级别的政治人物，其中不排除对总理贝卢斯科尼进行审查。10月2日，博雷利宣布将调查意大利泰莱皮乌电视台的帐目。

泰莱皮乌电视台是一家收费电视台，后来被贝卢斯科尼的菲宁韦斯特集团买下。政府“马米法”实施后，菲宁韦斯特集团只能保留10%的股份，其余股份卖给了贝卢斯科尼的9位朋友。在米兰检察院的调查中，金融家、泰莱皮乌公司原股东之一路韦吉·克利克交代说，他本人和其余8人对电视业毫无兴趣，只是贝卢斯科尼对他说，等到泰莱皮乌公司的资本扩大后，他可以将股份退还，也可以继续保留股份。1991年泰莱皮乌公司的资本增加到1500亿里拉（原来只有100亿里拉）时，克利克等人出售了股份。新进入公司的股东有一家德国电视与出版公司，一家卢森堡国际电讯公司。克利克说：“国际电讯公司和另一家公司的背后是谁，我不知道，我一直是同贝卢斯科尼的集团洽谈的。”1994年4月28日被捕入狱的税务警察纳诺基奥交代说，在审查泰莱皮乌公司股份时，他曾收到2500万里拉（约15万美元）的贿赂。经调查，卢森堡国际电讯公司拥有泰莱皮乌公司的25%的股份，后来南非一家公司想购买国际电讯公司的股份，但出面谈判的却是贝卢斯科尼及其全权代表奥利弗·诺维克。这样，米兰检察官就怀疑贝卢斯科尼实际上控制的泰莱皮乌公司的股份超过10%的限额，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的“马米法”。米兰检察院调查的另一条理由是，根据举报，菲宁韦斯特集团违背了广播电视法的有关规定，强迫泰莱皮乌电视台大肆宣传贝卢斯科尼所创造的“成绩”，为其涂脂抹粉、歌功颂德。

米兰检察院的决定首先在意大利司法界引起风波。司法部长比翁迪对博雷利在事先未通报政府的情况下把调查泰莱皮乌电视台一事透露给新闻界表示不满，他认为这将损害贝卢斯科尼总理及政府的威信，他要求博雷利撤回决定。博雷利自然不吃这一套，他明确表示，米兰检察院是在行使法律职权，“不是针对总理贝卢斯科尼的。”

10月5日，比翁迪以司法部不能正常行使权力为由提出辞职。总理贝卢斯科尼坚决不同意比翁迪辞职，并于当天下午在罗马指责米兰检察院“滥用法律的权力”；同时，他召集政府内阁会议商讨稳定政局的良策，并促使斯卡尔法罗总统出面“劝说”比翁迪改变主意。当天晚上，见好就收的比翁迪收回了辞呈。

在内阁暂时稳住阵脚后，贝卢斯科尼开始对米兰检察院实施反击。10月6日，意大利政府发言人费拉拉在罗马对记者宣布，博雷利的目的是为了推翻目前的合法政府，政府为此已向全国最高司法委员会控告博雷利“出于政

治目的滥用司法权力，阻碍政府的一些合法行动”。费拉拉甚至还请出因行贿政府官员被从重判处8年有期徒刑的大银行家库萨尼帮忙，库萨尼向罗马法院控告米兰检察院大检察官迪彼得罗滥用法律权力，对他量刑过重，并在审查过程中侮辱他。由总统直接领导的最高司法委员会经审议决定搁置此项控告案。10月19日，司法部长比翁迪又向米兰检察院派出监察官，对米兰检察院在司法调查中“可能的违章行为”进行审查，迪彼得罗被讯问达6个小时。

1994年10月28日，迪彼得罗以向政党非法提供经费的罪名起诉贝卢斯科尼总理的弟弟保罗，要求判处他5个月监禁和罚款620美元。保罗在这项起诉中被指控在80年代末承建乌博尔多公共垃圾站期间，曾向当地的一名天民党人提供了9.4万美元资金。

1994年11月22日，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贝卢斯科尼正在主持为期三天的打击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活动世界部长级会议。面对来自138个国家的代表，贝卢斯科尼大声疾呼，必须坚决对付跨国犯罪活动，必须斩断伸向全球的犯罪魔爪，决不容许犯罪集团腐蚀政界领导人。

然而，就在此时此地，米兰检察院向贝卢斯科尼发出了传讯通知。通知指出他事实上仍然掌握着菲宁韦斯特集团的活动，涉嫌向税警行贿，要求他亲自到法庭接受讯问。

当天的米兰《晚邮报》以醒目标题在头版刊登了贝卢斯科尼涉嫌两起贿赂税务警察事件的详细内幕。第一桩是在1991年下半年，税务警察在检查菲宁韦斯特集团下属的蒙达多里出版社税务情况时，该集团向税务将军朱塞佩·切尔切洛等4名财务警官行贿1.3亿里拉（约合8万美元）。第二桩是在1992年春天，税警中校朱塞佩·莫拉比托等人在检查梅迪奥拉努维塔保险公司的税务情况时，得到了1亿里拉的贿赂。1994年7月夏夏和保罗被捕后，均向司法当局交待了行贿事实，并承担了责任。但是，检察官们还是怀疑身为老板的贝卢斯科尼当年也卷入其中。

在接到米兰检察院的通知后，又羞又怒的贝卢斯科尼当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毫不含糊地说：“我没有贿赂过任何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拿我的孩子们的脑袋担保，决没做这种事。”他还说：“我的公司不是犯了行贿罪，而是遭到了税务警察的勒索。”“这一消息在不恰当的时候披露，是有人存心要我难堪。”他还强调说，决不允许以诽谤方式滥用司法权力扼杀民主的首要原则。

就在米兰检察院发出的传讯通知尚未见落实之际，罗马检察院又挤进来凑热闹，找贝卢斯科尼的毛病。11月24日傍晚，罗马检察院在发表的一份公告中宣布，根据几位国家电视台前领导人的举报，贝卢斯科尼就任总理不久，曾为他自己的私人电视台与国家电视台“瓜分广告市场”而向他们施加压力，并企图损害国家利益，从而涉嫌违反了“反托拉斯法规”。这对贝卢斯科尼来说，又是一个泥潭。

“重建共产党”等在野党发表声明说，尽管接受调查并不意味着犯罪，但作为政府总理，贝卢斯科尼公私不分，应该立即辞职。

但是，贝卢斯科尼表示，“我的职务是在群众投票赞成的基础上由国家元首和议会的信任而授予的，除非议会投票对政府表示不信任，我决不辞职。”贝卢斯科尼要求对参加联合政府的联盟重新进行考察，从而抵挡住要他辞职的压力并恢复信任。在执政党议员的直接发起和组织下，全国各大城

市先后举行支持贝卢斯科尼及其政府的大型民众集会，其矛头直接指向反对党和米兰检察院等司法机构，著名检察官迪彼得罗首当其冲。

在这种势不两立的形势下，迪彼得罗“感到自己为维护法律而进行的正常工作受到政界各派的利用和牵制”，于12月6日含愤宣布辞去其检察官职务并永远离开司法界。消息传出后，米兰、罗马、那不勒斯等城市的群众涌向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对迪彼得罗表示支持，要求迪彼得罗不要辞职。斯卡尔法罗总统也极力要求迪彼得罗收回辞呈。

12月13日，贝卢斯科尼乘坐灰色奔驰防弹车穿过由300名警察和宪兵组成的警戒线，来到米兰检察院接受讯问。由于原来主持调查这一行贿案的迪彼得罗辞职，总检察长博雷利亲自带领两位检察官对贝卢斯科尼进行讯问。在7个多小时的当面调查过程中，有2个小时用于双方问答，其余时间用于对讯问记录逐字逐句的核对检查。

此时的意大利政局出现了极其微妙而复杂的变化。为应付不测局面，总统与参众两院议长、前总统（科西加）以及其他人士进行了“必要的协商”，这引起了政府一些部长的强烈不满。他们严厉地指出，任何另组政府多数的图谋都是旨在取消今年3月大选的结果，都是为了恢复旧体制和背叛民意，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众议院议长皮韦蒂和总统斯卡尔法罗成为攻击的对象。政府部长兼政府发言人费拉拉频频攻击总统“同法官和反对党共同策划推翻政府”。作为政府发言人如此“诋毁”总统，在整个西欧都是没有先例的。

面对忠于总理的部长们的攻击，年轻的女议长皮韦蒂坚决反击：“另组政府多数也是完全合法的，因为3月份的大选是选举议会而不是选举政府。相反，不履行大选时的诺言才是对选民的真正背叛。”斯卡尔法罗以其宪法最高保障者之尊虽未参与政治辩论，但他坚决要求贝卢斯科尼就其政府成员不断攻击国家元首的行为公开道歉，否则将拒绝同他会见。而贝卢斯科尼则不理睬总统的这一套，“你不同我见面没关系，但工作上对国家造成损失我自然也就没有责任，这个责任你是责无旁贷的。”

到了12月16日晚上，贝卢斯科尼顶不住了，他觉得这么同总统耍小孩子脾气于挽回政治局面无益，只好硬着头皮致函总统表示道歉。12月17日，一直关注着这一事态发展的罗马检察院立即就费拉拉“诋毁国家元首”立案调查。与此同时，北方联盟领导人博西改弦易辙，与人民党和左翼民主党两个在野党领导人磋商后宣布，三党将于近日向议会提出对政府不信任案。博西声称，要把贝卢斯科尼赶下台去，把全国联盟永远逐出政府。

12月19日下午，北方联盟及左翼民主党、人民党两个在野党，以贝卢斯科尼总理“涉嫌卷入其私人公司菲宁韦斯特集团对政府税务官的数起行贿案”为由，向议会正式提出对贝卢斯科尼总理的不信任案。当晚，不甘坐以待毙的贝卢斯科尼全力相搏，他通过各大公、私电视台向全国发表讲话，鼓动民众举行“自由大进军”，反击“背叛民意”和“复辟旧体制的阴谋”，捍卫“新的共和国”。他所领导的力量党还在米兰举行集会和游行，焚烧北方联盟的旗帜。贝卢斯科尼的鼓动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政治空气骤趋紧张。反对党谴责贝卢斯科尼在搞“内战的总演习”，国防部长普雷维蒂只好出面否认军队将要政变的传闻。

1994年12月21日，这场政治角逐在意大利议会大厅展开。贝卢斯科尼在议会开始对他进行不信任辩论前作了25分钟发言，进一步指责博西等提出不信任案是损害选民的骗局，称博西是“叛逆”，他摊牌说：“如果执掌权

力的大多数人出现分裂的话，我们就必须果断地、平静地回到选民那里去，倾听他们的意见。我确信这是迫不得已的一步，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博西则反唇相讥，称他的党撤回对贝卢斯科尼的支持，是因为联合政府中某些政客与不法商人涉嫌行贿受贿等腐败丑闻。他宣布5名北方联盟成员退出内阁。

斯卡尔法罗总统当天说，“由于意大利实行的是代表制，而不是直接的民主制，人民的意愿是通过议会表达的”，根据意大利宪法，只有总统才有权解散议会、宣布大选。斯卡尔法罗这个讲话表明，他不同意重开大选，而赞成成立过渡政府、任命临时总理。

1994年12月22日，已经失去议会多数支持的贝卢斯科尼主持召开了第53届内阁的最后一次会议，向内阁成员宣布了立即辞职的决定。内阁会议散会后，贝卢斯科尼匆匆赶往总统府奎里纳尔宫，向抛弃了他的斯卡尔法罗总统递交了政府的辞呈。

就在贝卢斯科尼宣布辞职的当天，米兰法院以行贿罪判处保罗7个月的监禁和1000万里拉的罚款。米兰检察院宣布，“有关菲宁韦斯特集团贿赂案仍在调查中”。

1995年1月13日，斯卡尔法罗总统授权原贝卢斯科尼政府中的国库部长兰贝托·迪尼负责组建新政府。贝卢斯科尼“东山再起”的美梦暂时破灭了。

1995年5月20日，米兰检察院正式要求审判贝卢斯科尼，米兰检察院是在对此案进行了近半年的调查后最后做出这一决定的。贝卢斯科尼被指控犯有贿赂罪和伙同贿赂罪。据有关人士交待和法官调查，菲宁韦斯特集团下属的四家公司共向财政警察行贿3亿多里拉，米兰检察官认为此事与贝卢斯科尼有关。贝卢斯科尼则指责这一指控没有证据，因为长期以来的调查并没有发现能证明他有罪的证人和材料。他还指出，他领导的菲宁韦斯特集团下属企业负责人非但没有向财政警察行贿，而且是“典型的被勒索事件”的受害者。

1995年7月2日，原法官迪彼得罗因被指控“营私舞弊”和“滥用职权”被布雷西亚地方检察院传讯，谈话调查时间长达8个半小时。据报道，这次谈话调查也是应迪彼得罗本人要求而进行的。因造假帐目和贪污而被判刑的米兰“马亚”保险公司原董事长戈里尼指控迪彼得罗拖欠公司巨额债款不还和滥用职权。布雷西亚地方检察官正就此案进行调查。

1995年11月12日，米兰法院宣布，贝卢斯科尼涉嫌行贿案将于1996年1月17日在米兰法庭审理。

1996年1月17日，米兰法院第七刑事审判庭开庭审理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涉嫌行贿案，贝卢斯科尼在律师陪同下出庭受审。

贝卢斯科尼及其胞弟保罗等11人被指控向负责检查菲宁韦斯特集团纳税情况的财政警察行贿3.8亿里拉（合23.7万美元）。但保罗等6人这次没有出庭。贝卢斯科尼在法庭上否认了对他的指控，并称这是米兰检察院对他进行的“政治迫害”。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开庭审理距离即将举行的意大利战后第13届议会选举仅有3个月余的时间。作为意大利力量党领袖的贝卢斯科尼成为被告，对意大利力量党在新一届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不能说没有影响。

1996年4月21日，意大利举行了战后第13届议会选举。4月22日中午，

议会选举结果揭晓。

据意大利内政部公布的投票结果，在参议院的 315 个议席中，以左翼民主党为骨干的中左联盟获得了 167 席，以意大利力量党为骨干的中右联盟得到 116 席，北方联盟获 27 席。在众议院的 630 个议席中，中左联盟得 319 席，中右联盟只有 246 席，北方联盟为 59 席。左翼民主党以 21.1% 的选票成为意大利政坛的第一大政党，意大利力量党以 20.6% 的选票名列第二。新一届政府将由中左联盟的候选人罗马诺·普罗迪出任总理并组阁。

就现有情况来看，贝卢斯科尼是否被法庭定罪，是否还会东山再起，都无法过早地下结论。历史就是这样，过程就是一切，最终结局是微不足道的。



## 震动墨西哥的政治谋杀案

1994年3月，革命制度党的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遇刺身亡。1994年9月，革命制度党的总书记弗朗西斯科被谋杀。围绕这两起政治谋杀案，墨西哥前总统与新任总统之间展开了一场执法较量。

卡洛斯·萨利纳斯，1948年4月3日生于墨西哥城，其父1982—1988年任联邦参议员。早年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学习，1969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长期在财政和公共信贷部工作，历任分析员、处长、局长。70年代在美国哈佛大学先后获公共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1979—1982年任计划和预算部社会经济政策司司长，1982—1987年任该部部长，多次代表政府参加有关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国际会议，是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总统(任期为1982年12月至1988年11月)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1987年10月被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墨西哥长期连续执政的政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1988年7月当选总统，同年12月就任。1994年12月1日，因6年总统任期届满下台。他下台后，革命制度党领导人塞迪略任墨西哥总统。上述两起政治谋杀案正好发生在卡洛斯总统的任期内。

在卡洛斯任总统时期，对这两起谋杀案的调查进展都很慢，科洛西奥一案中只有一名枪手被逮捕。人们认为调查进度之所以如此缓慢不但是个腐败问题，而且还说明了这两起谋杀很可能同黑社会或政治集团有联系。为了早日侦破这两起谋杀案，塞迪略总统亲自挑选了反对党成员格拉西亚进入内阁担任司法部长。

这位司法部长上台后果然身手不凡，他任命的特别检察长查帕·贝扎尼拉于1995年2月24日就透露，他对这两起政治谋杀案的调查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位名叫瓦奎兹的革命制度党的司机兼保镖被逮捕，据称他就是1994年3月杀害科洛西奥的第二名枪手。此人的被捕使人们对卡洛斯总统当初断定刺杀科洛西奥是一人所为的结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当时，卡洛斯的调查组断定杀死科洛西奥的是一位名叫马特尼的“单一杀手”，此人当场被抓住，随后被判刑45年。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令前总统卡洛斯更加愤怒的事。

1995年2月28日上午，前总统卡洛斯正在墨西哥城自己家中看电视，他的管家前来通报，说现总统塞迪略的特派专使登门拜访。由于前来拜坊的人没有按惯例事先约定时间，因此卡洛斯对总统专使的来访感到不妙。但出于礼节，他还是让这位专使进来了。来客随身带来许多文件、磁带和录像带，他声称这些都是最近查获的有关谋杀弗朗西斯科的证据。开始时，卡洛斯还显得很高兴，因为这起在他任期内发生的政治谋杀案毕竟有了重大进展和突破，可是当他听到现政府派人去逮捕的重大嫌疑犯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哥哥劳尔·萨利纳斯时，他的脸色陡然变了。向来涵养功夫极好的这位前总统发起了脾气，他当众咆哮起来，随后拿起电话找现总统塞迪略，但塞迪略没有接他的电话。卡洛斯又拨了一连串电话号码找其他人打听，有几名官员回了电话，可是他们级别太低帮不上忙。最后，卡洛斯只能孤注一掷，派出他自己的警卫去营救他的哥哥劳尔。当然，卡洛斯此举无济于事，他的警卫在半道上就被联邦警方拦了下来，因为国防部长通过对讲机下令不准卡洛斯的警卫干预此事。

事实上，如果卡洛斯的警卫真的到达那里的话，也解决不了问题。30多

名联邦警察已将劳尔的藏身处团团围住，在相持到下午 2 时 30 分时，48 岁的劳尔眼看大势已去，只能放弃抵抗，束手就擒。随后，他就被联邦警察押往距首都 65 公里的阿尔莫洛亚监狱。

前总统卡洛斯得知他的哥哥劳尔被押往监狱后，在电话里对塞迪略总统绝望地狂吼到：“你不能这样做！”他本来还指望他的继承人塞迪略会出面保护他及其家人，没想到塞迪略总统此次明确表态：“从现在起，无论你、我、还是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不准凌驾于法律之上！”

1995 年 3 月上旬，特别检察长贝扎尼拉当着诸位记者的面宣读了一份长达 11 页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着重谈的不是科洛西奥被杀事件，而是弗朗西斯科被杀事件。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前总统哥哥劳尔同谋杀弗朗西斯科有直接关系；这场谋杀阴谋始于 1994 年初，当时两名杀手得到预付酬金 8.8 万美元；谋杀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没有成功，第二次成功了；弗朗西斯科在墨西哥城市中心的一家餐馆用完早餐出来时，遭到了一个名叫特拉维诺的枪手的袭击，当场送命；这场阴谋的幕后策划者，是前总统的哥哥劳尔和一名叫罗查的政客。

据检察长说，罗查是劳尔杀害弗朗西斯科的同谋，他是来自塔毛利帕斯州的立法议员，他同劳尔的关系一直可以追溯到大学时代；自从在 1994 年底被怀疑为组织谋杀事件的嫌疑犯以后，罗查就失踪了。检察官指责劳尔曾给了罗查 10 万美元，要他物色杀手完成任务，罗查最后就找到了牧场工人特拉维诺充当杀手。罗查至今下落不明，有人认为他已死亡。他参与上述谋杀事件的动机是政治性的，因为他曾告诉过他的同僚们，说弗朗西斯科成了他通往州长职位的“绊脚石”。贝扎尼拉检察长说，据查，劳尔和罗查的关系“非常密切”，他还向记者们出示了电话记录和其他由证人签署的文件来证明这两个人在谋杀弗朗西斯科的前后有“不断的、谨慎的接触”；罗查在谋杀事件发生后曾打过两次电话，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劳尔的；在最后出逃前，罗查曾告诉过他的秘书，说是劳尔资助了这一谋杀事件，并且是劳尔下达的命令。

那么，劳尔谋杀弗朗西斯科的动机是什么呢？

弗朗西斯科原来是劳尔兄弟的妹夫，劳尔还是他们第一个孩子的教父。不过，弗朗西斯科与劳尔兄弟的妹妹艾德丽纳·萨利纳斯在 70 年代就已离婚。

据劳尔的一些朋友和政府官员们分析，劳尔策划谋杀弗朗西斯科的根本动机也许是个人的，而非政治性的。例如，或许他无法谅解弗朗西斯科同他妹妹的离婚，或许本该从政的劳尔对于自己长期一直生活在卡洛斯和弗朗西斯科的“阴影”下深感不满。据调查，弗朗西斯科生前曾公开对劳尔表示过极大的蔑视。

弗朗西斯科自从上大学以来，就一直是前总统卡洛斯的朋友。据熟悉他们的人说，自从弗朗西斯科娶了卡洛斯、劳尔的妹妹艾德丽纳以后，弗朗西斯科同劳尔的关系就日益恶化。在卡洛斯任总统期间，外界传说劳尔在 1982 年至 1986 年担任政府食品补贴负责人期间就开始从事“见不得人的交易”；据执政党内许多高级官员反映，劳尔利用他的职位以低价进口了大量食糖、奶粉和肉类，转手以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卡洛斯总统对此事很关心，为了避免丑闻的发生，他将劳尔送往圣地亚哥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当访问学者。到 90 年代，弗朗西斯科和劳尔完全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头，劳尔在私下还

指责当时担任南方格雷罗州州长的弗朗西斯科“一再阻挠”他的各种各样交易。在劳尔被捕前后，《墨西哥城》报曾报道说，劳尔同一个名为“海湾卡特尔”的毒品集团达成了种种交易。弗朗西斯科尽管同劳尔关系不好，但是同卡洛斯总统的关系却一直非常密切。据劳尔的亲信透露，劳尔对于弗朗西斯科官运亨通十分恼怒。

就在杀害科洛西奥的第二名枪手瓦奎兹和杀害弗朗西斯科的牧场工人特拉维诺被逮捕后，革命制度党的一些议员对前总统卡洛斯在1994年是否曾阻挠这两个案子的侦破提出了疑问。

特别检察长贝扎尼拉在1995年3月上旬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司法部前副部长马里奥很可能故意掩盖了劳尔在谋杀弗朗西斯科一案中的作用。对此，作为弗朗西斯科亲兄弟的马里奥感到极大的愤慨，并予以坚决否认。

然而，就在马里奥作出上述否定两天后，他在纽约机场被扣押，理由是他没有申报随身携带的4.6万美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一理由显然只是扣押他的借口。

在卡洛斯总统执政期内，马里奥任司法部副部长。1994年9月28日他亲兄弟弗朗西斯科被杀后，卡洛斯总统就任命他来负责调查此案。按理说，失去亲兄弟的悲愤之情足以使马里奥将案情查个水落石出，将真正的凶手逮捕法办。然而，马里奥并没有一查到底。

马里奥在调查开始时的工作是很不错的，曾得到了媒介的一致赞扬。当时人们还传说谋杀弗朗西斯科实际上是对马里奥发出的警告，因为他最近一直在扫荡墨西哥北方地区的毒品集团，据说还逮捕了北方毒品集团的5名领导人，正因为有如此坚定的扫毒态度，卡洛斯总统才放心地任命他来调查弗朗西斯科谋杀案。人们当时或许还指望他能从毒品集团中找到杀害他亲兄弟的凶手。然而，就在调查进行了不到3个月时，马里奥突然在1994年11月23日宣布不干了，他的主要理由就是在革命制度党内有“两名高级官员伙同他的上司——司法部长”一起在阻挠他调查此案。而后，他又宣布辞去司法部副部长的职务。

马里奥的甩手不干无疑使人们惊愕不已，贝扎尼拉被任命为特别检察长以后，终于揭开了其中的秘密。

原来，就在马里奥还在担任司法部副部长时，他就同墨西哥毒品集团有了秘密来往，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商业银行及美国的其他一些银行里都有他的秘密帐号，他的收受贿金的代理人就是他在司法部办公室的亲信斯特杰奥斯，此人目前已逃亡，下落不明。美国《洛杉矶时报》曾引用墨西哥官员的话透露道，马里奥在台上时曾亲自策划指挥了一场“特许”行动，这一行动的服务对象就是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他允许由毒品集团头目来指定他们所信赖的人来担任各级执法部门的官员，这种“任命”的目的不言自明。鉴于这种“任命”的重要性，毒品集团向马里奥支付了大笔酬金。正因为自己罪恶深重，马里奥在弗朗西斯科一案中不得不对劳尔网开一面，尽力掩饰劳尔在谋杀案中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相互包庇，谁也不要揭对方的老底。

但是，他的老底还是被揭了出来。1995年3月2日，墨西哥有关当局找到马里奥谈了整整7个小时，要他讲清楚他是“如何掩盖劳尔的罪行的”，并要他交代自己的问题。

见势不妙，马里奥决定逃往海外。他第一站是飞到了休斯顿，用化名住进一家饭店，而后从得克萨斯州商业银行提出大笔现金，并用这笔钱为他的

妻子和女儿支付了飞往马德里和蒙特里尔的机票费用。然而就在他登上纽约飞往马德里的航班之际，对他的行动一直予以秘密监视的美国海关警察就以“非法携带大量未申报的现金”为借口拘留了他。

墨西哥检察人员说，让马里奥外逃是事先制定的方案，旨在查清马里奥在海外银行的秘密帐号。马里奥不知是计，以为可以一走了之。

据负责此案的墨西哥政府官员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透露，在美国海关总署的帮助下，已初步查获马里奥在美国银行里的 930 万美元，他们估计马里奥存在美国银行里的钱至少有 2000 万美元。墨西哥调查人员还在墨西哥银行帐号上查获 300 万美元，他们怀疑可能还有更多的钱已经被转存欧洲某些银行里。这些钱，据说都是同毒品集团有关的钱。

据一些墨西哥官员猜测，马里奥大概是 1994 年 2 月开始同毒品集团挂上钩的，当时卡洛斯总统还曾考虑提名他来任司法部长，之所以没有提成是因为他刚从丹麦卸任回来。按法律规定，须连续在墨西哥居住 12 个月以上的人才有被任命司法部长的资格，因此卡洛斯只能“委屈”他当了个副部长。马里奥对卡洛斯的重用自然感恩戴德，因此有人说正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当 1994 年的谋杀调查开始逼近劳尔时，卡洛斯曾暗示马里奥“别再查了”，于是就有了马里奥辞职而去的这一幕。但前总统卡洛斯对这一说法坚决否认。

据悉，有些观察家们坚信 1994 年墨西哥发生的两起谋杀事件是有必然的内在联系的，这是执政党的一个极为复杂的阴谋，其目的就是为了“阻挠墨西哥在国家一级水平上的进一步改革”。人们希望塞迪略总统能“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将此案查到底。民意测验表明，在前总统的哥哥劳尔被逮捕后，民众对塞迪略的支持率猛升至 68%。

1995 年 11 月 15 日，劳尔的妻子保琳娜及其兄弟安东尼奥因企图在日内瓦用假证件从银行提取 8300 多万美元存款而被瑞士警方逮捕。据报道，这笔巨款可能与贩毒和洗钱有关，或是劳尔 1982 年至 1992 年任政府官员期间贪污的公款。据查，劳尔在国内外还有多笔存款和多处房产。他的这些财产与他的收入不符，涉嫌非法致富。而这都与当时任总统的卡洛斯有牵连。

1995 年 12 月 2 日，墨西哥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决定，将把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及其哥哥劳尔·萨利纳斯清除出党。此时，前总统卡洛斯正在国外。

## 委内瑞拉总统贪污案纪实

1993年5月20日，委内瑞拉总统安德烈斯·佩雷斯，因涉嫌贪污公款600万美元，被迫辞去总统职务。1994年5月18日，委内瑞拉司法部门确证佩雷斯挪用、贪污公款，犯有腐败罪，将佩雷斯押往埃尔·洪基图监狱。与佩雷斯一同坐牢的有前内政部长伊萨吉雷和前总统府部长菲格雷多。

安德烈斯·佩雷斯，1922年10月22日生于委内瑞拉塔奇拉州鲁比奥镇一个商人兼种植园主家庭。14岁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在塔奇拉州参加国家民主党（民主行动党的前身）。曾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攻读法律，后去哥伦比亚波哥大自由大学及哥斯达黎加大学学习。1941年转入民主行动党，并当选为该党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1948年任民主行动党主席贝坦科尔特的私人秘书。1948年11月希门尼斯策动政变上台后，他在马拉凯市成立一个反对希门尼斯政权的抵抗政府，后被捕入狱，不久被流放到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流亡期间，曾任民主行动党国外指挥部成员，从事反对希门尼斯独裁政权的斗争。1958年1月希门尼斯政权被推翻后回国。1960年任内政部副部长。1962—1963年任内政部部长。1963年8月任民主行动党执委会委员。1968—1972年任民主行动党的总书记。

1973年12月，佩雷斯作为民主行动党候选人参加委内瑞拉总统竞选。竞选获胜后，佩雷斯出任委内瑞拉第四届总统，任期为1974年3月至1979年3月。

在5年的总统任期内，佩雷斯奉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对外政策，维护国家的独立、完整和民主，在经济发展上推行国有化和拉美一体化，一度成为拉美国家乃至第三世界的著名领导人。由于佩雷斯对国家的经济支柱石油产业实行了国有化管理，并推行了多项经济发展计划，使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当时，国际上石油价格节节上升，委内瑞拉是世界上第五大石油生产国，大量的石油出口使委内瑞拉成为拉美地区的首富。

佩雷斯当政时期，为发展国民经济，曾大批起用新人，许多专家得到重用，被安排在政府内阁部长的显要位置上。因为这一点，遭到民主行动党元老派的强烈反对。不得已，他解除了非民主行动党成员、外交部长埃斯科瓦尔等人的职务。紧接着，他被指控在委内瑞拉购买雪山号冷冻船一事上，有严重的贪污行为，法院专门组织进行了对他的全面调查。在社会各界特别是执政的民主行动党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任期届满后下台。按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届满后成为终身参议员。

依照委内瑞拉宪法规定，总统卸任10年以后方能参加下任总统竞选。佩雷斯作为民主行动党的领袖人物，不甘心只任一届总统职务，决意要东山再起。果不其然，10年后，他再次赢得国民的信任，竞选成功，重新登上总统的宝座。

1989年2月2日，佩雷斯宣誓就任委内瑞拉第七届总统。

80年代末期，拉美的多数国家面对经济和债务等方面的危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动下，纷纷进行经济上的调整与改革，实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委内瑞拉也由于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收入逐渐减少。前两届政府对外借款330亿美元，使得委内瑞拉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佩雷斯再次当选总统时，面对的却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人民日益不满的情绪，政局一

直动荡不安。1989年2月27日，首都加拉加斯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引发了一场骚乱，冲突中有250人死亡，1800人受伤，上百家商店被抢劫。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决意改变现状的佩雷斯，上任之初便匆匆忙忙实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比如统一兑换率、利率自由浮动、放开物价、降低关税、国营企业私有化等。但是，这些政策措施给人们带来的不是更多的好处，反而是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因此，引起人民群众越来越强烈的不满。1992年，还发生了两次未遂军事政变，这种局面，对执政的民主行动党极为不利。结果，在1992年年底的地方选举中，民主行动党纷纷败北，在全国22个州长中只占有4个席位。

国内的混乱以及民主行动党的惨败，使群众渐渐地丧失了对佩雷斯为首的民主行动党的信任和支持，要求缩短总统任期、让佩雷斯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最终招致佩雷斯总统垮台的，还是他本人涉嫌贪污公款的丑闻。

1989年2月，佩雷斯刚刚上台，内阁会议批准一项2.5亿玻利瓦尔（委内瑞拉货币）秘密经费拨款，用于国家安全。这笔款项归内政部管理。

拨款批准后，佩雷斯伙同中央银行行长、内政部长等人，以14.8玻利瓦尔兑换1美元的比价（当时的官方比价是43玻利瓦尔兑换1美元）把2.5亿玻利瓦尔兑换成1700万美元，而后又以市场价把这笔美元换成玻利瓦尔，从中获利0.86亿玻利瓦尔（约合600万美元）。不久，佩雷斯又动用10.9亿玻利瓦尔，向委内瑞拉劳工银行支付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债务。由于这些活动仅有几个部长级的人物参与，因此在佩雷斯执政前3年，相安无事。1992年8月26日凌晨，加拉加斯第21刑事法庭发出逮捕令，要求国防部立即将与“图尔皮亚尔”计划贿赂案有牵连的一批高级将领捉拿归案。该法庭的决定引起了委内瑞拉权力中心的震动。普通老百姓拍手称快，认为司法部门整治贪污腐败开始动真格的了。

被司法部门通缉的海军中将、武装部队高等研究所所长莫里纳，前海军司令阿尔赫尼斯中将，前武装部队审计长加西亚中将，前国防顾问阿庞特中将，陆军少将洛佩斯，海军上校帕拉，他们被指控在“图尔皮亚尔”计划中接受了商人的贿赂，因而犯了盗用国家公款罪。

“图尔皮亚尔”计划，是海军一项改善通讯的工程，它包括在海军舰艇上安装通讯系统。这项工程需要投资2700万美元。由于上述军官和军火商的私下交易，致使货款交出后许多设备迟迟未到，给国防建设带来了损失。

这一事件败露后，军事法庭曾传讯并逮捕了一些与本案有牵连的中下级海军军官，其中包括数名校级军官。随着案情的深入，军事法庭认为，此案已属刑法范围，于是把它移交给加拉加斯第21刑事法庭审理。在加拉加斯第21刑事法庭发出逮捕令后，“捍卫公共财产最高法庭”宣布，此案涉及到国家高级官员，应由他们来审理，有关档案要送到该法庭审阅，然后决定如何处理。

由于捍卫公共财产最高法庭的插手，这一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更奥妙的是，佩雷斯总统在第21刑事法庭发出逮捕令的当天说，下令逮捕武装部队的6名军官并不意味着这6名与所谓的贪污案有牵连的军人有罪。他还说，法院仍在调查之中，必须等待调查结果以确定上述军人是否有罪。

尽管发出逮捕令的法官杜兰有证据证明，有人在为海军购买先进的通讯器材时盗用了公款，接受了800万美元的贿赂，但总统却为之开脱，这引起

了人们的非议。而直接提供设备对贿赂负有责任的企业家洛韦拉，是佩雷斯的老朋友。当法院对洛韦拉发出逮捕令时，洛韦拉却逃之夭夭。

凡此种种，使人们对惩治腐败不力的总统佩雷斯产生了不信任感。

1992年11月17日，著名记者何塞发表文章透露，佩雷斯上台伊始，曾表示清腐肃贪、廉洁政治，可他在1989年2月10日就涉及低价套购美元的丑闻。国家审计总局对何塞提供的材料很感兴趣，认为佩雷斯总统在未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私自挪用资金是非法行为，随即立案审理这一案件，并把这一案件提交国会讨论。

接着，反对党又扔出另一枚“重磅炸弹”。激进事业党总书记梅纳杜和首都加拉加斯市长伊斯图里斯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控诉书，指控佩雷斯总统犯了侵吞公共财产、贪污公款、违背宪法等罪行。控诉书说，1989年佩雷斯动用10.9亿玻利瓦尔，支付不存在的所谓债务；还挪用安全专款2.5亿玻利瓦尔，以优惠汇率套购美元，从中获利。梅纳杜要求最高法院审判佩雷斯。

1993年3月9日，佩雷斯总统就此事向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说，这笔2.5亿玻利瓦尔的巨款全部用于国家的安全防务方面，没有什么违犯宪法行为；但考虑到秘密经费使用法规，他拒绝说明其中的具体情况。

最高法院在对佩雷斯一案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后，宣布因证据不足，驳回梅纳杜和伊斯图里斯对佩雷斯的指控，总统无罪，免于起诉。

捍卫公共财产最高法庭获悉梅纳杜对佩雷斯的指控后，决定调查佩雷斯总统挪用公款的问题。在调查中发现，佩雷斯为了竞选总统，花费了近1亿美元，这些钱中有一部分是朋友资助的。资助者们在佩雷斯当选总统后不仅很快收回了投资，而且他们的资金以令人惊奇的速度成倍地增长。近几年委内瑞拉已有4500万美元存入外国银行，其中数百万美元以佩雷斯及其姘妇的名义开列帐户，这些钱都是从国库中掠夺的。

1993年3月11日，委内瑞拉总检察长埃斯科瓦尔向最高法院递交了一份对佩雷斯进行审查的请求报告。

最高法院院长罗德里格斯是佩雷斯的老朋友。因此，佩雷斯在3月25日发表讲话说：“如果最高法院证实我犯有贪污罪，那我马上辞职。”佩雷斯私下接见政党议员时表示，他相信在最高法院他会击败总检察长提出的所谓盗用资金的起诉，因为他自信拥有最高法院15票中的9票。

不料，最高法院院长罗德里格斯接受总检察长埃斯科瓦尔的控告，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佩雷斯一案有立案根据和应予审理的决议草案，交由大法官表决。

1993年5月20日，最高法院召集全体会议，对是否审理佩雷斯一案进行表决。投票结果，15名大法官中9人赞成，6人弃权。于是，最高法院决定对佩雷斯总统涉嫌贪污公款案进行审判，对同案人前内政部长伊萨吉雷和总统府部长菲格雷多也予以审判。

佩雷斯获悉最高法院作出赞成审判他的决定后，于5月20日20时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1993年5月21日，参议院批准最高法院审判佩雷斯总统的申请，决定佩雷斯暂时停职，由参议院议长莱帕赫代行总统职权。在这种情况下，佩雷斯内阁成员举行会议，决定集体辞职。

1993年8月31日，国会举行投票，永久性地罢免了已经停职的佩雷斯总统。

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核实，委内瑞拉司法部门确证佩雷斯挪用公款 1700 万美元并侵吞公款，于 1994 年 5 月 18 日公开审判后，立即将佩雷斯押往监狱。

佩雷斯曾任两届高高在上的总统，因为带头腐败，终于成为一名囚犯。



## 巴西前总统科洛尔受贿案

1992年9月29日，巴西众议院通过了弹劾科洛尔总统的议案，指控他犯有渎职罪和受贿罪。科洛尔成了巴西历史上第一个被弹劾的总统。

巴西是拉丁美洲的第一大国，拥有人口1.36亿（1986年），面积851万平方公里。从历史上来说，巴西政坛风波迭起，危机不断，科洛尔也不是巴西第一个“翻船”的总统。1954年，多内莱斯·瓦加斯总统迫于反对党和军方的政变压力在卧室里开枪自杀，给后人留下了千古之谜。1961年，才就职7个月的达席尔瓦·夸德罗斯总统宣布辞职。1964年，马克斯·古拉特总统在军人政变中被推翻。巴西军政府1985年还政于民时，当选总统坦克雷多·内维斯又在就职宣誓仪式的前夕病倒，1个月后病故。内维斯病故后，副总统若泽·萨尔内接替了总统职务。科洛尔在众议院被弹劾后，离职候审，1992年12月29日被迫辞去总统职务。

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1949年8月12日出生于巴西东南部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里约热内卢。他的祖父曾是巴西东北部地区的“蔗糖王”，后来破产。他的父亲阿尔农·德梅洛在19岁那年到里约热内卢谋生，50年代发迹后不久便回到东北故乡，并创办《阿拉戈阿斯新闻报》和“新闻广播电台”及“阿尔农·德梅洛企业集团”。科洛尔在里约热内卢念完小学和中学。曾与伙伴们创办了少年报《小车》和《学生报》。科洛尔曾在阿拉戈阿斯州联邦大学新闻系和首都巴西利亚大学经济系就读，毕业后，他选择了新闻这一职业，曾出任《巴西时报》编辑。但很快他便不满足于做一个受人指使的小编辑，于是回到家乡帮助父亲管理报业，1972年任《阿拉戈阿斯新闻报》报社社长，1973年又出任“阿尔农·德梅洛企业集团”董事长。科洛尔勤奋、富有进取精神，极大地拓展了父亲的事业。

70年代的德梅洛家族在事业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拥有一家报社和三座广播电台，还创建了电视台，在当地颇有影响。当时，在军政府时期执政的“全国革新联盟”中，有一名政客与德梅洛家族达成一项君子协议，即把阿拉戈阿斯州首府马塞约市市长的职位让给科洛尔，以换取德梅洛家族控制下的新闻媒介对其同僚出任该州州长的支持。1979年，年仅30岁的科洛尔出任马塞约市市长，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这位在政坛鲜为人知的新人，虽说经验尚不丰富，但作风严谨、年富力强，且能宽以待人、做事认真负责，从而颇得人心。1982年，科洛尔作为执政党“民主社会党”的成员，当选为国会议员。

1984年，身为执政党议员的科洛尔，毅然投票支持由反对党提出的要求进行“总统直接选举”的提案。他的这一行动被同僚们痛斥为“执政党的叛徒”。1986年，科洛尔当选为阿拉戈阿斯州州长。任职伊始，他便签署法令冻结自己的工资、取消州长退休金、大幅度削减政府官员的公车、撤消因人设事的政府机构。科洛尔的“廉政”措施冲击了特权阶层，在巴西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科洛尔又进一步呈书要求联邦法院取消保护高薪阶层利益的特别法令。科洛尔一时被百姓誉为“高官厚禄的杀手”而名噪全国。

1988年，科洛尔创建了“青年党”。1989年2月，青年党又与其它三个小党合并成立“国家复兴党”，科洛尔被推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1989年的总统竞选。科洛尔为自己设计了一幅政治蓝图——1989年“象征性”地参加总统竞选，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为1990年竞选参议员铺平道路，1994

年全身心投入总统竞选，争取入主总统府“高原宫”。

当科洛尔在国家复兴党的支持下宣布参加总统竞选时，并没有引起巴西政界的重视。有人认为他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甚至说他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但是，老百姓们对科洛尔任州长期间的惊人之举仍记忆犹新。竞选伊始，科洛尔就以“穷人候选人自居”。在竞选中，他善于抓住选民的思变心理，猛烈抨击早已失信于民的萨尔内政府，许诺上台后要大刀阔斧地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的主张赢得了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普遍支持。同时，他还提出要实行“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鼓励私人投资”，“逐步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又博得了工商界的拥戴。在竞选期间，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发表了近 1500 场演说。在 1989 年 12 月的巴西第一次全民直接选举中，科洛尔力挫群雄，一举夺魁，当选为巴西总统。

1990 年 3 月 15 日，新总统科洛尔宣誓就职，任期 5 年。当时，科洛尔面对的是三位数通货膨胀和 1200 亿美元外债的国内形势。

费尔南多·科洛尔上台后，积极倡导改革，主张建立一个“新巴西”。上台伊始，他便提出了结束进口替代政策、开放经济边界、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转变、加快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等口号，大有再创“巴西经济奇迹”的勃勃雄心。

但事情并未如科洛尔想象的那样顺利，他的改革措施不仅大部分搁浅，他本人也弄得身败名裂。科洛尔犯的一个致命错误是，在时机尚未成熟之际便草草推出了他的改革方案。评论界中的“事后诸葛亮”认为，科洛尔急于求成，脱离了国情，过高地估计了国内各界的承受能力。巴西企业界亦认为，迅速开放市场意味着汽车制造、信息、水泥等行业将失去保护，结束进口替代也会使已在国内形成垄断地位的民族工业（如汽车工业）失去政府的保护伞。此外，科洛尔忽视了另一个重要国情，即巴西许多民族工业实际上是外资企业。如巴西汽车制造厂实际上是美国和德国公司的分厂。开放市场为日本、韩国汽车的涌入大开绿灯，使美欧企业面临新竞争对手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洛尔不仅得罪了民族工业，也得罪了一些早已在巴西投资的西方跨国公司。

在政治上科洛尔也势单力薄，没有坚定的同盟军。科洛尔统治的阿拉戈阿斯州是巴西东北部的一个小州，他的“国家复兴党”是一个为竞选而拼凑起来的小党，在实力上无法与操纵国会的自由民主运动党、自由阵线和社会民主党几个大党相比。

科洛尔上台后的其他几项举措也不得人心。政府的“缩编”使 36 万人丢掉了“铁饭碗”；为遏制高通货膨胀冻结存款，又使千万家储户利益受损。科洛尔很快失去民心，他的改革措施亦相继搁浅。科洛尔对内政策的成效欠佳，也加剧了科洛尔与反对党之间的对立，反对科洛尔的势力趁机借反腐败名义掀起反科洛尔浪潮。

科洛尔做上总统后，将一位名叫保罗·塞萨尔·法里亚斯的企业家“宣召进宫”，让其“理财”。法里亚斯是科洛尔的同乡，1989 年巴西大选时曾任科洛尔党选班子的财务主管，是科洛尔的心腹。

1992 年 5 月 13 日，正当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即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之际，科洛尔的胞弟、阿拉戈阿斯州颇有名气的青年企业家佩德罗·科洛尔，愤而亮出家丑，向他的哥哥发难。佩德罗在接受《阅读》杂志的采访

中，揭发了总统的密友、当今红得发紫的大富豪法里亚斯在竞选时的许多不法行为以及科洛尔入主总统府高原宫后，法里亚斯狐假虎威插手政府事务、组织“平行政府”、在总统的庇护下进行敲诈欺骗、威逼利诱、非法牟利的行为。这还不算，愤愤然的佩德罗又翻出过去的陈年老帐，揭露他的总统哥哥品行不端，曾引诱他吸毒。

佩德罗为什么火气如此之大地揭露哥哥科洛尔呢？

据说，佩德罗 1987 年发现妻子与哥哥科洛尔之间有过风流韵事，为此，佩德罗对科洛尔耿耿于怀。加之科洛尔当上总统后，高傲自大，更不把弟弟佩德罗放在眼里，在家族权力、财产分配问题上多方面排挤佩德罗，哥俩的关系终于闹僵了。科洛尔意识到这对他担任总统很不利后，为了防止了解底细的弟弟揭丑，科洛尔在 1992 年 4 月份曾派人送给弟弟 5000 万美元，让他悄悄离开巴西。然而佩德罗怎么也咽不下这口窝囊气，瞅准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前夕这个绝妙时机，向哥哥开火报复。

弟弟佩德罗的指控，一下子把风度翩翩的科洛尔总统打蒙了。一场“逼宫”的政坛风暴由此拉开了序幕。

听到消息后，科洛尔总统派出心腹助手同弟弟佩德罗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并许诺在家族权利分配中向弟弟作出让步，以求堵住佩德罗的嘴。捞到油水的佩德罗看来并不怎么知足，几天后在对新闻界发表的谈话中，虽宣布收回自己的话，说是“没有得到任何针对科洛尔的证据”，但却拒绝收回对法里亚斯的指控。面对外界的各种猜测，为了防止总统哥哥耍花招、蒙蔽世人，佩德罗还主动接受了花样繁多的心理检查，以证实自己的精神正常。

佩德罗的揭发犹如在巴西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朝野上下。

其实这次丑闻曝光只是科洛尔就任总统以来科洛尔家族成员制造的一系列丑闻事件中的又一桩。前些日子，总统的长子乘坐一架直升飞机，恣意遨游取乐，未经许可便由着自己的性子在森林保护区内着陆，结果毁坏了许多鸟窝，惹得国人纷纷嘲笑总统家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太差。一个月前，总统的内弟若阿金·马尔塔被指控用枪威胁一名反对派政治家，并因此受到法院的传讯，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一年前，总统夫人罗萨娜·科洛尔被人揭露救济金分配不当而有贪污的重大嫌疑，并从此失掉了巴西社会救济协会领导人的肥差。羞怒交加的第一夫人，把怨气通通撒在了总统身上，认为科洛尔以一国总统之尊竟保不住夫人的乌纱帽，真是窝囊透顶，差点为此与科洛尔闹离婚，好在科洛尔的好友们出面劝架，才避免了总统夫妇的婚变。

既然这次告发者是了解底细的“皇室”成员，疑团就不是那么可以轻易抹去的，而且使问题一开始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分量。况且此时的巴西正在长达两年的经济衰退中挣扎，全国上下本来就对科洛尔的国内政策不满，这次丑闻曝光对国人来说如同火上加油，因此格外引人注目。佩德罗的揭发，引起了反对派和舆论界的高度重视，国会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法里亚斯专案”。

1992 年 5 月 25 日，迫于公众舆论和反对派、国会各方面的压力，科洛尔就胞弟佩德罗·科洛尔的指控发表全国广播电视讲话，指责佩德罗对自己的指控荒唐透顶，是莫须有之事，并一再声称要对佩德罗造成的“道义伤害”提出起诉；但迫于形势，态度强硬的科洛尔不得不向反对派占多数的国会妥协，同意对法里亚斯进行全面调查。

早在科洛尔任阿拉戈阿斯州州长之前，法里亚斯就与科洛尔结为至交。

在 1989 年科洛尔竞选总统时，法里亚斯出任其竞选活动的筹款负责人。为了让科洛尔能夺得总统宝座，法里亚斯不惜呕心沥血，奔走呼号，利用种种手段筹措竞选经费，使科洛尔的财源滚滚而来，奠定了科洛尔入主高原宫的经济基础。科洛尔当上总统后，自然是投桃报李，在 1990 年 3 月 15 日宣布冻结巴西价值 500 亿美元的存款之前，为法里亚斯大开绿灯，让法里亚斯从银行提取了 22 亿克鲁扎多的现金，用于购置几处房地产。当然，科洛尔本人也没有忘记指使女秘书抢先从银行提取现金 63560 美元，用作自己花销。科洛尔虽没有给法里亚斯在政府安排一官半职作为酬谢，但按照竞选时达成的交易协议，科洛尔默许了法里亚斯在局级干部中随心所欲地安插他认为“信得过”的人。在科洛尔第一届内阁所属的局级成员中，有 40 人是法里亚斯点名指定的，其中 12 人是法里亚斯的“铁哥们”，人称“平行政府”的“12 大金刚”。他们身居政府要职，到处伸出罪恶之手，采取虚报冒领、私下交易、威逼利诱等非法手段，侵吞公款，接受贿赂，贪婪地牟取暴利。这些人还经常打着总统的旗号排斥异己，打击报复知情人和不愿为其效力的人，直至将其排挤出政府部门，巴西政府系统被搞得一团漆黑。

在科洛尔坐镇高原宫的两年间，法里亚斯横行无忌，俨然是总统的左膀右臂，经常和总统并肩携手，招摇过市。法里亚斯稳坐于高原宫外，借助现代化通讯手段，上通下达，呼风唤雨，竟然控制和掌握了国家机构和公共企业 50% 以上的资金发放。他利用政府要员手中的权力，在政府多项工程招标中以及国营企业私有化进程中，以非法手段牟取暴利、中饱私囊。法里亚斯利用科洛尔总统手中的权力，从几年前连房租、水电费都难以在当月结清的落魄小卒，一跃成为在国内外拥有 10 多家大企业的亿万富翁。

法里亚斯大发横财后，对纵容自己的科洛尔总统自然是感激涕零。他毫不吝啬地掏出大把大把的钱，把总统的家庭日常开支全部承包了。仅总统住宅的花园的翻修，法里亚斯就泰然自若地一把甩出 200 万美元的支票。总统夫人罗萨娜·科洛尔宠爱的白卷毛狗病了，第一夫人为此寝食不安，法里亚斯亲往安慰一番后，便拿出上万美元为爱犬看病，解除了第一夫人的一大心病。总统的母亲也以“皇太后”的身份心安理得地接受一份丰厚的“红利”，法里亚斯通过银行已把一笔巨额资金汇入她的个人帐户。科洛尔的两个儿子住在欧洲，这庞大的生活开支自然由法里亚斯一手全包；当两个孩子回里约热内卢看望父亲时，总统担心孩子在国内遭绑架，法里亚斯二话没说，立即调出一辆装甲轿车和一名贴身司机为孩子们保驾。除此之外，科洛尔的一些亲朋好友和与总统私交极深的政客、商人，也都从法里亚斯这里得到“关照”。

靠着总统这棵大树乘凉，法里亚斯逍遥自在地活着。而如今，这一切都在国会调查委员会和新闻界的跟踪追查之中了。为对付国会的调查，科洛尔召来自己的心腹研究对策。大家认为，既然国会抓住法里亚斯的尾巴不放，就只有让法里亚斯出面应对，供认某些无关疼痒的罪责，以掩盖危及总统的其它证据。

法里亚斯在总统府领命后，向国会调查委员会承认在掌管总统竞选资金时有错，此后在企业经营中也有逃税行为，但矢口否认其它指控。他根本不在乎国会的调查，称国会调查是逗人发笑的“马戏团表演”。看到法里亚斯如此顽抗，因不屈服法里亚斯而被削职的前巴西石油公司总裁维加怒不可遏，出面揭露法里亚斯依仗“总统后台”横行霸道，排斥异己的恶行。科洛尔看到这一招失败，于 1992 年 6 月 21 日情绪激动地再次向全国发表讲话，

否认维加的指控，并反咬一口，指责政治反对派组织“政变工会”，企图搞垮他的政府。

然而，几天后，科洛尔私人秘书安娜·阿西奥丽的汽车司机弗兰萨，向《这就是》周刊透露，他曾经用法里亚斯租来的汽车从这位财大气粗的企业家那里提款以支付科洛尔及其家人的开销。随后，报界披露法里亚斯与安娜有数百次电话联系。这是科洛尔与法里亚斯有密切来往的首项证据，从而在政府的支持者中引起了惶恐不安。一些人要求总统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有一些政界反对派人士主张国会弹劾总统，巴西利亚（巴西首都）的两家大报在头版发表社论要求总统立即辞职。科洛尔开始陷入窘境。

1992年6月30日，科洛尔为了捂住弗兰萨捅出的漏洞，再次在全国电视网露面，措词强硬地反驳弗兰萨的揭发：“我的一切私人开支均由我过去的秘书维也拉从安娜小姐管理的帐上支出，因此弗兰萨的指责是荒唐可笑的。我未曾用过法里亚斯的任何钱，维也拉可以证明我的廉洁和清白。”

调查委员会下令调阅安娜与维也拉的来往帐目，结果在安娜的帐户上没有找到任何一张维也拉签发的支票，却意外地发现了许多身份不明的人存入的巨额支票。调查委员会传唤维也拉出庭作证，对簿公堂。维也拉出示了一张1989年的借据，吱吱唔唔地说，为了科洛尔竞选总统1989年在乌拉圭贷到500万美元贷款，当时没有动用，便买成黄金，并委托一位金融糖客分批兑成巴币存入安娜掌管的帐户供总统开销用。这看起来颇能自圆其说。不料，第二天就被揭穿。圣保罗一家咨询公司（老板为科洛尔的好朋友）的一位女秘书挺身而出，揭出隐情——所谓1989年的乌拉圭借款纯属子虚乌有，只是两周前在巴西国内策划伪造出来的，她亲眼见到她所在的公司参与了这个伪造活动。调查委员会抓住这一线索紧追不舍，要求维也拉拿出借款及倒卖黄金的全部证明文件，惊慌失措的维也拉装聋作哑，始终拿不出来。据此，调查委员会认定维也拉的证据无效。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调查委员会正式聘请了美国纽约著名的调查机构克罗尔公司参与调查，详细地检查了有关人员的5万张支票和1万份银行资料、以及大量的电话帐单，发现在法里亚斯的企业与总统秘书安娜、总统夫人以及总统周围其他一些人之间，有大量的金钱在流动，总额高达数亿美元，支票上签的都是假名字，报界称之为“幽灵”。调查委员会共发现了18个假名字，经过笔迹验对等调查，证明这些假名字实际上都是法里亚斯手下的人所为。他们把约600万美元的钱，分别存入总统、总统夫人、总统母亲的帐户上。

这些证据见报以后，科洛尔表面“廉洁”的面纱被彻底撕破，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一落千丈，全国人民无比愤怒。在巴西各地大规模的抗议声中，科洛尔内阁陷入危机。总统发言人不久前还斟词酌句地为科洛尔辩解，但现在他再也不愿出卖自己的良知了，于是愤而辞官，加入了抗议者的行列。紧接着便是教育部长宣布脱离科洛尔“肮脏的内阁”。其它部长们则于1992年8月11日联名声明，他们留在政府内只是为了避免政治危机，不表明支持总统。一些支持科洛尔的议员纷纷倒戈。

在一片要求下台声中，科洛尔仍不服输，他不甘心就这么被法里亚斯一案搞垮。在一片指责声中，他仍充满信心地称自己是“绝大多数人选出的总统”，因此，他提出举行一次变相“全民公决”，要求“绝大多数保持沉默的选民”在1992年8月16日上街时身着国旗色（绿黄二色）或在窗前、车

上等处悬挂国旗，以表示对他的支持。然而，事与愿违，在 8 月 16 日这一天，全国各大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反政府集会游行。多数巴西人响应反对派号召，身着黑色的丧服，手举黑旗和写着“弹劾科洛尔”的标语牌，店主们则将黑旗挂在门前，学生们则用黑墨水涂在脸上。虽然在前一天科洛尔的好友巴西联邦储蓄银行总裁曾电令全国各分行挂国旗支持总统，并以违者“炒鱿鱼”相威胁，可到头来还是支持者寥寥无几。不少分行的头目宁肯摘掉乌纱帽，也不愿违心地支持“伪君子”科洛尔。这一结果完全出乎科洛尔总统的预料。

更加不妙的是，科洛尔的一些盟友开始改变态度，有的甚至公开加入指责科洛尔的队伍。伯南布哥州州长佛朗西斯科宣布与科洛尔决裂。圣保罗州州长弗莱乌里已着手准备在下周发动百万人大游行，要求科洛尔下台。科洛尔政府的主要支柱“巴西自由阵线党”全国领导委员会主席穆西奥公开表示投票支持弹劾总统，表示该党在这关键时刻“应站在人民一边，否则将受到人民的审判。”

强大的反对党阵营抛弃前嫌，开始联合行动。巴西民主社会党、劳工党、社会民主党等，于 1992 年 8 月 19 日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了联合会议，决定委托巴西报界联合会主席、全国最有声望的新闻斗士、现年 95 岁的索布利纽提交弹劾科洛尔总统议案，同时委托巴西律师协会着手起草弹劾议案。巴西众议院议长伊布森·皮涅罗表示，国会将尽快通过弹劾总统案。

科洛尔的总统宝座已岌岌可危。

1992 年 8 月 26 日，巴西国会调查委员会以 16 对 5 的票数通过了关于法里亚斯不法活动的调查报告。在这份厚达 360 页的文件中，数十次提到科洛尔总统的名字，报告认定科洛尔在执政的两年多时间里与法里亚斯集团有直接密切的联系，并获得不正当的收入，指控科洛尔在此案中犯有渎职罪和刑事罪。

根据巴西宪法，这项报告为每一个巴西公民创造了条件，他们可以要求国会开始弹劾程序。1992 年 9 月 1 日，巴西记者协会主席和律师协会主席向众议院正式提交了弹劾总统的议案。根据巴西宪法规定，弹劾总统议案在众议院要以 2/3 的票数通过后才能报参议院审议，参议院再通过后才能生效。

科洛尔的内阁成员看到大势已去，纷纷进谏科洛尔，劝他顺应民心，有条件地体面辞职。然而，在人生旅途上一直一帆风顺的科洛尔死不认输，不但拒绝辞职下野，而且还扬言要与反对党“血战到底”。

科洛尔没有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为保住总统宝座，他开始了最后一搏。国会调查报告公布后的 48 小时里，科洛尔充分发挥自己能言善辩的本领，又在电台和电视台做了 3 次情绪激动的辩解演说，力图“以情动人”。但民意测验表明，这些辩解已于事无补，对他表示不信任的人占 60% 以上。一计不成，又施一计。9 月 31 日晚餐时，科洛尔召集亲政府的 100 多名议员开会，亲口向他们许诺给以“特权”，保证每一个支持他的人“有光辉的政治前途”。最后，科洛尔决定动用“巴西银行”本应拨给政府各部的资金建立所谓“反弹劾基金”，给那些支持总统的议员发放“津贴”，称每位投票反对弹劾案的议员将获得 500 万美元。照此计算，要得到众议院的三分之一票数（168 票）须花费 8.4 亿美元。

尽管科洛尔以巴西银行行长和巴西经济储蓄银行行长作后盾以金钱诱惑众议员，但重赏之下却难见“勇夫”。

同时，科洛尔打算采取拖延时间的战术。因为10月3日是巴两全国市政选举日，在国内群众要求惩治腐败的浪潮中，几乎所有市长和市议员候选人都看风使舵，把“反对腐败、廉洁执政”作为竞选纲领。为了争夺选民，就连科洛尔本党（国家复兴党）的市长和市议员候选人也都抓起了反科洛尔的旗帜。在这种形势下，即使对科洛尔有好感，正在投身市长角逐的国会议员们也不得不与科洛尔划清界线，放弃对科洛尔的支持。如果把弹劾案拖到10月3日以后进行表决，将会对科洛尔相对有利。

反对派也清楚10月3日的价值，当然不给科洛尔以喘息之机，他们要穷追猛打“落水狗”。反对派不仅为争取总统弹劾议案早日表决积极活动，而且发起了争取众议员支持弹劾议案的游说和动员。与此同时，交通、银行、工业、商业四家企业家联合会加入了倒科洛尔运动，巴西三大工会组织（工人统一工会、总工会、工会力量）也号召各自的会员“向政府中的一切腐败势力宣战”。这种劳资一致的联合行动，在巴西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1992年9月18日，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近百万人在市中心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要求科洛尔总统辞职并严惩政府中的一切腐败分子。这是法里亚斯案发生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活动。全国所有的反对党领导人，一些州长、市长、议员以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冒雨参加了这次由圣保罗市政府和市众议院组织的游行集会。

1992年9月23日，巴西最高法院以8票对1票通过了一项裁决，决定9月29日公开投票表决总统弹劾案。在这之前，无可奈何的科洛尔曾要求秘密投票，但大多数法官认为应当公开投票，因为这样可以使选民了解他们的代表（议员）的投票结果。这对于科洛尔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1992年9月29日，巴西众议院开始审议总统弹劾案。经过137分钟的辩论，众议院以441票赞成、38票反对、1票弃权、23人缺席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对科洛尔的弹劾案，生来一直得志的科洛尔成了巴西历史上第一位被弹劾的总统。

众议院投票结果宣布后，议会中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聚集在议会大厦前的10万群众听到喇叭里传出表决结果后，欣喜若狂，不停地欢呼。

第二天（即9月30日），参议院接受并通过了此项弹劾议案，并任命一个由21人组成的审理委员会，负责下一步对犯有“渎职罪和间接受贿罪”的科洛尔总统进行政治审判。科洛尔虽在此项议案通过后依然坚决表示拒绝辞职，但根据这项议案他必须离职3个月听候参议院处理；在科洛尔离职期间，副总统伊塔马尔·佛朗哥代行总统职务。这样，科洛尔必须马上离开总统府高原宫。

至此，巴西的这场政治危机进入了审判科洛尔的司法程序阶段。

1992年10月2日上午，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携夫人罗萨娜·科洛尔，在群众的一片怒斥声中，乘一架直升飞机离开了高原宫，飞往自己的别墅，等待参议院的裁决。与此同时，副总统伊塔马尔·佛朗哥搬入高原宫，开始代行总统职务。

1992年12月29日上午，参议院开始对科洛尔进行最后裁决。开庭半小时后，思想上转过弯来的科洛尔意识到大势已去，于是打电话给辩护律师，抢先宣布他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

参议院在随即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宣布总统职位空缺，由副总统伊塔马尔·佛朗哥继任总统职位。经过长达20小时的会议，巴西参议院在12月30

日清晨通过了最后裁决：费尔南多·科洛尔玩忽职守、贪污受贿，剥夺其担任公职权利 8 年。

1993 年 1 月，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正式通知费尔南多·科洛尔，他将受到法庭的审判。

1993 年 4 月 28 日，巴西联邦检察院总检察长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起诉，指控科洛尔在任总统期间受贿。1993 年 6 月，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了这起轰动全国的大案。

就在科洛尔涉嫌受贿案暂告一阶段之际，巴西政坛又揭出了新的腐败案，巴西国会则成了“丑角”。

1993 年冬，前国会预算委员会主席、正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若泽·多斯桑托斯的妻子突然失踪。这位巴西上层社会著名交际花的失踪，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引起不小的轰动。多斯桑托斯报称妻子被人绑架了，但联邦警察却怀疑是多斯桑托斯本人将妻子杀害的，并以嫌疑犯将其收审。

1993 年 12 月，警方突然搜查了多斯桑托斯在巴西利亚的住所，在他家的床垫下发现了 100 万美元的现钞，同时还发现了 109 件淫秽物品和印有 170 名应召女郎的名册。在大量的物证面前，多斯桑托斯不得不交待其罪行：作为最有实权的官员之一，他在任职期间操纵公共基金，并以各种名义将之转送与他共谋的同僚；曾代表大公司的利益对已经由国会正式通过的预算案提出修正案，从中牟利；利用编制预算和分配拨款的权力，向州、市和各部门敲诈勒索。此外，他与卖淫集团为国会议员提供色情服务也有瓜葛。

多斯桑托斯的供词，涉及到包括国会议员、政府部长、州长等在内的 30 多名高官。如当年竭力支持弹劾科洛尔的众议院议长伊布森·皮涅罗，巴西利亚市市长罗里斯，佛朗哥总统民事办公厅主任阿格莱里斯，众议员若昂·阿尔维斯。其中，阿尔维斯被警方查出多年来从私人公司攫取了大量贿赂，并将 5000 万美元公款存入私人帐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3 年 12 月，联邦警察在调查一家建筑承包公司为争取公共投资项目而行贿的案件时，发现竟有 100 多名议员与此事有染。接着，辞去总统职务的科洛尔突然公开发表讲话，指责当年的竞选伙伴、他辞职以后担任总统的佛朗哥在 1989 年大选时接受“助选费”70 万美元。

此后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57% 的巴西人认为把科洛尔赶下台的国会议员同前总统科洛尔一样腐败。

巴西是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科洛尔总统和巴西国会议员严重腐败的事实表明，即使一个国家实行被人类历史证明是最可取的三权分立政体，消除腐败仍然会有一个从不很成功走向成功的过程。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还存在教育、法治等多方面的落后。

1994 年 12 月 7 日，拖了两年多的科洛尔受贿案终于在首都巴西利亚联邦最高法院开庭审判。

由于科洛尔是 1989 年选民以直接选举产生的第一位“民选总统”，又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在国会受政治弹劾下台的总统（这并不表明以前的总统并不腐败），也是第一位受联邦最高法院公开审判的国家元首，因此，此案格外引人注目。

在法庭上，总检察长代表原告一方宣读了指控科洛尔犯有受贿罪的取证材料。罪证材料说，科洛尔在任总统期间接受来路不明的现金数额高达 470



万美元。作为被告的科洛尔未出庭，仅由其辩护律师进行了辩护。12月7日的审理无果而终。

12月8日，升堂再审。经过数小时的舌战，大法官进行裁决，认定原告一方所提供的有关法里亚斯进行不法活动的电脑硬盘和电话录音，是私下秘密监视和监听获得的，侵犯了公民（法里亚斯）的基本权利，因而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当日的审判虽然未作出最后判决，但实际上已透露出科洛尔很有可能被判无罪。

果不其然，在1994年12月12日联邦最高法院法庭上，8名大法官以投票表决方式对科洛尔受贿案作出终审判决，结果以5比3判定科洛尔无罪。此案同时被起诉的法里亚斯，也被宣判无罪。科洛尔虽未被判有罪，但参议院原来作出的剥夺其8年担任公职权利的决定仍然有效。

年轻有为的科洛尔贪求权力走向腐败是可悲的，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能初步建立起制约总统的权力机制，又是可喜的。有理由相信，巴西的腐败治理会很快走向成熟。

## 震惊世界的韩国“三丰惨祸”

1995年6月29日下午6时许，位于汉城市南部瑞草区的高级购物中心——三丰百货商店，像往常一样熙熙攘攘，这时正是家庭主妇们购物的高峰时间。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灾难正向人们扑来。

三丰百货大楼突然剧烈摇晃，接着便是“轰”的一声巨响，这座地上五层、地下四层的建筑物的北半部从上到下在顷刻之间变成一堆废墟。在大楼北半部的顾客和商店职工大多被埋在废墟之中，情景惨不忍睹。

大楼倒塌后，抢救工作夜以继日地紧张进行，汉城各大医院提供最好的设施救治伤员。在抢救过程中，挖出来的绝大多数是尸体。不过，有3位年轻人在废墟下埋了10天以上，竟奇迹般地获救。其中一位名叫朴胜贤的商店职工，年龄19岁，她在废墟中没吃没喝度过了近16天的时光，整整377个小时，获救后，情况良好。这给一直被悲痛气氛笼罩着的韩国，带来不小的“惊喜”。到1995年7月17日，死亡人数已达407人，失踪259人，受伤1000人左右，其中，401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三丰百货商店倒塌事件在韩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事件的背后除了当初建设时偷工减料、违章施工以外，还隐藏着贿赂丑闻。

三丰百货大楼由三丰建筑公司承建，1987年7月动工，1989年11月竣工，1990年7月正式开始营业。整座大楼占地面积2.9万平方米，南北长200米左右。倒塌的北楼为购物区，而没倒的南楼为娱乐区。大楼外观漂亮，内部装修豪华，出售的均属中、高档商品，既有本国货，又有进口货，游泳池、健身房等娱乐设施先进、齐全。汉城的有钱人经常光顾这座现代化大楼。

三丰百货大楼所占土地原来是用于建设住宅的，大楼的地址原是一个垃圾场，但是1986年开始施工时却被批准建造商场。

1988年大楼的基本结构完成后，竟突然决定再加盖一层，结果在未加固底部的情况下，4层图纸盖出了5层大楼，使大楼的负重量大大超过了设计能力。

建筑公司在大楼施工中偷工减料严重。按设计标准，三丰大楼的支柱和楼板必须使用22至25毫米粗的钢筋，而实际使用的钢筋直径却是16至19毫米。按规定每个支柱用12根钢筋，施工时被减少到9根甚至6根。另外，大楼施工还使用不合标号的水泥、锈蚀的钢筋以及对金属构件腐蚀性很强的海沙。在大楼倒塌前塌陷的第5层地板，发现在1平方米面积内竟然没有钢筋。

三丰百货大楼倒塌后，韩国警方调查人员说，他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业主在兴建和扩建百货大楼的过程中曾拨出巨款收买政府官员，以非法修改施工方案和贿赂工程验收人员。

1994年，该商场为了扩大地下营业面积，又修改了大楼结构，也影响了大楼的承受能力。

1994年10月汉江圣水大桥事件发生后，汉城市政府曾两次部署对商店、桥梁等公用建筑进行安全检查，有关部门对三丰百货大楼检查后却两次表示“没有问题”。老百姓指责这种检查也是不负责任的走过场。

三丰百货大楼在倒塌前是有先兆的，然而没有引起公司负责人的高度重视，使千余名顾客和商店职工丧失了最后一次逃避灾难的机会。三丰百货大楼倒塌前的当天（29日）早晨，已有人举报大楼5层墙壁出现近30厘米的

裂缝，上午又有人报告楼顶变形、5楼地板塌陷。但是，该公司负责人在视察现场后只部署4层和5层暂停营业，根本没有考虑采取停止营业和全面检查的措施。

所有以上这些原因，终于酿成了三丰这场特大灾祸。

1995年7月24日，韩国警方已逮捕了汉城市3名官员，罪名是在三丰百货大楼扩建后每人收受2630至3950美元不等的贿赂。当时他们在汉城市工业和经济局负责工厂和大商场的施工。

到1995年7月26日为止，韩国警方已先后逮捕了19名事故责任涉嫌人员，包括百货大楼的负责人、接受贿赂的汉城市瑞草区官员、负责大楼设计和施工的几家公司负责人等。

专家们认为，三丰百货大楼一倒到底，只留下孤零零的电梯架子，说明建筑物的设计、施工和验收等所有环节都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大楼倒塌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韩国自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后，30多年来一直是以“军人政治”（止于1993年2月）和“财阀经济”两个主轴驱使国家的发展。“军人政治”与“财阀经济”在产权上是相互分开的，在经济利益上又是官商结合的。政企分开从根本上保障了韩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官商勾结则阻碍了韩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尽管如此，由于美国的大力扶持和美越战争给韩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在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中，韩国的年均增长速度在发展中国家中仍居于前列，率先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其间，由于政府刻意扶植财阀（官僚、半官僚资本家），造成国家有限的资金几乎全部被财阀们吸用，于是一种独特的“官商”勾结体制随之出现。财阀们贷款、承揽建发项目，必定给予官员巨额贿赂。这种贿赂或者归于私囊，或者成为执政党的政治资金。建筑业者因贿赂损失了巨额资金，于是只能靠偷工减料米弥补，这样便使工程留下了造成重大恶性事故的隐患。金泳三在1993年2月上台后的反腐倡廉运动，正是要解决30多年来一直困扰韩国经济发展的官商勾结痼疾。

在经济持续增长的韩国，各个领域都叫嚷要缩短工期，节约成本，便宜、快捷成为最高纲领。“不惜任何代价的增长”、“增长第一”，是六七十年代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著名的口号。1980年破土动工的汉城至釜山线的高速公路（328公里），就是以每公里1亿韩元的低廉造价突击两年完成的。有关人士吹嘘说，这是前人未曾做过的伟大奇迹。然而，后来用于维修道路的费用远远超过了建筑费。这不能不说它是不负责任的弄虚作假、行政官僚炫耀自己政绩的典型事例。这种事例不仅仅限于修路，在韩国的其他领域，弄虚作假、不负责任的事情比比皆是。

韩国在近30多年来以高速发展著称于世界，并被一些只注意速度指标的人们誉为“奇迹”。但近几年来频频发生的恶性事故，无疑揭露了其经济发展的另一面。

1993年3月28日，从汉城开往釜山的117次“无穷花”号列车冒着淅淅沥沥的春雨以每小时85公里的速度向终点站进发。车上600多名乘客中有年近古稀的老人，也有襁褓中的婴儿。下午5时30分，列车进入釜山市区，再有10多分钟就要到达终点了，然而，一场不幸却在这一瞬间发生。司机发现前方50米处的路基正在迅速下陷，连忙使用紧急制动阀，然而，为时已晚，车头一下子脱轨撞入路旁的深沟。在事故现场，机车头、发电车箱以及5号

和6号两节客车车箱，像一只只被挤烂的火柴盒堆在一旁。许多乘客被挤死在座椅之间，车厢里到处都是殷红的血迹。在这次事故中丧生的人数至少有80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两岁，受伤者达100多人。

1993年7月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预定在访问韩国时下榻的汉城海亚特饭店地下室锅炉爆炸，汽浪掀掉天棚，冲倒了墙壁，使该饭店3名职员受伤，近旁的一些商店及咖啡店遭到破坏。有关专家推测，这次爆炸可能是由于锅炉内的蒸汽气压过高，而消压阀或煤气自动开关失灵所致。这次事故虽未造成死亡，但令韩国饭店业在国际上的形象大受损害。

1993年10月10日上午，一艘客轮在韩国全罗北道扶安郡海面沉没，成为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宗海难。事件中，有292人死亡，70人生还。据查，事发时，这艘可载207名乘客的渡轮上载有360余人。警方说，严重超员和狂风巨浪是造成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金泳三总统因此革退了他的交通部长和海事及港口管理局局长。

1994年10月21日早晨7时45分，汉城市汉江上的圣水大桥中段约50米的桥梁突然倒塌，桥面上正在行驶的一些车辆掉入距桥面约20米的江水中，其中包括一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造成至少32人死亡，20多人受伤。据调查，这次事故是由于建造大桥时偷工减料，交通量失控和保修管理不善使桥梁长期超负荷运转，致使桥梁的中间联结部分断裂造成的。汉城市市长因此被罢免，国会提出对内阁不信任案，金泳三总统通过电视亲自向国民道歉。

1994年10月24日，就在总统道歉的镜头仍在电视上频频播放之时，一艘游船在韩国忠清北道的忠州湖突然起火燃烧，造成29人死亡，30余人受伤。警方说，事故很可能是由于游船机舱内的机器过热引起的。

1994年12月7日下午，汉城市市中心的麻浦区发生了一起煤气爆炸事故，造成12人死亡，40多人受伤。该区陷入一片火海之中，20余栋住宅和商业大厦及20余辆汽车被烧毁，消防人员经过数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警方说，事故是由于检修煤气计量器的人员在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检修而造成煤气泄漏引起的。

1995年4月28日上午7时50分，正值上班高峰期，大邱市市中心一所学校门前的地铁工地现场，随着巨大的爆炸声，地面塌陷，从地下工地冒出冲天大火，约有30余辆学生和上班市民乘坐的公共汽车和私人汽车坠落地下或被颠覆，周围10余栋建筑物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这次事故共造成至少103人死亡，180余人受伤，这座以石化和纺织工业而闻名的城市陷入一片悲哀声中。警方说，事故是由于建筑工人在钻孔作业时不慎将地下煤气管道打穿导致煤气泄漏造成的。

事故发生后，金泳三总统宣布大邱市为灾害区，要求内阁全力组织抢救。国务总理李洪九当即赶往现场调查受害情况，当晚，他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并向国民道歉，表示决不让类似事故再次发生。为此，韩国政府决定，将对全国的所有建设工程进行安全检查，对违反安全规则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对正在施工的地铁工程勒令停工检查。

然而，仅相隔两个月，三丰百货大楼又坍塌了。

韩国建筑行业实行的逐级转手承包的做法，是造成劣质施工的重要原因。一项工程在招标过程中，往往要被转包好几次，每转包一次，工程承包费就被剥掉一层，到实际承建单位手里的工程承包费往往只剩下50%左右。

为了实现盈利，承建单位只有在压缩工期、降低造价上打主意。这样的建筑工程，质量自然不能保证。然而，由于官商勾结，负责对建筑工程监管的政府官员也就为劣质工程开了绿灯。

1995年12月下旬，韩国汉城地方法院对三丰百货大楼倒塌事故的责任者做出判决：三丰会长李鎔及其儿子、三丰社长李汉祥，以违犯“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及业务过失致死罪，分别被判处监禁10年6个月和7年有期徒刑；两名原区政府头头李忠雨和黄哲民以收受贿赂罪分别被判处监禁3年和2年半有期徒刑，并被分别处以1300万韩元（约1.7万美元）和1200万韩元的罚款。

据最终确认，此次惨祸死亡502人，伤残937人，数十人找不到尸体。随着这座大型豪华商场的坍塌，偌大一个三丰集团随之宣布垮台。巨大的物质损失假如尚可弥补，人们心头的创伤却经久难愈。失去亲人的人们难以消除撕心裂肺的痛苦，不少劫后余生者很难在短时间内从恶梦中摆脱出来。

接连发生的恶性建筑质量事故，在韩国引起强烈震撼，舆论呼吁“不忘国耻”、“洗刷污名”；汉城市民要求在三丰百货大楼倒塌事故现场立碑，祭悼亡灵，警示后人。金泳三总统告诫国民振作精神，付诸行动，“把事故变成转祸为福的契机”。

政府在查明事故原因的基础上，采取了有力的法制措施。国会召开临时会议，修订通过了《建筑法》、《建筑安全管理特别法》等五项法案，对劣质施工者和腐败官员严惩不贷。修订后的法律规定，凡因违法行为发生建筑安全事故的责任者，不论是否故意或有无伤亡，一律绳之以法，直至判处无期徒刑。新制定的《灾难管理法》，对各级政府预防灾难事故的义务和紧急救灾抢险制度做出了明确、具体规定。同时，成立以国务总理为委员长的“中央安全对策委员会”和直属国务总理的“安全管理咨询委员会”，强化对安全的领导和管理。

为消除隐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安全大检查。检查对象包括桥梁、地铁、车站、学校、医院、商店、体育馆、公寓住宅等所有公共设施；对在建筑市场过热，不动产价格暴涨时期动工、竣工的建筑物定为检查重点；检查范围由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物，扩大到5000平方米以上。根据检查结果，区别情况分别做出停止施工、限期维修或禁止使用、报废重建等不同处理。到1995年12月初，共检查了1148个建筑工程，对62个承建单位下达了停工整顿的命令，对123座建筑物作出了禁止使用的处理。在安全检查和管理的上，韩国采取了“宁可付出经济上的牺牲，绝不留下事故隐患”的方针。

经历一桩桩血的教训后，韩国人终于认识到，只有当“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不但成为政府的意志，而且成为国民共识，并被产业界视作至高无上的法则时，劣质施工和恶性建筑事故的隐患才能消除。

但愿“三丰惨祸”今后不再发生！

## 震惊希腊政坛的受贿丑闻

1988年10月，希腊克里特银行董事长科斯科塔斯诈骗案败露。该案因揭露出政府总理帕潘德里欧及多名内阁成员涉嫌接受巨额贿款，在希腊政坛掀起轩然大波。这一丑闻立即使执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困境，并在1989年6月议会大选中败北。

这一案件的主角名叫科斯科塔斯。科斯科塔斯1954年出生于希腊，1970年随父母来到美国，拥有希腊和美国双重国籍。在纽约大学读书期间，因伪造信件曾被拘留，后被处200美元罚款，并被勒令退学。1979年他因伪造证件冒领失业保险金和所得税退税金而受到美国联邦检察机关的指控。在被正式起诉的前夕，他带着妻子及4个孩子回到了希腊。1980年，美国方面以侵吞公款4万美元的罪名对他提出正式起诉。

科斯科塔斯回到希腊后，经朋友介绍进入希腊第十大商业银行克里特银行雅典分行，不久当上了该银行会计。1982年，科斯科塔斯自称在美国梅里·林奇经纪公司的帐户上有一笔近2000万美元的存款。1984年底，他使用伪造的林奇公司证明买下了克里特银行85%的股份。当时，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正全力以赴参加竞选，并且有望取胜。科斯科塔斯看准了机会，聘请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老党员瓦克立斯担任银行总经理，他知道瓦克立斯是帕潘德里欧的老朋友。这一纽带终于使他和帕潘德里欧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安德烈亚斯·乔治·帕潘德里欧，1919年2月5日出生于希腊的希俄斯岛。其父乔治·帕潘德里欧是颇有声望的政治家，曾任中间派联盟的主席，并于1944年、1963年、1964年3次出任首相。

帕潘德里欧从小随家人迁居首都雅典，毕业于雅典大学法律系。1941年至1959年侨居美国，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1947—1950年和1951—1955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教，1950—1951年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1951年，他与美国姑娘玛格丽特·钱特结婚。1955年后，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系主任。1959年回国，1961—1962年任希腊银行顾问，1961—1964年任雅典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63年加入其父创立的中间派联盟。1964年当选为议员，先后出任首相府国务秘书、经济协调部副大臣。1967年4月希腊发生军事政变，他被逮捕和监禁。由于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为他说情，才得获释。1967年12月获释后，他流亡瑞典和加拿大。1968—1969年，任瑞典斯德哥尔大学教授。1969—1974年在加拿大约克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在国外期间，组织泛希腊解放运动，任主席，领导反对希腊军政府的斗争。1974年7月军人政权垮台后，他于1974年8月回国。1974年9月，创建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简称“帕索克”），任主席。1981年10月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大选中获胜后，帕潘德里欧出任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1984年5月，再次当选为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主席。1985年6月，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议会选举中再次获胜，7月25日组成一党政府，帕潘德里欧继续担任政府总理。

科斯科塔斯几乎一夜之间成了克里特银行的董事长，并将成千万德拉克马（希腊货币）借贷给政府部门和政界要人。按常规，私人银行起码要等一年后才能获准开设一处分行，但是克里特银行在4年里就开设了大约50处分行，还获得了另外20份营业执照。在金融界立足后，科斯科塔斯又买下了希腊最大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和格拉米出版公司。这家出版公司控制着有影响的

3 大日报、5 家杂志和 1 家电台，下有 1800 名新闻雇员。科斯科塔斯摇身一变成为声名赫赫的“银行家”和“出版商”。他还花 1800 万美元在雅典郊外的帕利尼买下一幢现代化办公大楼，并且创办了一家设备先进的印刷厂。

科斯科塔斯突然间成为希腊的巨富，引起金融界、新闻界的怀疑，他们一再要求政府调查，但当局不但没有理会，相反称科斯科塔斯为当代希腊具有非凡开拓精神的企业家。科斯科塔斯由于靠上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政府首脑这把巨大的保护伞，在希腊可谓是无所不能。他从一个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缉拿的在逃犯，一晃成了希腊财界的大亨。

1988 年 6 月，雅典较有影响的《自由新闻报》等报刊揭露科斯科塔斯用欺诈手段买下克里特银行股份，并不断挪用该银行巨款搞不正当交易，要求政府依法查处。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希腊银行总裁要求清查克里特银行的帐目，帕潘德里欧总理表示他已无法阻止对科斯科塔斯的调查。经过查询，美国林奇公司证实：科斯科塔斯在林奇公司的银行里根本没有存款，林奇公司也从未借款给他购买克里特银行的股份。

在林奇公司的证明面前，希腊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在 1988 年 10 月中旬决定免去科斯科塔斯的克里特银行董事长职务。接着，雅典检察官以诈骗、伪造证件和挪用公款罪对科斯科塔斯提起公诉，雅典初级法院正式受理了这一案件，并传科斯科塔斯不得离开希腊，11 月 14 日到庭接受审讯。为防止他逃走，警方调派了数十名秘密情报员监视他的行动。

1988 年 11 月 6 日，科斯科塔斯躲在一辆送报的货车内逃出他的印刷厂，在雅典西南方向 40 公里外乘游艇从海上潜逃国外。在此之前，他已将妻子和 5 个孩子送到了瑞士。他逃离希腊后，先后到过意大利和巴西，最后来到美国。1988 年 11 月 24 日，科斯科塔斯因旧案在美国波士顿附近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关进了马萨诸塞州的赛拉姆监狱。

1989 年 3 月上旬，美国《时代》周刊记者 6 次探监采访，科斯科塔斯和盘托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据科斯科塔斯说，他银行里“失踪”的一笔笔巨款实际上都落入了政府总理帕潘德里欧及其他高级官员的腰包。他的经济犯罪活动不仅自始至终得到副总理兼司法部长库措耶尔格斯等“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政府高级官员的庇护，而且其大量挪用公共存款等犯罪活动还是由帕潘德里欧等人亲自指使和批准的。

科斯科塔斯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主席帕潘德里欧的勾结，开始于 1985 年议会大选前后。当时，帕潘德里欧为了加强自己对全国的控制，物色到了科斯科塔斯这个当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银行家和出版商，而科斯科塔斯也正想借助政治势力来营建自己的“王国”，因此双方一拍即合。

科斯科塔斯说，执政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政府命令邮政、城市交通和国家制药公司等国营大企业以 2% 至 3% 的低利率将大笔巨额存款存入私人银行——克里特银行，而希腊银行界通常的利率为 15%。于是，那 12% 至 13% 的差额利息便被克里特银行拿去。最终，这笔收入落入了政府高官的腰包。在 1986、1987 两年间，科斯科塔斯向“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高级官员行贿总额折合美元高达 3000 万。

1987 年 10 月，科斯科塔斯以希腊贵宾的身份去华盛顿出席布什副总统主持的午餐会。美国特工人员在审查宾客名单时发现，这位希腊贵宾竟然是在美国被起诉 6 年而一直逍遥法外的逃犯。科斯科塔斯拿出 100 万美元保释

金才回到希腊。事后3周，帕潘德里欧总理召见了她，说他触犯了护照法，可能要坐牢，想不坐牢就得为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筹措50亿德拉克马（合330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并重新确定存款利息退回计划。此后，帕潘德里欧每周定期收到7500万德拉克马（合50万美元）的贿款，总额达2000万美元。科斯科塔斯还曾亲自将5亿德拉克马（约合330万美元）送到当时的副总理科索杰卡斯家里。另外，还有6名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按月从克里特银行领钱，其总额达15亿德拉克马（合1000万美元）。

据科斯科塔斯说，1986年初他首次同帕潘德里欧会见，遵照这位总理的旨意，他雇用支持“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采编人员创办了亲政府的《24小时》报。一年后，他又遵旨买下了全国最有信誉、但对帕潘德里欧总理常有“不敬之处”的《凯特麦里尼》报。另有一家周刊接连刊登总理情妇的裸体照，帕潘德里欧抱怨“太不象话”，不出一个月，科斯科塔斯就买下这家周刊，并于3个月后予以关闭。另一方面，几年里，克里特银行50多名知情的雇员遭到执政党的清洗，有两次这样的命令是来自帕潘德里欧本人。1988年夏，帕潘德里欧政府强行通过了有利于掩盖这一丑闻的特殊“保密法”。作为回报，科斯科塔斯亲自向副总理支付了200万美元的“奖金”。

1988年8月，帕潘德里欧要去伦敦做心脏手术，临走前，派路瓦里斯在科斯科塔斯处拿走了9000万德拉克马（约合60万美元）。手术后，总理第一次公开了早已众所周知的艳事——他同34岁的航空小姐迪米特拉·莉娅妮的关系。

据调查，由于科斯科塔斯行贿和贪污，克里特银行流失2.1亿美元。

科斯科塔斯丑闻败露后，在希腊政坛掀起轩然大波。1989年3月，最大的反对党新民主党在议会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此后，帕潘德里欧被迫几次改组政府。因卷入此案而丢掉乌纱帽的内阁高官多达9人。

1989年6月，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议会大选中败北，丧失组织内阁的资格，帕潘德里欧失去政府总理的职位。

以帕潘德里欧为首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这次议会大选中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科斯科塔斯一案曝光后，人们对帕潘德里欧政府怨声载道，反对党抓住时机穷追猛打，相继又抖出了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政府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丑闻。

第一件是“非法窃听电话事件”。帕潘德里欧执政期间，授意属下搞“非法窃听电话的活动”，触犯国家禁止窃听的有关法律。在希腊国家情报局大楼内，有两个房间安装着整套窃听录音设备和300条电话线路，窃听上自政府内阁成员下至黎民百姓，以及政治对手的私人电话，甚至连总理本人的情妇莉娅妮也不能幸免。这桩政治丑闻激起反对党和公众的强烈谴责。

第二件是购买军事装备佣金案。此案几乎与科斯科塔斯案同时败露。据报道，希腊政府1985年以来先后从美、法两国订购了40架F—16战斗机、40架“幻影”战斗机及一批先进的导弹。这批军事装备的实际订购价大大低于希腊政府对内正式公布的价格，其数百万美元的差额均以佣金等名义偷偷装进了希腊政府官员及与他们过往甚密的外国中间商的腰包。

第三件是“买机”案件。希腊奥林匹克航空公司购进多架飞机，“经手人违法受贿”，使国家损失1650亿德拉克马（约合10亿美元）。

第四件是倒卖玉米案。此案发生在1986年5月，据报道，当时希腊国营的国际贸易公司从南斯拉夫低价购买了9000余吨玉米，然后冒充是希腊的农



产品在欧洲共同体市场上高价出售。由于希腊农产品不需缴纳欧共体农产品补偿费，希腊贸易公司从中赚了一笔钱。不料此事很快败露，遭到欧共体委员会的调查并被罚款 250 万美元。调查表明，希腊国际贸易公司倒卖南斯拉夫玉米案的关键是，希腊商务部、农业部、海关、港口等部门均出具了假证明。

1988 年帕潘德里欧与比他年龄小 36 岁的空姐莉娅妮之间的婚外恋的公开，对帕潘德里欧及其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大选失败后，为挽回影响，帕潘德里欧与那位风流空姐正式结婚，这一风波才算平息。

大选失败后，由于新民主党单独组阁未成，帕潘德里欧又千方百计拉拢左翼联盟，试图同其组成联合政府继续执政。

在 1981 年和 1985 年两次大选的关键时刻，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都曾得到左翼联盟选民的支持。然而，由于它始终没有履行在前两次大选中所公开许下的撤走美军基地、让希腊退出北约等反西方的诺言，反而政府内腐败不堪，广大左翼选民已对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感到失望。左翼联盟不顾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再呼吁和提醒，坚持单独结成竞选联盟，发誓不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合作。大选结束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力达到继续执政的目的，对左翼联盟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包括让左翼联盟任意挑选部长职务、帕潘德里欧不当联合政府总理等。但左翼联盟中央在反复商议后，拒绝了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合作，与保守的新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从而使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再度组阁的希望完全破灭。

1989 年 7 月 5 日，希腊新联合政府宣布，将对帕潘德里欧领导的前政府有牵连的 4 大丑闻进行调查。

1989 年 7 月 19 日，希腊议会通过决议，组成调查委员会对帕潘德里欧及 4 名前部长涉嫌受贿 2.1 亿美元的科斯科塔斯案进行调查。该调查委员会由新民主党、左翼联盟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 12 人组成。

1989 年 9 月 14 日，调查委员会赴美向在押的科斯科塔斯调查后回国宣布，帕潘德里欧和 4 名前部长在这起案件中犯有渎职、受贿和违反部长责任法罪，要求议会批准特别法庭审讯这 5 个人。

1989 年 9 月 28 日，议会经过两天辩论后投票决定对帕潘德里欧、前副总理兼司法部长库措耶尔格斯、前财政部长措沃拉斯、前交通和通讯部长佩佐斯、前国民经济部长罗梅里奥蒂斯 5 人提起公诉。

1989 年 10 月 2 日，议会任命 12 名高级法官组成特别法庭。

1991 年 3 月 11 日，最高特别法庭开庭审理此案，审讯进行到第 18 天（4 月 11 日），库措耶尔格斯在向证人提问时当场因脑溢血昏厥。

自 1989 年议会决定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及帕潘德里欧本人声称，该案主犯是科斯科塔斯，而现在将帕潘德里欧列为主要被告是旨在打击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阴谋。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帕潘德里欧本人，竭力为争取取消审判或延期审判而活动。

帕潘德里欧本人拒绝到庭，也不派律师出庭，只请几位法律顾问通过电视了解审判情况。在 18 天审讯期间，前副总理库措耶尔格斯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为自己辩护，一直没有供出帕潘德里欧的具体罪证。库措耶尔格斯当庭发病后，帕潘德里欧及其党的高级干部纷纷前往医院探望，一些该党成员昼夜守候在医院门外，对库措耶尔格斯表示声援和支持。党的成员也从过去指责库措耶尔格斯“殃及全党”转为称颂他是“为维护自己尊严而战斗”

的“战士”。1991年4月18日，库措耶尔格斯在医院里死去。

库措耶尔格斯死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一反过去反对审讯的立场，坚决要求继续审下去，欲把政府和执政的新民主党推上搞“政治陷害”的被告席。

一名被告已死，另一名主要被告帕潘德里欧拒绝出庭，政府和执政的新民主党对如何处理此案感到进退两难。另一政党左翼进步联盟原先与执政的新民主党合作，要求清查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腐化问题。但开庭审讯后，它作为原告一方认为“被新民主党利用了”，其内部对是否继续审讯下去意见不一。执政党内有影响的人士拉利斯（曾于1980年至1981年任希腊总理）批评现政府上台一年多未拿出解决国家政治、经济危机的具体措施。他提出摆脱困境的出路是促成新民主党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两大党捐弃前嫌，由两党首脑米佐塔基斯和帕潘德里欧两个宿敌联合组阁。而左翼进步联盟对此感到不安，试图与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联合，推翻现政府。

因此，原定1991年4月22日的开庭不得不搁浅。

许多人都认为70多岁的帕潘德里欧下台后再难爬起来，谁知四年之后，他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1993年议会大选中获得了300个议席的171席，再次组成了以他为总理的一党政府。

1995年11月20日以来，帕潘德里欧由于肺炎一直住院。1996年1月25日，由于身体不佳，终于迫使他让出政府总理的职务，但他没有辞去执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主席的职务。看来，帕潘德里欧与希腊总理的职务是无缘了。

##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受审记

田中角荣，1972年7月当选自民党总裁，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1974年11月，因被《文艺春秋》杂志揭露以权谋私、偷税漏税、隐瞒财产以及包括男女关系在内的私生活，被迫辞去自民党总裁和首相职务。1976年7月27日，因涉嫌“洛克希德受贿案”被东京地方检察厅逮捕。1983年10月12日，因任首相期间受托受贿、违犯外汇法、触犯刑律，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和罚款5亿日元。田中角荣虽然身为一国的首相，最终仍受到法律的制裁。

1918年5月4日，田中角荣出生于新潟县二田村，是家中7个子女中唯一的男孩。由于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后因交不起学费，他被迫中断了学业。1934年，年仅16岁的田中角荣，孤身一人来到东京谋生。他先后当过建筑公司的学徒工、贸易商行卸货员、《保险评论》杂志社实习记者等。这一时期，他白天工作，晚上到私立中央工业学校学习。他在上夜校时，为避免因疲劳而睡着，竟然用锥子和刀尖顶在自己的手掌上。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刻苦精神，他获取了私立中央工业学校土木科毕业文凭。

1937年，雄心勃勃的田中角荣白手起家，独自创办了“共荣建筑事务所”，承揽土木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日本政府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田中角荣也应征入伍，被编入侵华日军，但两年后因伤病退役回国，重操旧业。1943年12月，他创立田中土木工业公司，任经理。田中角荣年轻聪颖，几年内就把该公司发展成为日本50家大建筑公司之一，他本人也成为实业界小有名气的富翁。

田中角荣与政界结缘，起始于战后与原内阁国务相大麻唯男的接触。大麻唯男非常欣赏年轻有为的田中角荣，劝说他拿出一部分奖金资助原民政党总裁町田忠治竞选进步党总裁，田中角荣照办了。此后，在大麻唯男和町田忠治的提携下，田中角荣怀着“当一个政治家的理想”步入政界。1947年，田中角荣作为进步党候选人当选为众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他又被自由党总裁吉田茂招致麾下，成为该党总务委员会委员。

田中角荣涉足政界不久，就崭露头角、惹人注目。1948年10月，日本政局发生变动，芦田均内阁宣布辞职。根据一般惯例，议会第一大党自由党将组成下届政府。当时，自由党内一些干部，以美国占领军“暗示”为根据，企图撤换吉田茂的总裁职务，推出自由党干事长山崎猛为新总裁并组织新政府。总务会议就此事进行讨论时，出现了上述意见一边倒的局面。吉田茂无可奈何，只得准备接受这一意见。就在吉田茂准备作辞职发言的一刹那，身居总务委员末席、年仅30岁、血气方刚的田中角荣站了出来，慷慨激昂地发表了“美国不能干涉日本内政”的演讲。他的演讲使得会场形势急转直下，吉田茂保住了总裁职位，并出任内阁首相。

吉田茂因田中角荣而得救，感激之余，他也认识了田中角荣的才干。1948年10月，田中角荣被吉田茂首相任命为法务省政务次官。不久，因与贪污案有牵连而去职，并被美国占领军当局逮捕，两年后宣布无罪释放。

1950年，田中角荣任长冈铁道公司总经理。1953年，任理研化学公司董事。1954年，任自由党副干事长。1955年，任众议院商工委员会委员长。1957年，任岸信介内阁邮政大臣，1958年6月离任。1958年9月，任行政机构改革特别委员会副委员长。1961年7月，任自由民主党政务调查会会长。1962

年7月，任池田勇人内阁大藏大臣。1964年11月，任佐藤荣作内阁大藏大臣。1968年11月，任自民党干事长。1971年7月，任佐藤荣作内阁通商产业大臣。

1972年6月，作为自民党干事长的田中角荣自觉羽毛丰满，毅然打出了“田中派”的旗帜，竞选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原属自民党内的最大派系佐藤派，而即将卸任的佐藤荣作首相看中的接班人是福田纠夫。为了竞选总裁，田中角荣在佐藤的眼皮底下作了不为旁人察觉的秘密准备。他的这种精明政治手腕，被人们称之为“田中角荣魔力”。

当时，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的有四人，即田中角荣、福田纠夫、大平正芳、三木武夫。第一轮投票，田中角荣得156票，福田纠夫得150票，大平正芳得101票，三木武夫得69票。在这种情况下，大平正芳的倾向十分重要。如果大平正芳与三木武夫携手，大平正芳就能当选自民党总裁，组成大平内阁；如果大平正芳支持福田，就会出现福田内阁。在这样微妙的局势下，田中角荣成功他说服了大平正芳和三木武夫支持他，从而以绝对优势击败前首相佐藤荣作支持的福田纠夫，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并登上首相宝座。

田中角荣上台后提出了两大新政策，一是同中国建交，一是实行日本列岛改造。1972年9月，田中角荣率领外相大平正芳等访问中国，签署了日中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的对内政策，集中体现在他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上。早在担任佐藤内阁通商产业大臣期间，田中角荣便着手进行国土开发和改造的综合性调查与研究，并把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设想，写成《日本列岛改造论》一书。按照田中角荣在《日本列岛改造论》中提出的设想，为解决日趋严重的空气污染、交通壅塞、住宅紧张、城乡人口疏密不均等问题，重新焕发日本经济发展的活力，必须“坚决地扭转城市过分集中的趋势，把民族的有生力量和雄厚的经济余力，引向整个日本列岛”。

田中角荣踌躇满志地把“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付诸实践。然而，实施该计划的经济形势并不成熟。其一，进入70年代后，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正在急剧丧夫。从这个意义上说，田中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选错了实施计划的时机。其二，1973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石油危机”。石油涨价后仅3个月时间，日本国内石油价格便上涨2倍。土地买卖投机活动引发的地价上涨与石油价格上涨相结合，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生活，一场抢购日用商品、哄抬物价的风潮，迅速由城市刮向农村。

物价狂涨激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不满，冷却了国民对田中角荣内阁的热望。在1974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国民的不满都凝聚到选票上，致使自民党在选举中败北。尽管田中角荣派参议员由46席增加到50席，并且同大平正芳派构成了参议院的“轴心”，但田中角荣春风得意的时代已经过去，不得不由“进取”转为“退守”。

正当田中角荣失意受挫的时候，副首相三木武夫和大藏相福田纠夫接连退出田中内阁，并且反戈一击，利用田中内阁遇到的经济困难和国民的不满情绪，向田中角荣开刀，打乱了田中角荣想通过选举获胜而为明年连任总裁铺平道路的鸿图。

1974年10月，提前出版的11月号《文艺春秋》杂志，刊登了评论家立花隆的一篇文章——《田中角荣研究——他的财源和人事关系》。这篇文章长达60页，揭露田中角荣以权谋私、偷税漏税和隐瞒财产的疑点以及包括男

女关系在内的私生活。这篇文章的发表，在日本政界引起轩然大波。

1974年10月18日，福田纠夫派参议员藤尾正行揪住这个辫子在自民党总务会上向田中角荣发起攻击。紧接着，自民党内外都掀起了追究田中角荣财源的波涛。

田中角荣难以抵御这铺天盖地的风暴，只好在处理完善后工作后，于1974年11月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和首相职务。

田中角荣虽然在1974年11月离开了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的宝座，但他在任首相期间犯下的罪行并没有因离职而了结。

1976年2月4日，美国参议院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揭发了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为了向日本全日空公司推销“三星”式客机而大量行贿事件。2月6日，洛克希德公司副董事长A·C·库钦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作证说，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为了向日本全日空公司推销客机，通过日本丸红公司伊藤宏、日本“幕后人物”儿玉誉士夫和国际兴业公司小佐野贤治，向日本政府高层官僚赠送了金钱。

这一消息的传来，在日本议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议员们注目的焦点由各项议题立即转向了“洛克希德案”。

议员们情绪激昂，纷纷发表意见，认为政府高级官员接受赠款是受贿行为，应受法律的追究，并要求查清所指高级官员到底是哪些人。在野党则更为活跃，强烈要求三木武夫内阁对此事进行彻底追查。日本国民对此也深表愤慨，揪出接受赠款的高级官员是他们的一致要求。

那么，执政的三木武夫内阁对此事持何态度呢？三木内阁是自民党组织的内阁。自民党在二战以后一直组阁执政，政府高级官员也是由自民党成员担任；如果将洛克希德案追查到底，势必涉及自民党高层人物，这对处境困难的自民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如果仅从执政党的利益出发，三木内阁对此案应持慎重态度。但出人意料的是，首相三木武夫却在国会上表示：此事关系到日本政治声誉，有必要将问题查清。

1976年2月16日，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传唤了与此案有关的国际兴业公司老板小佐野贤治、全日空公司总经理若狭得治和副总经理渡边尚次。但是，三人却采取强硬的不合作态度，当问及他们洛克希德公司向政府高官赠送金钱的具体情况时，三人对此均矢口否认。

第二天，丸红公司董事长桧山广、总经理松尾泰一郎、专务大久保利春和伊藤宏四人也被传到委员会回答问题，四人对洛克希德公司副董事长库钦的证词也作全盘否定。

由于相关人物对此事均予否定，通过国内途径追查此事已相当困难。据此，三木武夫决定向美国要求协助。他指示外相宫泽喜一：“请求美国提供包括接受金钱的高官名单在内的一切有关洛克希德事件的资料。”

可是，美国方面对此事却持慎重态度。当日本外务省通过驻美国大使馆与美国政府交涉此事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认为“扩大洛克希德事件会扰乱盟国日本的政治。”

日本方面对查清洛克希德事件似已下定决心。3月23日，众议院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美国参议院提供此案的全部资料。同时，三木武夫也在国会上表明了态度：“我将亲自把全体国民的意愿通过书信转达福特总统，以请求他的协助。”三木在此事上显得有点迫不及待，独自决定向美国总统提出书面请求，而未与当时任自民党总干事长的中曾根康弘等人商议，并于

3月23日下午就把亲笔信送交了美国政府。

由于众议院的决议和三木武夫首相的坚持，美国方面的态度有了转变。1976年3月24日，日美两国政府签订了“司法相互协助协定”。这一协定规定：美同方面向日本检察厅提供洛克希德事件的资料。

得到美国的协助后，洛克希德案的进展速度加快。5月14日，日本众议院成立了洛克希德事件特别委员会。

5月24日，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以伪证罪名对全日空公司总经理若狭得治进行了控告。几天之后，小佐野贤治、桧山广和大久保利春也以相同罪名被控告。

6月22日，东京地方检察院开始逮捕此案的嫌疑犯——丸红公司的大久保利春、伊藤宏、桧山广和全日空公司的若狭得治和渡边尚次。其后，又有多人被捕，但都未超过行贿者、嫌疑者的范围。大久保利春和伊藤宏被捕后便开始作了交待。根据这两人提供的证词，检察机关认定，田中角荣在1973年8月至1974年2月任首相期间，从丸红公司的桧山广等人的手中接受了洛克希德公司的现款5亿日元。

7月27日，田中角荣在事先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被东京地方检察厅逮捕，被关押进名为“东京小营”的东京拘留所。而且，他任首相时的秘书夏本敏夫也在同一天被捕。当天，东京地方检察厅还搜查了田中角荣的私宅、在议员会馆内的办公室和田中事务所。夏本敏夫的私宅和办公室也被搜查。

田中角荣在拘留所里过了21天拘禁生活。8月16日，检察厅以涉嫌“受托受贿”和“违反外汇管理法”为由，对田中角荣提出起诉。田中角荣在交纳了2亿日元的保释金后被保释出狱。

洛克希德案的追查，一开始就出现了麻烦。作为重要证人的司机竹原政则，在接受了两次传讯后突然死亡。

据伊藤宏供述，丸红公司送给田中角荣的5亿日元都是将现款用纸箱装着，由他亲自交给了田中角荣的秘书夏本敏夫。在四次交款中，前三次在场的还有为夏本敏夫开车的司机（即竹原政则）和伊藤宏自己的司机松岗克浩。

检察厅查明，当时为夏本敏夫开车的司机是竹原政则。

7月31日和8月1日，检察厅两次传竹原政则查问。竹原政则说出了两次出车的情况。

一次，“夏本敏夫让我用车送他到过富士见町公寓。我把车停好，坐在司机席上看杂志，突然听到有人敲车门，我抬头看到夏本敏夫抱着一个好像很重的纸箱，急忙跳出车门，把纸箱接过来，不是放在车的后排坐席上，就是放在车尾的行李箱里了。”

另一次，“在钻石饭店方向一座楼前的坡路上，我停好车等候，后面来了一辆绿色赛德利克车，停在我的车后，从那辆车里搬下一个纸箱放在了我的车上。”

当检查厅人员将伊藤宏的司机松岗克浩的照片给竹原政则看过后，竹原政则当即承认：“没错，就是他，他就是另一辆车里的司机。”

竹原接受查询时，态度和善，精神状态也很好。

但是，8月2日，突然有人在日本埼玉县的一条山林公路的汽车里，发现了竹原政则的尸体。经法医检查，竹原政则的尸体上没有外伤，也无药物反应，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根据现场情况，警方断定，竹原政则是用塑料

管把汽车排出的有毒气体引入车内自杀的。

竹原政则的死亡，在日本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为新闻报道的热门话题。8月3日，东京的一家大报对竹原死亡的消息用了这样的标题：“洛克希德案件自搜捕以来，终于出现了自杀者。”这是因为，在日本现代历史上，凡重大贪污受贿案件，在搜查阶段很少不发生证人死亡事件。

竹原政则是洛克希德案的直接证人之一，他的证词对证明夏本敏夫接受伊藤宏的现款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夏本敏夫在1976年7月27日被捕后虽一度承认了接受赠款的事实，但从第一次公审起他就推翻了证词，说是检察厅方面捏造的。竹原政则在接受查询时，因时间一时不能记清，当时的4页陈述没有收进案卷，而是由竹原政则带走了。竹原政则一死，他的那些陈述便不具有任何证明力，这对检察厅方面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检察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竹原的死亡是他们工作上的重大过失。

1977年1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对“洛克希德案”进行初次公审。检察当局力证田中角荣有罪，辩护方面反驳说无罪，双方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吵。

田中角荣除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审讯外，中间的180多次公审都未讲话。不管检察厅方面如何质问，他都一言不答，全由律师代替他同检察官争辩。

1981年4月8日，法庭继续开庭审理洛克希德案。出人意料的是，田中角荣的律师新关胜芳，拿出了一本证明夏本敏夫“不在犯罪的现场”的书面证据——“清水日记”。

“清水”是指总理府的汽车司机清水孝士，他也负责夏本敏夫的用车。“日记”是清水孝士自己记的“行车备忘录”。清水孝士的行车备忘录完全否定了夏本敏夫四次接收现款的可能性。因为在检察厅方面提出的四次交款时间内，夏本敏夫都坐着清水的车到别处去了。

这样以来，案情审理转而对田中角荣有利，“田中角荣无罪”的说法占了上风。

正当田中角荣和他的律师得意之际，检察厅方面出其不意地给了他们一次重击。在1981年10月28日进行的第146次公审中，检察厅方面请求法庭通知夏本敏夫的离婚妻子三惠子出庭作证。三惠子在法庭上说：“夏本敏夫当时亲口对我讲的，收下5亿日元。”并说夏本敏夫曾在自家院里销毁了任首相秘书期间的日程表、记事本和文件等证据。

三惠子的证词，顿时使田中角荣方面阵脚大乱，从而使夏本敏夫“不在现场的证明”发生动摇。三惠子出庭作证时，夏本敏夫痛苦万分，没过多久便突然病倒，经医生检查是脑出血。从此，夏本敏夫再也没有出庭。

三惠子出庭作证后，双方辩论的焦点又集中到了首相权限上，即田中角荣对民间航空公司购买何种飞机是否拥有指挥权。

1982年6月8日，法院对洛克希德案的其他被告进行了审理，判定桥本登美三郎（当时任运输大臣）、佐藤孝行（当时任运输政务次官）犯了“受托受贿罪”。东京地方法院当庭宣判：“判处被告人桥本登美三郎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缓期三年执行；判处被告人佐藤孝行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

1983年1月26日，检察厅方面在法庭上宣读了田中角荣的论罪书，论罪书达30万字。最后，检察官向法院提出：判处田中角荣五年徒刑，交罚金5亿日元。

1983年10月12日上午，东京地方法院701号法庭开庭，审判长冈田光

宣读了判决书：田中角荣因受托受贿、违犯外汇法，触犯刑律，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 5 亿日元。

到此，洛克希德案经过 7 年多的审理，第一审判决才告完成。

一审判决后，田中角荣立即上诉，律师团为他办理了到东京高级法院继续进行诉讼的手续。

1987 年 7 月 29 日，东京高级法院驳回田中角荣的上诉，认定一审判决无误，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后，田中角荣表示不服，继续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始终没有表示。

田中角荣在 1985 年 2 月 27 日中风病倒，严重时半身没有知觉，失去了说话的能力。经多方医治，虽有所恢复，但仍不能离开病床和轮椅。1989 年 10 月 14 日，田中角荣的女婿、国会议员田中直纪，在田中角荣的家乡郑重宣布：正在养病的前首相田中角荣不再参加下届众议院的选举，在本届众议员任期结束后，从政界引退。从此，田中角荣离开了政治舞台，一直到 1994 年初去世。

洛克希德案件，从被告人的地位之高、所控受贿额之巨、审理案件所耗时间之长来看，在日本战后的历史上都是创记录的。

洛克希德案的发生和审理，既充分暴露了日本政界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的黑暗内幕，也充分展示了法律的威严。



## 华盛顿市市长吸毒案始末

1990年1月18日晚，已连任11年的华盛顿市市长马里恩·巴里，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精心策划的诱捕行动中因吸毒被抓获，一时成为新闻媒介大肆渲染的丑闻。事实真相真是象喜欢夸大其词的美国新闻界报导的那样吗？巴里市长有几分过失、又有几分怨情呢？

巴里1936年出生于一个贫苦棉农之家，50年代毕业于菲斯特大学，获化学硕士学位。1960年他在田纳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正值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巴里即投身于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表现出非凡的组织和演说才能。当年他就出任了首届全美学生非暴力运动协调委员会主席。1965年，巴里到华盛顿，积极参与黑人的各种政治活动，并建立了一个非赢利机构，帮助黑人谋求经济上的发展，逐步在黑人中树立起威信。1978年巴里击败沃特，成为华盛顿市黑人市长。在以后的1982年和1986年的选举中他又以压倒优势取得连任。

巴里任华盛顿市市长期间，在治理波托马克河、打击毒品走私和整顿由于种族骚乱而被破坏了的邻里关系方面成就斐然，赢得较高信誉。但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他在华盛顿政府的管理，特别是在居民住房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多次出现失误。在此期间，其政府内先后有11名市政官员（其中包括两名副市长）因贪污问题受到法院审判，另有11人因管理工作失误而被解除职务或被迫辞职。巴里本人也不断受到指摘，说他有贪污受贿和吸毒问题。

1981年，华盛顿市第一次盛传市长巴里是个“瘾君子”，有人声称曾在市中心的一个酒吧里见到他吸毒。由于没有证据，司法部门认为这可能只是谣言，未予理睬。巴里本人也公开出面否认。那时，华盛顿市民根本不相信大力肃毒的市长会成为“瘾君子”。

1984年，巴里又一次卷入与毒品有关的风波。一位名叫凯伦·约翰逊的女工受到联邦法院的审讯，她被指控非法销售可卡因。有证人作证说，凯伦还曾经为巴里市长提供过毒品。但是当审判人员询问此事时，凯伦拒绝回答。巴里则表示与凯伦有个人关系，却没从她那里买过毒品。

从那时开始，巴里引起缉毒人员的注意，联邦调查局对他的调查跟踪不断加强。1988年，联邦调查局制定了代号为“毒刺行动”的秘密调查计划，矛头指向巴里市长，这一计划经司法部长索恩伯勒审阅后批准执行。

1988年12月，联邦政府开展了一场反腐败的调查运动。12月22日深夜，两名华盛顿市的警察来到拉马达汽车旅馆，任务是向住在这里的一个名叫查理斯·路易斯的房客进行调查。路易斯当时49岁，住在拉马达汽车旅馆内，经常与该饭店的一位女服务员勾搭。他为她提供可卡因，她则向路易斯出卖肉体。据报告，路易斯还曾向其他人兜售过可卡因。

当两名警察来到九楼路易斯的房间猛地推开房门，准备冲进去时，突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原来房间里不但有路易斯，还有市民家喻户晓的巴里市长。两名警察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但是公事公办，他们向市长说明了目的后就开始盘问起路易斯。但还没有问上几句，他们随身携带的对讲机里就传来了“撤回自己管区”的命令。这其中是否是有人暗中跟踪，巴里市长也不知道。

事后，“巴里市长同贩毒分子在一起，并妨碍公务”的谣言就传开了。华盛顿舆论一片喧闹，又一次将巴里市长与吸毒牵扯在一起。为此，联邦法

院还成立了大审判团专门对此事进行调查。巴里先后两次出庭，否认他曾经从路易斯那里购买毒品，否认自己曾经吸毒。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公开调查只好中断。

为了获得巴里吸毒的证据，联邦调查局对毒品贩子路易斯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和调查。1989年3月，正当路易斯在维尔京群岛向一名联邦调查局便衣出售可卡因时，一副冰凉的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1989年4月，路易斯在华盛顿受到审讯，他被指控犯有“向联邦大陪审团撒谎及非法拥有毒品罪”。此时的联邦调查局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是冲着巴里市长来的。在经过一番幕后交易后，路易斯同意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参与对巴里的秘密调查；作为交换条件是联邦法院将撤销对他的某几项罪行的起诉。在路易斯的帮助下，联邦调查局收集到了巴里吸毒的部分证据，决定对巴里采取行动。

根据路易斯的招供，巴里的情人莫尔小姐曾同巴里一起吸过毒，巴里对莫尔一往情深。在哥伦比亚特区警方的协助下，联邦调查局在加利福尼亚找到莫尔。在“晓以利害”后，莫尔终于勉强同意合作。于是，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维斯塔国际旅馆设下了圈套。

1990年1月18日下午，莫尔突然从维斯塔国际旅馆打电话约巴里到旅馆一叙旧情，巴里喜出望外，答应有空马上就来。晚上8时左右，巴里乘坐他的豪华轿车在保镖的陪同下如约前往。

莫尔小姐是当年顶顶有名的黑人模特，尽管时下已38岁，膝下有3个孩子，但风韵不减当年。莫尔居住在维斯塔国际旅馆7楼的727房间，是联邦调查局包租的3间相连客房的1间，房间里事先就安装好了秘密录像录音装置。

巴里来到727房间后，两人互致问候，温情地交谈起来。莫尔开始先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巴里想要点什么。巴里当然不知道莫尔小姐已被联邦调查局收买充当诱饵。

正在这时，一位伪装成莫尔女友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前来“拜访”，莫尔暗示巴里说，她的女友有可能搞到些可卡因。但巴里表示他早就不用那玩艺儿了。然而，在莫尔的一再引诱下，巴里终于同意搞些快克（毒品的一种）来吸。这时，莫尔的“女友”言听计从，一转身出了房间，不一会就带回了一包价值60美元的快克。正当巴里拿起莫尔帮他卷好的快克品尝时，早已在外等候多时的联邦调查局特卫和华盛顿警察局警察破门而入，当场以吸毒罪逮捕了巴里。此时，巴里市长才如梦方醒，愤愤地说：“真他妈的该死，我中了圈套！”

接着，联邦调查局特工马上给巴里市长套上假发，戴上墨镜，簇拥着他从旅馆后门出去，登车直驱联邦调查局总部。在总部，调查局人员给巴里做了指纹、血、尿等方面的化验，结果可想而知。其实，这只不过是一道工作程序而已，因为调查人员已经用录像机录下了全过程。随后，巴里暂时被释放回家，听候联邦法院的传讯。

当地电视台这时已获悉并抢先报道了“巴里因吸毒而被逮捕”的特大新闻。因此，当巴里从联邦调查局回到家时，闻讯而来的记者早已是“里三层、外三层”把他家团团围了起来。据记者报道，市长官邸外整个夜晚喧闹不停，照相机的闪光灯不时一闪一闪。他们整整一夜只见巴里在房内不停地踱来踱去，而他的妻子埃菲则在不停地打着电话。后来，巴里的一位朋友闻讯赶来接走了他们10岁的儿子，以免孩子受到过分的刺激。

巴里被捕的消息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爆炸。由于该市的 71 万（1980 年）人口中 70% 是黑人，这位黑人市长被抓获的消息自然在黑人中引起了更强烈的反响。

全美有色人种进步协会会长胡克斯率先发表声明，指责联邦调查局有意骚扰当选的黑人官员，并指出在过去几年中一些黑人官员不断遭到骚扰，巴里一案就属此例。黑人社团的领导人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他们认为，巴里被捕的唯一原因是：他是一位黑人政治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在巴里第二天保释离开法院时，成千上万的黑人聚集在法院门口，呼喊支持巴里的口号，谴责搞种族迫害。

当然，也有一些黑人市民对巴里吸毒一事感到失望和羞辱。曾教过巴里历史的一位教师说：“我听到这一消息时都快要发疯了。他是黑人市长，代表着我们的种族。他告诉我们不要吸毒，而他自己却吸毒，而且被人当场抓住，我为他感到羞愧难当。”另外还有人把华盛顿每况愈下的治安情况也归咎于巴里领导不力。

1990 年 1 月 21 日，是巴里原计划要发表第四次参加市长选举声明的日子。但是，由于联邦调查局的节外生枝，巴里的计划全部被打乱了。1 月 21 日这一天，巴里在离他公寓不远的圣提莫西教堂做完祈祷后，痛苦地宣布，将华盛顿市府的日常工作交给市长助理卡洛尔·汤普森处理。

自联邦调查局设计诱捕巴里之后，法庭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取证工作。围绕法庭调查，辩控双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检察官在向法院提出的公诉中，列举了巴里 14 项罪行：其中 3 项是向法院作伪证，有 10 项是拥有毒品，有 1 项是企图拥有毒品。如果这些罪名成立的话，巴里最终可能被判 26 年徒刑，并课以 185 万美元的罚款。

在从 1990 年 6 月 4 日到 7 月底的法庭调查中，检察官共传唤 26 人到庭作证。据检察官方面透露出的消息说，共有 10 人作证说巴里曾在哥伦比亚特区、亚特兰大、维尔京岛和巴哈马群岛等地吸毒 200 余次。这些作证的人大多数是巴里以前的仆人、保镖、秘书和朋友等，其中有的人有吸毒和贩毒的前科。

巴里的辩护律师肯尼恩·芒迪在法庭上同检察官针锋相对，从几个方面为巴里辩护。

——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芒迪律师指出，检察官提供的证人所说的巴里使用可卡因的时间、地点、细节都对不上口；并着重指出，这些证人大多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才提供证词的。

——对联邦调查局用诱骗方式逮捕巴里提出异议，并对“主要证人”莫尔小姐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追问，以致莫尔小姐不得不承认在巴里最后拿起莫尔给他卷的“快克”之前曾 7 次拒绝吸毒。

——把巴里吸毒案与种族斗争联系在一起，以影响陪审团的裁决。在法庭上芒迪还抖出了联邦调查局内设有一支“突击部队”的内幕。芒迪指出，该组织专门在全美各地骚扰黑人官员，最近还在亚特兰大、芝加哥和加利福尼亚等地专门收集当选黑人官员的情况，其中包括许多黑人著名政治家。而这个“突击部队”的负责人就是指挥这次诱捕行动的特工人员罗纳德·斯特恩。

1990 年 8 月 10 日，陪审团经过 8 天的激烈讨论，判定巴里仅犯有“拥有可卡因”一项罪名，并宣布检察官对他的另一项指控不成立、其余 12 项罪

名的指控为无效。根据美国法律，“拥有毒品”是一种行为不端的轻罪，最多判一年监禁和 10 万美元罚款。

当法庭宣布裁定后，巴里的情绪立刻活跃起来，他走到芒迪律师跟前，与他紧紧拥抱，眼泪夺眶而出。当巴里走出法庭时，支持者们把他团团围住，高呼“再干四年！”等口号。

虽然陪审团认定巴里只犯有轻罪，但毕竟已触犯刑律，而且是人们普遍关注的毒品问题。无论法庭最后如何判决，巴里的形象已受到严重损害，政治上元气大伤，这也许正是联邦调查局一些人所希望的。

1990 年 10 月 26 日，联邦地方法院对巴里吸毒案进行了宣判。主审官杰克逊宣布，巴里因持有毒品罪而被判处半年徒刑，5000 美元罚款和缓刑一年。杰克逊法官在宣判时对观众说：“巴里市长的声望会鼓励其他人去效仿他，由于他没有为华盛顿市民，尤其是年轻人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他现在必须成为另一种榜样。”他还命令巴里在服刑期间参加戒毒计划，并要求他在一年缓刑期间接受吸毒抽查。

虽然根据美国法律犯有象巴里这样的轻罪不影响竞选市长和市政委员，但这次审判很可能意味着巴里政治生涯的结束。

## 日本里库路特股票丑闻

里库路特贿赂案是 80 年代日本政坛发生的最大丑闻，检察当局先后逮捕了 14 人、起诉 17 人，被迫辞职的政界要人 50 余位——其中包括日本首相竹下登。值得注意的是，新闻记者在此案的揭露过程中竟然起到火车头的作用。

1988 年 3 月，一幢崭新的 20 层大楼在日本川崎市火车站前拔地而起，这幢大楼正是里库路特公司的川崎情报大楼。江副浩正董事长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又一次大功告成了，岂料这幢大楼的落成却是他钱权交易内幕败露的发端。

原来，1984 年 12 月川崎市制定了一个城市发展规划。根据这一规划，川崎市将在火车站附近 70 公顷的范围内建立一个技术开发区，这一计划的负责人是当时的计划调整局局长小松秀熙。为了获得在上述黄金地段修建大楼的地皮，江副浩正指示手下人与小松秀熙进行了接洽。双方一来二去，很快达成了交易。里库路特公司向小松秀熙“让售”其子公司宇宙公司未上市的股票 3 万股，每股仅作价 1200 日元。小松秀熙拿不出钱购买这些股票，里库路特的第一金融公司又向他贷款。1984 年 12 月，股票到了小松秀熙的手中。1986 年 10 月，宇宙公司的股票正式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小松秀熙将手中的股票以每股 5000 日元的高价倒手出去，净赚了 1.2 亿日元。当然，里库路特公司也不会吃亏，情报大楼的地皮能够到手自然是小松秀熙的功劳。

里库路特公司和小松秀熙之间的交易虽然是在暗中秘密进行的，但还是走漏了风声。1988 年 3 月，神奈川县地方警察根据举报，开始对小松秀熙的情况进行秘密调查，只是小松秀熙当时已升任副市长，警方不大想揭他的老底，很快又以“没有确凿的证据”为由停止了调查。

然而，闻风而动的新闻记者们察觉到了这次秘密调查。经过他们细心的观察、巧妙的探询和准确的分析，他们掌握了这次秘密调查的对象和内容。警方停止侦查后，《朝日新闻》的记者们根据已掌握的线索，决定独立进行调查。于是，在川崎分社副社长山本的指挥下，几位记者开始分头调查。

后来，山本获悉里库路特一位工作人员清楚股票的事，便决定派 26 岁的记者矶田到他家中采访。矶田第一次去采访时，这人满口答应帮忙，还说“过两天给回电话”。可是三天过去了，矶田还没有得到回音。矶田不等这人回音就第二次去找他，结果被拒之门外。矶田并没有灰心，他利用一个晚上叩开此人的大门，好说歹说，此人才拿出一份里库路特公司股票受让人名单给记者看。这张名单上列了 76 名社会名流，记者自然不可能全部记住，但是记者记住了小松秀熙、前文部大臣森喜朗等人的名字。

此后的半个月里，《朝日新闻》记者先后 6 次采访了小松秀熙副市长。小松秀熙对此事先是否认，后来在证据面前只得承认购买过里库路特公司的股票，但说这是在正常的、个人的、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的买卖。但从记者掌握的材料看，小松秀熙购买股票与里库路特公司在川崎市盖情报大楼存在有可疑问题。即使股票之事不触犯法律，或者警方并不认为此事已构成犯罪，可市政府高官同企业互相勾结，一方用权一方用钱侵犯公众利益，也已构成金权丑闻。

又经过半个月的调查取证，记者们确认情况属实、没问题后，于 1988 年 6 月 18 日将调查报告刊登在《朝日新闻》社会版上。

文章一见报，整个川崎市便沸腾起来了。6月19日，伊藤市长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要对小松秀熙接受未上市股票一事进行调查。川崎市市民、市议会也要求尽快查明真相。6月20日，小松秀熙正式向市长提出辞呈，但市长却以解职的方式予以处理。6月22日，中止侦查的神奈川县警察局又重新调查起来。

小松秀熙股票丑闻报导的成功，大大鼓舞了《朝日新闻》的记者们，他们决心要向政界顶峰突破，因为他们知道小松秀熙只不过是“股票受让人名单”上的小人物，更加惊人的消息还在后头。

于是，他们把原先采写的基本属实的前文部省大臣森喜朗接受里库路特公司股票一事，刊登在1988年6月25日的《朝日新闻》上，作为突破国家级领导人丑闻防线的第一炮。文章发表后效果果然不错，日本政界、财界一片哗然。接着，横滨支局和驻川崎市的《朝日新闻》记者从川崎赶到东京，开始从财界到政界顺藤摸瓜。

6月30日，《朝日新闻》刊出他们采写的消息：自民党政调会会长渡边美智雄、前防卫厅长官加藤纮一、前农林水产大臣加藤六月、民社党委员长纮本三郎接受过里库路特公司未上市的股票，渡边美智雄以长子名义收进5000股、获利2600万日元，加藤纮一买进5000股、获利2000万日元，加藤六月以次女和秘书名义买进1万股、获利4000万日元，纮本三郎买进5000股、获利2000万日元。

7月6日，头版报道：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大藏省大臣宫泽喜一、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助手接受过里库路特公司未上市的股票。

7月7日，头版头条刊登里库路特公司董事长江副浩正因股票丑闻败露而辞职和竹下登首相涉嫌之疑，社会、经济、综合版上也作了大量报道。

7月9日、10日、11日，《朝日新闻》连续刊载里库路特股票丑闻。此后，有关里库路特公司行贿的报道越来越多。

1988年7、8月间，日本新闻界始终以里库路特案作为报道的重点。在这些报道中，新闻界大体搞清了里库路特公司“让售”股票的情况：从1984年到1986年，江副浩正等公司高级职员共向各界名流出售了里库路特宇宙公司未上市的股票720万股，价格为每股2000至3000日元。但是，新闻界并未能够证明那些头面人物因为接受了股票而渎职。这一方面是由于里库路特公司“投桃”之后，名流们还未来得及“报李”，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东京地方检察厅仅仅作些表面文章，没有深入调查这起丑闻。

为了搞清达官显贵们受贿赂的真相，日本许多在野党组织了专门的班子，杜民联议员榑崎弥之助则与众不同，他只要儿子和秘书作助手。可是，最后成果最大的还是榑崎弥之助，江副浩正就是栽在他的手里。榑崎弥之助在调查中发现，为了增加资本总额，里库路特公司曾在1985年春向第三者发行过一批股票。后来，里库路特公司又把这批股票回购了76万股，专门用于笼络政要人士，并在1986年9月、10月间把股票转让给了包括13名国会议员在内的大人物。在日本众议院税制问题调查特别委员会一次会议上，榑崎弥之助毫不客气地将这一调查结果和盘托出，大大地给了里库路特公司一军。

急病乱投医的里库路特公司想出了一个自以为高明的解决办法。1988年8月30日，里库路特公司的子公司宇宙公司派社长办公室主任松原弘第6次登门拜访榑崎弥之助。这一次，松原弘特别干脆，直截了当地摊牌说，只要

榑崎弥之助放过里库路特这一关，公司将奉养榑崎一生。说罢这番话，松原弘还拿出了一包点心和—个装有 500 万日元的红包。然而，清正廉洁的榑崎不仅没吃松原弘的这套，当场予以严同拒绝，而且还事先联系了电视台的人在自—己的客厅里装了录像机，把整个行贿过程和两人对话录得—清二楚。1988 年 9 月 5 日，榑崎在国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揭发了此事。当晚，日本读卖电视台播放了松原弘行贿的实况。9 月 8 日，榑崎正式向东京地方检察厅控告了松原弘的反社会罪行。这—下人赃俱在，里库路特公司自然在劫难逃，而警方也不能再敷衍了事了。

1988 年 10 月中旬，东京地方检察厅介入此事，组织特别调查，立案侦查股票丑闻案件。为了取证，检察厅搜查了里库路特公司，并传唤正在医院避风的江副浩正到国会作证。

江副浩正是日本著名的实业家之—，他的发迹史再次揭露了日本根深蒂固的狼狽为奸的官商关系。

江副浩正 1936 年出生于大坂市天王寺区，身高 1.65 米。其父是—名教员，他 3 岁时母亲即离去。他中学学习成绩平平，属孜孜苦读类型。1955 年春天，江副考进东京大学教养部文科第二组。当有人问他今后的打算时，他说“想当教师”。他致力于个性心理学的研究，准备日后当个教育家。

1956 年，正在东京大学二年级读书的江副浩正被校内的—则招聘广告吸引住了。招聘广告是东大学生报社张贴的，东大学生报由于连年亏损而愿出月薪 1 万日元（当时大学毕业的小学教员月薪仅 8000 日元）聘请得力的业务员推销报纸、承揽广告。学费来源—向不宽裕的江副浩正毅然前去应聘。并揽下了这份差事。上任后，他不断登门拜访老校友，向他们大力推销东大学生报，同时又通过这些校友积极向公司靠拢。1958 年 6 月，江副浩正以学生打扮两度拜访丸红饭田综合商社人事部，终于从该公司争取到了—则企业招聘广告。此后，—个季度内江副浩正又为学报争取到了 12 家公司的广告。毫无疑问，丸红饭田商社的招聘广告是江副浩正勤工俭学生活中的—个重要里程碑。

1960 年 3 月，江副浩正在留级—年之后终于从东京大学毕业。这时的江副浩正虽然学业平平，但却为自己在—学习期间经商有道而自鸣得意。学生时代的小小成功极大地激发了江副创—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同年 4 月，他邀请—位也曾在学报工作过的好友—起创办了“大学新闻广告社”。开始，他们只聘请了—位女职员。由于人手紧张，江副—天常常要工作 15 个小时。此外，广告社的办公条件也相当差。当时，办公室是在东京港区芝大楼租的—间加盖房屋，里面只有两张旧桌子。由于办公室里没安电话，他们不得不借用大楼的公用电话。但是，这不过是万事开头难罢了。

1960 年 10 月，江副浩正集得资金 60 万日元成立了“大学广告公司”，他的企业也由“个体户”升格为“股份有限公司”。江副将公司搬迁到新桥附近—间 10 平方米的地下室，并雇佣了 3 名正式职员。但他大量雇佣东大工读生，这些人每周帮忙 2 至 3 天。1962 年秋天，他创办了自己的第—份刊物——《介绍各企业》，这份杂志后来成了大学广告公司的门面和顶梁柱。1963 年，江副又增资 500 万日元，将公司名称改为“里库路特中心”（里库路特乃是英语 re—cruit 的译音，意思是“招聘”）。《介绍各企业》是介绍企业概况、为大学生择业提供参—考的杂志，内容主要是企业招聘广告。1969 年以后，江副浩正又将《介绍各企业》改头换面，更名为《里库路特手册》而

大量发行。

正当江副浩正满怀信心、艰苦创业时，1966年日本一家“钻石出版社”发行了一本相同性质的刊物，其销售量后来大大超过了《介绍各企业》的销售量。这件事激发了江副的企业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使他认识到单单经营大学广告这样的无本生意是飘摆不定、靠不住的。所以，1974年又创办了里库路特宇宙公司，开始经营房地产业。1975年，他又开始进行企业兼并活动，并着手实施“第一次住宅情报连线网络”等一连串计划。

对于江副浩正来说，要想在竞争激烈的日本站住脚，就必须同政治权力结合。60年代，他以付给政治家优厚的稿费、演讲费形式向政界外围靠近；到了70年代，目标是盯着国会议员、以行贿手段向政界靠拢；进入80年代，行贿直射政权中枢人物。经过江副浩正的苦心经营，终于使里库路特公司在短短的30年内，发展成为有职工1.1万多人（一半左右为临时工、钟点工），拥有广告情报杂志、房产、电子、酒店、旅游业等27家子公司，年营业额达4800亿日元的大企业，成为日本信息产业的后起之秀。自1984年起，江副浩正相继加入了日本财界团体——经团联、经济同友会、日经会，并分别担任干事、评议员和常任理事，以“破例的年轻岁数”在财界确立了他的重要地位，并被称为日本信息产业的一颗新星。1985年起，他又先后担任日本教育课程审议委员会委员、政府税制调查会特别委员、土地临时调查会参事、大学审议会委员等要职。

里库路特宇宙公司股票丑闻被揭露后，江副浩正于1988年7月6日宣布辞去里库路特董事长职务；1989年2月13日，东京地方检察厅以行贿嫌疑逮捕了江副浩正。

里库路特事件在东京地方检察厅立案后，那些中饱私囊的政客们开始惶惶不可终日，一时间日本政坛刮起了一股辞职旋风，与里库路特股票案有染的政客纷纷被迫引退。政要辞职之风始于大藏省大臣宫泽喜一，而又以法务大臣长谷川峻的下马最为滑稽。

宫泽喜一身为日本副首相兼大藏省大臣，又是自民党内宫泽派的领袖，可谓“德高望重”。更有意思的是，宫泽喜一长得象一位老实巴交的老农民，平常素有廉洁的好名声。然而，宫泽喜一也未能闯过里库路特股票关。1986年9月30日，宫泽的秘书服部恒雄以宫泽喜一本人的名义买进了1万股里库路特公司的股票，股票抛出后获利4000万日元。其实，竹下登等高官也都买了此种股票，只是他们用的都是秘书或亲属的名义，事发之后都可以用“自己没参与此事”逃避罪责。宫泽喜一却是“老实人”直肠子，当初没留后手，一下子就被抓住了把柄。更为严重的是，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宫泽宣称买股票的钱是自筹的，手里却拿不出证据来，事后又被人揭穿，他是用里库路特第一金融公司的贷款作本钱买股票赚钱。这一下，宫泽再也无法狡辩，也无颜继续留在内阁之中了。1988年12月9日，宫泽喜一被迫辞职。

有关大臣阁僚因股票丑闻受到追究，给竹下登内阁带来严重危机。为重新树立竹下登内阁在全体国民中的形象，保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竹下登首相对内阁进行了改组。1988年12月27日下午，竹下新内阁正式成立。按照惯例，新内阁成员均与记者见面。由于此时里库路特股票案风潮正凶，主管司法工作的法务大臣长谷川峻自然成了记者注目的焦点。在记者招待会上，长谷川峻应对自如，博得了记者们的好感。当回答到他与股票案是否有瓜葛的问题时，长谷川峻还俏皮地说：“正因为没有瓜葛，所以才出现在你



们面前”，伊然一副何必多问的气势。可是，第二天日本报纸就登出了一条特大新闻：长谷川峻及其政治后援团体“迫进会”从1971年起每月都接受里库路特公司近千万日元的政治捐款。他的次子兼秘书却公开承认曾接受过股票之事，并证实向他父亲报告过。长谷川峻顿时哑口无言，只得在1988年12月30日上午宣布辞职，同时表示“惭愧不已，深表歉意”。上台下台，总共三天，你说长谷川峻这出戏演得滑稽不滑稽？

进入1989年3月份，日本内阁的辞职风潮已经告一段落，这时里库路特案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警方开始逮捕有确凿证据的行贿受贿者，原来以为钻了法律的空子可以不受惩罚的人先后落入了法网。警方的逮捕行动主要在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劳动省和文部省这三条与里库路特公司有密切联系的线上展开。

1989年3月6日晚，日本电信电话公司董事长真藤恒首先被捕，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秘书村田幸藏。日本电信电话公司是一家半官半民的股份公司，它的前身“日本电信公社”是国营企业，1985年4月1日起改组为半官半民的股份制以后，日本政府依然控制着该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垄断着日本全国的电话电报和国内外通讯业务，控制着所有国家级的超大型电子计算机系统。为了在信息时代图谋发展，江副浩正早已盯上了这家可以作为靠山的大公司。真藤恒是江副浩正最早结识的一个权贵，1985年8月和9月，江副和真藤两次会谈。当时，江副要求真藤对里库路特公司开始从事的信息业给予全面支持，真藤随即直接指示其亲信式场英、长谷川寿彦在转售线路和大型电子计算机等方面向里库路特公司提供便利。作为报答，里库路特公司在1986年9月30日前后向真藤转让了1万股股票。虽然这些股票在名义上是给真藤的秘书村田幸藏的，但转手后的收益2200万日元中，900万日元存入了真藤的银行账户，另外1300万日元则存入了日本电信电话公司秘书室长的政界经费保密户头，村田幸藏本人并未将钱纳入私囊。

在受审时，真藤恒狡辩说“全部是秘书干的。关于得到股票之事，在看到出售收益的领收单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但是，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亮出了表明真藤在磋商转让股票阶段即已知情的具体证据。真藤恒最后不得不低头认罪。1989年10月9日，真藤恒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里库路特公司是靠提供就业信息起家的。因此，劳动省官员也是该公司的重点行贿对象。1989年3月8日，东京检察当局分别以行贿受贿嫌疑逮捕了里库路特公司原社长室室长辰已雅朗和日本劳动省原事务次官加藤孝。

加藤孝在职期间，日本劳动省曾打算加强对里库路特公司出版物的管理和整顿，因为该公司的刊物登出的就业信息常常与事实有出入，引起了种种纠纷。江副浩正得知了这一消息之后，立即对劳动省官员进行了拉拢和疏通，并且收买议员，竭力阻止通过旨在严格规定有关就业情报刊物出版发行的“职业安定法”。在此期间，里库路特公司经常招待当时担任职业安定局局长的加藤孝及其下属主管课长鹿野茂打高尔夫球、钓鱼、旅游、到高级饭店就餐。里库路特公司的这一招果然灵验，1984年10月劳动省放弃了制定对职业介绍杂志加强限制的法规，而且与此同时加藤孝还在劳动省内积极活动，说服其他官员批准几家情报企业由里库路特公司牵头在东京都文京区设置“雇佣情报中心”。对于加藤孝的“功绩”，里库路特公司自然感恩不尽。1986年9月底，江副浩正等人以每股3000日元的低价向加藤孝出售了3000股未上市的股票，加藤孝在第二天股票一上市即行抛售，一下子净赚了690万日元。

日本文部省事务次官高石邦男也从里库路特公司捞了不少好处。早在1976年高石邦男担任文部省管理局振兴课课长时，里库路特公司就聘他为讲师，并在他的指导下发行《专科学校指南》。里库路特公司曾在高中进行“志愿”调查，并以调查为基础免费把大学、短期大学、专修学校等各领域的升学信息杂志送到高中生家中。但是，从1985年前后开始，专修学校的广告越来越夸大其词。而且学校与民间企业合作一起从中渔利。对于这种情况，人们提出了种种批评和改进意见。但是，当时身为文部省初等中等教育局局长的高石邦男，不仅一味袒护里库路特公司，而且还在1985年9月积极帮助江副浩正获得了教育课程审议委员、大学审议会委员等职位。为了报答高石邦男，江副浩正指示彩釉陶器公司总经理小林宏到文部省次官高石邦男那里提出了股票转让事宜。只想占便宜的高石邦男居然还怕里库路特公司的股票不赚钱，在请教了证券公司的专家后，高石邦男才认定此股票有利可图。于是，高石邦男一分钱没掏，完全用彩釉陶器公司的贷款换取了1万股股票。1986年11月中旬，正当里库路特公司的股票涨到每股5000多日元的时候，高石把股票抛了出去。然而，高石邦男意想不到的，好处捞足之后居然还会“甘尽苦来”——1989年3月28日，高石邦男和小林宏分别被东京地方检察厅以受贿罪、行贿罪依法逮捕。

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劳动省、文部省三条线清理完毕之后，人们自然又把注意力移向了更高层，而这时万众瞩目的正是首相竹下登。

1989年3月31日，《朝日新闻》杂志再次一马当先，刊出了一篇题为《里库路特公司购买2000万元竹下“鼓励会”的宴会券》的报道，直接把矛头指向了竹下登。这则报道说，1987年5月21日下午6点，竹下登及田中角荣派内的竹下登支持者在东京王子饭店举办了一个名为“鼓励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晚会”的宴会。这次宴会门票高达3万日元一张，总销售额达21亿日元。关于宴会券，日本自治省的解释是：“只要宴会券的价格在社会常识的范围内，购买张数也是以出席宴会为前提，就不成为政治资金法中的捐款。”相反，购买多得无法出席的大量宴会券，就应该看作是“捐款”。在王子饭店举办的这次宴会，售出的门票有7万张左右，可是出席人数仅是1.3万人。由此看来，宴会的集资性质是相当明显的。而且，也正是在这次宴会上竹下登宣称“贡献出五尺之躯是我最后的使命”，事实上表明了他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的决心。

既然购买这次宴会券应被视为政治捐款，那么购买者就应遵守政治资金法的有关规定。其实不然。1987年5月里库路特公司的资本为16.2亿日元，按政治资金法的规定，它一年对政党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家的捐款最多为1500万日元，对其他政治团体的捐款最多为750万日元。里库路特公司一下就购买了700张竹下“鼓励会”宴会券，耗资达2000万日元，显然超过了以上所说的法定限额。由此可见，对于“宴会券”买卖双方来说，其行为都是违犯“政治资金法”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9年4月5日，日本《每日新闻》又发表了一则有关竹下登接受里库路特公司捐款的消息，题目为《里库路特曾购买竹下登后援组织举办宴会的3000万元的宴会券》。报道说，1987年5月，竹下登的后援组织“岩手长期政策恳谈会”在岩手县盛冈市举行宴会，里库路特公司又出资3000万日元购买宴会券。此外，报道还说，宴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竹下登在里库路特公司经营的球场与“岩手长期政策恳谈会”的成贝进行了

高尔夫球比赛，随后竹下登又乘里库路特公司的直升飞机飞回东京，此行一切费用均由里库路特公司负担。4月5日的《每日新闻》同时还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党委员长主张建立“国民联合政权”》的文章，报道了社会党委员长土井要求竹下内阁总辞职的消息。

正当竹下登为了宴会券问题而愁眉不展的时候，日本时事通讯社又在1989年4月7日抛出了《又发现新的事实》一文，揭露里库路特公司还曾向竹下登提供过2500万日元的捐款。

1989年4月7日下午，日本四大在野党举行两年多来的首次首脑会谈。在野党首脑们一致认为“现在时局是战后政治史上未曾有过的重要时刻”，决定采取联合行动“倒阁”。次日，自民党内部也发生了不利于竹下的征兆。日本的资深政治家、前国务大臣河本敏夫在茨城县下茨市发表讲演，“要求在参议院选举前谋求人心一新”，实际上就是向竹下登提出了下台建议。

竹下内阁到了山穷水尽、走头无路的境地，可是，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有识之士会议”却献出了一条转危为安的锦囊妙计。以前内阁法制局长官林修正为首的“有识之士”们建议竹下登“率先垂范”，坦率地讲明自己同里库路特案的关系，以求得国民的原谅。到了这种时候，竹下登也只有接受建议把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1989年4月11日上午9点半，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开始举行会谈，竹下登在会上——交代了他与里库路特公司的金钱关系。竹下登除对众所周知的情况作了一些补充说明之外，还主动交待了一些新情况。比如，在1985和1986年还得到了2000万日元的捐款，1987年5月21日的“鼓励会”除里库路特总公司买了2000万日元的宴会券外，里库路特的宇宙公司还买了3000万日元的宴会券。据竹下登本人说，他和亲信们共从里库路特公司方面得到了1.51亿日元。虽然这一数字远远地超出了人们的预计，但是，由于竹下登表示他对接受里库路特公司捐款负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首相的“决然行为”果然博得了公众的谅解。这样以来，竹下派的干部们都说“首相本人的问题清楚了”。内阁官房长官小渊也说，“这样以来，对首相本人的追究将告一段落。”

然而，竹下登本人暂时得到解脱只能算是结束了竹下内阁与国会之间分歧的一个问题，重大问题的分歧还远远没有解决。政府迫切希望议会能够通过1989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而在野党表示：除非能够传讯中曾根康弘到国会作证或者竹下登内阁总辞职，否则对预算案不予审议。

里库路特股票丑事发生在中曾根康弘任首相期间，政府腐败他当然负有领导责任，而中曾根康弘本人也不清白。他曾用两位秘书的名义购买了里库路特公司2.9万股未上市的股票，抛售了其中的2.3万股，获利6385万日元。此外，里库路特公司还给中曾根提供了3500万日元的政治捐款，购买他的宴会券1071万日元。这几项总计达1.1亿日元，中曾根承认他确实拿了这些钱。可是，有一件事中曾根始终不肯承认。1988年夏，里库路特公司拿出3500万日元的现金对自民党内15名有实力的人物进行拉拢。在其名单中就有中曾根康弘及其长子中曾根弘文参议员。具体细节是：1988年8月20日前后，里库路特公司向中曾根父子分别支付了500万日元和100万日元的支票。但这两笔钱又退回了里库路特公司。许多人怀疑，中曾根父子是在里库路特公司向社民联议员榑崎弥之助行贿事件揭露后，怕事情败露才急忙退回的。中曾根康弘口气十分坚定地说：“根本不知道有此事。”真相究竟如何？人们

自然要求中曾根接受传讯到议会作证，把一切都交待清楚。

但是，中曾根康弘向来是一位强硬派人物。他认为，接受传讯去作证无异于承认自己不清白，这有损于他作为自民党最高顾问和前首相的尊严。此外，中曾根还担心，一旦传讯开了头，自民党的政界要人将被一个个带上证人席。因此，他表示“坚决拒绝”传讯。另一方面，在野党也不示弱。他们表示，中曾根一天不到国会作证，他们就一天不参加1989年度政府预算案的投票。这一下竹下登被难住了。若是依了中曾根，预算案肯定通不过，可是新的财政年度已经从4月1日开始，政府不可能长期靠为期50天的临时预算运转。若是依了在野党，强迫中曾根接受传讯，那么竹下登又势必会失去中曾根派的支持而跨台。左右为难的竹下内阁简直只有死路一条了！

可是，屋漏偏遇连阴雨，里库路特案居然又有新发展。1989年4月14日，《朝日新闻》又发表了《里库路特公司向安倍夫人支付过900万日元的顾问费》的报道。报道说，在里库路特案曝光前的两年零七个月里，即1986年2月至1988年8月，里库路特公司每月给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太郎的夫人安倍洋子30万日元的顾问费，总计已达900万日元。

在同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安倍晋太郎不得不承认了这一事实，但他强调自己和妻子在接受记者采访前对此事一无所知。他宣称：“我身居繁忙的职位，资金方面的事情都委托秘书办理。顾问费一事就是清水二三夫秘书经办的。顾问费已成了我的家庭收入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但是，安倍又说，“不管怎么样，作为干事长我深感负有责任。”把直接责任推给秘书，然后再假惺惺地表示愿意代部下受过，这种政客推卸责任的惯用手法还能骗得了谁呢？

1989年4月21日，自民党和在野党关于预算案问题的谈判正式破裂，负责在朝、野之间穿针引线的安倍晋太郎连忙称病住院，竹下内阁终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1989年4月22日，日本新闻界给了竹下登最后的一击。这一天，日本报纸以大字标题报道说，1987年在竹下登竞选首相时，他的秘书青木伊平从里库路特公司借了5000万日元的巨款。于是，竹下登“彻底交代”的形象被揭穿了。对此，日本国民十分愤慨。

1989年4月23日，竹下登首相的邻居约60多人在东京竹下寓所举行集会，强烈要求取消4月1日实行的新的3%的消费税，并呼吁竹下内阁总辞职。这一“家门失火”，更使得竹下登的处境雪上加霜。

1989年4月25日，走投无路的竹下登在上下一片谴责声中宣布了辞职意向。他表示：“里库路特事件延续到今天，招致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仍在扩展，作为政府最高负责人和自民党总裁，我对此痛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向国民深表歉意。为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任，我决心引退。在国会通过1989年度预算案后，内阁将总辞职。”

就在竹下登宣布引退的当天，国会传问了前任首相中曾根康弘。1989年5月31日，中曾根在自民党内和国民的强烈抨击下，他宣布辞去中曾根派会长和自民党最高顾问职务，放弃自民党党籍。

竹下登声明辞职后，东京地方检察院当即表示，首相的辞职声明并不妨碍对里库路特案件的追查。在野党人士也表示，竹下登声明辞职并不意味着就不再追查此案。

1989年4月25日，竹下登的前秘书青木伊平为保全竹下登的声誉含恨

自杀。

竹下登声明打算辞职后，往常争夺激烈的首相宝座居然受到冷落。当时人们曾希望比较清廉的伊东正义出任，但伊东正义却不愿意收拾这个烂摊子，他托词有病，千唤万唤就是不出山。万般无奈，自民党最后推选与里库路特没有牵连的宇野宗佑继任竹下的首相之职。

1989年6月2日上午，竹下登在自民党国会议员会议上宣布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宇野宗佑接替竹下登任自民党总裁。中午，竹下登在内阁会议上宣布内阁总辞职。晚上，宇野宗佑出任新首相。第二天，宇野内阁正式宣布成立。

1989年7月24日，日本举行了第15届参议院选举。结果，自民党惨遭失败。

按选举法规定，日本参议院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一半。在过去的历届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均以多数占据参议院的主导地位，在最困难的时期每次改选当选数也不低于60席，可在这次改选的126席中，自民党只得到36席，比改选前减少33席。作为反对党的社会党则获得46席，成了在参议院中可以与自民党分庭抗礼的第二大党。对此，有人推算，如果当时参议员全部改选的话，自民党将会把首相宝座交出来。

自民党这次参议院选举失败的原因有：强行实施消费税、农业政策的软弱、里库路特股票丑闻以及宇野宗佑首相的桃色丑闻。其中，里库路特股票丑闻使自民党腐败的金权政治彻底暴露于国民之前，使国民对自民党的政治统治失去了信心。

回顾里库路特案追查的全过程我们不难看到，没有比较健全的民主监督体制，里库路特案是不会追查到最高权力人物——首相头上的。

## 日本首相宇野宗佑的桃色丑闻

宇野宗佑是在自民党落魄时被自民党推举为首相的，这位被自民党公认的首相“最佳人选”刚上台不久，就被日本国民挑出了“毛病”——寻花问柳。在多党竞争中，宇野宗佑不仅没能力挽狂澜使自民党守住阵脚，他的桃色丑闻反而使自民党的处境雪上加霜。在一片指责声中，宇野宗佑度过了他68天的首相生涯。

1989年4月25日，因陷入里库路特股票案竹下登首相声明将在新年度预算案通过之后内阁总辞职。竹下内阁解体后谁来收拾残局，一时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自民党总裁”与“日本首相”这两把交椅金碧辉煌、极具魅力，自民党内七大派系的几个头头哪个不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然而，这次他们谁也不敢出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屁股都不干净，都与里库路特股票案有这样那样的瓜葛；如若出马角逐，必是一败涂地，所以，一个个都很识相，不敢奋勇当先。

竹下登在辞职前夕首先相中了自民党总务会长伊东正义。在竹下声明引退的当天，即4月25日，竹下派的首领、副总裁金丸信表示：“现在恐怕除了伊东正义没有别人能行。”第二天，安倍派、中曾根派、河本派和宫泽派分别召开会议，一致确定伊东正义继任首相最合适。共同社当天报道说：“伊东正义接班在自民党内大势已定。”

伊东正义出生于福岛县会津若津市，时年75岁，中等身材，虎背熊腰，最大的特点是头特别大，最突出的性格是人倔强。他认准是正确的，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伊东正义膝下无子女，患糖尿病多年，和夫人辉子住一套木建两层小屋，在世田谷区千岁台一带是最破的一套房子。在自民党政治家中，他的清廉也是首屈一指的，这是他此次得到日本各方一致推举为首相人选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伊东正义对别人垂涎三尺的首相职位似乎全无兴趣。1989年4月26日，官房长官小渊惠三正式请求伊东接替竹下登任首相，伊东以身体不好拒绝了。他说：“一旦因病中途辞职，还会给国际交往带来麻烦。”伊东正义认为，自民党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而党的主要领导人对此都认识不足，如不采取果断的改革措施，即使他上台，也难以贯彻廉政方针。

但是，伊东正义也表示，临危受命不是不可以，条件是首先解决因里库路特股票丑闻所造成的失信于民的问题。他认为，派系是引起金权政治泛滥的原因，所有与里库路特丑闻有牵连的党内领导人物要全部从内阁中引退，起用清廉能干的年轻人；如不取消派系，以全党一致的强烈危机感进行彻底的意识革命，那种“只换书皮，不换内容”的做法无法恢复国民对政权的信赖。他表示，不同意解决这些问题，绝不继任首相。

尽管伊东正义提出的接任首相的条件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但鉴于自民党面临的困境，竹下登及元老派和中坚议员还是表示可以理解伊东的意见，为伊东创造条件，使他出马组阁。

但是，由于中曾根派坚决反对中曾根康弘到国会作证等有关问题，加上中曾根派骨干、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美智雄（与里库路特股票案有牵连）故意刺激伊东说：“只要现在的选举制度存在，派系就不能没有；只要不改变选举制度，谈论解散派系只不过是说漂亮话；应该明确说清想不想接任，别

一边说不接任，内心却想接任。”结果，伊东闻此言后倔强气顿时冒了上来，说什么也不干了。

在此情况下，自民党几位负责挑选接班人的元老煞费苦心，在冷却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做伊东的工作，强调目前非他不行，要以国事为重。但硬骨汉伊东仍断然拒绝三顾之请。之后，在新的候选人名单上，出现了原首相福田纠夫、原副首相金丸信、前众议院议长坂田道夫、前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原国务相河本敏夫等。但这些人全是“老弱病”者，没有一人能赢得党内多数人的同意。如此多次反复，耗时一个月之久也未选出合适的接班人。

1989年5月25日，竹下登亲自点将，将宇野宗佑确定为首相候选人。

1989年6月2日，竹下登宣告辞去自民党总裁和首相职务，并宣布内阁总辞职；宇野宗佑接任自民党总裁并当选日本第75任首相。1989年6月3日，宇野宗佑宣誓就职，重新组成新一任内阁。

宇野宗佑，1922年出生，1951年当选县议员。1960年以来，他9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在执政的自民党内部，他先后担任青年局长、人事局长和代理干事长。在田中角荣、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内阁中，曾担任防卫厅长官、通产省大臣、外务大臣等重要职务。在竹下内阁中，他担任外务大臣（即外相）。宇野宗佑与中曾根康弘的关系非同一般，宇野自称是中曾根的“大弟子”，中曾根则把宇野当成自己的代言人。竹下登力排众议，极力推举宇野宗佑继任首相，除了深知宇野的政治背景之外，最重要的是为了解决自民党金权政治的形象问题，因为宇野宗佑与里库路特股票丑闻没有牵连，向来以清廉正直为人称道，当然就成为最合适的首相人选。

宇野宗佑就任首相后，1989年6月5日在日本众参两院发表施政纲领，提出新内阁要努力改变日本在世界上的“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形象，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使日本作为西方和亚太国家的重要一员，履行更多的国际义务，逐渐成为世界政治大国。同时信誓旦旦地要针对现行的日本政治进行改革，重建日本人的伦理道德。其目的就是要铲除产生金权政治的土壤，全面更新自民党在全民中的形象，使国民对现行政治给予信任。他在新内阁中起用了一批年轻人，并且改变过去选任首相本派人士做官房长官的作法，任命安倍派的盐川为官房长官，努力给人以务实和清新的印象。7月份将要举行的参议院大选马上临近，他期望自民党能顺利通过大选。

宇野面临的是自民党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涉嫌接受里库路特公司贿赂的国会议员有40余人，中曾根康弘、竹下登都未能幸免，宫泽喜一、长谷川峻、竹下登均因此而辞职，民意测验竹下内阁的支持率只有9%。宇野上台后，自民党期望他能自民党稳住阵脚，在7月份参议院大选中不至于损失太大。

然而，愿望只是愿望，日本政坛并未因此而趋向稳定，宇野刚刚上台，就陷入东京新闻界的包围之中，日本政坛又掀起丑闻风波。

日本新闻界素以穷追猛打、刨根问底的泼辣作风而著称于世。在洛克希德贿赂案、里库路特股票案中，新闻界跟踪采访，起到了检察部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宇野的桃色丑闻也起源于新闻界。

6月5日，即宇野当选首相的第3天，东京《每日周刊》以醒目的标题刊登有关宇野首相丑闻的文章。文章说，据一个名叫那阿西、现年40岁的神乐坂原艺妓揭露，从1985年至1986年间，宇野同她“相好”过5个月，为此他一共支付了300万日元（合2.1万美元）。

时隔不久，6月12日《新潮周刊》又爆出另一新闻：在宇野与神乐坂艺妓相好之前，宇野与原赤坂艺妓波津子保持了10年之久的关系，直到1984年宇野才将她“抛弃”。在他们相处期间，宇野每月给她10万日元（合700美元）。

此后，《新潮周刊》又乘胜追击，披露了宇野首相前秘书的揭发材料，说从1962年到1972年，宇野曾付一笔数目不明的钱给银座一间酒吧的女老板，她与宇野相好期间曾怀孕堕胎。

接着，东京小报又传出消息，说66岁的宇野竟与一个16岁的雏妓有不明不白的关系。

日本新闻界沸沸扬扬，海外舆论连篇地转载，日本朝野震动，宇野首相坐立不安。

宇野与艺妓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6月18日《每日周刊》以《宇野首相的丑闻》为题，发表了专题采访。内容如下：

宇野首相不是靠“政治实力”而是靠“廉洁正派”登上首相宝座的。但是，有人在问这位新首相：“你做人的道德哪里去了？”“用金钱可以玩弄女人吗？”诸位请听听被他玩弄过的妇女的“控诉”吧。

我们假定把这位妇女称“A子”。A子是一位美人，现在东京一家设计公司工作，40岁，过着单身生活。1985年，她不顾旁人的反对，与丈夫离了婚。后来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便在东京新宿区的花柳街神乐坂当了艺妓。

采访长达6个小时。

问：你具体介绍一下同宇野首相的关系，好吗？

答：我是艺妓，他一见钟情，就成了我的“丈夫”。宇野先生通过料亭（高级酒馆）女老板告诉了我所在的艺妓馆里的女老板。

问：有金钱上的授受关系吗？

答：当时得到了200万日元，是现款，不是转帐支票。钱是装在一个信封里给我的，信封上印着议员会馆的字样。钱是包在一张粉红色的信纸里。

问：你和宇野首相最初是怎么认识的？

答：是我去料亭陪客途中被他看到并向别人打听我是谁的。从那以后过了一周或10天的样子，在一家料亭的二楼正式认识了宇野首相。他问我“知道我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便叫人拿来一本他写的介绍他的故乡的书给我，并强调让我看作者介绍。上面写着科学技术厅长官、通产大臣等头衔。我想他是借以炫耀自己。然后他捏住我的3个手指问：“这个数如何？”

问：做你“丈夫”时举行过什么仪式吗？

答：在料亭，先生和我，另外还有两家酒楼的女老板，4个人一起用啤酒干杯、吃饭。

问：除前面谈到的200万日元以外，还有什么钱吗？

答：年底先生回故乡滋贺时，给了我100万日元。除此以外，再没给什么钱了。

问：他说做你“丈夫”，提出了什么条件了吗？

答：说不能生孩子，随叫随到，其他随我的便。

问：你们双方没有长时间保持关系，是什么原因呢？

答：那年新年发生了“妈妈”（艺妓对其女老板的称呼）被气哭的事情。每年新年，宇野先生有一个习惯，就是款待一次支持他的人。记得是1月3日或4日的事。我负责为来客分发“丈夫”的礼品袋，艺妓馆的女老板为欢



迎她店里艺妓的“丈夫”到来，高兴地跳起了舞。当我必须告辞去招待客人时，妈妈觉得是新年第一次相见，便说“先生，你去送送她吧！”。可是，宇野先生却说“为什么要我去送？岂有此理！”，接着他又朝着妈妈骂道：“没请你来，就擅自跳舞摔倒献丑，没有教养！”。妈妈已是老太婆，而且她在跳舞时也根本没有摔倒。宇野先生的所作所为，不仅不象个男子汉，而且是欺侮人。

另外还有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到我家，说：“我回到了东京，快告诉我你的公寓。”我回答说：“不要来，我家很乱。先生，我是女人，请你不要来。”可是他还是找来了。他可能认为，是他付了钱，随便怎样都行。我感到，宇野先生在心理上对我构成了一种压力，我不仅不能以与他的关系为骄傲，而且害怕暴露出来。如果让人知道，我就不能接客了。

问：你“告发”当代首相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答：也许有人会说我以这样一种方式谈论一度相处的人是泄私愤。可是他现在是一国之首相，如果他以对待我的那种轻率态度来处理国家政治，就实在不能容忍了。欺侮软弱老太太的人怎么能当一国首相呢！认为女人可以用钱买来供自己寻欢作乐，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宇野先生的人格不能说是高尚的。

《每日周刊》社为证实这些讲话的真实性，进行了广泛的采访。除那家料亭的女老板否认外，其他有关人士都承认A子与宇野的“关系”。

6月26日，星期一，宇野首相会见记者，当被问及上述方面的问题时，连连表示“无话可说”。

宇野的风流韵事在报刊上披露后，不仅在政界、财界引起强烈反应，在妇女界也掀起了阵阵波澜。

日本是一个男权主义社会，日本妇女的地位在世界上名列第34位，这与日本的经济水平很不相称。日本在教育 and 就业方面对女性的歧视是严重的。1988年有关部门曾对日本1000家公司作了调查，结果发现担任部门级负责人的妇女只有150名。虽然日本在1985年通过了不准在就业中歧视妇女的法令，但是迄今为止日本妇女还只有“乞求”而不是“要求”男女平等就业的权利，而违反法令的雇主则依然“逍遥法外”。

象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的性观念比较开放，色情业十分发达。但日本社会的特点是，在性自由方面男女不平等格外突出。对丈夫在外寻花问柳，日本妇女一般也不闻不问。一名有3个孩子的42岁的母亲说：“日本女人对她们丈夫的艳事一般都持不闻不问的态度。她们认为只要男人不将那一身脏病带回家就算了。”

象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色情服务业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十分低下。人们不能接受作为国家首相与艺妓密切来往，人们不能想象一个艺妓会当着电视观众的面出面揭露首相。人们也不会想到，宇野丑闻竟唤起了日本妇女的觉醒。

6月13日，日本7个妇女团体联名提出抗议，并开始走上街头抗议，舆论沸沸扬扬。东京一名女政治评论员慷慨激昂地说：“时代已经彻底改变。即使日本还是个男性社会，这种事也不应该发生。我们妇女的力量正在日益壮大，我们决不允许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对待女人就象对待一双破袜子一样。”

当然日本舆论对艺妓的评说不一，但宇野与艺妓的关系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长期以来以描写男女恋情闻名的作家濑户内寂德撰文认为，选择

这种妇女的男人没有资格当首相，怎么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没有眼力的人呢？评论家盐田丸男也认为，这个艺妓的作法虽然并不光明正大，令人厌恶，但事情已经在电视上曝光，宇野应该在公共场合明确承认。

日本国内妇女团体紧紧抓住宇野丑闻，将此作为宇野对待妇女“人权”的态度，追究首相的“性道德”。妇女们认为，首相的行为是用金钱买女人的买春行为，是国民难以接受的。“财团法人日本基督教妇女矫风会”、“亚洲妇女会”、“新日本妇女会”等组织纷纷呼吁，“不准宇野欺侮妇女”和“宇野早日下台”。

日本女评论家通口惠子和政法大学教授驹尺喜美两人主办了一次“宇野问题座谈会”，与会者150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参加座谈会的日本女性一致认为，许多上层社会的男士们凭借权力和金钱把女性占为己有，这样是无法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的。第二天，主办人将抗议信亲自送到首相官邸。这份抗议信说，首相的女性问题并非私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尊严的政治性的问题。首相至今不对此事作出明确答复，这是不能容忍的，要求首相马上辞职。

面对舆论高涨、妇女斗争、在野党抨击、议员质询，宇野宗佑开始慌张起来，因为无论如何表白，也无法掩盖事实、证明自己清白。宇野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他将不得不辞职以谢天下。

6月27日傍晚，被桃色丑闻搞得焦头烂额的宇野流露出辞职的念头，但是桥本干事长极力挽留。因为，如果宇野立即辞职，必然给即将到来的参议院选举带来极大的影响。因此，自民党内部一致要求宇野坚持到参议院选举过后。

7月24日，参议院选举揭晓。126席改选议席，自民党只获得36席，比改选前减少33席，社会党当选46席，比改选前增加24席。34年来，在野党的总席位第一次超过了自民党。

7月24日上午，宇野宗佑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对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败“负全部责任”。他声泪俱下地表示：“失败的责任全在我，我已决心辞去首相和总裁职务。”当记者们追问“桃色事件是不是影响到参院选举”的问题时，宇野没有正面回答，但间接予以承认“责任全在我”。

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自民党经过幕后磋商，破格推荐小派系河本敏夫派的首领、年轻的海部俊树出马组阁。1989年8月9日，58岁的海部俊树继任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宇野内阁正式倒台。

## 美国五角大楼舞弊案透视

五角大楼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几座规模宏大的办公大楼之一，它是美国国防部所在地。80年代末，就在这座庞然大物内，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海军调查局“挖”出了一桩美国“国防部有史以来的最严重的军火采购丑闻”。此案情节之严重，涉及面之广，令人“无法想象”。

1988年6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海军调查局针对五角大楼贪污受贿案联手进行的代号为“歪风”行动的调查，已进入公开收网阶段。6月14日，38名军火承包商、军火工业咨询顾问、五角大楼官员的办公室和住宅被搜查，其中包括空军部部长助理帮办、海军部部长助理帮办等人的办公室和住宅。有的办公室和住宅甚至被贴上了封条。

令人惊讶的是，这次“歪风”行动的调查计划是如此的秘密，以至于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司法部长等都“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在该计划实行公开收网调查的“最后时刻”才被告之。

事实上，“歪风”行动在1986年9月就因一名前海军部职员的举报而开始实施。当时，这位前海军部职员已退役在一家军火承包商的公司内做工，他曾“因看不惯有些事情的做法”而牢骚满腹。1986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位曾在海军部工作过的军火工业咨询顾问约翰·马洛的电话，马洛说他有一些国防机密要出售。于是，这位前海军部职员立即把所听到的电话内容报告了海军部。海军部获悉此事后，非常重视，会同联邦调查局拟定了“歪风”秘密侦查计划。他们一方面指示那名举报者继续与军火工业咨询顾问马洛保持联系，另一方面又在征得法院的准许下，对五角大楼内12部电话机安装了录音设备，甚至还在国防部的顾问办公室等处悄悄地装上了窃听器，以截听国防部的电话通讯内容。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这次法院授权的电话录音进行了291天，录下了4800次谈话，其中571次涉及违法活动。经过两年之久的秘密调查，联邦调查局和海军调查局根据谈话录音，顺藤摸瓜，掌握了国防部官员接受军火承包商贿赂出卖招标情报的证据，便决定于1988年6月14日进行公开搜查。直到这时，联邦调查局和海军调查局才把“歪风”行动的调查经过通报了总统里根、国防部长卡卢奇、司法部长米斯。据负责此案的官员说，他们事先没有通知上层的秘密做法是“明智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最后谁会落入网里”。

由于“歪风”行动出人意料地在美国总统眼皮底下抖出又一起受贿丑闻，这使里根总统十分尴尬。1988年6月16日、17日，里根先后召见国防部长卡卢奇、司法部长米斯、联邦调查局长塞申斯共商对策，并指示执法官要“尽快”查清。里根之所以对此事表现得“非常关切”，是因为这桩发生在五角大楼的受贿丑闻在美国国防部历史上是空前的，里根害怕因此而影响了自己的形象。

据报道，参与行贿五角大楼官员以探听情报、承揽国家防御合同的美国军火生产公司多达20余家，其中有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诺思罗普飞机公司、波音飞机公司、联合科技公司、尤尼安电脑公司等；涉及国家防御合同近100项，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受牵连的退职、在职的五角大楼官员有100余人。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工业界人士。甚至众议院中也有5名议员卷入此案（其中民主党议员4名、共和党议员1名）。

在这桩案件中，对前海军部助理佩斯利的指控证据最为充足，也最引人

注目。佩斯利出生于俄勒冈的波特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出色的飞行员，在欧洲上空驾驶 P—47 战斗机参加过多次战斗。当他以空军上尉军衔退役后，被著名的波音公司聘为助理工程师。此后他步步高升，当上了一家子公司的国际销售部经理，在此期间佩斯利与波音公司顾问约翰·莱曼成为挚友。1981 年莱曼当上政府海军部长不久，就提名佩斯利为负责研究、工程和设备的副部长，可谓平步青云。

在佩斯利的犯罪活动中，国际咨询顾问威廉·加尔万是其合伙人之一。加尔万虽然没有国际事务经验，也没有在五角大楼工作过，但在商业利润的追逐上极具天赋，成为几家军械公司的咨询顾问，也成为佩斯利的密友。

佩斯利和加尔万的第一笔交易成交于 1985 年圣诞前后。当时两人敲定了一个计划，挑选马丁·玛丽埃塔公司为海军一项研究计划的主要承包商，佩斯利从这一公司收取经济利益。1986 年 6 月，佩斯利不顾下属的反对，指定这一计划由马丁·玛丽埃塔公司主承包。1987 年 1 月佩斯利离开五角大楼后，海军部取消了同玛丽埃塔公司的合同，但是佩斯利已从该公司拿到 20 万美元的报酬。

1986 年，佩斯利为斯佩里公司投标竞争海军机场雷达监视系统作出过“突出贡献”。他花费了极大心血阻止了将合同授予另一家竞标公司的计划，然后设法让同僚改变竞标的某些条款使其有利于斯佩里公司。他甚至私下将竞标对手的情报告诉加尔万，由加尔万帮助斯佩里公司出谋划策。如此努力，终于使该公司赢得了这笔 4500 万美元的合同，另外，在为驱逐舰和小型巡洋舰的神盾武器系统提供雷达发射装置的竞标中，佩斯利又帮助斯佩里公司获胜。佩斯利如此卖命，当然不是白干。1986 年 8 月斯佩里公司副总裁以其顾问尼尔的名义，以 14.9 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了佩斯利在太阳谷的公寓，一年以后以 10 万美元的价格将此公寓售出。佩斯利 1987 年 1 月离开五角大楼后，斯佩里公司聘请他为咨询顾问。从 1987 年 5 月到 1988 年 5 月，该公司共向佩斯利支付 9.8 万美元。

离开五角大楼后，佩斯利立即着手同加尔万一起将他掌握的内部情报变成硬通货。当时，联合科技公司的“普拉特与惠特尼”分公司正与通用电力公司争夺 F/A—18 战斗机的生产权。因通用电力公司的报价低，海军部正准备将全部合同交给通用电力公司。佩斯利告诉加尔万他掌握通用电力公司投标的情报，加尔万立即安排“普拉特与惠特尼”公司头头尤金·塔利亚与佩斯利会面。在佩斯利的指点下，塔利亚重新修改了报价，结果于 1987 年 6 月 4 日得到了合同。当天，联合科技公司就聘请佩斯利为公司咨询顾问，并在此后的一年里向他支付了 21.8 万美元。

卷入此案的人士中，除佩斯利外，还有海军四星上将、前太平洋舰队司令莱昂斯。此外，前海军部长莱曼的手下至少有 5 名部长助理帮办于过“泄漏机密文件”换取金钱的勾当。这些文件包括国防预算和采购备忘录，甚至莱曼同前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的内部通信也被捅了出去。

这桩“美国国防部历史上最严重的军火采购丑闻”被抖出来以后，美国舆论为之哗然，人们纷纷要求政府迅速查清，并严惩犯法者。布什作为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为了不让这一丑闻搅了他竞选美国第 41 任总统的前程，在“震惊”之余，公开表示他“决不会容忍五角大楼或国会中的不法行径”。美国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也于 1988 年 6 月底先后宣布，将对此案的调查举行听证会。到 1989 年 1 月底，在卷入这桩丑闻的众多人员中，“已有 8 人承认有罪”。

此外，五角大楼在已定案的 299 个贪污受贿事件中，“共追问了将近 3 亿美元的赃款和罚金”。

1980 年里根竞选总统时，曾信誓旦旦地说，在他任总统时，他将连根拔除国防部内的浪费现象。然而，在里根总统两届任期即将届满之际，人们在五角大楼依然看到“总是有许多钱到处流淌”，以至于在五角大楼内爆出了这桩“令人无法想象”的超级丑闻。这是为什么？美国舆论对此议论纷纷。

有的议员认为，这是多年来五角大楼一直存在的“严重的管理问题”造成的。因为美国政府过去挑选官员时“只考虑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信仰，……而不考虑他们是否擅长管理”。事实也确实如此。例如上面所提到的佩斯利，他早在波音飞机公司任职时，就有过贿赂国防部官员、对公司的竞争对手进行窃听活动等不光彩经历。但就是这样一个行为不端的家伙，居然被前海军部长莱曼委以重任。另外，根据报道，早在 1985 年当时的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就得到密告，说有的海军官员泄漏机密给承包商；然而，他却置之不理、听之任之。由此可见，温伯格“对五角大楼的管理松散”到了何等程度。

诚然，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对五角大楼的管理松散是非法的交易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导致这桩超级丑闻产生的根本原因恐怕是因为“在里根执政年代”庞大的军费开支引起了人们“极度浪费和贪心”。

众所周知，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其国民生产总值为全世界之冠。在里根执政期间，每年国家开支达万亿美元。而投资最大者当推国防开支，每年大约花费 3000 亿美元。五角大楼每年几乎将国防预算开支的一半用于订购军事物资和装备。美国全国的 1/3 企业，航天工业的 80%，造船工业的 60%，电子工业的 40%，都要靠五角大楼的订货。这样，五角大楼也就自然成了各军工企业争夺的“肥肉”。为了在五角大楼的订货中中标，各军火承包商必须事先掌握充足的军事经济情报，包括摸清军方所需武器标准、五角大楼的真实意图、其它军火承包商的明确打算。而要掌握这些情报信息，就必须有中介人的穿针引线。于是，在美国就出现了所谓“军火工业咨询顾问”之类的人物。

这些“顾问”有的是以前的军界红人，有的是占据国防部要职的官员或其亲戚。他们既有丰富的经验，又同军界、政界要人来往甚密，他们消息灵通，常常掌握着五角大楼的机密。因此，这些人一挂牌“营业”便立即成了各军火承包商竞相以重金聘请的对象。例如，1986 年佩斯利在海军部任职时，他的妻子维姬收到了弗吉尼亚州维蒙顾问公司所给予的 5 万美元的酬金。而恰在此时，维蒙公司正代表若干家军事用品承包商与海军部打交道。其中的奥秘不言自明。又例如，国防部民用采购官员杰克·舍曼承认，他在 1986 年 10 月至 1987 年 6 月间因向外界透露了“涉及数百万美元合同的秘密招标信息”，而得到了 4.35 万美元的酬劳。

正是在所谓“顾问”们的咨询下，许多私人承包商利用所得来的情报，在承包国防部的招标项目中既能保持商价，又能保证中标。然而，招标中的舞弊行为不仅会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加重国民的赋税，而且难以保证所采购武器装备的质量。总之，在五角大楼发生的“用美元换取信息的爆炸性丑闻”决不是偶然的，正如美国一位立法者所说，它“是国防部最高层的管理松散和大量‘戕害人命’的金钱造成的”。

## 日本阿部文男受贿案内幕

1992年新年伊始，日本政界又一大丑闻曝光。1月13日，曾任政府北海道、冲绳开发厅长官的自民党现任众议员——阿部文男，被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以受托受贿嫌疑罪的罪名逮捕，其住宅、事务所、议员会馆的办公室等地同时受到搜查。

阿部文男是日本检察当局，继16年前的“洛克希德案”后，又一次以受托受贿罪名逮捕的现职国会议员。

阿部文男受贿案，再次暴露了日本政界权钱交易的秘密。

阿部文男1969年在北海道三区首次当选众议员，是一个7次当选众议员的老资格政治家。曾任北海道、冲绳开发厅政务次官和自民党总务会长代理等党政要职。1989年8月至1990年2月任北海道、冲绳开发厅长官。

1989年2月，日本共和钢筋加工公司的总经理松浦胜利、副总经理森口五郎经人引见，在东京赤坂一家豪华料亭里，宴请了众议员阿部文男。从此，阿部文男和共和钢筋加工公司的关系便异常密切起来。

如果说刚开始阿部文男还只是伸手要领带、手表，到后来，阿部文男的胃口越来越大。1989年6月，也是在赤坂料亭的一次宴请中，阿部文男直截了当地对森口五郎提出，他已经有6次当选议员的资历，在自民党内属于“大臣适龄组”，加上有党内元老支持，很有希望在下届内阁中捞个大臣当当，共和钢筋加工公司能不能在资金方面予以支持。共和钢筋加工公司是一家暴发户，正在从建筑行业向不动产和娱乐业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政界的头面人物当靠山，对阿部文男的要求哪有不答应之理？几天之后，森口五郎便悄悄地把一大笔款项送到了阿部文男手中。

1989年8月，阿部文男如愿以偿，以宫泽喜一派议员身份在海部俊树的第一届内阁中出任北海道冲绳开发厅长官。共和钢筋加工公司为此提供了约9000万日元“猎官”资金。

在1990年2月的众议员大选中，共和钢筋加工公司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而且派出了大批职员参加阿部文男的竞选事务所，使得事先预测可能要落选阿部文男在函馆选区以第二位的高得票率第7次当选众议员。大选过后，阿部文男派人向共和钢筋加工公司送去了一张1.4亿日元的选举费用的帐单，要求予以支付。森口五郎尽管面露难色，但还是照办了。

阿部文男与森口五郎的关系异常密切，阿部文男向共和钢筋加工公司要钱成了家常便饭。在东京和北海道维持事务所所需经费向“共和”要，连他私宅的装修也由共和公司掏腰包。“缺钱的话，向共和去要”，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他那位管理金钱出纳的女秘书，三天两头往东京代代木的共和公司总部跑。

来而不往非礼也。共和钢筋加工公司向阿部文男这个“无底洞”提供巨额资金，也自然从他那儿得到了回报。

过去与政界渊源不深的森口五郎成了阿部文男事务所的常客。据说，阿部文男的秘书们都曾得到过这样的指示：凡是森口五郎以及共和公司方面的客人，一概优先接待。而森口五郎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每次总是有所求而来，就像阿部文男去找他一样。

共和钢筋加工公司在同丸红商社的一家分号在建材交易中有买空卖空的舞弊行径，被九红总公司发现，予以中止一切交易的处分。阿部文男让政界

的要人替共和钢筋加工公司说情，才使共和公司得以渡过难关。

共和公司在福冈县新建的工厂举行开工仪式，是阿部文男为之奔走，请来了本派的元老、前首相铃木善幸大驾光临，使得共和公司一时声名大振。阿部文男还有本事说服铃木善幸出任共和公司在茨城县的一处高尔夫球场的名誉理事长，使得这家球场增色不少，会员证销路大增。

特别是阿部文男在北海道冲绳开发厅任长官期间，他竟利用职权一再给共和钢筋加工公司各种好处。他向森口五郎泄露了有关函馆至江美之间高规格公路的走向，结果使共和公司在道路沿线大肆进行土地投机和开发游乐场。他还提供了在札幌建设全天候多功能运动场的情报，使共和公司得以在预定场址的周围地区买下大片土地以获取暴利。在共和公司资金周转遇到困难时，阿部文男甚至还准备用他掌管的北海道东北开发金库的公款予以接济。仅这几件事，森口五郎就先后向阿部文男支付 8000 万日元。

阿部文男的受贿秘密，是在共和钢筋加工公司倒闭后暴露出来的。

1991 年 5 月，共和钢筋加工公司因为欠下高达 250 亿日元的债务被迫倒闭。

身为副总经理的森口五郎自知难逃责任，便溜到函馆躲藏起来。他曾让人带信请阿部文男拉一把。谁知阿部文男见共和钢筋加工公司再也榨不出油水，竟一口拒绝。森口五郎因此怨恨在心，在被逮捕后“竹筒倒豆子”般地将共和公司与阿部文男等政府官员之间的行贿受贿经过全盘托出。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根据掌握的证据，决定逮捕阿部文男。

阿部文男在被捕之前，因新闻媒介连篇累牍地报道共和钢筋加工公司与他之间行贿受贿的种种线索和情况，感到大事不妙，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于是称病住院，想借医院这块“宝地”避避风头。但是，检察厅特别搜查部经过周密地调查，得出他的“病情”不影响他被捕的结论，并立即采取行动，于 1992 年 1 月 13 日派人到医院将阿部文男逮捕归案。

1991 年 12 月，新闻媒介披露出阿部文男与共和钢筋加工公司的“金钱授受关系”之后，担任日本首相不久的宫泽喜一感到此事对自己不利，就迫使阿部文男辞去宫泽派的事务总长职务，以便宫泽派与这个贿赂案划清界线。

尽管阿部文男在被捕后矢口否认有受贿事实，但有关证人已陆续露面并提供证词。从共和钢筋加工公司抄出的帐簿表明，森口五郎在近两三年内经手的款项中有数十亿日元“用途不明”。森口五郎承认他一共交给阿部文男 5.3 亿日元，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多少金额都说得有根有据。而且此事不光是涉及阿部文男一人，还牵涉到一大批自民党官员。例如：给阿部文男的 5.3 亿日元中，有 1.1 亿是转给前首相铃木善幸，作为铃木善幸同意担任共和公司那家俱乐部名誉理事长的谢礼的。前总务厅长官盐崎润因为替共和公司向丸红商社说情，得到了 2000 万日元的“好处费”，外加 100 万日元车马费，这也是由阿部文男转交的。还有一名叫岩屋毅的众议员，则直接为共和公司疏通资金，让共和公司负担他两名秘书的薪水。上述涉嫌者都是宫泽喜一首相派的。据说，阿部文男从共和公司要来的巨额金钱中，有大约 1000 万日元作为总裁选举的经费上缴宫泽派的政治组织“宏池会”。

阿部文男被捕后，日本各在野党纷纷发表谈话，要求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并追究宫泽首相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铲除产生受贿丑闻的温床。在野党还强烈呼吁尽快制定政治伦理法案、防止政治腐败法案和修改政治资金限

制法案。在舆论压力下，宫泽喜一首相不得不对本派干部涉嫌受贿表示遗憾，但他强调这只是阿部文男个人的事，否认宫泽派曾得到过阿部文男上缴的1000万日元。然而，宫泽喜一的答复并没有说服日本公众，日本报纸大量报道说，阿部文男受贿的钱，在1991年宫泽喜一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发挥了作用。

由于“金权政治”给日本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正如阿部文男在法庭上受审时所说：“为了当上内阁大臣就需要钱，大家都在以金钱作交易”，日本许多有识之士不断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实现“少花钱的廉洁政治”。

日本《读卖新闻》登载文章说：“每当受贿案被揭露，总能发现政治家的影子，真是可耻可悲的现实。”这番话道出了日本广大群众的心声，说明他们对“金权政治”的现实已经深恶痛绝，也说明战后日本在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难以克服的金钱政治的困扰，始终给国民的心理蒙上一层阴影。



## 日本金丸信因偷税被捕记

1992年8月，日本国会议员、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宣布，他在1990年众议院大选前曾接受东京佐川急便提供的5亿日元非法政治捐款，决定辞去自民党副总裁和党内竹下派会长职务。1992年9月，东京地方法院做出判决，金丸信犯有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罪，罚款20万日元。1993年3月，金丸信以偷税漏税数亿日元、违反所得税法的嫌疑被逮捕。

金丸信受贿偷税丑闻曝光后，自民党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在1993年7月18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的议员席位未过半数，不得不结束一党长期执政达38年的历史。

金丸信，1914年9月17日生于日本山梨县一个酿酒商人家庭，1937年东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被征入伍，后因病返乡承袭了父业。1953年金丸信弃商从政，1958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63年，任池田内阁邮政政务次官。1967年任佐藤内阁运输省政务次官。1972年，任田中内阁建设大臣。1974年，任三木内阁国土厅长官。1977年，任福田内阁防卫厅长官。1986年7月中曾根康弘第三次组阁时，任中曾根内阁副总理。

1987年7月，金丸信与竹下登一起建立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经世会”，并出任会长。在金丸信的全力推举下，竹下登于1987年11月当选日本首相。1989年6月竹下登首相因“里库路特贿赂案”被迫辞职后，金丸信又扶持宇野宗佑上台。以后出任首相的海部俊树、宫泽喜一，都是在金丸信的支持下走上内阁总理大臣宝座的。宫泽喜一当选首相伊始，便请金丸信于1992年1月出任自民党副总裁，把党内的一切权力交与金丸信，以换取金丸信的大力配合。金丸信在日本政坛和自民党内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据报道，金丸信在日本黑社会也有一定影响。在前首相竹下登上台前夕，东京街头突然出现许多右翼团体日本皇民党的宣传车，高喊“竹下是日本最有钱的政治家”等口号，欲棒杀竹下登。竹下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金丸信私下里找到佐川快运公司社长渡边广康商量，制订了以毒攻毒的计谋，出重金买通了黑社会暴力组织稻川会的会长石井进，要其阻止皇民党的行动。果然，不消几日皇民党的宣传车便在东京的街道上销声匿迹。竹下登顺利走马上任。

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首先是因为“东京佐川渎职案”而被法院起诉的。

1991年2月，东京国税厅告发了东京佐川快件运输集团公司中的30多家公司从1985年起漏税30多亿日元。同年7月，又揭发出该集团公司中的骨干公司“东京佐川急便”总经理渡边广康等人与日本的大暴力组织稻川会控制的企业相互勾结，总经理渡边广康、常务董事早乙女润因此被解除董事职务、开除出公司。同月，佐川集团公司董事长佐川清根据公司内部告发的材料向东京地方检察厅提出了起诉，检察厅开始正式立案侦查。

1992年2月14日，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以“特别渎职罪”之名下令逮捕了“东京佐川急便”前总经理渡边广康、前常务董事早乙女润，同时被捕的还有“平和堂公司”总经理松泽泰生、“市原观光开发公司”经理大内美知夫。逮捕的前一天，特搜部还与东京警察厅合作，对渡边等人的住处、办公室、别墅等进行了多处强制搜查。1992年3月6日，东京地方检察厅正式对渡边广康等人提出起诉，起诉书中说，自1989年12月到1991年3月，渡边和松泽两被告在明明知道平和堂不动产公司等4家平和堂集团的企

业因股票投机失败，失去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为了谋取私利，两人合谋以东京佐川公司保证的形式直接贷款，给公司造成约 245 亿日元的损失；早乙女润、大内美知夫两人明知市原观光开发公司因投资失败濒于破产，仍以东京佐川公司作债务担保，造成了 400 亿日元的损失。

据佐川公司的内部资料，通过佐川公司前负责人之手流出的非正当资金总额达 5300 亿日元。其中约有 1142 亿日元的资金流向暴力组织稻川会系统的企业，590 亿日元以债务担保和贷款的形式流向扮演疏通政界角色的平和堂集团公司，440 亿日元流向市原观光开发公司。这些资金一部分用于不动产投资，其余用于股票投机，但由于泡沫经济的破产，股票交易损失严重。

从表面上看，佐川特别渎职案是一桩经济案件，但问题的要害是去向不明的巨额资金的流向。种种迹象表明，这些资金除非法流向数十家公司企业外，还以各种名目流入政界。

佐川集团公司在日本运输业中赫赫有名，运输网络遍及日本各地。而东京佐川公司又是其中的骨干企业，雇员近 4000 名，营业额占佐川集团总营业额的 20%。渡边广康攀附上佐川集团后很快发迹，并逐步进入日本的上层社会，与政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有广泛的交往。有报道说，渡边广康“出手大方”，常与政界人士等出入于银座的高级酒吧和夜总会，有时一个晚上就挥霍掉上千万日元。客人吃喝不算，临走还领到上百万日元的“交通费”。据《产经新闻》1992 年 2 月 15 日报道，有一次渡边广康的办公室里放着 20 个纸袋，每个纸袋里装有 5000 万日元，渡边对公司其他负责人声称，这些钱是送给政治家的。还有报道说，以自民党为中心的政界人士中，“有 130 名议员得到过渡边的捐款，总额达百亿日元。有关人士证实，佐川集团公司负担过全国约 250 个国会议员秘书的工资，其中约 150 人是由东京佐川公司负担的，这些人的名字写入工资帐簿，按公司职员的待遇发给工资。由于渡边广康广泛地贿赂政界人士，使他具有很大的能量。据同案犯松泽泰生说：“渡边广康一个电话打出去，就能决定谁当大臣。”

东京佐川渎职案事发后，日本政界是否受贿问题成为新闻界、司法界、在野党和国民关注的焦点。一名自民党国会议员不无忧虑地表示，“最坏的事态发生了！自民党将面临着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果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1992 年秋天，正当东京地方检察厅的搜查步步逼近东京佐川疑案的核心时，1992 年 8 月 27 日金丸信突然承认曾接受过东京佐川公司的 5 亿日元“政治捐款”，宣布引咎辞去自民党副总裁和竹下派会长的职务。此举使自民党领导层大为震惊。宫泽首相、加藤官房长官和绵贯自民党干事长等纷纷提出挽留，要求金丸信收回辞呈。但金丸信辞意坚决。8 月 28 日，宫泽首相决定接受金丸信辞去自民党副总裁的要求，并将此决定正式通知自民党四位领导人。日本各在野党一致认为金丸信辞职是理所当然的，要求传金丸信到国会作证，以彻底查明佐川案件真相，并要求尽早召开国会临时会议。

1992 年 9 月 28 日，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搜查部以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数量限制罪，向东京地方法院对金丸信提出起诉。9 月 29 日，东京地方法院做出裁决，判金丸信犯有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罪，课以罚款 20 万日元，并于当天将裁决书的副本送交金丸信。如果金丸信在两星期内不要求进行正式审理，其罪名将正式成立。法院作出如此判决之后，舆论界和在野党做出强烈反应，认为量刑过于轻描淡写。

在象征性地交付了 20 万日元的罚款后，金丸信居然在次日便踌躇满志地恢复了政治活动，似乎一切压力已烟消云散，他又可以率领自民党的主流派来重兴“政治改革”大业了。

这种对社会正义的公然亵渎，对民意的漠然视之，是对近年来高唱“政治改革”和“政治伦理”的自民党的绝妙讽刺。

金丸信在“隐退”了 5 周以后，只是就此事“带来的麻烦”向国民轻描淡写地略表歉意，便重新在政界露面。这不仅激怒了广大日本国民，连自民党内的许多人也实在看不下去。于是他们便互相串联，纷纷发难，从而使得自民党的后院也“狼烟四起”。

从此案东窗事发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自民党，到这个份上再也无法“无动于衷”了。1992 年 10 月 8 日，宫泽派和渡边派的 7 名资格不老的国会议员，成立了一个旨在恢复对自民党的信任的组织，并要求金丸信在预定于 10 月底召集的临时国会会议以前“按照惯例了结此案”，即要求金丸信退出自民党。此外，在宫泽派和渡边派联合举行的会议上，两派的头面人物还要求金丸信辞去国会议员以谢国人。此后，党内对金丸信本人及其亲信——竹下派代会长小泽一郎，不断加强攻击“火力”。竹下派的头面人物——前首相竹下登却始终不表态，而竹下派的“七大金刚”的原有裂痕日益加深，桥本龙太郎等人则利用这一天赐良机，谋求以“集体领导体制”来取代独断专行的“金丸——小泽”体制。

在此严峻的形势下，竹下派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按其任期长短，分别碰头协商。在分析了日本列岛的强烈反应后，大家一致认识到这是自民党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局势比洛克希德案件和里库路特案件揭露时还要险恶，如今再也不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应倾全力来恢复竹下派的威望。但是，在如何行动上竹下派的立场并不一致。竹下派中的“少壮派”主张通过严肃处理金丸信来取信于民，竹下派代会长小泽一郎则企图通过袒护金丸信，使其主子逍遥法外，来蒙混过关。

除了竹下派以外，自民党的其他派系头面人物也表现出了他们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在各派秘书长的联席会议上，对金丸信的赞誉之词竟充斥耳际。似乎只要表示出对政治改革的决心，金丸信丑闻案便可从轻发落了。然而，日本国民的态度则恰恰相反：只有从严查处这起丑闻，才更能表明自民党的政治改革决心。

自民党及其竹下派的头面人物对查处金丸信丑闻态度冷漠而热衷于党内的权力斗争，使得自民党的一些元老人物都觉得太过分了。曾连续 17 次当选国会议员、历任内阁各主要职务的前众议院议长坂田道太，就在一次有内阁要员和竹下派首领出席的座谈会上公开警告道：有派无党，有派无国，有派无民。其他许多原先的铁杆保守派人士，这次也明显感觉到了危机，并向金丸信猛烈攻讦。

与自民党连拖带顶的策略相反，各在野党却抓住这一机会穷追猛打。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要求严惩金丸信。他们又是上街宣传，又是搞民意测验，还分别向地方议会提出建议。各党还相继成立了“政治改革行动委员会”、“佐川丑闻特别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大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之势。公明党书记长还要求在传讯金丸信的同时，传讯前首相竹下登，因为金丸信通过东京佐川快运公司原社长渡边广康与黑社会的接触，正是为了竹下登能顺利入主首相府。在小泽一郎看来，这笔交易的最大受益者

是竹下登。正因为如此，小泽强烈要求竹下登与金丸信联手，共渡时艰。因为金丸信倒了，接下来便是竹下登。

竹下登一直认为，他出来讲话的时机还未到，在这个风头上他没有必要为金丸信分担什么，况且他早已不满于竹下派内事实上的“金丸——小泽体制”。在他拒绝出头露面之后，竹下派内的反小泽势力便加紧了活动，他们明确提出了实行“集体领导体制”，将桥本龙太郎和前干事长小渊惠三增设为该派的副会长，以此牵制日益坐大的小泽一郎。

作为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的宫泽喜一，此时的日子也很不好过。是金丸信一手将他扶上首相宝座的，他今后仍离不开作为党内主流派的竹下派的鼎力支持。对这次丑闻案，他的表态是：对金丸信的辞职极为遗憾，但将极为认真地对待此事。

日本公众对佐川案件所暴露出的日本金权政治弊端，深恶痛绝，纷纷进行强烈抗议。全国许多地方的县、市议会，分别通过了有关要求严肃查处此案的决议。街头上、公园里、车站旁到处是集会、宣传车、横幅标语和传单。一些地方的公众甚至采取了绝食斗争和静坐示威的方式，强烈要求金丸信辞去国会议员职务。一位参议员截止到1992年10月8日，共收到抗议信18余万封。人们对日本的司法部门显得如此软弱无力，也表示极大的不满。

在党内外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中，金丸信于1992年10月14日下午正式宣布，他为承担“东京佐川快运公司非法政治捐款”的责任，辞去国会议员职务。这样，金丸信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宣告彻底结束。

金丸信虽从政坛退出，但他收受政治资金后的纳税情况及政治资金的去向仍是一个尚未解开的谜。从1992年9月到12月的短短4个月时间内，日本在野党议员、民间团体、市民3万多人向东京地方检察当局、东京国税当局投书告发金丸信有偷税漏税嫌疑。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检察当局和国税当局联合起来对金丸信和他的秘书生原正久两人的资产进行了秘密调查。结果，当局意外地发现，除了东京佐川快运公司5亿日元政治捐款外，金丸信还收取另一笔巨额资金。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1987——1988年，金丸信以杂项收入不计入收入帐目的手法，隐瞒所得收入7.5亿日元，逃税4亿日元。金丸信在股票证券界的“名人”指点下，将这笔收入购买了既无需提供本人身份证明又可以自由转让的日本信用银行的信用债券。金丸的秘书生原正久也以同样手法将自己1987——1991年收入的4亿日元转移，从而逃避了2亿日元的个人所得税。日本税务署每年要公布纳税1000万日元以上的纳税大户名单，金丸信的名字在1987年的名单上还赫然在目，到了1989年就已不见踪影了。

东京地方检察院在掌握了金丸信的大量罪证后，一直按兵不动，向法务大臣后藤田正晴请示如何行动。

1993年3月6日，日本新年度财政预算议案在国会通过。当晚，金丸信以偷税漏税数亿日元、违反所得税法的嫌疑被逮捕，金丸信的前秘书生原正久也因同案被捕于横滨家中。

东京地方检察厅选择1993年3月6日晚逮捕金丸信，是煞费苦心的。3月6日正是日本新年度财政预算案在众议院表决的日子，如果在对预算案表决之前逮捕金丸信，立刻会在国会引起骚动，在野党必定闹起来，预算案便不能按时获得通过；如果拖延逮捕时日，又难免走漏风声，节外生枝，使嫌疑犯金丸信1987年的偷税行为因在3月14日超过法律时效而无法追究。因

此，在众议院预算案通过仅两个多小时，检察机关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开始了搜捕活动，在此之前，检察当局还请医生对 78 岁的金丸信进行了健康检查，在确认金丸信能够承受拘留所的生活后，才决定将其逮捕。

金丸信被捕后，检察机关对他的事务所、住宅等进行了突击查抄，六七个身强力壮的检察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金丸信藏在一间非常隐蔽的房间里的一个保险柜搬到屋外。经清点折算，这个保险柜里的各种折价债券、现金、金块、名人字画、古董等约合 70 亿日元，相当于 40 个日本职员终身收入的总和。

金丸信除去住宅等不动产还拥有日本一般日本人花上百年的时间也无法赚到的天文数字的巨款，这不能不使人们感到十分费解。金丸信是怎样成为“巨富”的呢？

只要考虑一下金丸信在政坛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便不难想象钱是如何源源不断地流进他的腰包的。在“政治资金”这个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日本一些政客受理各行各业的人的托情，答应在行政机关为其提供方便，而作为交换条件要收取好处费。金丸信也正是利用这些金钱确保了他在政界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来说，在表面看到的政治资金背后还有数量惊人的贿赂资金，而这些贿赂资金是除了当事人之外其他人根本无法知晓的。金丸信利用竹下派会长的职位，负责向该派的 110 余名国会议员发放选举资金、红包和补贴等款项，其中一部分进入他的私囊。

金丸信的选区在家乡山梨县，他在当地拥有极其雄厚的势力。金丸信利用权力，为山梨县修建道路、娱乐场所等公共设施，当地人对他感恩戴德。特别是金丸信出任过建设大臣，为山梨县的企业、公司在承包工程项目方面提供了相当多的方便。山梨县的公共事业费从 1970 年的 100 亿日元猛增到 1990 年的 1010 亿日元，其中 99% 的公共工程都由金丸拍板。因此，在山梨县只要有金丸信的条子或他的口头承诺，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山梨县的建筑行业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凡是曾受惠于金丸的公司，按其规模每年分两次拿出 100—500 万日元向金丸信上贡，行话叫上缴“馒头”。至于县的协同工会上缴的“馒头”则以“亿”日元计。即使是金丸信不提任何要求，每年仍可得到 10 亿日元。

金丸信的家属也借金丸信的威风发了大财。在东京繁华地区有一个名叫“K”的公司，该公司的大股东是金丸信的二儿子，董事长是金丸信的三儿子，经销的商品是水泥、钢筋等清一色的建筑材料。该公司仅有 16 人，但交易对象均是在日本有代表性的大公司、大商社。据民间信用调查机关的报告显示，该公司 1992 年 4 月一个月的销售额就达 152 亿日元，在日本 4300 家同类企业中名列前茅。

金丸信因偷税被捕的消息继他的佐川受贿案后，又一次在日本政界和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造成由他引起的第二次“政治地震”。各大报纸都就此事发表了社论。政府领导人和各政党首脑也纷纷发表谈话。自民党干事长梶山静六说：“实在令人吃惊，今后将关注司法当局的公正调查。”在野党要求把此事列入国会议事日程，并在众议院设立特别委员会以彻底查明真相。

金丸信被捕遭起诉后，他立即通过律师向司法当局申请保释。23 天后，东京地方法院于 3 月 29 日傍晚批准了金丸信要求保释的申请，金丸信为此缴纳了 3 亿日元的保释金。东京地方法院批准金丸信保释申请的理由是，金丸信患有糖尿病。

东京地方检察院在起诉书中说，被告金丸信从 1987 年至 1989 年共隐瞒收入约 18.5 亿日元，从中偷税约 10 亿日元。金丸信在被起诉后，基本承认自己的罪行。等待金丸信的是巨额罚款和判刑。

在有着金权政治传统的日本，在幕后大搞权钱交易的政界要人又何止被曝光的金丸信等几人！要纠正金权交易之风，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消除腐败的政治体制根源。日本也正是在朝这一方向迈进。

## 英国保守党主席的桃色丑闻

在 80 年代，英国保守党主席帕金森因一桩桃色丑闻两度丢官，情场官场双惨败，为人们演出了一部鸡飞蛋打的人生闹剧。

1983 年 6 月上旬，英国保守党在议会大选中再一次获胜，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再次出任英国首相。从保守党的领袖到默默无闻的党徒，全党上下无不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在全党一片欢声笑语中，首相撒切尔夫人也开始精心挑选内阁大臣，重用在竞选中的有功之臣，首相组阁自然忘不了“本党历史上最出类拔萃的党主席”——塞西尔·帕金森。

首相撒切尔夫人思前想后，决定让帕金森担任内阁中非常重要的职位——英国贸易工业大臣。首相将决定宣布后，无论社会舆论还是党内成员，几乎无人反对。大家都觉得象帕金森这样的谦和君子担当重任不仅问心无愧，也是众望所归。帕金森本人也喜出望外，他踌躇满志，准备弹冠登场在政坛上一展宏图。

然而，4 个月后，就在保守党内对帕金森的一片赞颂声中，一则关于帕金森的丑闻揭露出来。在英国有相当影响的报纸《每日镜报》上，刊载了记者对一位风姿绰约的女人凯伊丝的采访，凯伊丝揭露了她与保守党主席帕金森长达 8 年之久的婚外恋。凯伊丝声泪俱下地哭诉了帕金森与她有染已经 8 年之久，并在得知她已经怀孕的情况后抛弃了她。

这消息如同一颗炸弹，在英国立刻引起了强烈震动。刹那间，英国各大众传播媒介纷纷张扬帕金森与凯伊丝性爱的新闻。记者们如蝇逐腥，对凯伊丝和帕金森穷追不舍，都希望从他们的口中探寻出更多的隐秘。“有谁料到保守党领袖竟是沾花惹草之徒？”、“贸易大臣帕金森与凯伊丝小姐相染 8 年之久”、“看似谦谦君子，实则绝情忘义之辈”、“帕金森弹冠相庆，凯伊丝痛不欲生”、“有染 8 年，珠胎暗结”，诸如此类的标题在报刊上接连不断。许多人对凯伊丝充满了同情，寄语赠物。更多的人对帕金森的行径愤愤不平，指责他无情无义、道德欠佳。保守党内也是怨声载道，认为帕金森有损保守党政府的形象。

在西方国家，人们普遍把性关系看得比较轻，一般有妇之夫沾花惹草或者有夫之妇有外遇皆视为个人私事，公众和社会舆论均不介入。然而，一旦政府官员身上发生此类事情，舆论决不放过，总是要穷追猛打，直到真相大白于天下，让其下台谢罪才肯罢休。因此，政界人士也都深知桃色丑闻暴光的厉害。

帕金森是保守党内的显赫人物。众所周知，英国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议会每 4 年进行一次大选，由获胜的党派出人担任首相，并由首相组阁，挑选任命内阁大臣。多少年来，英国政坛尽管有许多政党并存，然而能够互相争雄、角逐执政党地位的只有工党和保守党两家。政党在选举中获胜的原因除以竞选政策争取人心外，党内是否有出类拔萃的政治人物也是十分重要的。正因为如此，工党和保守党都费尽心机培植党内领袖人物。帕金森就是保守党领袖、首相撒切尔夫人一手扶植起来的“奇才”。

帕金森初登政坛时，仅仅是一位根本不引人注目的议员。然而，此人不仅有一定的才干，而且深谙官场钻营之道。不久便以其忠顺而博得撒切尔夫人的赏识。短短数年间，帕金森由内阁一名副大臣擢升为一党之尊的保守党主席。在内阁中，他同时兼任主计大臣和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成为人人侧

目的内阁大臣。不但如此，帕金森还千方百计地迎合撒切尔夫人的价值观念：力主自力更生，发挥个人的积极作用。撒切尔夫人能够在人才济济的大英帝国战胜成千上万的男子成为一国首相，除了借助本党的力量和个人苦心孤诣的奋斗外，还与她的思想个性——“强硬”、“自主精神”分不开。撒切尔夫人强硬的思想个性和强劲的工作作风，不仅使她获得“铁女人”和“铁相”的称号，而且也使她在公众中平添魅力，为广大选民所称颂。帕金森自力更生的主张与撒切尔夫人的个性一拍即合。另外，帕金森也的确不是等闲之辈，不仅能言善辩、技压群雄，而且风度翩翩，在电视上有十足的绅士形象；这在讲究风度礼仪的英国很容易赢得公众的好感。

最为重要的是，帕金森以其忠诚和才干为本党竞选和撒切尔夫人的连任屡建奇功，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因为如此，撒切尔夫人十分器重和赏识他，把他视为“党内宠儿”，称赞他是“保守党历史上一位最出类拔萃的党主席”。可以设想，如果不发生意外事情，帕金森应该是官运亨通，并最终能登上首相宝座的。然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帕金森终因性爱问题露出破绽。

那么，凯伊丝为什么要揭露她与帕金森的私人关系呢？

1983年6月初的一天，英国大选在即，保守党上下正紧张地迎接选举，党内大小头目个个忙得不可开交、疲惫不堪。然而，保守党主席塞西尔·帕金森的办公室却特别宁静。正坐在办公桌前若有所思的帕金森突然感觉有人悄悄来到自己身边，回头一看，不禁喜出望外。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女秘书凯伊丝小姐。这位36岁的女秘书颇有姿色，处处散发着诱人的魅力。凯伊丝见室内无旁人，便俯在他耳边亲昵地说：“亲爱的，今晚七点半老地方”。帕金森听到这爱意绵绵的声音，心领神会，微笑着点了点头。

当晚7时30分，华灯初照，整个伦敦城一片灯火辉煌。这时，只见一辆黑色豪华小轿车在一家大咖啡厅前嘎然而止，车还没有停稳，就从车上急急忙忙下来一位绅士派头的人物。他脚步匆匆而又轻车熟路地直奔二楼后排雅座。还没等他走到那里，一位早已等候多时、打扮得楚楚动人的中年女人快步迎上前来，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之后，他们便靠在一起，喝起了咖啡。

这位绅士派头十足的人就是英国大名鼎鼎的保守党主席帕金森，女的则是他的女秘书凯伊丝。两人为遮人耳目，精心选择了这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咖啡厅的二楼，作为经常约会的场所。

两人含情脉脉地边喝边谈。过了一会，凯伊丝突然焦急地恳求帕金森：“亲爱的，我觉得应该把我们之间八年之久的恋情告诉首相，因为咱俩的名字在政界中充分连在一起，难免引起人们的猜测。让首相在组织新政府之前知道我们的事，很有必要。”听了凯伊丝的话，帕金森原来充满喜色的脸上，立刻露出为难之色，急忙搪塞说：“亲爱的，此事不宜操之过急。不过你尽管放心，我会见机行事，在适当的时机向首相面陈内情”。尽管凯伊丝对帕金森的态度颇为不满，不过一想到帕金森与自己如胶似漆的恋情，尤其考虑帕金森是党内奇才，一向深谋远虑，他现在不向首相说明，定有其更高明的想法，凯伊丝也就不再坚持，免得双方下不来台。不过，凯伊丝已隐隐感到帕金森对自己的态度有些微妙的变化。

不久，凯伊丝再次主动约请帕金森去老地方相聚。帕金森一见面就发现凯伊丝这次显得既激动又羞涩。还没等招待送来咖啡，满面绯红的凯伊丝就迫不及待地扑向帕金森的怀里，悄然说到：“亲爱的，我有了。”帕金森如坠云里雾里，不解地问：“有了什么？快告诉我。”凯伊丝见帕金森没反应



过来，忙笑着说：“有了就是有了，还不明白？天下的男人都是一群只知寻欢作乐的傻瓜。”说完不好意思地指了指自己的肚子。帕金森这时才如梦方醒，知道自己最不希望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这可怎么办呢？聪明绝顶的帕金森为了防止凯伊丝得寸进尺，再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急忙冷淡而又断然地说：“不过，我已是有三个成年子女的父亲，无论如何不想再结婚了。”

帕金森的话犹如晴天霹雳，惊得凯伊丝喘不过气来。她没想到帕金森竟然如此冷若冰霜，如此绝情忘义，突如其来的羞辱感、愤怒感使她一下子晕了过去。

帕金森见此情景，也一时慌了手脚，急忙把凯伊丝抱任，百般安慰。他灵机一动，对凯伊丝说：“亲爱的，我只不过同你开开玩笑，其实，我心里比你还激动。”凯伊丝此时表现得十分简单，一听此言，立即破涕为笑。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大，不可收拾，帕金森决定先把凯伊丝稳住。于是信誓旦旦地向她表示：“我准备马上会见首相，把我们之间的事告诉首相，并争取首相的谅解。”沉默了一下，他又说：“为了娶你，我必须先同我妻子离婚，此事我也着手去办。”此时的凯伊丝显得非常激动，她开始憧憬自己与帕金森的未来，想象着人们如何向她们投来羡慕的目光。

1983年6月9日，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当晚，帕金森便驱车前往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面见首相。寒暄之后，首相撒切尔夫人觉得今晚帕金森显得有些异常，几次欲言又止，似乎有什么事情难于启齿，便十分平和地问道：“塞西尔，有什么事吗？”帕金森吞吞吐吐地向撒切尔夫人说：“萨拉·凯伊丝怀孕了，这孩子是我的，我与她8年以前就相爱了。”

撒切尔夫人一听此言，如同被人在头顶猛击一棍，她没有想到帕金森这样成熟的政界要人也没过“美人关”。此事一旦传扬出去，那真是非同小可。不仅帕金森凶多吉少，无法在政坛立足，而且保守党内出现这种桃色丑闻，也会使党的形象蒙受损失。想到这些，撒切尔夫人禁不住面露愠色。不过，沉思片刻，撒切尔夫人又平静地说：“塞西尔，此事已成事实，泼水难收，现在关键是防止事态扩大，不要声张出去。要稳住凯伊丝，更不能抛弃自己的妻子，要继续同你的妻子生活在一起。侥幸，此事没有在大选前传扬出去，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听了首相的这番话，帕金森如释重负，首相不准备改变他的内阁职务安排。撒切尔夫人不是没有考虑到此事的风险，不过虑及帕金森的才干和多年来对自己的忠心耿耿，仍然坚持让帕金森留在内阁，出任大臣。同时，撒切尔夫人又向他面授机宜。

当天晚上，帕金森按照原定的计划，兴冲冲地赶往与凯伊丝约会的老地方。这次，成竹在胸的帕金森显得特别主动、分外殷勤，把凯伊丝哄得欢天喜地。帕金森告诉凯伊丝，说他已把他们的事告诉了首相，凯伊丝激动得热泪盈眶。她又怎么会想到帕金森已怀异心，在向撒切尔夫人施展缓兵之计呢？

自此以后，帕金森一方面继续保持同凯伊丝的关系，一方面在保守党内树立自己的威信，并坐上了贸易工业大臣的内阁交椅。此时的帕金森自以为自己的地位已稳如泰山，不时地向同僚和新闻界流露出春风得意的神色。1983年8月初，在没同凯伊丝说声“再见”的情况下，他毫无顾忌地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到国外度假去了。

此时的凯伊丝度日如年，整日坐卧不安，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沉重。因为她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越来越难以掩人耳目。久久不见帕金森的音讯，凯伊丝对帕金森的真情有所怀疑了。不过，她又抱有侥幸心理：他不会这么绝

情，再说，他身为一国执政党主席，又兼内阁大臣，总不会置个人的名誉与前途于不顾吧。

帕金森轻松地在国外度假一个月后，携家眷返回伦敦。下飞机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约凯伊丝到老地方相会。凯伊丝喜出望外，这些天来的忧虑和痛苦顿时一扫而光，她暗暗责备自己把帕金森想得太坏了，感到很内疚。然而，见面后帕金森的表现又使她如同被人浇了一盆冷水。帕金森对她象对待一个陌生人那样“彬彬有礼”，脸上冷若冰霜，以往那种令她激动不已的柔情已荡然无存。这种打击对凯伊丝实在太大了，她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失神地望着与自己有着8年男欢女爱之情的帕金森。

这次帕金森毫不犹豫地告诉凯伊丝：“我不想和你结婚了。”凯伊丝声嘶力竭地问道：“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说罢嚎陶大哭。帕金森漠然地回答到：“因为……我有许多为难之处……”凯伊丝不等他把话说完，就发疯似地向外冲去，一头跌倒在人行道上。帕金森把她送到了家里。

呆呆躺在床上的凯伊丝，此时欲哭无泪，欲怒无力。帕金森也是一言不发，他也不想再安慰她，只坐了一会儿，便离开了“是非之地”。帕金森长长地嘘了口气，感到肩上轻松了许多。凯伊丝却绝望了。

在英国，法律有明文规定，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哪怕说出的隐私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如果损害了别人的名誉，也会以诽谤罪论处。相反，如果涉及的是政府官员，则无论涉及什么地位的人，都可以照揭不误。

一个月后，已经彻底绝望的凯伊丝，这时忍痛含悲，决心同帕金森拼个鱼死网破。于是她鼓足勇气，求助于公共舆论，要向社会讨个公道。凯伊丝在家中接受了《每日镜报》记者的单独采访，把帕金森与她有染8年、在得知她怀上了他的孩子后绝情地抛弃了她的行径公诸于世。

帕金森的桃色丑闻曝光后，举国惊讶。有些人公开质问：“执政的保守党主席这号人物，究竟要把英国引向何处？”要求帕金森下台的呼声也时有耳闻。迫于新闻界的强大压力，帕金森于10月上旬在保守党第100届年会上发表简短声明，遮遮掩掩地承认了此事。

对于保守党领袖的丑事，首相撒切尔夫人，保守党内要人以及政府官员，甚至英国亲保守党的报刊杂志，共同联合起来予以庇护。首相撒切尔夫人亲自出面为帕金森开脱。她曾先后就帕金森的桃色丑闻发表两次声明，宣称这仅是个人私生活的小节，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会影响帕金森的留任。

在保守党的年会上，大会主持人特意安排得力人物为帕金森评功摆好，制造党内继续拥护他的气氛。亲保守党的许多报刊也纷纷刊登有利帕金森的报道。有关电视台也在关键时段播放帕金森节目，为其提供辩护机会。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帕金森在10月13日保守党年会上，竟然大摇大摆地作起了报告，其得意忘形之势，溢于言表。

面对帕金森的忘乎所以，凯伊丝悲愤填膺，决定同帕金森最后“摊牌”。于是，她在具有权威性的报纸《泰晤士报》上发表了《讲明真相》的文章。这篇洋洋万言的长文，用确凿的事实，向公众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帕金森的两面派真面目。凯伊丝揭露说：帕金森通过其律师发表的关于她们之间私恋的描述，不仅轻描淡写，而且歪曲了事实真相，旨在推卸责任。凯伊丝还一针见血地将矛头指向首相撒切尔夫人，揭露说，有关帕金森想同她结婚的事情，首相完全知道。而且，撒切尔夫人身为一国首相，居然说帕金森的行为纯属生活小节，无害大局，这完全是为帕金森开脱。同时，凯伊丝进一步说明了

自己的无辜。她写到：“帕金森在我怀孕之前很久就已向我提出结婚的事，他第一次向我求婚是在1979年。我是在持久的恋爱关系的基础上怀孕的。我之所以让这种关系继续维持下去，是因为我相信他要同我结婚的保证。”

凯伊丝的《讲明真相》一文，使趋于平静的帕金森桃色丑闻又再起波澜。而且这次给予帕金森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她用大量的事实揭露帕金森的伪君子面目。以往一些把这件桃色事件看作私生活小节的人，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不是政治家一般的沾花惹草，而是说明帕金森在道义和人品上有问题。那些一开始就对帕金森丑闻愤愤不平的公众，看过这篇万言长文后，更加火冒三丈，群起声讨帕金森。

面对舆论的声讨和外部压力，保守党内和政府内反响强烈，许多人不顾首相的面子，纷纷谴责帕金森的卑劣行径给保守党脸上抹黑，这样的人再担任党的领袖和政府要职，无疑辱没本党和政府的名声，直至给保守党带来更大的危害。

在内外声讨下，帕金森纵然才华横溢，纵然有“铁女人”为他撑腰，也难挽狂澜。瞻前顾后，左思右想，帕金森感到只有引咎辞职才能平息这场风波。于是，这位昔日在英国政坛上纵横驰骋的领袖人物怀着悔恨交加的心情，向一向器重他的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了辞呈。对此，撒切尔夫人此时也是百感交集。眼看着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党内英才”顷刻间因为女人问题搞得声名狼籍，并且使本党声誉蒙受巨大损害，怎能不令她痛惜不已呢？回想起帕金森为本党竞选和自己连任的耿耿忠心和他那横溢的才华，又怎能不使她万分难过呢？然而，事已至此，别无选择，只好让帕金森辞职来平息这场风波了。于是，这位女首相忍痛接受了帕金森的辞职。

帕金森辞职一周后，在他的乡间别墅里对记者发表告别谈话时说：“我现在的愿望是，同妻子和家人一起重建美好的生活。我不打算辞去议员的职务。”这位英国显赫的政客，就这样不情愿、不光彩地败下阵来。

英国舆论认为，首相撒切尔夫人作出支持帕金森的判断是十分错误的。这不仅使帕金森本人不能知难而退，而且撒切尔夫人本人也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了损害，也使整个保守党受到了损害。因为“帕金森事件”使撒切尔夫人在保守党年会上的报告黯然失色，并使4个月前在大选中赢得的胜利失去了许多光彩。无疑，这是撒切尔夫人在政治上所遭到的众多挫折中，令人难以忘怀的一个。

帕金森辞职以后，并没有从此归隐田园、放弃追求。相反，他时刻都为重返政治舞台而不懈努力。

1987年4月12日，即保守党在11日大选中赢得“三连胜”的第二天，56岁的帕金森突然同撒切尔夫人等保守党要员们一起，兴高采烈地在电视上公开露面。但见帕金森春风满面，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情，似乎早已把4年前不光彩的桃色丑闻忘得一干二净了。

然而，英国的公众对帕金森4年前的丑闻却记忆犹新。帕金森在电视上一露面，立刻引起了许多观众的注意和议论，许多人推测着，这位“风流大臣”可能又要东山再起了。的确，撒切尔夫人考虑再三，决定让帕金森出任内阁的能源大臣。

敏感的新闻界见帕金森有复出的迹象，又连篇累牍地把帕金森4年前的丑闻端了出来，同时发动强大舆论攻势。帕金森面对记忆力如此强的新闻界和社会公众，只好自认倒霉，再一次痛苦地接受失败。对此，撒切尔夫人也

感到非常惋惜。

英国舆论界认为，帕金森几乎复出，原因有三：一是此人才智超群，不是等闲之辈，深得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垂青；二是帕金森为几届保守党大选尤其是第三次大选效尽了犬马之劳，功不可没，具有被委以重任的资格。三是撒切尔夫人着眼于“大节”用人，不是清教徒式的人物，对人不求全责备。

尽管帕金森在权力的阶梯上攀登到很高的层次，但终因行为欠妥被舆论界和民众定为“次品”。这种结局，应当说是公正的！

## 英国保守党副主席的桃色风波

1986年9月上旬的一天上午，英国保守党副主席杰弗里·阿切尔仰靠在办公室舒适的转椅上，嘴里叼着一支雪茄烟，正同自己年轻貌美的女秘书侃侃而谈。整个办公室烟雾缭绕，充满了浓烈呛人的烟味。女秘书两手托腮，眼睛注视着阿切尔，被眼前这位谈笑风生的政客吸引住了。

阿切尔谈兴正浓，刚刚发完对英国政坛的见解，又话锋一转谈起了文学问题。他说：“其实文学和政治有时也有惊人的联系。我就喜欢写政治小说，我在文坛执笔多年，自己最满意的作品还是《平等者中间的第一名》。这里边我写了四位政客，其中三个人身上均不干净，四人中只有一人洁身自好，其实这个人就是我的自画像。”阿切尔还想和女秘书谈他的另一部作品《名誉问题》，突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

女秘书拿起了电话，“您好，这是阿切尔先生的办公室。”话筒里传出了一个娇声娇气的女人声音：“我是阿切尔的朋友，请他本人接电话。”女秘书把话筒递给了阿切尔。阿切尔以爽朗的声音和对方攀谈着，可是讲着讲着，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脸色也越来越难看。放下电话后，他怒气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来，阿切尔同伦敦一个妓女有染，这个妓女名叫莫尼卡·科夫兰，天生一副美人胚子，娇艳迷人，认识阿切尔已有多年。这个电话就是她打来的。她惊慌失措地告诉阿切尔，一位律师名叫库尔塔，是她的一位嫖客，此人威胁说要把她同阿切尔的“特殊关系”泄露给报界。

阿切尔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又惊又怕。在英国，人们对待性问题早已不封建，一般人在合法婚姻外另有男女私情，也很少受到谴责，因为英国人坚信这是个人之间的私事，而且法律有明文规定——个人隐私权不受侵犯。但是，如果这类事情发生在政客身上，情况就不同了，新闻界可以一追到底，直到下台为止。阿切尔作为一党副帅，前途无量，若被揭出桃色丑闻来，也只有中途退场告别政坛。所以，这不能不令阿切尔心惊胆颤。

阿切尔时年46岁，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毕业于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古老学府——牛津大学。在大学期间，阿切尔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他尤其擅长文学，具有文学天赋。1974年，阿切尔参股的一家加拿大公司倒闭，他发财的美梦没有做成，反而破了产，负债达数十万英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然而，阿切尔毕竟不是懦弱无能之辈，他生性争强好胜，胆略过人。他决心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特长，写出几部畅销小说。这样既可以偿还债务，解除囊中羞涩之苦，又可以名扬天下。于是，他在贫困交加中开始了艰苦的文学创作。功夫不负有心人，1974年阿切尔终于出版了一部名为《一个便士不多，一个便士不少》的小说。这部小说很快成了畅销书，一印再印，一版再版，他也因此而一举成名。此后，他陆续出版的五部小说，均成为抢手货，挤身英国出版的最畅销小说的行列。他随之也成为英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阿切尔拥有了众多的读者，英国的许多文学评论家也称他是文坛奇才。此后，阿切尔家中门庭若市，请他写书的出版商进进出出，令他应接不暇。就这样，阿切尔依靠数百万英镑的收入，不仅还清了债务，而且还当上了百万富翁。

阿切尔并不是专职的小说家，他的生活舞台是在政界。他29岁时，已任英国国会保守党议员，成为当时英国政坛一位令人刮目相看的年轻议员。在

官场上，他目睹了英国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处理各种关系越来越得心应手。他凭借自己的写作特长，在报刊上发表政论文章，宣传保守党的政策，拥护撒切尔夫人的强硬政策，得到了本党同僚们的好评，也深得撒切尔夫人的赏识。从此，撒切尔夫人对阿切尔格外关切，准备时机成熟时委以重任。

1985年9月，阿切尔在政治上交了好运，撒切尔夫人一手提拔他担任保守党副主席。这是连阿切尔本人都没想到的。1983年，保守党主席帕金森因为与女秘书凯伊丝的桃色丑闻曝光，在舆论的压力下辞去了保守党主席等职务。帕金森的下台，无疑使撒切尔夫人失去了一只得力的臂膀。撒切尔夫人痛心之余，开始暗中物色帕金森的接班人。这次撒切尔夫人十分谨慎，她准备挑选一个新的得力助手，开创保守党工作的新局面，恢复被帕金森玷污了的保守党的声誉。挑来挑去，最后选中了阿切尔。撒切尔夫人曾不止一次地称赞阿切尔是位“德才兼备，聪明能干，年富力强的”人物，提拔他任党的副主席党内几乎无人反对，公众舆论也没有不好的反映。然而，谁也不会料到，阿切尔也和帕金森一样遇到了桃色事件。

阿切尔自从接到莫尼卡·科夫兰那令人惊心的电话后，整日坐立不安，彻夜难眠。他脑海里不时浮现出保守党主席帕金森因桃色丑闻狼狈下台的情景，每想至此，他便不寒而栗。办公室里，再也听不到他侃侃而谈的声音了。阿切尔天天都在寻找着对策。

1986年10月23日傍晚，心急如焚的阿切尔悄悄打电话给莫尼卡，让她去国外旅游，避避风头，一切费用由他负担，并约好第二天上午11点钟，他派一个好友去维多利亚火车站第三进站口给她送钱。莫尼卡娇滴滴地答应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阿切尔是想先让莫尼卡出去躲躲风头，然后再慢慢施展对策，用钱堵住她和那个嫖客库尔塔律师的嘴。然而，阿切尔对对方行为动机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原来，那个叫库尔塔的律师是妓女莫尼卡的常客，他从莫尼卡嘴里得知：大名鼎鼎的保守党副主席阿切尔与莫尼卡有染。听到这个秘密后，狡猾的库尔塔生了邪念。他想，把这样的大人物的桃色丑闻捅给报界，不仅可以使保守党难堪出丑，而且自己还可以捞到一大笔钱。于是，他打算同莫尼卡合作，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妓女莫尼卡只知道赚钱，不问手段是否正当，当下就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库尔塔串通莫尼卡布下了“迷魂阵”。先是由莫尼卡给阿切尔打电话，让阿切尔陷入圈套，然后再引“蛇”出洞，一网打尽。

库尔塔律师得知“蛇”要出洞的消息，兴奋异常，马上拨通了英国《世界新闻》社的电话。记者们根据事先与库尔塔律师的协议，开始准备“现场采访”。

10月24日上午11点，维多利亚火车站热闹非凡，在第三进站口，一位中等个头的青年男子在独自徘徊，他手里拎着一个精制的小皮箱，两眼不时地四下张望。此人就是阿切尔派来给莫尼卡送钱的。就在这时，一个浓装艳抹、美貌动人的女人来到了进站口。青年男子认定此人就是莫尼卡，于是快步迎上前去，经过短暂的交谈之后，就把装有巨款的小皮箱递给莫尼卡。然而，《世界新闻》的记者早已等候在那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青年男子给莫尼卡送钱的经过全部装进了镜头，而且还借助莫尼卡录了音。

10月26日清晨，一家发行量全国第一的英国黄色报纸，以头三版整版篇幅刊登长文和巨幅照片，把阿切尔的桃色丑事原原本本、绘声绘色地端了

出来。这一爆炸性新闻很快就传遍了伦敦全市，并传向全国。

直到这时，阿切尔这位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才知道落入了妓女的圈套。他坚决否认与莫尼卡“有染”，并一口咬定他从来不知道莫尼卡这个人，更没有见过那个莫尼卡。但是人证物证俱在，阿切尔怎么辩解也无法说服别人。最后，阿切尔只好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愚蠢”、“上了圈套”，于当天辞去保守党副主席的职务。阿切尔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在政治小说《平等者中间的第一名》中描写的情节，最后竟发生在他的身上。

阿切尔下台后，愤怒不已，他聘请了律师控告库尔塔等侵犯了自己的名誉。经过反复较量，终于胜诉，恢复了名誉。但是，舆论界和民众对此已不感兴趣。

## 法国尼斯市市长的经济丑闻

尼斯位于法国东南部，紧靠摩纳哥，濒临地中海，是法国第五大城市，以环境优雅而闻名海内外。1990年9月16日，担任尼斯市长职务长达25年之久的雅克·梅德森突然提出辞职，他涉嫌经济犯罪的丑闻也随之披露出来。

雅克·梅德森是尼斯市前市长让·梅德森的儿子。

1928年，雅克·梅德森出生。这一年，让·梅德森也当选为尼斯市市长。以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让·梅德森一直担任这一职务，只是在1945年至1947年间曾由社会党的律师雅克·考特担任过两年尼斯市市长。

1950年，22岁的雅克·梅德森刚刚进入大学学习法律，而让·梅德森已为儿子进入政界继承他的事业作了精心安排。一天晚上，雅克·梅德森在父亲的安排下见到了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第四区的议会主席，并和他做了长谈。此后不久，就有大量的海报号召人们投“丁·梅德森”的票。然而，一直到公布名单时，尼斯人才发现所谓“丁·梅德森”不是让·梅德森，而是他的年轻的儿子雅克·梅德森。让·梅德森利用姓名上的机巧耍了一个大大的花招，为儿子入选地区议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雅克·梅德森刚刚步入政坛，一切都在摸索之中，他的言语行为毫无可称道之处。为了扩大儿子的影响，巩固他的地位，让·梅德森在一次支持他的群众集会上故作动情地说：“我把雅克交给你们了，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护他。”1962年，雅克·梅德森在选举中被击败，地方报纸普遍认为作为父亲继承人的雅克“太诚实，太理想主义了”。

1966年，让·梅德森死后，雅克·梅德森当选为尼斯市市长，而且没有发生大的政治较量。他的竞选对手对此解释说，“人们不会去反对一个还在戴孝的人。”

让·梅德森把他的权力基础建立在三种人身上：一是反法西斯的老战士，二是退休者，再就是天主教徒。雅克·梅德森上台后，想进一步扩大其权力基础，着眼点从手工业者发展到实业家。雅克已不满足于象足球俱乐部、剧院等一类的东西，而想大规模地发展经济，搞市政建设。

很快，雅克·梅德森就树立起了他的市长形象：满头浓密的黑发、点着一支雪茄烟、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的行为举止中透着几分二流子气，但却颇有诱惑力。他有一套体系完备的思想，他提出的想法常常显得有些俗气，然而却从中透出几分精明。他对美国的加利福尼亚颇有好感，并希望能把尼斯一下子建设成“欧洲的洛杉矶”。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雅克·梅德森终于在事实上成了这一地区的头号人物。这里的封建色彩比较浓厚，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深入到尼斯市的每一个角落。雅克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大规模地发展他的计划。早在1967年，他就曾帮助他的一位号称“贿王”的同学让·多米尼克·弗拉多尼在尼斯建立了一家俱乐部。以致于一位强烈反对他的戴高乐主义者写信给当时的内政部长罗杰·弗来伊说：“雅克·梅德森是我们的敌人，他制造了许多麻烦。”

但雅克·梅德森却依然故我、我行我素，并以其在尼斯的政绩获得了尼斯人的信任。在1983年的选举中，雅克以55%的绝对多数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获得了连任，1989年，他因涉嫌经济犯罪的传闻威信有所降低，第一轮投票中只得了43%的选票，但在第二轮选举中他还是以48%的多数再次连任尼斯市长。



到 1990 年 9 月 16 日他宣布辞职时，雅克任尼斯市长已近 25 年之久。他父子两人担任尼斯市长的时间加在一起，则长达 40 余年。难怪法国舆论界评论说他们在尼斯建立了“梅德森王朝”。

据法国报刊称，雅克·梅德森是个私欲较重的人，随着任职时间的增加、地位的巩固，他变得更加贪婪、奢侈。

法国报刊报道说，自 1979 年以来，雅克·梅德森多次涉嫌经济违法犯罪活动。1980 年到 1990 年 11 年里，地方审计机构先后对他进行了 3 次税务审查，税务部门屡次发现他本人在征税申报单中漏报、虚报收入，有一次竟高达 1600 万法郎。

1986 年，尼斯市政府曾委托巴黎一家金融公司为重新安排该市的一笔 6 亿法郎的债务同有关部门谈判。按双方的协议，这家公司可以得到 3%（即 1800 万法郎）的佣金。然而，等到谈判结束、事成之后，这笔佣金中的 450 万法郎却支付给了一个 25 岁的女学生爱利莎白丝·阿努芙。阿努芙把钱迅速转移到美国一友人处，这笔钱下落不明。阿尔卑斯滨海省审计机关事后调查认为，在这一非法支取公款的案件中，雅克·梅德森和他的 4 名助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88 年，雅克·梅德森甚至私自截留了议会议员马丁·唐柯利的津贴补助。

据来自美国的调查报告，雅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银行有多个帐户，并在一些公司中持有股份。法国报纸称雅克是一个“利用市长职务做生意的大商人”。

雅克在长达 20 多年的市长任期内涉嫌众多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为什么没受到即时的查处呢？这里面有一个历史之谜。

1980 年前后是雅克处境最为困难的时期。当时，有多起涉及他的丑闻被揭露出来，如“斯班吉里事件”、地中海乐园的倒闭、汝拉俱乐部丑闻。1976 年至 1978 年间，雅克曾任右翼政府旅游部长，这些事件都和他有关。然而在追查这些事件的责任时，雅克却拿出了他的“秘密武器”。他说：“我参加政治活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父亲从 1925 年就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我们了解许多发生在尼斯市的秘密事件，尤其是那些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发生的事件。我随时可以公开这些材料。”雅克所指的文件是他父亲留给他的，其中涉及众多的法国政界要人，因此很有威胁力。他的谈话很有成效，法国情报总局宣布他“无重大问题，只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于是，雅克·梅德森的问题被掩盖起来。

在 10 多年时间里，人们先后对他提出了 18 次指控，都被他以这种手段压了回去。也正是因为雅克手中握有令一批政府要员心惊肉跳的秘密文件，才使得他能够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1988 年，在米歇尔·萨哈斯的支持下，原来的税务总监伊夫·奥里乌被任命为阿尔卑斯滨海省的省长。这一任命，事实上吹响了对雅克·梅德森进攻的号角。随后，对雅克涉嫌经济犯罪的秘密调查就进入了准备之中。

1989 年，有人又指控雅克犯有干涉司法审查罪。雅克虚张声势加以威胁，做出要破釜沉舟的样子，并在政治上向“国民阵线”靠拢。

进入 1990 年，司法机关与雅克·梅德森的较量进入关键时刻。

1990 年 7 月底，埃克斯法院秘密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对雅克的司法调查问题。他们一起仔细研究了所有的司法程序，并决定了执行办法。财

政部的一名高级官员，经济事务机构的一名经济警察，两名地区审计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大法官一起研究了这些问题。最敏感的问题则在于核查尼斯市的帐目。这一行政调查的最终结果可能会导致罢免雅克·梅德森。同时，在财政部的督促下，司法警察从3月份就开始了预备性的调查。总检察官最后决定，调查之后就可以进行司法预审。在这次秘密会议上，还讨论了监禁爱利莎白丝·阿努芙的可能。一位与此案有关的证人供认450万法郎可能由阿努芙转给了她的一位美国朋友，因为担心生命安全，这位证人不愿意透露姓名。

1990年8月中旬，对雅克严厉指控的消息传到了雅克的耳中。这促使他下决心离开尼斯市，准备到其它地方去安身。

1990年8月底，另外一件事情增加了雅克在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他的一位亲信背叛了他。

8月29日前后，雅克·梅德森夫妇开始把物品从他们居住的私人别墅搬走，搬迁行动非常秘密。他们把一部分东西搬到住在内地的女婿那里，另一部分则由经营海外搬迁业务的马特斯·卡洛斯公司负责运往阿根廷。雅克的妻子伊安娜·格里玛还把一些物品搬往他们在摩纳哥的住所。

秘密的搬家行动没有逃过精明的地方情报局的监视，他们将有关情况通知了内政部长。

1990年9月9日，雅克动身前往日本大阪，庆祝尼斯和大阪结为友好城中。这是雅克第22次访问日本。尼斯人根本没有想到他从此逃往国外。

出发前，雅克收拾了3个箱子外加1箱私人物品，准备随后就运往国外。临走前他还交了一封辞职信给他在尼斯的律师查理·朗贝尔，一旦地方议会打算宣布解除他的职务，就由律师公布这封辞职信。

但是，雅克离开尼斯后，他的行李却未能顺利地出境。他的箱子连同其护送人勃莱特·姆拉在罗西机场被截住。当时，这位年轻的姑娘因为箱子超重，在尼斯罗西机场打电话要旅游部的一位高级官员来帮助她出境。而海关人员在情报局的要求下早已在机场静静地等候她了。在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箱子里藏有大量法郎和美元（共值60万法郎）。海关人员没收了这批巨款和箱子里的文件，放了这位姑娘。

雅克·梅德森在国外得知这一消息后，发表声明说他的行李里装的是一些私人文件、衣服和体育器材，此外还有一份阿尔卑斯滨海省议会与乌拉圭得拉斯特市的协议，并称箱子里的钱是“警察的挑衅和栽赃”。

后来，雅克在乌拉圭得拉斯特市接受法国《观点》杂志记者采访时解释这件事说：“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助手通过一位朋友把两只箱子交给了这位姑娘。箱子里装的是一些私人物品。后来，为了便于她出海关，这位助手通知了巴黎情报总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这是9月6日的事，我还没有出国。5天后，一位陌生人以我助手的名义又交给她一只箱子。这是一个陷阱，是社会党政府的挑衅，我根本不知道这些钱的来历。如果真是我要把这些钱转出去，又怎么会把钱装在印有尼斯市政府的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上我的名字呢？在我看来，这笔钱已被它的合法主人、财政部长收回去了。但不能容忍的是，海关把属于我个人的东西也没收了。”对于这种做法，雅克·梅德森表示：“可以看出他们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所以我只好走上策了。”

雅克听到行李被截的消息后，立即通知他的律师朗贝尔公布他的辞职信。

在对《观点》记者解释辞职一事时，雅克说：“我9月9日离开尼斯，去日本进行工作访问，随后我还要去阿根廷和乌拉圭拜见两国总统，并准备9月24日返回尼斯。但我担心1988年由社会党一手建立的地区审计院趁我不在尼斯时谎称我犯有经济罪，让阿尔卑斯滨海省省长宣布解除我的职务；所以我在出国前交给我的律师一封辞职信。这样，我就可以轻松地离开而不会被人捉弄。9月15日，我听到了在罗西机场发生的事。这太过份了！我立即通知律师在《尼斯晨报》上公布我的辞职信。”

按雅克·梅德森的话来说，这一行动是为了“先发制人”。事实上，他所担心的是行政法院指控他犯有罪行而传讯他。

这出“雅克·梅德森逃亡记”到此也就结束了，雅克开始了他在阿根廷的“流亡”生活。虽然他与阿根廷总统梅内姆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但他表示“不愿因为自己这个小人物而给梅内姆总统增添麻烦”。他还说，他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拥有许多财富”，他将过着朴素的生活，并有可能参加一些商业活动。而在尼斯人眼中，这真是一出奇特的戏剧。

## 美国民主党人哈特的桃色丑闻

1988年，加里·哈特参加了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不料，竞选中途被揭出了桃色丑闻，使他轻易地败下阵来。

加里·哈特，1936年11月生于美国西部堪萨斯州的渥太华，家境贫寒，父亲是一个普通的运油卡车司机，母亲是一位平凡的学校教师。哈特年青时曾在铁路上做工，后来才到俄克拉何马州一所基督教学院就读。60年代初，转入耶鲁神学院攻读法学专业。1964年，他从耶鲁神学院毕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

1960年，哈特作为一名自愿服务人员参加了约翰·肯尼迪的竞选班子，开始接触政治活动。1964年大学毕业后，在约翰逊政府内谋得一公职，担任司法部民权事务律师。1970年，他改换师门，转而帮助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竞选总统。因工作卖力，他被提升为麦戈文总统竞选班子的“总管”。在他的积极努力下，麦戈文得以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中首战告捷，然后脱颖而出，最后赢得了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1974年，哈特利用在协助肯尼迪、麦戈文竞选总统中所获得的经验，正式加入科罗拉多州美国参议员的竞选行列。不出所料，旗开得胜。这时，他才38岁。其后，哈特在参议院内的影响不断扩大，被认为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和“革新”的政治家，一跃成为国会中公认的“新自由派”的代表人物。1980年，他又历经艰难角逐，连任美国参议员。从此以后，他便积极探索问鼎总统宝座的途径。

1984年，哈特首次打出竞选美国总统的旗帜。在一无强有力的竞选班子，二无充足的竞选经费的情况下，他决定采取“攻破点，影响全局”的竞选策略，以图开创美国总统竞选史上的新范例。于是，他把主要财力和人力集中在被称之为美国总统竞选“晴雨表”的衣阿华和新罕布什尔这两个率先预选的州。果然，他的竞选策略成效显著。在预选前，据民意测验表明，支持他做候选人的选民从未超过5%，但到衣阿华州投票时，他已获得了15%的支持，由过去在民主党竞选人中“根本排不上号”，一跃而居第二位。到新罕布什尔州投票揭晓时，他竟然打败了民主党内的头号候选人蒙代尔，获得40%的支持，得票率第一，成为轰动一时的“黑马”。但是，优秀的竞选策略终究不能代替竞选实力，由于政治后台不硬和经费不足，哈特在其它州的竞选连连失利，最终未能获得198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在这次党内候选人竞选中，他虽然未能如愿以偿，并因竞选而负债130万美元，但他在全国的知名度却由此大大提高了。

哈特并没有灰心，他打算卷土重来，力图在1988年总统竞选中一展雄风。从1985年开始，他就为竞选总统而开展广泛的游说活动。1986年，他在乔治城大学发表题为《为21世纪设想的对外政策结构》的演说，纵论了变化中的世界和美国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强调用纵横捭阖的灵活策略对付苏联的攻势，采取平等、互利的姿态维护美国和盟国的关系，同时主张调整美国的经济结构，使之能适应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和技术的迅速变化。他这次演说，受到普遍的好评。此外，哈特还撰写了《新民主》和《胜利的起点》等专著，阐述了他的“新思想”。所谓“新思想”，就是用“新方式”去解决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例如：在社会问题上，他支持“平等”和“公正”的传统自由主义原则，强调加强“民权法”的实施；在社会福利上，主张削减政

府对医疗的补助和照顾项目；在经济上，要求政府、企业、工会三位一体共同制定美国的经济政策；在军事和外交上，反对里根的军事扩张，主张减少核武器数量，加强常规武器的攻击力量，强调北约组织内部的团结是重要的，主张与苏联改善关系。哈特的演说和专著，俨然是他上台执政后要推行的国内外政策蓝图。

1987年1月，他两届参议员任期届满，毅然离开了参议院。1987年4月13日，在科罗拉多的丹佛，他正式宣布角逐198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这时，民主党内包括哈特已有6人宣布争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由于哈特早已为人所知，加上又有颇具感召力的“新思想”作护身，因此，他这次一登场，便赢得了一片喝彩声。大批年轻有为的专业人才放弃高薪工作，自愿为哈特组成全国性的“哈特竞选委员会”，宣传哈特“新思想”，筹备必要的资金，一时间，使其他竞选人默然失色。在多次的民意测验中，哈特都领先于共和党主要候选人布什。在民主党内，哈特更是遥遥领先于其他7名候选者，支持他的选民达35%至45%，而其他候选人则在10%以下。这说明，哈特在这次总统候选人角逐中具有很大的优势。

不料，正当哈特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冲刺时，出现了意外事件。1987年5月3日，《迈阿密先驱报》突然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哈特5月1日晚在其夫人外出的情况下，与一位迈阿密模特——29岁的唐娜·莱丝在他家里同床共枕。随后，美国各家报纸竞相转载这一消息。顷刻间，哈特的私生活问题成了美国新闻媒体的头号新闻。

唐娜·莱丝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卡罗莱纳大学生物系，曾经是美国全美优秀学生联谊会的啦啦队长。1980年，她曾参加过世界小姐的竞赛，后当选为南卡罗莱纳州小姐，此后，这位初出茅庐的美人即移居纽约，想以当模特和演员作为自己的事业。1983年，她不愿再当模特，改做兼职演员。在以后的几年里，她只在一些电视系列剧和通俗滑稽戏中，充当跑龙套的角色。1986年一年中，她获得的拍片报酬仅为1000美元。

唐娜与哈特是1987年新年时在一次晚会上相识的。不久，唐娜又结识了一位迈阿密的商店女店主林恩，林恩专门销售妇女流行服装和三点式游泳衣。他们几人曾一起游览过迷人的马哈马群岛等地，也进出过酒吧。

1987年5月1日，哈特、唐娜、林恩、威廉（一位律师）出外乘游艇游览。游览结束时，他们约定当晚9点在威廉家举行室外烤肉宴。之后，哈特将唐娜领到自己家里，到了晚上9点半时，威廉仍不见哈特和唐娜前来，于是去电话询问。哈特焦急地告诉他，门外有记者，不能出来。

当威廉和林恩驱车赶到哈特寓所时，哈特脸色苍白，说门外记者已看到了他们，要唐娜赶快离开，到威廉家去。唐娜在威廉家度过了焦灼不安的一夜。记者不断要求采访她，都被威廉挡掉。唐娜急得直哭。

对于《迈阿密先驱报》的发难，哈特给予了及时的反击。他指责报社用十分卑鄙的手法侵犯了他的个人隐私，无端制造所谓引起轰动效应的不实的新闻，全然不讲什么新闻道德，同时要求报社澄清影响并道歉。

唐娜小姐为了给哈特挽回影响，出面对《迈阿密先驱报》的报道进行纠正和澄清。此外，威廉律师也出面作证，否认《迈阿密先驱报》的报道。

但是，《迈阿密先驱报》始终坚持说，唐娜在哈特的公寓里与哈特幽会。并且还揭露说，唐娜小姐与哈特之间的风流韵事，很早之前就成为既成事实。

就在哈特因“唐娜事件”被弄得焦虑不安之时，《华盛顿邮报》又刊登

了哈特的另一桩婚外传闻。1987年5月6日晚，该报记者通知“哈特竞选委员会”，说他们根据一个“匿名的来源”所提供的线索，经“有效地证实”，已掌握了哈特同华盛顿的一名女性有暧昧关系的“确凿证据”，并要求立刻向哈特当面采访。

面对舆论界的强大攻势，哈特已清楚地意识到争取总统竞选提名的形势对他已越来越不利。5月7日，他决定放弃正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的竞选活动，无可奈何地飞回到了丹佛。当天，他的竞选总部宣布了哈特暂停竞选活动的消息。5月8日，哈特在妻子李·哈特的陪同下，在丹佛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他已决定退出竞选。其理由是他不愿意让他的家庭、朋友和他本人进一步受到“谣言和流言蜚语的伤害”。接着，他对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报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我们必须对这个国家选择政府首脑的体制提出严肃的批评，它使这个国家的新闻界降到了猎人的地位，而总统候选人则成为他们的猎物；它使记者们藏身灌木丛中，编造不确切的虚假故事；它使照像师们窥测于我们的窗户之间，成群的直升飞机则在房顶上盘旋。我的非常坚毅的妻子也为之落泪，因为她没有一次不在受到侵扰的情况下回到自己的住处。”不过，他也承认，他与唐娜之间有“不检点行为。”

美国的总统职位历来是由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担任，为了担任总统，两党总是展开激烈的竞争。1987年的总统预选似乎与以往任何一届都不同，两党的实力出现了明显的距离。当时，共和党参加竞选总统候选人的只有两人，即副总统布什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多尔。他们实力雄厚，在政界影响大，且有正在执政的绝对优势，决心使共和党蝉联总统职位。而在民主党中，宣布参加竞选总统的候选人竟多达8名，获胜呼声最高的哈特宣布退出竞选后，其余7人旗鼓相当、被美国报刊称为“七个小矮人”。

哈特退出竞选后，民主党内部就着手从“矮子里面挑高个”。但这几位竞选人中，除了黑人领袖杰克逊在全国有一定的知名度，支持率约在10%外，其余6人的支持率均在5%左右，无一人能与共和党候选人相抗衡。而且，根据规定，参加1988年总统竞选的最后报名登记期限为1987年12月18日。这样，民主党就面临着是否要推出新的候选人的问题。

这时，民主党内有一部分人认为非哈特重新出马参加竞选不可，否则，民主党难敌对手。当时的民意测验也表明，68%的美国人认为报刊对哈特是不公正的。而且，哈特的家人和朋友也支持哈特重新竞选。在这种形势下，哈特觉得时机已到，终于在1987年12月15日作出重新参加竞选的抉择。

事实上，哈特在退出竞选后，仍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全国的竞选形势。据报道，他和他的妻子在长达7个月的隐居生活中，他们的谈话“没有一天不涉及到这个话题”。开始，哈特只希望对总统竞选施加一定影响。他自己说，春天他退出竞选时，原以为民主党内会有“其他有名望的领导人将加入竞选”，并期望他的“有关战略投资、军事改革和明智地卷入的思想会被他们采纳和宣扬，但7个月过去了，两者都没有发生。”于是，他想到了东山再起。

1987年12月15日，哈特发表了重新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演说。他在演说中毫不隐讳地说，他曾与唐娜·莱丝“干了一件蠢事。但这纯粹是私事，与旁人无关”。接着，他含沙射影地攻击共和党里根政府在“伊朗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他说：“重要的是我没有犯法，我从来没有向国会撒谎，更没有销毁过任何文件”。并一再声称，“我有他人没有的，而又

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新方向、新思想”。最后，他慷慨激昂地说，现在他和其他几位候选人不同，“一无竞选班子（早已解散），二无竞选经费”，所以，他只能走上街头，面对选民，“让人民来决定”他是否有资格当美国总统。

哈特宣布重新参加竞选后，美国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一些美国人认为，哈特的通奸行为固然不足取，但是他在事后毫无隐瞒地向选民作了说明，其诚恳坦率可嘉。因此，他们不仅赞赏哈特的才华和智慧，还原谅了哈特的“不检点行为”，表示支持哈特竞选总统。据美国广播公司1987年12月的民意测验，这部分人在全国民主上党选民中占有30%，虽然比过去低了15%，但仍比支持其他民主党候选人的比例高。然而，也有许多美国人指责说，哈特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幽灵”。

美国新闻界对哈特重新参加竞选的态度是一致的，即视哈特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开心解烦的笑柄，并再次掀起一股嘲弄、讥讽哈特的热潮。因为新闻界需要刺激性的话题，以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维持新闻界的生存。例如，一位戏剧演员编了一个政治笑话：“如果哈特当选总统，也许白宫要加盖一系列厢房，供第一、第二、第三夫人使用”。

更令哈特难堪的是，民主党内许多有影响的人物也对哈特的复出大加责难。民主党主席考克指责哈特“把个人放在党的利益之上”。前科罗拉多州州长将哈特比作是“在合家团聚时出现在门口的私生子”。至于该党的其他总统候选人，对哈特的举动更是震惊和愤慨。殊不知，这几位候选人原本在全国的声望就不高，正当他们力图引人注目、招揽选票之时，哈特却又“爬”了出来，把新闻界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在许多民主党人的眼里，哈特由于桃色丑闻的影响，根本没有当选总统的可能。因此，他们称哈特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腥汤之鱼。

尽管哈特的妻子和女儿出面大力支持哈特，大多数美国选民仍不能忘记哈特的“不检点行为”，他们希望选出一个“清清白白”的总统。

1988年2月8日，在衣阿华州首先开始的总统候选人预选中，哈特出师不利，仅获得该州民主党人1%的支持。接着，2月16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预选中，他又一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得票率倒数第一。此后，他在其它州的预选中获得的票数“越来越少”。

经历一连串的打击和失败，他于1988年3月11日在丹佛再次宣布退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后来，这场总统宝座之争以民主党的失败而告终。共和党人乔治·布什，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

## 历时七年的西德弗利克贿赂案

1974年5月，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因私人助理纪尧姆间谍案被迫辞去西德联邦总理职务，社会民主党副主席施密特担任联邦总理职务。1982年10月1日，联邦议院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案”，施密特总理被迫下台，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取代施密特出任联邦总理。

弗利克贿赂案发生于1981年至1987年，发案于施密特任联邦总理期间，结案于科尔任联邦总理期间。弗利克贿赂案涉及政党之多、涉及政府官员之多、涉及官员的职务之高、对政坛的影响之大，都是举世罕见的。

弗里德里克·弗利克是“弗利克康采恩（集团联合）”的创始人，是德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神秘人物，1984年去世，享年90岁。他出身农家，曾在一家小钢铁厂里当会计员。结婚后，他用妻子的嫁妆和自己的积蓄买下了一家钢铁公司的部分股权，不久，他就当上了这家小公司的老板。

他善于经营，喜欢投机。他虽然当上了钢铁公司的老板，但同时也做股票生意。他把公司的赢利用于炒股票，并很快发达起来。他手里有了一笔钱后，就开始扩大投资。几年后，德国鲁尔地区的大部分中小钢铁厂已让他吞并了。

当时，德国有两家庞大的财团：克鲁普财团和塞斯森财团。弗里德里克·弗利克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不被这两家财团吞并，除了和管理上下功夫外，必须同上层人物建立关系。所以，从20年代起，弗利克便开始资助他的政治代言人。在他的大力资助下，先是切尔执政，后来是兴登堡元帅出任总统。后来崛起的纳粹党，也得到过他的不少捐款。由于善于应变、左右逢源，弗利克的公司飞速发展，开始形成与那两家大财团实力相当的三足鼎立局面。

希特勒统治德国时，弗利克对这位纳粹头子的资助也是不遗余力，每年资助的款额不下10万马克。希特勒垮台后，他因资助希特勒被送上纽伦堡军事法庭，并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他在纽伦堡受审时透露了他的经营哲学：“花钱买政治保险是企业经营成功的必要条件之一。”

弗利克似乎早就预料到他会受指控，他在希特勒垮台之前，就将自己名下的财产分给两个儿子——奥图·厄恩斯特·弗利克和弗里德里克·卡尔·弗利克，自己只留下公司10%的股权。

1951年，弗利克刑满释放。他重整旗鼓，很快恢复了公司原貌。不过，当时西方很多国家的资本家对弗利克集团垄断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表示不满，要求弗利克集团退出一个行业。当时，西德正处在被美、英、法占领和管制状态，弗利克集团只能服从，从两个行业中选择其一。

二战以后，欧洲各国都在恢复本国生产，煤炭工业非常吃香。但是，弗利克有他的打算，他毅然放弃煤炭业，集中精力搞钢铁。后来的发展证明，他的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此后，弗利克不惜重金，购买了“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的大部分股票，买下了诺贝尔工厂，大量投资军火工业，经营化学、造纸和机器制造业。

这时候，弗利克的两个儿子已长大成人，弗利克家族形成了父子“三巨头”的局面。后来，次子卡尔·弗利克展露锋芒，控制了弗利克集团67.5%的股份。长子则不甘心受制于老二，离开了弗利克集团。

卡尔·弗利克同他父亲一样善于理财，不过，他的商业手腕和经营之道似乎更胜父亲一筹。



卡尔·弗利克 1984 年时 57 岁，号称西德首富，家产估计有 60 亿马克。他经营的弗利克康采恩（集团联合）是西德最大的私人控制的超级集团，国内外有雇员 15 万，资产渗透到钢铁、汽车、机器制造、军火、化工炸药、造纸、运输、保险等行业，被称为一个想买下整个西德的“工业帝国”。其中由它控制的弗尔德勒集团是欧洲最大的造纸公司，布德鲁斯集团是欧洲制造最大型机器的公司之一，诺贝尔集团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主要炸药供应厂家，克劳斯·玛菲集团是生产高性能坦克的商家，有世界“坦克之王”的美称。

在扩大其生产经营范围的同时，弗利克康采恩在政府部门内设法安置自己的内线，搜集政府的最新经济情报，同政坛红人加强往来。卡尔·弗利克对那些可能平步青云的政界人物更是百般拉拢、利诱和扶植。据说，早在弗里德里希在“莱茵兰——法耳茨州”农业部供职时就被卡尔·弗利克看中，并特地将他送去进修演讲，培养他日后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具备的演讲能力。果然，此人后来当上了经济部长，并为弗利克康采恩逃税等大开方便之门。

弗利克康采恩早就看好科尔是位政坛黑马，对他百般扶持。在科尔担任总理前的 1974 年至 1980 年期间，弗利克康采恩先后 11 次向科尔“捐款”56 万马克。更有甚者，是弗利克康采恩不择手段，以重金为诱饵，劝诱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主席赖纳·巴泽尔把该党主席一职让给了科尔。作为答谢，弗利克康采恩在 1973 年至 1982 年间，向在法兰克福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巴泽尔变相提供了“顾问费”160 万马克。

弗利克康采恩从 70 年代起就大规模向政党及政府官员“捐款”，但是，它的这些做法当时谁也没去追究，直到 80 年代初才有人揭发出来。

1981 年冬，联邦司法人员和国库稽查人员根据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的秘书的揭发材料，对几百家公司进行了一次税务大检查，发现许多公司都有程度不同的漏税情况。弗利克康采恩也被查出有漏税嫌疑。原来，1975 年该公司出售它在“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中的股份时得到了 19 亿马克（合 7.03 亿美元）的收入，但却没有交税。没有交税的原因是，政府批准这项交易享受免税。

1981 年 11 月 25 日，西德国家检察院搜查了弗利克康采恩董事会的办公楼。经调查，检察院发现弗利克康采恩“漏税”与西德高级官员有关，于是这桩经济违法案件又变成了一桩涉嫌贿赂案。

1981 年 11 月 29 日，西德发行量最大（99 万份）的新闻杂志《明镜》周刊披露说，联合政府的经济部长奥托·格拉夫·拉姆斯多夫、财政部长汉斯·马特赫费尔、总理府国务秘书拉恩斯泰因有收受弗利克公司的贿赂、为该公司偷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的嫌疑。

但是，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政府的信任危机上，没有来得及顾及这桩丑事。

然而，在议会信任表决后的第 21 天，即 1982 年 2 月 26 日，检察院下令对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财政部长马特赫费尔两人的财经活动进行调查。调查主要涉及弗利克公司的偷漏税情况和两位部长的“变相贪污”。

检察官们认为此案错综复杂，将涉及包括其他内阁成员在内的 1000 多人。因此，他们打定了开展持久战的决心，准备花几年时间把案情查个水落石出。检察官们的这一决定深得民心，西德全国上下抓“大鱼”的劲头一下子来了。西德新闻机构开足马力大肆报道，外国的新闻界也一哄而上。

案发后，先是拉姆斯多夫和马特赫费尔“极其坚决地反驳了这种指责”。接着，施密特总理对此案公开表态。

施密特总理首先信誓旦旦地庄重声明，他对这两位部长的信任“绝对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然后，他在尽量不对司法部门的决定提出异议的前提下，又小心翼翼地暗示“检察官有时候可能是错的”。为了加强这一暗示的效果，施密特总理还举自己为例作了一番论证。他说，回溯到1963年时，他本人曾涉嫌一起严重的叛国案，警方用了四年的时间才排除了对他的怀疑。

不明内情的人也许会以为施密特总理是爱臣心切、有意护短，其实不然。知根知底的人都知道，施密特自有一本难念的经。其一，如果拉姆斯多夫下台，施密特联合政府有可能被拖垮。其二，施密特总理有求于拉姆斯多夫所在的政党——自由民主党。

1982年时，西德主要有8个政党。施密特担任副主席的社会民主党人多势众，当时拥有党员98.2万人。1966—1969年，该党同“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联合政府；1969年10月大选后，该党又同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成为主要执政党。施密特政府即是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赫尔穆特·科尔担任主席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有党员68.2万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然后是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员17万人。论人数，自由民主党排名第四，有党员8.3万人。另外4个政党——绿党、德国的共产党、西德共产主义联盟、国家民主党，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人，政治影响无法同四大政党相比。

然而，由于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在联邦德国（西德）建国开始就结成了“联盟党”，西德国大政党实质上是三大政治势力。在这种三角关系中，自由民主党虽然人数最少，但在西德政坛上从来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它的立场如何，将决定其它两大政治势力谁是执政党、谁是在野党。施密特总理不是不敢“得罪”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本人，而是不敢“得罪”拉姆斯多夫所在的自由民主党。

拉姆斯多夫1926年12月20日出生于德国的亚琛，1944年从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46年，他结束了短暂的军旅生涯。1947—1950年，拉姆斯多夫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和科隆大学，主修法律和政治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担任过估税员，后又投身商界，长期担任多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经理。1951年，拉姆斯多夫加入自由民主党。从1968年起，他担任自由民主党“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的司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也逐步上升。从1973年起，他担任西德联邦议院议员，从1977年起，他又担任西德经济部长。仅从他的履历看，他走过的道路与多数西方政客大同小异。但是，凭心而论，他的成功要比旁人艰辛得多。战争带给他的是终身残疾，但他始终对前途充满信心，在生活中奋力拼搏，曾经获得过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和残疾人体育运动金质勋章。说拉姆斯多夫身残志坚、毅力惊人，是一点都不过分的。从政之后，他还著书立说，在1978年和1980年先后出版过两本书。在自由民主党内，拉姆斯多夫与本党主席、长期担任西德外长的根舍过从甚密，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在政府中，拉姆斯多夫主持经济工作，一贯主张“自由经济”，反对提供过多的社会福利。虽然他免不了与总理发生分歧，但确实是施密特的一员得力干将。因此，在调查尚无定论时，施密特总理无论是从两个执政党的关系着想，还是从个人的才干

方面考虑，都不打算舍弃他。

1982年4月初，正当弗利克公司贿赂案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波恩盛传施密特将改组内阁，罢免涉及该案的财政部长马特赫费尔和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然而，4月27日施密特正式公布内阁的重大改组时人们发现，施密特只免去了内阁中本党的几位部长的职务，而拉姆斯多夫则继续留任经济部长之职。

然而，施密特对拉姆斯多夫的忍让并没有给政府带来稳定。本来，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在1981年夏天就曾为1982年度的预算吵得差点不欢而散。1982年的这个夏天，双方又为1983年度的预算争得面红耳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1982年6月30日达成了妥协，避免了一场政府危机。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经济未能象政府在1982年6月份乐观估计的那样很快回升，财政收入达不到预期指标，新年度的财政收支又出现了100亿马克（约合40亿美元）的赤字。对于如何填补这一亏空，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意见不一。社会民主党一向标榜为广大职工谋福利，是靠大搞福利主义起家的，因而它主张大量举债和增加税收。而自由民主党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它认为增税会损害它所代表的这部分人的利益，因而主张大刀阔斧地削减福利开支。此外，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的威信江河日下，反对党基督教“联盟党”的影响日益壮大，自由民主党十分担心自己再同社会民主党结盟则会与之同归于尽。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素有“波恩政界最为足智多谋的策略家”之称的自由民主党主席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暗下决心，要改弦更张，与社会民主党决裂。

作为自由民主党内阁部长中最右的人物，拉姆斯多夫充当了实施这一意图的总先锋，最先放风说要“更迭”。

1982年8月31日，西德发行量最大的《图片报》报道说，拉姆斯多夫宣称，在即将到来的9月份举行的黑森州地方选举中，选民们可能表明他们是否希望他的自由民主党退出联合政府。8月31日这一天，拉姆斯多夫又在威斯巴登的一次讲话中说，社会民主党要想推行它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的经济政策，它就不得不另谋联合政府伙伴。

1982年9月1日，施密特总理在内阁会议上对拉姆斯多夫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公开抨击，当面谴责拉姆斯多夫的言论危害了西德政府内政外交的行动能力。施密特对拉姆斯多夫的言论表示“震惊、意外和恼火”，而且很不客气地说，要是什么人想背弃自由民主党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协议，他们就应当“公开地、坦率地、直截了当讲出来，而不必通过接见各种人物去表达这种态度。”

自由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分道扬镳的决心已定，它决不会因施密特的勃然大怒而放慢步伐。1982年9月11日，拉姆斯多夫抛出了一份长达34页的经济就业和福利政策综合方案，抨击政府的经济政策，要求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第二天，拉姆斯多夫又违反内阁惯例，公开了他向施密特总理递交的这份报告。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自由民主党向社会民主党发出的最后通牒，施密特总理则风趣地说，“公众舆论认为这是一份‘离婚书’”。

果不其然，1982年9月17日，自由民主党主席、联合政府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根舍，率领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内政部长格哈特·鲍姆（自由民主党副主席）、粮食和农林部长约瑟夫·埃特尔（自由民主党成员）集体辞职。自由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长达13年的执政联盟正式破裂，施密特联合政府就

此垮台。

但是，施密特总理“没有眼泪，没有挽歌”，他决定维持少数派政府，独撑危机局面。施密特的意图是，凭借他本人的威望和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地位等优势，在反对党措手不及以及自由民主党退出联合政府后内部出现分歧的情况下，提前大选，摆脱困境。

然而，反对党岂能给施密特喘息的机会而坐失夺权的良机？1982年9月28日，自由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向西德联邦议院议长里夏德·施蒂伦克提出了一项“建设性的不信任案”，正式要求联邦议院于10月12日进行表决，以便把施密特赶下台，由科尔取而代之。

1982年10月1日，施密特被迫下台，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当选西德第六届总理。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科尔卧薪尝胆、苦苦等待了7年。1982年10月4日，科尔完成组阁，拉姆斯多夫留任经济部长，新联合政府正式开始履行职责。

新政府成立几个月后，弗利克贿赂案的调查者们又有了新的发现。调查的这项新进展差点毁灭了新政府的廉洁形象和它所宣布的官民风雨同舟、共渡难关的宏伟构想。

1983年1月25日，西德《明镜》周刊又登载了一条爆炸性新闻：科尔总理接受了正在税收方面受到调查的弗利克公司的现款。

信息公开后，1980年1月始建的激进小党“绿党”闻风而动，要求科尔总理立即辞职。绿党执委会委员贝克曼愤愤不平地说，科尔接受弗利克公司的现金是一件“丑闻”，绿党不要“接受工业界的贿赂而同时又要求公民准备为振兴经济‘作出必要的牺牲’的人当总理”。绿党此举对于科尔总理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绿党的名字也因此响亮了很多。

在1983年3月6日的第十届联邦议院选举中，科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同基督教社会联盟以48.8%对38.2%的票数击败社会民主党，科尔连任联邦总理。在这次选举中，绿党以5.6%的选票（27个议席）进入联邦议院，从而打破了联邦德国传统的四党三派格局，成为影响政局的第五个政党。

从1982年2月26日下令对弗利克贿赂案展开全面调查之后，波恩检察院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紧张侦查。1983年11月29日，波恩检察院发言人约翰尼斯·威廉宣布，检察院已经掌握了可以起诉拉姆斯多夫等人的足够证据。但是，由于拉姆斯多夫是联邦议员、现任经济部长，享有豁免权，要对他正式起诉必须首先取消他的这一法定特权。为此，约翰尼斯·威廉请求西德联邦议院取消拉姆斯多夫的议员豁免权。1983年12月2日，联邦议院一致通过决议，取消拉姆斯多夫的议员豁免权，从而为检察院正式向法院提出起诉扫清了道路。

1983年12月8日，波恩检察院首席检察官弗朗茨布鲁诺·奥伊伦卡姆普正式对弗利克贿赂案提出了起诉。弗利克康采恩的两名前经理和自由民主党的三名重要政治家分别被控行贿和受贿。波恩检察院的这份起诉书长达100多页。

起诉书指控的被告是：

拉姆斯多夫，男，56岁，联邦德国经济部长，在担任部长期间曾四次接受弗利克康采恩的钱，总共13.5万马克。

弗里德里希，男，52岁，德累斯顿银行行长，前经济部长，1975年12月到1977年5月，共收取弗利克康采恩贿赂37.5万马克。

里默尔，男，57岁，前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经济部长，弗利克康采恩曾九次暗中对他人行贿，他总共收取贿金约14.5万马克。

布劳希奇，男，57岁，前弗利克公司经理，过去几年内他曾经给过弗里德里希、拉姆斯多夫、里默尔五位数到六位数的现金。

内米茨，男，57岁，企业家，原属于弗利克康采恩的拉廷根市“化学工艺流程设计公司”负责人，他曾经给过自由民主党部长里默尔许多钱，从而从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的能源发展计划里得到了数百万马克的补贴。

起诉书中气两处提到了科尔总理拿钱的情况：

1976年9月17日，弗利克公司经理布劳希奇让会计迪尔支出9万马克，其中6万马克给当时的经济部长弗里德里希，3万马克给科尔。用波恩检察院的话说，这位弗利克公司经理是“想支持作为反对党领袖的科尔的政治工作”。

整整1年后，正赶上拉姆斯多夫担任西德联邦经济部长，布劳希奇又从迪尔那里提取了6万马克，给“科尔博士和拉姆斯多夫博士一人一半”。

在公布起诉书之前的调查过程中，波恩检察院核实过有关材料。1982年7月5日，波恩检察院传讯了当时担任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的科尔。科尔承认，他收过弗利克公司的钱。然而，科尔又说，从1974年到1980年迪尔（弗利克公司前会计）帐上记的56.5万马克他是“完全不知道的”，他只记得“两次到三次捐款，数目是2万马克，或3万到3万5千马克”。

在这次传讯两个半月之后，即科尔当选总理之前九天，科尔对此事作了准确说明。他给检察院写了一封信，介绍了1977年、1979年和1980年三次交付现金的情况。他说这几次的总额是15.5万马克，不过不包括迪尔帐上所记的两个3万马克在内。

毫无疑问，一个官员如果接受了钱并因此渎职，那么他就是收受贿赂，理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然而，在波恩的检察官看来，科尔接受了钱并无疑问，问题是科尔当时不是政府官员。既然科尔当时不是“官员”，他也无权决定对弗利克康采恩免税，因而检察院的起诉书只是确认了事实，并未对科尔起诉。

起诉书列出了一张140人的证人名单，其中包括——基民联主席、联邦总理科尔，自由民主党主席、外交部长根舍，基社联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斯特劳斯，前联邦总统谢尔，联邦议员格雷格尔（基民联），联邦议员埃姆克（社民党），联邦议员米施尼克（自民党）等政界要人。按西德法律规定，若法庭认为必要，这些人必须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

面对涉及面这么广的政坛特大丑闻，西德民众反应的强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1983年12月12日出版的第50期《明镜》周刊，尖刻地讽刺说：“平时只有在戈德斯堡的雷杜特举行国宴时才会有这么多政治名流，如果按波恩的检察官们的想法办，明年政治名流将在波恩地方中级法院的刑事暗审法庭大厅里欢聚一堂。”

不过，起诉书的核心部分却是长达29页的“对证明材料的评价”。在这一部分中，起诉书驳斥了被告在接受调查时对主要证人证明材料可靠性的否认，并透露了两位部长接受贿赂、策划通过对弗利克康采恩的免税决定的一些细节。

在检察院调查此案的过程中，弗里德里希和拉姆斯多夫始终不承认收过钱。他们的辩护律师想通过否认自由民主党司库库里留下的材料的可靠性来

为他们减轻罪责，因为卡里素有“自由的艺术家”的美名，而且这位证人已在1981年5月被谋杀，已无法再对证。然而，认真细致的检察官提出了不利于被告的证据：卡里多年的生活伴侣里塔·贝尔在一张清单上记下了卡里“亲自以现款方式或以其他方式接受的所有给党的款项”，单子上没有弗利克康采恩的钱。这就意味着那些钱可能没有作为党派活动基金上缴司库，而是有人中饱私囊了。

关于两位部长受贿和渎职的情况，起诉书说，弗利克康采恩的经理布劳希奇频频地与弗里德里希和拉姆斯多夫接触，后两人“至少是缄默地表示愿意”在作决定时考虑到弗利克康采恩的付款。起诉书提到，拉姆斯多夫曾多次去过布劳希奇经理的私邸并暗示他如何同社会民主党的财政部长马特赫费尔打交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拉姆斯多夫在弗利克康采恩原来在杜塞尔多夫开的“米勒斯和费斯特”餐厅，提出了如何拟写免税申请的主意。最后，弗利克康采恩的这份免税申请是经拉姆斯多夫亲自签字而批准的。拉姆斯多夫之所以有必要采取这样异乎寻常的举动，是因为签字前他的国务秘书奥托·施勒希特曾提醒他，对弗利克康采恩下属的“格尔林——考夫”公司实行免税遇到了新的法律问题。为了论证弗利克的贿赂与两位部长渎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起诉书引用了弗利克康采恩的老板卡尔·弗利克的话。起诉书指出，在还没有接到税收通知单时，卡尔·弗利克曾从慕尼黑提醒他在杜塞尔多夫的总管布劳希奇说：“对波恩的友好，迄今为止对我没有帮助。”

拉姆斯多夫不是一个轻易屈服的人。从弗利克贿赂案败露到1983年11月底，他始终没承认过自己接受贿赂。即使在检察院对他正式起诉前后那段最为严峻的时期，他依然矢口否认受贿。执政的“联盟党”、自由民主党及其总理科尔、外交部长根舍，态度也都极其强硬，大有支持拉姆斯多夫顽抗到底之势。

1983年11月29日，就在检察院的发言人约翰尼斯·威廉宣布准备对拉姆斯多夫等正式起诉的当天，联邦德国经济部的一位发言人说，拉姆斯多夫否认自己干过任何不道德的事情，并将在随后一两天内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明立场。第二天，拉姆斯多夫对记者说，他在任经济部长期间“从未接受、要求或得到过”弗利克康采恩的“一个马克”。

11月29日当天，西德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自由民主党主席根舍立即表示，他确信拉姆斯多夫是无辜的。科尔总理没有在这一天作出反应，但是他的政府发言人伯恩施宣称检察官约翰尼斯·威廉宣布的指控是“令人震惊”的。伯恩施明确表示，尽管这种指控引起了轩然大波，科尔的政府仍然支持拉姆斯多夫。不仅如此，伯恩施还拐弯抹角地对检察院进行了旁敲侧击的批评。他说，“有些人认为检察官没有勇气取消这些指控”。人们不难听出他的话外之音：实际上这是一桩证据不足的案件，检察官只是迫于公众舆论施加的压力才硬着头皮要把案子追究下去。最后，科尔的这位发言人重申：“我只能重复我说过话：在拉姆斯多夫被判决有罪之前，他仍将是清白无辜的。”

12月2日联邦议院就是否取消拉姆斯多夫的豁免权一事进行表决时，拉姆斯多夫显得相当大度，他本人投了赞成票，给人们留下了“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的好印象。

对于拉姆斯多夫这个在一年前倒戈搞垮了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叛徒”，社会民主党自然恨之入骨，他们决不会轻易放他过关。1983年12月7日，

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们提出了要求拉姆斯多夫辞职的议案。社会民主党议员提出这一议案的理由是，不管拉姆斯多夫在“弗利克事件”的贿赂丑闻中是否有罪，拉姆斯多夫在受贿罪的阴影笼罩下无法履行他的职责。这一天，科尔在联邦议院发表了经电视转播的讲话。科尔指责检察院在对拉姆斯多夫正式提出受贿指控之前就将此事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布是“奇怪的作法”，是“不能容忍的”。科尔还在议院中为拉姆斯多夫进行了辩护，他对要求拉姆斯多夫辞职的反对派议员挥动着手指，提高了嗓门说，“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1983年12月8日，正当拉姆斯多夫在议院为新的预算进行一般性辩论时，波恩检察院对他提出正式起诉。法官表示，他们将仔细审阅起诉书，以断定是否有充分的证据审讯拉姆斯多夫，然后才允许拉姆斯多夫在进入诉讼以前看起诉书。

1983年12月9日，西德联邦议院就要求拉姆斯多夫辞职的议案进行表决。结果，联邦议院以274票对196票否决了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这一提案。这次表决中78票的差额比科尔联合政府通常拥有的60票优势要多，因而给了处境艰难的拉姆斯多夫莫大的安慰。

虽然议会否决了要求拉姆斯多夫辞职的议案，但拉姆斯多夫的去留问题仍然使得科尔政府左右为难，当时，科尔上台才一年多，严重失业和收入普遍下降仍是政府面临的难题。在人民普遍存在不满情绪的情况下，科尔政府力求稳住脚根，政策十分小心。留下拉姆斯多夫可能会使政府的威信进一步受损；不留拉姆斯多夫也有困难。一来科尔政府是联盟党与自民党的联合体，离开了自由民主党，联盟党难于单独执政；二来拉姆斯多夫确实是处理经济问题的内行，许多人都把当时西德经济形势的好转归功于他。如果他下台，自民党内后继无人则会发生内阁职务分配上的困难，而经济界又会对政府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发生怀疑，从而影响经济的复兴。

犹豫再三的科尔决定先派高级法学家研究起诉书的23份卷案和36份证明材料，然后再作定夺。总理办公厅主任瓦尔德马尔·施雷肯贝格尔承担了这一研究任务，他以前曾担任过莱茵兰—法尔茨州的司法部长。

1983年12月20日，政府发言人伯恩施宣布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将留在内阁继续担任原职。伯恩施说，科尔和拉姆斯多夫一致认为，案件记录不能成为“在作出开审的决定之前改变目前政府估计”的根据。但是，伯恩施也声明，“总理强调说，让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留任的决定只具有政治意义，因此并不涉及这个案件，这一案件现在是由一个独立的法官审理。”

随后，弗利克贿赂案又进入了一个长达半年时间的潜伏期，以等待法院决定是否审理此案。但是，拉姆斯多夫在此期间继续表现出“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倔劲。

1984年2月9日，拉姆斯多夫当着由各党派组成的议会质询委员会的面，对检察官指控他在弗利克公司行贿丑闻中接受现金一事发起猛烈的反击。德新社在当天的报道中说，“这一反击之猛烈使委员会的成员们大吃一惊。”拉姆斯多夫在反击中，一方面说所谓弗利克公司掌握着的、以及检察官对他的起诉中详细提到的那份受贿者名单是“漏洞百出”的证据；另一方面又指责检察院没有公平地对待他，因为同案的其他被告（其中包括前财政部长汉斯·马特赫费尔）的指控均已取消。与此同时，拉姆斯多夫的律师给检察院寄去了一份详细的公文，文中声称，检察院对拉姆斯多夫本人的指控从法律上来说是不站得住脚的，因此无法辩护。

为了挽救拉姆斯多夫的政治生命，科尔也想尽了办法，其中最著名的是在1984年5月中旬提出了赦免逃税者法案。该法案建议对近2000名参与非法筹措竞选经费的政界和工商界要人免予刑事诉讼。自由民主党主席根舍，在没有先同本党其他领导人磋商的情况下，就立即表示支持科尔的法案。但是，根舍立即在党内遭到了马丁·班格曼等人的严厉批评，根舍在党内的地位随之岌岌可危。最后，根舍不得不告诉科尔，他的党是法治国家的守护者，他不能再支持这项赦免法案。毫无疑问，这样一个触犯众怒的法案遭到的只能是胎死腹中的厄运。

拉姆斯多夫无计可施了，科尔也只能是“忍痛割爱”了。

1984年6月26日，波恩地方法院决定开庭审理弗利克贿赂案，律师将这一决定通知了拉姆斯多夫。6月26日晚上，拉姆斯多夫拜见了总理科尔，向他提出了辞呈。6月27日清晨，拉姆斯多夫宣布辞去西德经济部长之职，当天上午科尔接受了他的辞职。但是，拉姆斯多夫在6月27日发表的声明中再次强调，他在任职期间从未接受过弗利克康采恩的任何钱财。他声明，辞去部长职务“并不意味着退出政界，也不意味着听天由命”。拉姆斯多夫表示，他仍将履行他议员的职责，并在党内发挥作用。

1984年6月28日，49岁的自由民主党律师马丁·班格曼就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在马丁·班格曼宣誓就职时，科尔总理在议会热情赞扬拉姆斯多夫是个坚强的富有战斗性的人，并且赞扬他办事勇敢、富有同情心并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本来，人们都以为拉姆斯多夫的辞职会使这桩贿赂案告一段落，然后逐渐平息下去。不料按下葫芦又起瓢，好戏竟在后头。新闻界又把矛头指向了联邦德国的第二号人物——联邦议院议长赖纳·巴泽尔。

1984年10月中旬，西德舆论集中火力报道了巴泽尔与弗利克康采恩的经济关系。议长巴泽尔受到的指责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在1973年辞去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和“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之后，曾在法兰克福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弗利克康采恩曾以支付“顾问费”为名，先后向巴泽尔提供了170万马克的巨款。有的报道甚至说，这笔钱是当初巴泽尔辞去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之职、让位于科尔的“补偿费”。舆论指责巴泽尔的第二点是，巴泽尔有参与弗利克集团偷税漏税的嫌疑，因为在巴泽尔为那家律师事务所担任顾问期间，该事务所正在为弗利克康采恩处理出售“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股票所得款项申请免税的事宜。

1984年10月23日，巴泽尔发表声明，矢口否认他曾从弗利克康采恩得到巨款。但是，议会中和巴泽尔同属一党的“弗利克调查委员会”成员赫斯特·艾尔曼却承认，他在看了有关材料之后，认为对巴泽尔的指责至少有部分根据。这时的西德舆论已经认为，巴泽尔的去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而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也确实已在酝酿新议长的人选。

第二天，即1984年10月24日，巴泽尔亲自到“弗利克委员会”作证。他完全否认舆论对他的指责，但是他也承认，他在1973年至1982年充当律师事务所顾问期间，的确知道这家事务所同弗利克公司有合同关系。在巴泽尔之后到场作证的是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阿尔伯特·保席，他承认在1973年到1979年期间曾从弗利克康采恩得到180万马克，作为工作的酬金。但是，他完全否认弗利克康采恩通过他向巴泽尔付款的说法。他说，他从弗利克公司收费和他给巴泽尔160万马克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



尽管如此，人们认为巴泽尔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澄清。舆论对他在这样一种嫌疑下是否能继续担任仅次于总统的高级职务表示更加怀疑。

1984年10月25日中午，巴泽尔决定辞去议长职务。他写信给“基民联—基社联”议会党团说，由于无法承受对于他的政治和心理压力，而议会又必须继续工作，所以他决定辞职。当天下午，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格雷格尔在开会前宣布了巴泽尔的这一决定，并表示尊重他的决定。

这时的巴泽尔已陷入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境地。在基民联党内，他还可以发发牢骚，要求恢复名誉，指责他的党内同事虚伪，没有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可是，对于公众，巴泽尔还能再作什么解释呢？正如巴泽尔的后任、新当选的议长菲利普·耶宁格尔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公民仍在不安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政治机构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是否还存在？”

巴泽尔下野之后，舆论随着议会的调查把焦点又转向了总理科尔等政界要人。

1984年11月7日，科尔在议会“弗利克调查委员会”受到了长达6个半小时的严厉盘问。科尔证实，1977年、1979年和1980年，他得到过三次捐款，共15.5万马克（在弗利克公司前会计迪尔的记帐名单上，记载着从1974年到1980年总共支付给科尔56.5万马克。）。但是，科尔说全部捐款都交给了党的司库。

1984年11月8日，“弗利克调查委员会”对副总理兼外长、自由民主党主席根舍进行了盘问。从弗利克公司前经理布劳希奇手中没收的记录中说，根舍曾答应“帮助”为该公司减免巨额税款。为此，根舍作证说，这“完全令人莫名其妙”。至于在被查封的弗利克公司的帐单上有根舍的名字，而且帐单表明他接受的捐款总额超过100万马克，根舍回答说这些钱均已交给党的司库，他个人分文未取。但是，根舍承认，1980年8月，布劳希奇曾要求他向当时的财政部长汉斯·马特赫费尔施加压力，以确保最后的一系列减免税收的要求得到准许。不过，根舍又说，“我对他说，……我不会也不能向马特赫费尔施加压力。”在这次听证会上，弗利克调查委员会还向根舍询问了1983年12月向自民党捐款600万马克的匿名捐款人的身份问题。因为这次捐款发生在一项规定捐款超过1000马克（338美元）的捐赠者必须公布其身份的新法律生效前几天。在根舍受质询的第二天，即11月9日，自由民主党名誉主席、曾在1974年至1979年任西德总统的谢尔证实，这笔钱是零售商、百万富翁赫尔穆特·霍尔滕在获悉自民党财政拮据之后提供的。

1984年11月29日，西德前总理、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勃兰特，再次受到弗利克调查委员会的质询。在此之前，勃兰特已在10月26日受到过一次质询。当时，调查委员会发现有些证人和材料涉及勃兰特同弗利克财团的关系。根据弗利克财团前主任会计师迪尔的记录，勃兰特曾在1975年2月、1979年6月和1980年1月三次接受过钱款，总共19万马克。调查委员会主席、基民联议员朗纳在质询时还引用了弗利克财团写给勃兰特的律师的一封信，信中说保证弗利克方面不会把向勃兰特支付款项的事泄露出去。此外，弗利克财团前经理布劳希奇在作证时提到，他同当时的财政部长马特赫费尔（社会民主党党员）讨论免税问题时，马特赫费尔曾寻求勃兰特的支持，而且当时社会民主党的司库阿尔弗雷德·瑙曾把弗利克财团对社民党的捐款同政府处理该财团的免税申请联系起来。勃兰特在议会接受质询时，坚决否认他曾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弗利克财团的钱财，并宣称他对社民党执政时期弗利克

财团曾得到免税一事一无所知，更没有施加过影响。同时，勃兰特在这次质询中还反守为攻，他说，为了反对社会民主党左翼的代表人物埃普勒，弗利克财团倒是曾给了某些新闻记者不少钱。后来查明，勃兰特本人的确未拿那些钱，会计帐上的记录是经理布劳希奇让会计迪尔记的，因为布劳希奇认为那些钱用于勃兰特所管的范围。后来（即1986年3月），勃兰特由于1984年11月29日的这次作证被人以“伪证罪”告到了波恩检察院。因为在1984年的这次作证中，勃兰特曾断言无论是他还是别的社民党负责人都没有接受过弗利克公司的钱财，而1986年3月西德的《星期一世界商报》说，社民党前财务负责人阿尔弗雷德·瑙1975年从当时的弗利克财团经理康拉德·卡莱奇手中接受了10万马克的现金，收据上有阿尔弗雷德·瑙的亲笔签名。阿尔弗雷德·瑙通过他的律师证实，他确实接受过这笔钱，并将它移交给他的下任威廉·德勒舍尔。

正当弗利克贿赂案把西德政坛搅得天昏地暗之时，远在它国的西班牙居然也闹起了弗利克风波：1984年11月2日，西班牙巴塞罗纳省的《先锋报》宣称，弗利克财团向西班牙社会党支付了400万马克的经费，其中大部分钱交给了费利佩·冈萨雷斯首相本人，用于资助首相在1982年的竞选。首相自然怒不可遏，一气之下将《先锋报》告到了法院。

弗利克贿赂案给西德政界要人增添了无数的烦恼，1984年底时，简直谁都无法弄清此案何处是尽头、何时能了结。

1985年8月29日，波恩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弗利克行贿案，被告是西德前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前经济部长弗里德里希、以及弗利克康采恩的经理布劳希奇。虽然联邦部长出庭受审在西德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但在法庭等候旁听的人却只有100多人，而且由于场地有限，只允许41人入内旁听，记者也只有41人获准入内。看来，这时候弗利克案引起的轰动已经开始退潮了。当天新华社发自波恩的电讯说：“在审讯过程中，检察院将提供200名证人，估计整个审讯将要拖延数年之久。”

1986年，一身清白的绿党不甘寂寞，又对总理科尔发起了攻势。

1986年2月17日，绿党议员奥托·席利指控科尔犯有伪证罪。席利提出的指控有两项，一项说科尔向莱茵兰——法尔茨州（科尔的故乡，1969—1976年科尔任该州基民联主席和州政府总理）议会设立的一个正在调查党派非法基金的委员会提供了伪证，从而将该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引入了歧途。事情的经过是：1985年7月，科尔曾向该委员会作证说，他一点都不知道设在莱茵兰——法尔茨州科布伦茨的慈善组织——“1954年公民联合会”，曾给过基督教民主联盟钱；当然也就更不知道该组织起了使基民联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资金合法化的作用。但是，三个月之后，科尔又写信给该委员会说，他回想起是那个慈善组织交来的钱。席利的另一项指控说，1984年11月科尔未能向议会“弗利克调查委员会”讲出真情。科尔当时说，他不记得从弗利克财团那里得到过一笔5万5千马克的政治捐款。

一直在大力揭露和抨击弗利克贿赂案的西德《明镜》周刊与绿党遥相呼应。1986年2月23日，该刊报道说，科尔总理所在政党的主要领导们已经作了计划，一旦科尔由于说谎而被起诉，他们就抛弃他——那时科尔必须下台。

1986年2月24日，科布伦茨和波恩两地的检察官开始对科尔进行弗利克贿赂案败露后的第二次调查。

1986年2月25日，科尔接受汉诺威《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将“沉着地”面对司法程序，并且扬言“这项指控实际上没有什么，因为我是尽自己所知凭良心作证的”。其实，当时科尔对这项调查是忧心忡忡的。他在这次采访中就说过，这项调查不论结果如何，都“将产生附带后果。政治气氛将因此遭到毒害，我们的公民将因此感到不安全”。除此之外，科尔当然也进行了反击。他谴责提出这项指控的席利谋求“破坏我个人的形象和名誉”，并且自信他说：“我认为，多数公民将看透并坚决抵制为反对一个成功的联合政府而采取的这种恶劣手段。”

对于这桩“伪证”公案，科尔的参谋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说是“政治诽谤”。科尔所属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书记海纳·盖斯勒则宣称，科尔当初说“不”也许是因为他“暂时失去了记忆”。

但是，科尔到底是“失去了记忆”还是有意做伪证，人们不得而知。确定无疑的只有一点：1987年1月西德将举行新的大选，各党都在积极准备。

1987年1月25日，第十届联邦议院举行选举。“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的执政党联盟再次获胜，科尔继续出任总理。

1987年2月16日，一拖再拖的弗利克贿赂案总算有了结果。西德彼恩地方法院正式宣判：前联邦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受贿罪不成立，但法院认定拉姆斯多夫在使弗利克康采恩逃税中负有责任，因而判以罚款18万马克；前经济部长弗里德里希的受贿罪也不成立，但同样以帮助弗利克康采恩逃税为由判处他6.15万马克的罚款。历时7年之久的弗利克贿赂案终于降下了帷幕。

## 西德石荷州州长竞选死亡案

在人口过剩的时代里，竞争渗透进人类的方方面面，你要想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就必须拼命地竞争。在市场上，企业间的竞争你死我活。在官场上，政党间、政客间的竞争冷酷无情。为了战胜对手，政客采用不正当手段挺而走险的丑事经常发生。这类政治丑事被揭露出来的，毕竟只是极少数。西德石荷州州长竞选死亡案，使我们有幸看到了政坛上的黑暗一幕。

在西德政坛上，乌韦·巴舍尔是位已显露头角的人物。

1944年5月31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消失时，乌韦·巴舍尔在柏林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里出生了。在失去父亲的情况下，他和两个兄弟靠母亲辛勤劳动养活，日子过得相当艰苦。

巴舍尔很小就崇拜政治家。据一位从少年时代就认识巴舍尔的人说，乌韦·巴舍尔“从18岁起就立志要当联邦总理。为了这一目标，他不惜一切”。

巴舍尔上中学时就担任学生代表，开始组织集体活动。16岁时加入基民盟（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青年组织——青年联盟，18岁时加入基民盟，23岁时成为青年联盟的州主席。

政治抱负使巴舍尔在学业上主攻方向十分明确，他主攻法学和政治学，并获得双博士学位。事实证明，这种专业和学位对他后来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巴舍尔在25岁时当选为基民盟的州副主席，27岁时成为州议员，29岁时当选州议会党团主席。35岁时担任州财政部长和内政部长，是当时西德最年轻的州政府部长。

1982年，当他的顶头上司石荷州州长施托尔滕贝格出任联邦财政部长时，巴舍尔被选为石荷州州长。当时，巴舍尔年仅38岁。

象其他政治家一样，巴舍尔十分注意树立自己的伟大形象。他宁可忍受皮肉之苦，也要在群众集会上笔挺地站立几个钟头。对他来说，权力就是生命。

巴舍尔说，幼年时代的困苦生活使他成了一个“爱思考”和“谦虚”的人物。但有些报纸不这么评论，说他是一个爱说大话的人，在大庭广众面前摆出一副领袖姿态时，决不会有半点的迟疑和脸红。在周围的人中，他只听得进一个人的话，这个人就是精心栽培他的前州长、联邦财政部长施托尔滕贝格。

巴舍尔在政治上有强烈的进取欲望。他的年龄优势，一帆风顺的政治生涯，一往直前的劲头，使他很少去考虑未来会遇到的困难。

1987年，石荷州进入了选举年。随着州议会选举、州长换届的到来，巴舍尔又将面临一场优胜劣汰的考验。

1987年，巴舍尔在石荷州已当了5年州长，但当州长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阶梯。他绝不满足于做地方官，他要到首都波恩去，当议员、当部长、当总理。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已苦心经营了半生。由于雄心勃勃，他对这次石荷州大选看得很重，他无法允许别人从他手中夺走州长的大权。

恩霍尔姆也参加石荷州的这次州长角逐。

恩霍尔姆是社会民主党人，当时50岁，瑞典移民的后代。他1962年加入社民党，持“中左”观点。他的工作精神受到当时的联邦总理施密特（社民党领导人）的赏识，1981年荣升联邦教育部长。1982年10月社民党下台

后，恩霍尔姆于 1983 年回到石荷州州城基尔市，与基民盟的巴舍尔争夺州长宝座。

石荷州本是基民盟的地盘，基民盟在此已掌权 37 年。按常规来看，社民党人要在此州获胜希望是很小的。但恩霍尔姆由于脸上经常挂着微笑，给人留下一个“温和”的政治家的印象。在一些民意测验中，比如在“令人感到好感”、“有吸引力”、“温和”等项形象测验中，恩霍尔姆的得分都高于巴舍尔。这对于要确保自己在石荷州统治地位的巴舍尔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为了降低对手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和名声，巴舍尔感到身边急需一名有丰富经验的竞选助手和谋士。巴舍尔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曾在不来梅一家报社担任总编的普法伊费尔。

普法伊费尔是无党派人士，深受基民盟的器重，是一名出色的“竞选和策略专家”。他熟知政界的权势之争，对丑闻一类秘史极为敏感，他的文章常常在政界引起非同小可的反响。这样一个人对巴舍尔太有用了。有了这样一个得力助手，就能在权势之争中做得滴水不漏，还能挖出竞争对手的见不得人的材料。

普法伊费尔上任了。作为州长的新闻雇员，普法伊费尔的办公室离上司不到 50 米。他的任务是“观察媒介动向”，直接向巴舍尔州长提出心理和宣传等方面的竞选建议。凭着自己的政治嗅觉，普法伊费尔深知州长对自己的器重，决心为之效犬马之劳，以报知遇之恩。

巴舍尔很信任普法伊费尔，凡是遇到非常棘手的事情，尤其是一些不宜公开的事情，总是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密商。普法伊费尔曾这样说过：“对于秘闻一类事务，我是巴舍尔唯一可信赖的人”。

经过短时间的考察，州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向普法伊费尔交底了。

1987 年 1 月中旬的一天，巴舍尔把普法伊费尔叫到办公室，谈论起反对党领导人恩霍尔姆的收入和交税情况。普法伊费尔立即心领神会，派人审查了恩霍尔姆 1983 年 4 月至 1987 年 1 月的收入和交税的详细情况，并将具体数字列成表格。

一个星期以后，巴舍尔在办公室里口授了一份指控恩霍尔姆漏税的信件，普法伊费尔负责记录并打印 3 份。根据巴舍尔的安排，普法伊费尔将 3 封内容相同的信，一份寄往税务局、一份寄往财政部部长、一份寄给州长巴舍尔本人。巴舍尔说，他得到这封信后，便有理由亲自过问此事。

制造了匿名信后，巴舍尔仍觉得不够。在一次私下谈话中，他又向普法伊费尔透露了一个使之感到惊奇的消息：恩霍尔姆有同性恋行为，私生活放纵。他要普法伊费尔物色一名能提供这方面情况的人，或者是委托一家私人侦缉公司监视恩霍尔姆的行动，以获取确凿证据，能拍到这方面的照片更好。

普法伊费尔遵照州长旨意，根据在刑事局工作的好友那里打听到的情况，最终选择了“哈里·皮尔事务所”负责监视任务。1987 年 1 月 25 日，普法伊费尔在不来梅市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餐厅里同哈里·皮尔定下了这笔报酬为 5 万马克的交易。

哈里·皮尔事务所接受任务后，立即派了两名暗探，对社民党领导人恩霍尔姆进行严密监视。他们每天租借不同的车辆，带着步话器和照相机，悄悄地跟踪恩霍尔姆，以期能捕捉同性恋或玩弄女性的精采镜头。

为了嫁祸于人，巴舍尔甚至几次催促普法伊费尔设法为他弄到窃听器，

装到巴舍尔自己的办公室，以便让女秘书约安全人员前来检查。一旦查出窃听器，巴舍尔就可以借题发挥，攻击对手，还可以取得更多的同情。

在巴舍尔的授意下，普法伊费尔曾伪造过“绿党”的“新闻通告”攻击社民党，以激化两党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的矛盾。他们还派人冒充《图片报》的人，通过电话离间“石荷州独立选民协会”的领导人。

1987年9月初，离石荷州选举仅剩一周时间了。这时，西德最有影响的政治刊物《明镜》周刊，以醒目的《基尔“水门事件”》为题，报道了石荷州州城基尔市在野政界人士被跟踪事件，引起朝野各党极大关注。消息传开后，人们把怀疑的目标指向执政的基民盟。

在这种情况下，巴舍尔不但不悬崖勒马停止一切阴谋伎俩，反而继续打算安装窃听器。

《明镜》周刊披露盯梢活动第二天的一大早，巴舍尔就急忙打电话到普法伊费尔的家里，指示普法伊费尔为他找一个窃听器。当天下午，巴舍尔又打电话到普法伊费尔的办公室，询问窃听器一事。在这次电话交谈中，巴舍尔顾不上电话可能被偷听，向普法伊费尔透露了安装窃听器以嫁祸于人的目的。

然而，政治嗅觉颇为灵敏的普法伊费尔，此时已预感到事情不妙。特别是他四处打听窃听器如何买到而得知窃听器属非卖品、私下使用违法时，便立即作出抉择：与巴舍尔州长分手。

当天晚上，巴舍尔再次打电话催问窃听器是否买到，普法伊费尔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可惜没弄到。”

次日清晨，普法伊费尔在石荷州州府留下了一句话：他白天不在，要赶紧去汉堡处理“州长的事”。

在汉堡，害怕杀人灭口的普法伊费尔，向公证人一五一十地公开了巴舍尔州长的行为和意图。

当《明镜》周刊在州选举前一周首次揭露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时，人们并不清楚有巴舍尔的背景。自从巴舍尔的竞选帮手普法伊费尔倒戈后，《明镜》周刊立刻把矛头对准州长巴舍尔，全国各大报刊、广播电视也报道了这一事件。

科尔总理很担心基尔市的局势，他给巴舍尔打电话，要他坚持住，要拉住自民党不要让它倒向社民党。他还明确地告诉巴舍尔，石荷州的局势关系到基民盟在首都波恩的地位。

这时，联邦财政部长施托尔滕贝格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到波恩之前是石荷州的州长。尽管他将州长职务交给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巴舍尔，但仍然保留了这个州的党主席职务。基尔市出事后，有人便把矛头指向施托尔滕贝格，认为他对巴舍尔事件同样负有责任。因此，他只好一个劲地给巴舍尔鼓劲，让他顶住。

巴舍尔是位职业政治家，20多年的政坛生涯已将他磨炼成一名经验丰富的政客。处于这种不利局面，他没有乱了阵脚。他十分清楚目前的情况，不能手软，不能后退，后退就意味着基民盟的倒台，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从此结束。他要反击，他决心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人们对他的信任，与普法伊费尔作一番你死我活的拼斗。在得到波恩强有力的支持后，他更坚定了这一决心。

《明镜》周刊等指名揭露巴舍尔的文章发表后，人们一时还难以分清谁

是谁非，巴舍尔抓住这一战机开始了反击。

巴舍尔本是法学博士，自认为能够利用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同普法伊费尔打一场官司。他在不同的场合散布说，此事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在选举后的第一天，巴舍尔就以污蔑罪向法院控告了普法伊费尔和《明镜》周刊的有关编辑。

巴舍尔调动了州府内外几乎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为反击作充分的准备。他一连几天苦思冥想，推敲了每一个细节，并找了7个证人立下了字据。一切就绪后，巴舍尔开始行动了。

1987年9月18日，巴舍尔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他面对众多的摄像机和不停闪烁的闪光灯，逐一推翻了普法伊费尔揭露的事实。同时，他还亮出了有关人士提供的证明。

根据这些证明，人们看到了一幅截然相反的情景。

在指控恩霍尔姆漏税的问题上，政府发言人阿伦德森说，他不记得州长下过这样的指示；巴舍尔的两名女秘书也证明当时没有收到一封匿名信。

巴舍尔的妻子和司机也证明，当时巴舍尔事情多，根本没有机会与普法伊费尔谈及窃听器的事。

对于派人盯梢恩霍尔姆、秘密调查恩霍尔姆交税、伪造绿党通告和撰文攻击恩霍尔姆搞同性恋等问题，巴舍尔声明自己是一无所知，完全是普法伊费尔瞒着他干的，他不但是清白的，而且是普法伊费尔阴谋的受害者。

对于上述情况，巴舍尔郑重地宣布：“我以名誉担保。”为了不失去人们的信任，巴舍尔使出了绝招。

局势很快就扭转过来，朝着有利于巴舍尔的方向发展。

巴舍尔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当天下午，石荷州检察院就派人截住了普法伊费尔和与他同行的女秘书施罗德，搜查了他们在《明镜》周刊报社的客房，带走了普法伊费尔保存的36份材料。与此同时，法院也根据巴舍尔的要求，禁止普法伊费尔重复对巴舍尔指控，否则罚款最高可达50万马克。

一时，普法伊费尔成了众矢之的，顿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在无奈的情况下，普法伊费尔离开了汉堡，带着女友即昔日的女秘书施罗德远走高飞，到葡萄牙的一个只有他的律师才知道的地方“度假”去了。

然而，巴舍尔也太小瞧普法伊费尔了。此君虽未做过官，但漫长的记者生涯使他见多识广，也赋予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他出走汉堡，并不是仓皇逃跑，而是事先作了一番周密的准备。他带走了决定其命运的证据和材料，事后又一一抛出，给巴舍尔一个回马枪。

普法伊费尔曾是巴舍尔的竞选伙伴，许多事是在两人之间商讨的，没有第三者在场，所以一时各说各的理，真相难以分辨。但是，普法伊费尔手里有大量巴舍尔写的纸条，这些白纸黑字的纸条充分证明了普法伊费尔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巴舍尔的指示下干的。

巴舍尔再也无计可施了，他陷入了窘境。

9月25日上午，巴舍尔向联邦总理科尔提出要对这一事件负政治责任，并要求辞去州长一职。科尔没有同意，还是要他坚持下去。

9月25日下午，巴舍尔正式宣布辞职，并委托州的联邦事务部长施瓦茨临时接管州长事务。

从《明镜》周刊指名道姓地指责巴舍尔起，仅仅两周时间，巴舍尔就从州长的位置上掉了下来。

巴舍尔辞职以后，在基尔市的一家邮局里，人们从收件登记本中查到了匿名信的3个收件号。这3份挂号信的收件人分别是：州长巴舍尔、吕贝克税收侦缉处、州财政部长罗格尔·阿斯木斯。顺藤摸瓜，人们又在州府的收件登记本中查到了这封给州长的挂号信的收件记录，签字人是巴舍尔的女秘书艾希勒。这一发现证实了普法伊费尔所揭出的事实，同时也揭穿了巴舍尔及其女秘书的没有收到这封信的“誓言”。

私人侦缉事务所的老板皮尔也供认说，盯梢恩霍尔姆的任务是由普法伊费尔牵线达成的。

吕贝克检察院根据已掌握的一些事实向州议会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巴舍尔的豁免权。从此，党内的矛头也指向巴舍尔。

这次该轮到巴舍尔“休假”了。基尔市这几周的风风雨雨，使巴舍尔在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他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意外结局。他没想到过有中途退出政坛的可能，更没想到过会被检察院指控。

巴舍尔辞职后，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基尔市。他来到大西洋上的大加那列岛，住在一位老相识家里。

10月8日，巴舍尔给基尔市州府办公厅主任黑贝尔恩发了一份电传，电文中说：“我于周日到达汉堡，班机LH026，从法兰克福起飞，抵达时间：14点02分。”

几分钟后，巴舍尔又发了一份电传，给基民盟州议会党团主席克劳斯·克里本。巴舍尔在这份电文中，声称发现了新的情况，说这有可能澄清事实真相。

在飞往日内瓦（瑞士城市）的途中，巴舍尔写了一篇“日记”。这篇日记的开头注明是为调查委员会准备的。日记中写道：

“大约是9月26日，有一人打电话到家里，说他知道普法伊费尔的一些较详细的情况。10月9日，一自称罗贝特·罗洛夫的人打电话到大加那列岛，显然想帮助对付普法伊费尔。开始提出在马德里见面，后来他答应在日内瓦接头。

“他不要钱，只是要报复普法伊费尔，因为他上过普法伊费尔的当。他不准备到警察局报案。他想要在日内瓦机场（碰头地点为国际航线问讯处）交给一些材料，这些材料足以说明问题。”

10月10日下午，巴舍尔到了日内瓦。一下飞机，便叫了一辆出租车，开到“美丽海滩饭店”。在饭店里，巴舍尔写了第二篇“日记”，臆造了与罗贝特·罗洛夫碰头的情况。

这天晚上，巴舍尔没有出门，连电话也不接。他躺在床上，静静阅读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一本短篇小说选。这是巴舍尔看的最后一本书。

10月11日，星期天，当《明星》画刊的记者克恼尔找到巴舍尔时，巴舍尔已经死亡。

巴舍尔死后，有的记者立即认为这起死亡事件属谋杀案。巴舍尔的妻子和弟弟在他死后立即在日内瓦举行记者招待会，强调巴舍尔的死是“他杀”。他们公布了巴舍尔留下的日记，公布了巴舍尔死前与他们通电话的情况，他们认定只有唯一的可能性：他杀。

警方对此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根据巴舍尔日记中提供的线索，警方找到了神秘人物“罗洛夫”，但此人是否就是巴舍尔日记中的那个“罗洛夫”警方难下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人这个周末不在日内瓦，巴舍尔



在日记中提到的照片，警方一直没有找到。由此看来，他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相反，尸体解剖和现场调查结果一致证明巴舍尔是自杀。法医断定，巴舍尔属于服安眠药过量致死，死者身上没有被击伤的痕迹，也无临死前的反抗和痛苦挣扎的迹象，死者是躺在浴池里平静地死去的。他采取的是双重自杀法，即服安眠药后躺在放满水的浴池里，如果不被安眠药毒死也会被浴池里的水淹死。

巴舍尔精心布置的“谋杀案”被揭穿了。

人们愤怒了，巴舍尔的“证人”在一夜之间几乎全都推翻了原来的“证词”。

巴舍尔的司机舍勒哭了，他含着泪水承认自己的证词是巴舍尔写的，他为表示对主人的忠诚，不加思考地在证词上签了字。

巴舍尔的妻子弗雷亚觉醒了，她和巴舍尔的另一名女秘书伊罗娜·奥伯施泰因一样，也承认自己作了假证。弗雷亚说，她的证词是巴舍尔写好后让她在家签的字。

巴舍尔的亲信、州府发言人阿伦德森也承认，他是受巴舍尔的指使作了假证。他说，他把对上级的忠诚看得太重了，他总觉得他保护的是一位州长，而不是罪犯。

巴舍尔不仅丢了官，还丢了命，这是一出双重悲剧。他不该把权力看得太重以致于为此而不择手段，更不该在辞职后不思悔改、执迷不悟而走向绝路。

但是，这类不该发生的事情以后是否还会发生呢？

## 美国住房部官商勾结纪实

政府开支来自大众的赋税，然而支配这一开支的人们却是有着私利的组织（政党）和个人；于是，在这里发生了公与私的关系，发生了腐败。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开支领域是腐败集中产生的温床；发展中国家是这样，美国也是如此。

“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简称“住房部”）是美国联邦政府内的福利性机构，它成立于1965年9月，主要职能是主管城市住房抵押贷款和对贫困家庭的房租补贴等工作。里根总统两届任期届满于1989年1月卸任不久，美国即爆出了关于住房部官商勾结、严重浪费的丑闻。

1989年6月，美国报刊揭露前内政部长詹姆斯·瓦特利用他跟住房部官员的关系为承包商介绍业务，获好处费42万美元。1989年8月，美国报刊又披露说，有几十位声名显赫的共和党人干过同样的勾当。美国国会发现，里根政府的住房部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达40—80亿美元，而准确的数字谁都无法得知。布什总统上台后任命杰克·肯普为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肯普在上任后不久就说，“我对我发现的情况不胜愤怒”。这位新部长为什么大动肝火？他的前任到底干了些什么呢？

里根当政时的住房部长塞缪尔·皮尔斯是一位黑人。皮尔斯有两大特点，一是反对住房问题上的种族歧视，在这一方面连他的政敌都不得不对他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称赞；皮尔斯的第二大特点是出国旅行——单是苏联他就去过5次。

青年时代的皮尔斯是一位出色的律师，后来他又当过刑事法庭的法官。此外，皮尔斯也曾在财政部任过职，在国会担任过议员的幕僚。但是，皮尔斯从未单独领导过一个较大的部门，缺乏担任联邦部长之职的经验。皮尔斯步入政坛的原因也非常耐人寻味：1964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竭力举荐皮尔斯出任政府高级职务，目的是想让他与当时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相抗衡，领导黑人“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从1964年起，皮尔斯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最后终于登上了部长的宝座。

皮尔斯虽然当上了住房部长，但却对本部门的工作毫无兴趣。通常他很少过问工作，因而得了个雅号——“沉默的塞姆”。他若要过问起工作来，却又令人啼笑皆非。他一共当了8年部长，在卸任前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同事们正在热烈讨论有争议的“适度修缮计划”，皮尔斯冷不丁地插话问道：“什么是‘适度修缮计划’？”他这一句话就把所有的人都问得默不作声了。其实，皮尔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一心想的是到最高法院去任职。可是，偏偏白宫又不愿意提名他当法官，因为白宫认为他的观点过于自由化，而且他还不够德高望重，难当重任。于是，皮尔斯就消极怠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每天上午10点上班，下午4点回家。就这么一点上班时间，他也没有全部用来处理公务，不少下午他就在办公室看电视消愁解闷。

皮尔斯在住房部采取的是所谓“公司制”管理方式，他当“董事长”，一切事务都交给“经营人员”操办。最要命的是，皮尔斯听不进任何批评意见。1985年的时候，他命令公共关系办公室去掉每天送给他的简报中的任何反面报道。谁要是向他反映意见，他就会说“你把起诉书拿来，我就采取行动”。结果倒好，1989年果真真有6名皮尔斯任部长时的住房部官员被起诉，其中还包括经营部长基金的杜波依斯·吉列姆。

既然部长自动放权，必然得有人填补权力真空。在住房部掌握实权的是皮尔斯的行政助理德博拉·戈尔·迪安。迪安在住房部还有一个重要职务——皮尔斯派在“监督浪费、欺诈和管理不善部长委员会”的代表。

1984年迪安开始在住房部担任要职时才29岁，但她却神通广大。迪安出生于豪门世家，政治关系极广，参议员阿尔伯特·戈尔还是她的表亲。迪安本人曾办过杂志，经营过酒吧。用皮尔斯后来的话说，她还有个特点是“权力欲太强”。迪安名为皮尔斯的助手，实为“业务总管”，对工程交给哪家公司承包有最后的决定权。住房部的大部分项目不是被迪安给了有权有势的共和党人承包商，就是给了她那些曾在住房部工作、后来又跳槽出去当“顾问”挣大钱的朋友们。后来，人们从迪安的卷宗中找到了不少想捞取好处的共和党人写给她的信，对此，迪安便用住房部的“油水”成全他们。例如，后来被布什总统提名为美国驻卢森堡大使的弗雷德里克·部什就承认，与迪安有了交情后，他从住房部争取到了60万美元的补贴。虽然他不承认其中有什么肮脏的交易，但对他的任命还是在美国国会遇到了麻烦。

此外，住房部工作人员最痛恨迪安的一点是，她在部内拉帮结派，安插亲信。她把她的6个朋友都安排到了关键职位上，这些人都极不成熟，被人们称为“乳臭未干的一帮毛孩子”。但是，这帮人对待同事却粗暴无礼、专横跋扈；同时，由于他们有靠山别人也只是敢怒不敢言。

皮尔斯为了推卸责任，后来在国会作证时说，他对迪安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可是，迪安的一位亲戚却为迪安打抱不平地说：“他要不知道这些事情就肯定是一具木乃伊”。

虽然皮尔斯被人们称为“沉默的塞姆”，但他在帮朋友争取项目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打破沉默。前联邦住房局代理局长雪莉·怀斯曼揭露说，皮尔斯曾经否决了她和同事们的建议坚持通过了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市的一个项目，因为想要得到这个项目的人是以前皮尔斯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同事、达勒姆市市长查尔斯·马卡姆。

里根政府曾主张大力削减福利开支，因此，从1980年到1988年，美国住房部的预算也从340亿美元削减到了150亿美元。相应地，住房部的雇员人数也从最多时的16200人降到了最少时的11178人。如果是真正的精兵简政，那当然是好事。问题是，由于裙带关系等因素，剩下来的不少人员不仅没有多少才干，而且对于为穷人造房的计划持敌视态度，同时他们往往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1977年—1985年间担任住房部审计长的查尔斯·登普西曾不客气地批评说：“住房部是一个蠢材充斥的地方”。

负责多处住房事务的前部长助理帮办亨特·库欣就是这么一个人。库欣主管着好几个为穷人造房的计划，可是他却极度蔑视穷人。据住房部的工作人员说，库欣有一次在工作会议上竟也大放厥词，说什么天主教徒和波多黎各人象蟑螂一样滥生孩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库欣对共和党的显贵们格外热情。在1988年时，住房部的亚特兰大行署发现，有一个企业漫天要价从住房部系统多领走了59.4万美元。可是，由于这个企业的合伙人之一是1980年里根竞选班子的副主任顾问爱德华·韦登非尔德，库欣决定只要该企业退还8.87万美元。1989年重新进行的审计表明，该企业实际上应退还75.77万美元。在事实面前，库欣的律师提出了新的解释：那家企业不是索费太多，而是帐目出现错误造成了误会。

其实，库欣等人的态度与皮尔斯本人的态度也有很大关系。后来在为自

己的失职辩解时，皮尔斯又特意提醒国会的有关委员会说，他从一开始就反对“适度修缮计划”。结果，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这么回敬了他一句：“因为你没有能够扼杀这个计划，所以你就决定榨干它的血汗”。

由于没有真正为穷人服务的思想，住房部常常只做一些表面文章。住房部下设的社区住房资源委员会的任务是保障实施公平住房政策，可该委员会经费的有效使用率仅为38%，其余44%的经费用来完成文书工作，还有18%的经费则宁可压着也不用来为穷人办事。有钱不花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更令人气愤的是住房部把大笔的钱给建筑承包商，建造出的竟然是劣质住房工程。住房部后来的一项审计表明，在21个月内完工的25项低收入者住房工程（这些工程都有政府补贴）中，有11项工程不符合住房部的部颁标准，其中一项工程竟然连一项质量指标都没有达到。这些工程一共花掉了3600万美元的政府补贴，达官显贵和不法承包商从中大捞好处。

美国政坛有一种特殊的现象：说客可以公开地在议会四下活动对议员们施加影响，争取通过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法律。其实，美国政府部门也常常有说客登门求情，比前者危害更大的是这种人一般都在幕后活动。

曾经担任过里根政府内政部长的詹姆斯·瓦特就是一位活跃于住房部的说客，不过，瓦特当说客挣钱不是凭“说服”别人的本事，而是靠他在任时结下的关系网，利用自己卸任后的“余热”。有一次为了争取到一个项目，瓦特先后打了8次电话，跟皮尔斯面谈了一次（30分钟），他的价码是每次交谈收费33333美元。有人请他描述一下他在这种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这位前部长竟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一位技术娴熟、富于天赋、利用自己的可信性完成了工作的人”。

看到当说客收入丰厚，住房部的官员们也不禁怦然心动。于是，他们在任职时就多了个心眼，注意为日后的收获撒下种子。1983年住房部的审计长就发出过警告说，由于地产开发商虚报成本、漫天要价，“适度修缮计划”会损失好几百万美元。当时担任住房部部长助理的菲利普·艾布拉姆斯斥责这种警告“夸大其词”，对警告不予理睬。艾布拉姆斯离任之后，与也曾负责过同一计划的前住房部官员菲利普·温一起于1984年加入了一家建筑公司。他们两人一起活动，为他们的公司从“适度修缮计划”的修缮基金中捞到了1.336亿美元，还因这一计划而免去税款2900万美元。后来的审计发现，他们从3项工程中就多收费970万美元。

事实上，至少有14名前住房部官员加入了为私人企业争取承建合同的行列，这些人都充分利用了他们与在职的住房部官员的关系。联邦住房局前局长温·艾布拉姆斯、皮尔斯部长的前助手兰斯·威尔森和住房部地方分部的一位前官员，三人组成了所谓“温集团”。在短短11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就得到了“适度修缮计划”所有工程中1/8的承建合同。调查人员根据电话留言本发现，联邦住房局局长托马斯·德默里收到过已经成为说客的前住房部官员的上百个电话。1987年12月，德默里去科罗拉多的维尔度假时，租用了“温集团”拥有的房子。德默里从那儿用电传给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发回了属于机密的管理条例，上面竟然有温·艾布拉姆斯改动的平迹。而这些文件按规定根本就不应该让温·艾布拉姆斯看到，更别说让他修改了。在审查此事时，德默里承认，他让温·艾布拉姆斯看过条例；但他说这是为了征求“前局长”的意见。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说客都收报酬，也不是说不收报酬的说客就没有危

害。例如，福特政府时期的住房部长、布什政府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女士就对别人把她和前内政部长瓦特相提并论“极为愤慨”，因为她当说客未取分文。但是，卡拉·希尔斯造成的损失比瓦特造成的损失还大。她说服皮尔斯按照“合作担保贷款计划”继续给予华盛顿的一家金融公司发放贷款的权利，结果该公司给住房部造成了3亿美元的损失。

人们也许会问，既然住房部管理不善，营私舞弊成风，而且持续时间长达8年，美国国会为什么没有及早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呢？在1986—1988年间担任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的威廉·普罗克斯迈尔说：“无论是对想得到权势的人来说，还是对国会议员来说，住房部都是一个蜜罐。我们委员会的议员几乎没提过批评意见，因为他们都指望住房部能给他们的地区和州一些好处。”普罗克斯迈尔的这番话可谓坦诚至极、切中要害。

1987年，皮尔斯提名德博拉·戈尔·迪安为部长助理。本来，这是国会提出反对意见的大好时机。可是，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的许多委员都站出来明确支持迪安。当该委员会的主席普罗克斯迈尔想阻止对迪安的提名时，委员会的12名委员（6名共和党人、6名民主党人）一致要求付诸表决。究其原因，住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得好：“他们忙着代表承建商讨好迪安还来不及呢！”

按照布什政府住房部审计长肯普西的说法，“任何一个8年级的初中生，只要读一页当时住房部给国会的审计报告，就会知道住房部存在严重的问题。”但是，既然国会议员都在为一己私利而争相讨好住房部的实权派，他们又怎么会真正行使监督权呢？虽然美国国会在皮尔斯卸任后开始抨击住房部的“适度修缮计划”，可是，当初许多议员却只顾忙着给住房部打电话、写信，积极要求把该计划中的建筑工程交给自己的关系户承建。

住房部的舞弊丑闻暴露后，美国的低收入者家庭愤怒不已，他们或投书报刊进行抨击，或游行向政府示威。民主党把这一丑闻看作是对共和党展开攻击的“天赐良机”，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大肆宣扬，指出这一丑闻是共和党严重腐败的一个证据；并谴责说，这样腐败的政党不能再继续执政下去了。民主党的攻击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对共和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冲击波，使其执政地位受到严重影响。

## 美国众议院议长被迫辞职案

在等级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诱惑；一旦有机可乘，许多人都会腐败；因此，在防治腐败上，个人修养和人治是靠不住的，只能依靠社会监督和法治。美国众议院议长赖特的腐化过程再次验证了这一公理。詹姆斯·赖特，1922年12月出生于得克萨斯州沃斯堡市。他的童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大萧条时期度过的，全家人靠父亲四处推销商品艰难度日。父亲望子成龙，常常对孩子们说，人生最大的目标莫过于担任公职为大众服务。据说，詹姆斯·赖特最初从政时也颇有一番雄心壮志，声称要尽全力服务于民众。

1939年至1941年，赖特就读于韦瑟福德学院。1941年，就读于得克萨斯大学。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7日晨）发生后，赖特中断了学业，弃学从戎。赖特被编入陆军航空队，在太平洋战区服役。在对日作战中，他表现勇敢，荣获“英勇飞行十字勋章”。此后，还曾获得美国总统颁发的“功勋勋章”。

1942年，赖特与玛丽·埃塞琳·莱莫斯结婚，后生有一男三女。

1947年，年仅25岁的赖特便进入政界，当上得克萨斯州议会议员。1950年，他当选得克萨斯州韦瑟福德市市长。1955年，他作为得克萨斯州第12区的代表被选入美国国会。当时，年仅32岁的赖特被人们称为理想主义者，他把向他捐献的竞选基金的最高额定为100美元，他还公布自己的所得税回执。在赖特身上，人们看到的是青年人的纯洁和热情。然而，在政界这个大染缸的环境下，这两种做法后来他都没有坚持下去。

到1961年时，赖特竞选参议员未能成功，反倒背上了一屁股的债。随后经商的损失、抚养四个孩子和一位花钱大手大脚的妻子的重担压得赖特在经济上喘不过气来。1969年，当妻子玛丽提出离婚时，赖特求之不得地把他们所拥有的家产都给了她。另外还每月给她950美元的子女赡养费。

1971年，赖特在日记中写到：“我的财务情况是一团糟，……”；“我欠了那么多的钱，我需要运气帮我还债”。不过，据接近赖特的人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还债以外，赖特对钱还是没有多大兴趣。

1972年11月，赖特与他的前秘书贝蒂·海结为夫妻。贝蒂比赖特小3岁，是一位风姿秀雅、穿着入时的女性。夫妻二人感情很好。毫无疑问，贝蒂是一位头脑聪慧的女人。婚后不久，她就给丈夫不少影响。她干的头一桩事就是敦促赖特戒掉一天两包烟的习惯。这项工程起初成效不大，但后来加上医生从旁协助，终究还是大功告成了。贝蒂还很关心赖特与其他众议员的关系，因此她曾建议丈夫：“你为何不跟年轻的议员们再亲近些？”赖特接受了妻子的这一建议，时常请他们一起吃饭。在办公室里，贝蒂也常常帮丈夫拿主意：聘用这位，解雇那位，等等。

不过，在经济方面贝蒂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事事讲究，花销自然很大。有人说，是贝蒂的开支促使赖特铤而走险、滥用权力。这话有些道理。贝蒂自己也说：“事情该怪我，我比他更喜欢精美、昂贵的东西。”

美国国会议员的年薪是8.95万美元，议长也只有11.5万美元，没法与影星、歌星、电视播音员、企业家、资本家的收入相比。既然收入有限、支出无度，赖特家里入不敷出也就不足为怪了。1977年，赖特运用9.8万美元的竞选基金偿还了他的私人债务，这是他采取的后来被认定为非法的第一个

举动。但是，家庭开支入不敷出并不是赖特下水的唯一原因。这是毫无疑问的。

1980年，赖特与房地产兼石油开发商乔治·马利克合伙创办了一家公司——马赖特公司。马利克是赖特的老朋友。据后来负责调查赖特经济问题的费伦说，赖特夫妇仅在该公司中投资5.7万美元，但是在8年的时间里，却给他们带来了价值43万美元的丰厚收益。其中包括：

1. 1981年至1984年，公司付给贝蒂的7.2万美元工资。但是，大家都知道贝蒂从未去公司上过班。

2. 赖特夫妇免费享用公司提供的位于沃斯堡的一套公寓和一辆凯迪拉克轿车。前者折合价值5.3万美元，后者的费用1.9万美元。

3. 公司付给赖特夫妇的5.9万美元的红利和1.8万美元的利息津贴。

4. 1988年赖特转让他在该公司的股份，获得15万美元现金和12万美元股票。扣除当初的5.7万美元投资，其收益为21.3万美元。

这件事正是赖特后来被迫辞职的两大问题之一。

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赖特终于在1987年登上了美国众议院议长的宝座。议长是国会中最显要的政治人物。他是众议院的领袖，也是众议院多数党的首脑。根据宪法规定，当总统不能履行其职务时，他是仅次于副总统的总统继承人。

身为民主党的象征和最著名的代言人，赖特平日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他能在司机生日那天，送些精美的礼品，给司机一个惊喜；他还会去秘书家帮助修剪花枝。他给人们的印象是：笃信宗教，清心寡欲，善解人意，体恤下属。

俗话说，树大招风，好景不长。渐渐地，人们对赖特夫妇与工资收入不符的花销有了怀疑。1988年春天，佐治亚州选出的保守派共和党议员纽特·金格里奇和一个叫做“共同事业”的自由派院外活动组织发表联合呼吁，要求全面调查议长赖特的从政道德，从而引起全美国的关注。1988年5月26日，金格里奇正式向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指控赖特有违反有关法规的嫌疑。道德委员会十分重视此事，决定展开调查。为了确保调查的全面和公正，众议院道德委员会特地从院外聘请了特别检察官、芝加哥律师理查德·费伦主持调查。同时，众议院还拨款160万美元，用作调查经费。

这一下，赖特的日子可不好过了。在白天，赖特成为记者追踪、议会审查的对象；在晚上，赖特成为电视台报道的热点人物。赖特有口难辩，寝食不安。有些夜晚，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有些夜晚，他又一跃而起，冲着电视新闻大发雷霆。一次，为了向记者们说明众议院道德委员会的调查不会有什么不利的结果，赖特邀请记者们参加了一个他在国会山上临时组织的午餐会。第二天，赖特发现，所有报道集中报道的都不是他自己反复强调的主题，而是他说的一句话“如有必要，可以离开议长之职”。赖特从政40年，从来没想到会落到这一步田地。赖特曾对妻子贝蒂说：“老天爷，我可怎么办呢？”“我觉得没救了。一切都被歪曲了。”赖特觉得自己是一外孤立无助的受害人，自己的命运一下子落到别人的手里，只好听任对方的摆布。而贝蒂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是在“等候死刑判决”。

赖特夫妇在度日如年地等候着。他们等来的不是“死刑判决书”，而是“费伦报告”。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费伦报告也确实是一份“死刑”判决书，它一锤定音，实际上宣告了赖特政治生涯的终结。

检察官费伦在 8 名助手的协助下，历时 6 个半月，花费 150 万美元，从 72 名证人那里取得证词，终于在 1989 年 2 月完成了长达 279 页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除包括“马赖特公司”问题外，还包括以下 5 个问题。

### 一、稿费问题

赖特共出过 5 本书，分别是 1965 年的《你们和你们的国会议员》、1966 年的《即将来临的水饥荒》、1968 年的《剑与犁》、1970 年的《国会与良心》（与人合著）、1984 年的《一位公务员的反思》。问题出在《一位公务员的反思》一书。

《一位公务员的反思》为 117 页的平装书，是赖特的讲演和谈话集。该书的出版商是赖特的老朋友、沃思堡的印刷商卡洛斯·穆尔。从 1974 年起，赖特用竞选基金向穆尔支付了 60 多万美元，赖特得到《一位公务员的反思》一书的稿费是 62000 美元，这笔稿费占全部版税的 55%，而一般作者的稿费仅是 10—15%，因而这桩交易有侵吞竞选基金之嫌。此外，穆尔曾因逃税而在联邦监狱坐过 6 个月的牢，还曾涉嫌贪污工会政治基金，穆尔的这些劣迹又加重了人们对赖特的疑心。

《一位公务员的反思》一书的销售情况也极不正常。调查发现，这本书主要卖给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或个人。例如，卡车司机工会买了 2000 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得克萨斯州同乡约翰·怀特买了 1000 本，输油公司“科罗纳多输送公司”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位代理人买了 1000 本，得克萨斯州保险业企业家伯纳德·拉波波特买了 1000 本，沃思堡的地产开发商吉恩·佩特买了 1000 本。其中，吉恩·佩特曾公然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只想给赖特增加点收入，但是规则禁止这样做，所以我就买了他的书。”费伦在调查中还发现，有时候赖特应邀作演讲不收演讲费，却要主办单位购买他的《一位公务员的反思》一书。根据规定，众议员应邀演讲的酬金不能超过年薪的 30%，但稿费收入并无上限。赖特在收取的演讲费达到了最高限额后，就以卖书为手段逃避法律约束。

此外，这本书的整理出版也引起了公众的批评。《一位公务员的反思》是赖特的助手马修·科索洛特花纳税人的钱汇编成集的。科索洛特为此事花了 200 个工作时，其中包括在沃思堡呆了 3 周，公家为这次出差支付了 2078 美元。赖特坚持说这份工作是科索洛特自愿做的，而科索洛特却说，“我以为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 二、油井股票问题

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大致情况是：正当赖特与马利克的老朋友莫里斯·贾菲及其儿子道格·贾菲所有的“贾菲航空公司”在向美国空军推销一架滑翔螺旋桨教练机时，马利克的儿子迈克尔·马利克从道格·贾菲的“圣安东尼奥公司”手中买下了该公司在得克萨斯州奥林奇县色宾湖的一口油井的 4% 的股票。就在马赖特公司正式取得该油井股票的当天，马赖特公司又以 44 万美元的价格将这口井的股票卖给了西德“联合莱茵尼施石油公司”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子公司。扣除有关费用，马赖特公司在这桩交易中获利 35 万美元。

### 三、娱乐区问题

历史上沃思堡市有一个很大的牲畜围栏，过去用以放置即将送往市场或屠宰场的家畜。该市的地产开发商比利·鲍勃·巴尼特，想把这一历史遗迹开发建设为一个综合娱乐区，但缺少资金。家乡在沃思堡市的赖特，运用议



员的威望，通过经济发展署等机构向沃思堡市拨款 2250 万美元。

费伦的报告指出，马利克在同比利·鲍勃·巴尼特谈判他在该项目中的利益时，坚持说议长的支持是他要求利益的根据。赖特风波发生后的 1989 年，马利克说他参与这一项目的的时间很短，而巨根本没有牟利。但是，1987 年秋天，马利克却对《新闻周刊》的记者说，他为解决兴建娱乐区所需的经费忙活了近一年的时间，并且坚持认为由于他筹得了 10 万美金，他应该得到佣金。

#### 四、储蓄银行危机问题

费伦的报告指控赖特以议长的身份，对正在处理得克萨斯州不断出现的储蓄银行倒闭案的联邦官员，施加了“不适度”的压力。马利克也卷入了这些事件，他既是银行的借款人，又是倒闭的银行经营人写给赖特的求援信的执笔人。

#### 五、在蒙克利夫公司的投资问题

沃思堡市的蒙克利夫家族在埃及的西奈半岛有几口油井。1979 年，赖特为该家族去向埃及政府和当时的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求情。后来，埃及政府支付给蒙克利夫家族 500 万美元。几个月后，蒙蒂·蒙克利夫以极低的价格将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一口天然气井的一些股票卖给了赖特。费伦报告说，这份交易实际上等于给了赖特 8.2 万美元的礼物。但是，该报告未能说明赖特的外交活动和这件“礼物”之间有直接关系。

费伦报告列举的赖特的问题极其复杂，美国报刊认为，有不少问题复杂到了只有专职律师、会计师和当事人本人才能明白其中奥妙的地步。

1989 年 4 月 13 日，美国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公布的正式报告对这些问题作出的结论也极其谨慎。评议报告认定对赖特的指控中，有关娱乐区、储蓄银行危机、蒙克利夫公司的问题不成立，而油井股票问题则需要“进一步调查”，“然后才能恰当地得出结论”。但是，该委员会认定赖特在妻子任职问题和稿费问题上违反了法规。

1989 年赖特风波席卷美国之时，新闻界又大肆报道了赖特的高级助理约翰·麦克的“历史问题”。麦克是赖特女婿的兄弟。1973 年，麦克经营一家商店时，曾把一位名叫帕梅拉·斯莫尔的妇女骗进一间无人的小屋，在诱奸未遂的情况下，麦克用锤子敲了她的脑袋好几下，还用刀划破了她的喉咙，并把她扔进她的汽车了事，根本不顾她的死活。为此，麦克被判刑 15 年。但是，麦克服刑仅 27 个月即被保释出狱，并被赖特雇用。从此，麦克一直追随赖特而成为他的助手。此事本来早已了结，但是却又出了一个新问题。1989 年 5 月上旬，有人从华盛顿打电话给电台的“空中漫谈”节目说，在麦克诱奸帕梅拉前两周，麦克曾绑架他的妻子，卡她的脖子，然后强奸了她。麦克否认了这一指控。但是在群情激昂的情况下，他于 5 月 11 日辞去了高级助手的职务。此事的矛头显然是指向赖特的。经济问题尚未澄清，却又冒出一个重用犯罪分子的问题，这对于赖特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关于赖特的有关事实虽然基本上搞清楚了，但是，对于如何处理赖特这一问题美国国会仍然感到十分棘手。

首先，对赖特的处理牵一发而动全局，将涉及全部议员的个人利益，因此也就势必会官官相护。据美国报刊披露，大约 1/3 的众议员和大约 2/3 的参议员公布的总资产是 30 万美元左右，而真正的财产净值又肯定远远高出这

个数字。许多议员都是在任上发的财，他们的财产报表也表明，绝大多数议员积极参与了股票和不动产的投资。这就是说，在经济上有小辫子可抓的决非赖特一人。因此，赖特事件弄得议员们人人惧怕。1989年4月24日的《新闻周刊》就说，许多议员担心“如果赖特倒下去，他们都会因同样的罪行而摔跟头”。得克萨斯州选出来的民主党议员查利·威尔森就公开跳出来，如果严惩赖特，那么“我们就是在冒险制定连教皇都没法遵守的准则”。

赖特事件也使许多议员夫人惶惶不安，因为兼职的也不只是赖特夫人贝蒂一人。据国会议员配偶俱乐部主席玛丽·雷占拉估计，一半以上的国会议员配偶都有拿报酬的工作。的确有许多人结婚前就已在国会工作，但有的人就纯粹是领薪水而不干活。北卡罗莱纳州选出的议员查尔斯·罗斯的妻子琼·罗斯，在她丈夫领导的众议院烟草和花生委员会工作，但实际上每周只有锻炼身体时才到办公室露一下面。议员配偶在议会外“上班”的也不少。例如，纽约州选出的众议员诺曼·伦特是主管通讯的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的委员，而他妻子巴巴拉·莫里斯却是纽约电话公司的公开注册的院外说客。但是，这些人的问题并没有受到追究。所以，赖特喊冤叫屈地说：“大多数国会议员的妻子都工作，为什么我的妻子不能工作？”

美国国会在处理赖特时面临的第二个考验是如何对待法律上的漏洞。谁都不否认美国国会制订的法律浩如烟海，但是这些法律也无法做到所有问题都是非分明。例如，众议院的有关法规规定，议员要“慎重对待”非家庭成员或朋友给予的100美元以上的好处。那么，前面一再提到的马利克算不算赖特的“朋友”？马利克让赖特夫妇免费使用沃思堡的公寓，算是对他们的“个人招待”呢，还是算礼物？对于“个人招待”，法规没有规定任何限制；对于“礼物”，法律则明确规定不得轻易收受。此外，什么才算是与自己的公务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也是一个规定得很含糊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美国报刊早就指出，赖特能否侥幸过关，完全取决于他能否使其他议员相信他是党派之争的受害者，从而让道德委员会的议员们作出“纯法律性质的判决”。实际上，赖特及其三位辩护律师也都是向这个方向努力的。

然而，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赖特的法律问题是跟政治分不开的，虽然老百姓对于一般公民钻法律的空子会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但人们决不会轻易原谅议长钻法律的空子。为政必须讲究从政道德，自己制定的法律不仅不遵守，反而振振有辞，这叫老百姓怎么服气？正如蒙大拿州选出的民主党议员帕特·威廉斯所说：“选民是非常注意道德问题的”。赖特风波初期的民意测验表明，75%的选民认为，“如果情况属实”，赖特必须辞职。到了后期，情况则成了“不管众议院怎样处理，赖特在公众的头脑中已经被定了罪”。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赖特于1989年5月31日被迫宣布辞职。这样，由于不再是议员，众议院道德委员会对他的调查也就终止了。

赖特成了美国现代史上第一位被迫辞职的议长，也开了美国历史上议长因违法行为而丢官的先例，其反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正如美国共和党的一位工作人员温迪·迪莫克所说，“国会的面罩被揭开了，美国人民第一次真正看到了那儿发生的事情。”

## 震惊法国的“发展路口”丑闻

1986年4月，刚上台不久的希拉克右翼政府就揭露了前社会党政府要员涉嫌贪污“发展路口”公款的丑闻。围绕这桩贪污案，右翼政府与左翼的社会党展开了长达4年之久的政法较量。案情发展，险象环生；两派相争，丑态百出；充分展示了法国政坛的生动画面。1981年5月，法国左翼力量在熬过了22年的在野生涯后，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宝座。社会党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竞选总统获胜，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4位总统。1981年6月，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在立法选举中获国民议会多数席位，社会党的莫鲁瓦出任政府总理，梅尔马兹当选为国民议会议长。

1986年3月立法选举后，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在国民议会中由多数派变为少数派，右翼政党（保卫共和联盟、法国民主同盟）成为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派。根据法国宪法，政府由议会多数派组建，保卫共和联盟领袖雅克·希拉克出任法国总理，组建右翼政府。这样，一个少见的政治现象便出现在法国政坛：左翼总统与右翼总理（政府）共掌政权。

以希拉克为首的右翼政府有一套完全不同于社会党人的政治纲领，他们也正是凭借这一纲领促使选民抛弃社会党转而支持右翼的保卫共和联盟的。希拉克政府把社会党执政期间几乎所有的政策都改了回去，转而实行自由经济、全面推行私有化，欲把在野5年来的全部不满都发泄出来。以希拉克为首的右翼政党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还打算利用已控制的国民议会和政府来寻找机会进一步削弱社会党的势力，使两年以后（1988年5月）的总统选举对右翼有利，进而使社会党人失去总统宝座。“发展路口”贪污案，正是在这种激烈的党派斗争的背景下暴露和追查的。

1986年4月28日清晨6时，法国欧洲第一广播电台播出了一条独家新闻，揭露了一桩贪污丑闻。

广播电台报道：有人发现刚卸任的前社会党政府国际合作部部长克里斯蒂安·努西拥有一座豪华的老别墅，而努西本人的合法收入绝对无力购买这座别墅，于是要求司法部门前往侦查。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国际合作部所属的对外援助机构、刚被希拉克总理宣布取消没几天的“发展路口”，帐目混乱，至少有2000万法郎的亏空。1984年12月在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举行的第12届法非首脑会议由“发展路口”筹办，耗资6100万法郎，且有许多假革据。1982年在多哥首都洛美举行的法非首脑会议也由“发展路口”筹办，但仅花费1000万法郎。为何1984年的会议费用竟高出上次如此之多呢？唯一的解释是其中发生了官员贪污公款案。克里斯蒂安·努西是涉嫌贪污公款的首要人物，他将难逃法律的制裁！

“发展路口”成立于1983年，是执行密特朗总统“第三世界主义”的专门机构，专职经营法国对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国家的财政援助，也经管一些特需款项的处理。“发展路口”由法国国际合作部直接领导。

接着，新闻媒介逐步披露了努西挪用公款的内情：努西不仅用“发展路口”的资金购买了豪华的别墅、田产，还为其情妇购置了田宅、为社会党支付党费。有证据显示，社会党的多次竞选活动，用的也是“发展路口”的钱。

记者们都以为这条爆炸性的新闻是他们的电台同行凭借职业的敏感和勇气挖掘出来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是希拉克右翼政府根据手中掌握的材料暗中鼓励电台予以披露的。4月28日下午，新任国际合作部部长米歇尔·奥

里亚克便发表谈话，要求审计法院审查此案，并宣称：“此案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努西背后肯定有后台，不论牵扯到哪一位高官，都要拉他出来在法律面前示众。”

舆论认为，奥里亚克是总理希拉克的心腹，他的讲话实际上代表了希拉克总理的立场；奥里亚克说努西背后有人，显然是指社会党领袖、总统密特朗。这样，“发展路口”贪污案又与党派斗争结合了起来。

新闻舆论的大肆渲染，加上国际合作部长奥里亚克的出面抨击，使得密特朗总统及其社会党十分被动，希拉克政府达到了削弱社会党影响的初步目的。为了平息民愤、弄清是非，巴黎大法院决定受理此案。

努西不只是刚卸任的前部长，还是现任国民议会社会党议员。根据宪法规定，法院对议员不得轻易传讯，更不能拘捕，只有经议会同意而成立的最高司法法庭才能对议员进行审讯。巴黎大法院一时对努西无能为力，只好决定先从努西任部长时的办公室主任伊夫·查利埃入手。他不仅是“发展路口”金柜的钥匙掌管人，大部分款项都经由他手向外支付，而且也是他向希拉克政府提供了关于努西的一些犯罪事实。巴黎大法院决定先收审不享受法律豁免权的伊夫·查利埃，并叫让·皮埃尔·密索大法官负责。

然而，就在巴黎大法院刚做出决定，拘捕令尚未发出的时候，法国内政部的高级官员、全国警察总监雅克·德勒布瓦紧急会晤了查利埃。德勒布瓦向查利埃透露了巴黎大法院要收审他的决定，交给他一本新签发的护照和一张机票，通知他立即离开法国前往拉美国家，对外名义是受法国政府之托办理一件棘手的案子。

1986年5月14日，精心化妆的查利埃戴着宽边墨镜，在法国内政部三名秘密警察的护卫下，顺利通过巴黎戴高乐二号国际机场的海关，登上了飞往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法国航空公司班机。次日凌晨，飞机在里约热内卢着陆，查利埃一出机场，就被两位接应人员迎上一辆黑色宽体福特小轿车，悄然驶向里约热内卢远郊的大森林；在那里，查利埃下榻于一座占地数公顷的高级别墅。查利埃并非受法国政府之命前来办什么案子，而是由一位美丽的巴西女郎陪伴，或是到海滨浴场沐浴阳光，或是到赌场里一掷千金，很是自在！

在政府的精心安排下，查利埃在被收审前夕无声无息地在法国消失了。

右翼政府费尽心机，要搞垮社会党，但为什么又要安排主要证人查利埃出国避难呢？后来才知道，主要原因是此人向执政的右翼党提供了许多社会党的内幕情报，特别是社会党政府在5年执政期间的情报，希拉克政府为表示感谢而采取了保护措施。正在审理此案的巴黎大法院当然不知其中奥秘，一面为案犯出逃而自责保密不够，一面全力侦破查利埃是怎么出逃的，离境后又逃往何处。

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希拉克政府的行为很快便暴露了。社会党立即倾尽全力攻击希拉克政府及其内政部长夏尔·帕斯库瓦，要他交出罪犯，同时交待自己的“罪行”。努西义正词严地在议会发言：“我是清白的，政府才是有罪的！现在大家看清楚了吧？右派议员先生们，到底是谁应该接受审判，你们自思吧！”

虽然内政部长帕斯库瓦一再申明政府与此事毫不相干，同时要求议会尽快通过成立最高司法法庭的法案，把社会党前部长、有重罪嫌疑的努西送上审判台；但是，面对社会党和舆论的强大压力，政府看出包庇查利埃的阴谋实在不能长久，便作出姿态：法国政府已与国际刑警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全

世界范围内发出通缉令，以便尽快使查利埃归案伏罪；“到那时，谁在包庇罪犯将大白于天下，社会党将不得不交出努西以谢国人！”

1986年11月6日，在巴西避难长达半年之久的查利埃终于被引渡回国，投入巴黎卫生监狱。

让·皮埃尔·密索大法官这下有事干了，清闲半年之后，他也确实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然而，审讯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当大法官查验犯人的证件时发现，查利埃逍遥海外半年之久所持的护照是由政府签发的，没有任何涂改和伪造的痕迹，照片也是查利埃本人的。不过，持照人的姓名却是伊夫·纳瓦罗。也就是说，政府在向查利埃颁发护照之时，就把他的姓氏改成了纳瓦罗。而且，驾驶执照上的姓名也是伊夫·纳瓦罗，颁发日期与护照相同。

消息传出，如同“发展路口”案刚被披露出来时一样，举国震动。法国人的语汇里又出现了一个新词——“假真护照”。“假真护照”的发现，使得“发展路口”案更趋复杂。亲社会党的《世界报》等频频发表文章，向右翼政府发起攻击，舆论开始向不利于政府的方向转化。

希拉克政府为挽回局势，同时表明此事与政府无关，遂于1986年12月2日向新闻界宣布解除当初帮助查利埃出逃国外的全国警察总监雅克·德勒布瓦的职务，并称为防止意外将对德勒布瓦实行“司法监护”。此举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外界特别是新闻记者与他接触，透露出对政府不利的消息。

处于“司法监护”之下的雅克·德勒布瓦，虽与外界断绝了来往，但法官是可以与之接触的。查利埃向密索大法官供认“假真护照”来自德勒布瓦之手，德勒布瓦则向大法官声称是“来自大老板的命令”。再查，密索大法官发现查利埃手持的“假真护照”属于法国反间谍机关领土监测局的“库存物”，这些空白护照是专为特工人员出国执行特殊任务时签发用的。

1986年12月9日，密索大法官传讯了法国领土监测局局长贝尔纳·热拉尔，问他法国反间谍机构为何要做危害本国安全的事，协助一名本国司法机关将要依法拘捕的要犯外逃？这是有意犯罪还是受人指使？然而，热拉尔局长的回答大出密索大法官所料：“事关国防机密，恕不相告。”说完，热拉尔拂袖而去。根据法国内政部的规定，领土监测局的行为即使与法律发生抵触，它也既可拒绝出庭，又可拒绝做出任何解释，因为事关“国防机密”。

法院认为“国防机密”一说不能成立，要求巴黎上诉法院检察院就此事做出决断。社会党也就此事向政府提出质问：领土监测局的活动只能限于本土，而把一个既不属于其工作人员且司法部门正在缉捕的要犯派往国外，属于何种行为？社会党议员要求领土监测局局长热拉尔和内政部部长帕斯库瓦到议会回答质问，但遭到拒绝。

1987年5月27日，巴黎上诉法院检察院就所谓“国防机密”一事做出最后裁定：领土监测局签发给伊夫·查利埃的“假真护照”是正当行为，送他出国确系“国防机密”，任何司法机关均不得继续追究此事。

1987年5月28日，自1986年底一直处于“司法监护”之下的内政部全国警察总监雅克·德勒布瓦官复原职。

面对“国防机密”，大法官只好将社会党的要求搁在一边，集中力量调查“发展路口”案。

经过一年的调查，巴黎大法院于1987年4月30日公布了“发展路口”的案情，认定社会党前国际合作部部长努西犯有罪行，应受法律的追究和制

裁。

案情调查报告公布后，右翼各党派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活动，积极酝酿方案、研究部署，以便早日向议会提交法案，要求成立特别法庭审判克里斯蒂安·努西。社会党也专门成立了“危机委员会”，全力以赴对付这场由政府发起和导演的整垮社会党的活动。法国新闻媒介也分成左右两大派，相互激烈地进行指责。

1987年6月3日，法国国民议会就努西的涉嫌犯罪问题进行辩论。双方议员交替进行发言、质询，议会大厅内充斥着两派相互攻击的火药味。

当议员们的力气业已用尽、吵嚷声终于渐趋平息、无人再要求发言时，希拉克总理才站起身来，慢步走到话筒前，从衣袋里掏出事先打印好的讲稿，开始发言。希拉克总理代表右翼党派历数社会党执政期间的弊端，特别指出社会党政府纵容努西犯罪便是自身犯罪。他指出，努西贪污如此巨额公款，社会党政府竟毫无知觉，还要等到由反对党执政后才加以纠正，这是不尊重法律的表现。希拉克总理要求议会尽快通过议案成立最高司法法庭，使努西得到应有的制裁，以体现法律的尊严。中午议会休会、议员们吃饭休息期间，希拉克总理与右翼两大议会党团主席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将提交议会讨论通过的法案文本和其它程序，随后便征集签名。很快，法案得到了256名议员的签名支持。右翼掌握着议会多数，看来努西是非受审判不可了。

在右翼党派征集签名忙得不亦乐乎的同时，司法部长阿尔班·查朗登致信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两院议长，正式要求组成最高司法法庭审判努西。

司法部长致函两院议长的消息传出后，社会党议员团主席皮埃尔·若克斯立即主持召开了社会党“危机委员会”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发展路口”案已经演变为一场政治事件。对于这场来势凶猛的打击社会党事件，社会党决不能等闲视之，必须运用一切合法手段予以反击。若要组成最高司法法庭，内政部长帕斯库瓦也应接受审判，社会党议员不承认什么“国防机密”。努西发表谈话称：“我对所谓帐目混乱一事毫无所知，是查利埃伪造了我的签名领取款项并伙同不法商人制造假发票。我永远是无辜的！”

1987年7月10日，春季议会闭幕式举行之后，议员们开始收拾行囊准备外出度假，“发展路口”案暂时搁置起来。

由于社会党的顽强抵抗，涉嫌“发展路口”案的15个人中只有查利埃一人被捕。查利埃数次要求法院释放他这位“替人受过”的受害者，遭拒绝后三次绝食。巴黎法院当局8月底发表的查利埃健康公报称：犯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十分虚弱，为了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应采取监外就医以外的其它处理方式。

1987年9月15日，查利埃的两个律师联名致信司法部长查朗登，请他关注查利埃的身体状态。因为，绝食以来，查利埃的体重已下降了13公斤，心理分析报告证明查利埃正在进行慢性自杀，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信函称：“伊夫·查利埃并非‘发展路口’案的主要受益者，但却是该案的唯一在押者，岂非咄咄怪事！”

司法部长查朗登收到律师的来信后，从人道主义考虑，要求密索大法官尽快假释查利埃。9月22日，密索大法官签署了在司法监护下假释查利埃的命令。次日，查利埃假释出狱，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查利埃假释，努西议员又不能传讯，密索大法官感到自己已无能为力，遂提出辞职。

虽然司法调查暂停，左右两派并未停止斗争。在浓浓的秋色中，休假的政客们返回了巴黎，开始投入秋季议会的准备工作。右翼政府准备将努西送上审判台，社会党方面也制订了针对右翼政府的反措施。

1987年9月21日，努西的两名律师向巴黎预审法庭递交了一份诉讼状，告发一些人犯有包庇罪：1986年5月至11月间，所有包庇、帮助查利埃逃亡巴西的人，其行为均构成窝藏罪，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诉讼状称，查利埃在担任努西办公室主任期间，其银行帐户的进款为544万法郎，其中工资为133万法郎，来自“发展路口”帐户的资金270万法郎，其余款项来路不明；此外，查利埃还从“发展路口”帐户上支出现金121万法郎。所有这些都说明，查利埃是真正的罪犯，帮助他外逃的人自然也是罪犯，都应受到惩罚。然而，由于诉讼状列举的上述款项并不能解释“发展路口”数千万法郎的资金去向，右翼政府对社会党的这项指控嗤之以鼻，根本不屑作出反应。

1987年10月7日，秋季议会开幕，人们期待已久的左右翼决战开始了。执政的右翼政党将组成最高司法法庭审判努西的提案交给议长，要求立即进行表决。表决结果，340票赞成，211票反对，提案通过。

表决结果宣布后，努西要求发言。他说：“这完全是一个政治阴谋。表面上是反对一个人，其实是通过一个人打击整个社会党”。此后，无人再要求发言，议长宣布休会。

此后，社会党一方面利用对“假真护照”一事的指控向右翼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寻找右翼政府的丑闻。说来也巧，社会党恰恰在这时发现了司法部长阿尔班·查朗登的一桩经济丑闻。

在巴黎市中心，有一家法国最有名的、已有200年历史的珠宝首饰公司。公司世代相传，现由“韶麦”兄弟两人共同经营。韶麦公司曾经生意兴隆，财大气粗，在日内瓦、布鲁塞尔、伦敦、纽约等地都有分公司。然而，由于1982年石油价格暴跌的影响，一直经营惨淡，到1987年中期已欠债20亿法郎。韶麦兄弟为渡难关，千方百计弄钱，其中办法之一便是借债，许以12%至22%的高息。1987年6月13日，巴黎上诉法院起诉厅以诈骗和转移资本罪逮捕韶麦兄弟入狱，公司收款付息成为地下银行也是其罪状之一。司法部长查朗登的儿子娶了老大雅克·韶麦的千金为妻，两家成为亲戚。司法部长查朗登把630万法郎存入韶麦公司收取高额利息，他妻子还在公司设有一个100万法郎的帐户。问题在于，作为司法部长的查朗登有支持韶麦公司私设银行和自己放高利贷的犯罪嫌疑。

消息传出后，舆论为之哗然。舆论的焦点也迅速地转向司法部长查朗登。亲社会党的《世界报》和右翼报纸《费加罗报》不断发表文章、谈话，相互指责，毫不相让。

1987年10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就此事举行辩论。社会党议员提出议案，要求政治家在担任公职前后各公布一次财产状况，以证实他是否利用职权为自己敛财。而右翼政党议员则称：“政治家也有权利使自己富有。我们目前的制度并不要求每个人都立贞节牌坊。”表决结果，社会党议员的提案遭到否决。

1988年，是法国总统换届选举的年份。

1988年2月16日，亲社会党的《世界报》头版大幅标题非常引人注目：《司法警察调查报告减轻了努西先生的责任》。此消息称：“发展路口”案共挪用公款3062万法郎，主要是查利埃所为，罪在查利埃。他模仿努西的签

名领取款项。努西则主要是用公款垫付了竞选市长和国民议会议员的费用，总额在 10 万法郎左右。司法报告得出最后结论：努西作为部长举止欠妥，但最主要的是中了办公室主任查利埃的圈套。此外，长篇调查报告中对查利埃挪用的数千万法郎的每项用途都罗列分明。

社会党第一书记利奥内尔·若斯潘随即发表声明：“这一浩大、准确、冷静的报告，与我们最初所讲的完全吻合。克里斯蒂安·努西的所作所为或许有些轻率，但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查利埃受人操纵，问题是要弄清从何时开始。希拉克总理身边总有那么一群企图挑起事端的人，最后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与此同时，右翼报刊登出了内容相反的评论文章，并质问社会党：“众所周知，‘发展路口’丑闻远未结束，案子的审理还未真正开始，设在凡尔赛宫的特别委员会正在积极工作。一切显得缓慢，然而却是在稳步而正常地进行。秘密文件是怎样流向社会的？社会党的解释明显带有政治色彩，皮埃尔·若克斯（社会党前内政部长）何以知道警方报告并发出预言的？谁犯了‘侵犯司法机密罪’？”

由于总统选举定于 4 月 24 日和 5 月 8 日分两轮举行，在这决定各党政治命运的重大时刻，左右两翼都全力以赴投入竞选，在“发展路口”一案上的激烈争吵便暂告一段落。

1988 年 5 月 8 日，第一轮（4 月 24 日）总统选举 10 名候选人中的 2 名得票最高者进行最后的竞选，以决定谁当选总统。当晚 8 时，选举结果揭晓，密特朗再次当选为法国总统，任期 7 年。次日，保卫共和联盟主席、竞选总统失利的希拉克辞去法国总理职务。

根据宪法的规定，密特朗总统于 5 月 10 日任命社会党人罗卡尔为总理，组成新一届政府。以罗卡尔为首的社会党政府代替了希拉克右翼政府。

1988 年 6 月，法国立法选举分两轮举行。结果仍是社会党人获胜，社会党在议会的 577 个席位中占有 277 席，左翼力量控制议会。

1988 年 12 月 13 日，法国电视二台《披露真相》节目同时邀请社会党内政部长皮埃尔·若克斯和原内政部长帕斯库瓦就“假真护照”一事做出各自的解释和回答。现任内政部长若克斯首先发言说：“假护照就是假护照，根本无所谓假真护照。大家都知道，应帕斯库瓦先生的要求才有人为查利埃制作了一本假护照，它与‘国防机密’毫不相干。这本是出于政客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酝酿的一场阴谋。”帕斯库瓦并没反驳，只是淡淡地说：“我国有一位以上帝自命的总统，如果我们又有一位对这位上帝唯命是从的内政部长，那我们真应该为我们的国家走向何方担忧！”

1989 年 9 月，内政部长若克斯宣布当年查利埃借以出逃巴西的“假真护照”的“国防机密”解密，允许司法机关过问此事。预审大法官菲利浦·雅南受命审理此案。11 月 20 日，雅南从领土监测局局长贝尔纳·热拉尔那里获得了关于“帕斯库瓦以内政部长名义命令他为查利埃签发护照和驾驶执照”的供认。幸亏帕斯库瓦是现任参议院议员，否则，他将因犯有利用职权作弊罪而遭逮捕。

1989 年 12 月 7 日，法国国民议会以 283 票赞成、168 票反对，通过了社会党议员让·皮埃尔·米歇尔提出的一项修正案。该修正案的主要内容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凡在 1989 年 6 月 15 日前的历次竞选活动中，以非法手段筹集经费或使用经费而犯罪的，只要没有中饱私囊、没有制造假钞、没



有直接搜刮、没有贪污或变相贪污，一律赦免无罪。

这项法律修正案，将使许多人得到解脱。然而，社会党通过此修正案的首要目的是解脱努西在“发展路口”案中的罪责。此修正案投票结果一出来，法国民主同盟议员热拉尔·隆盖即发表评论：“十足的虚伪！十足的虚伪！”次日，各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也多以“虚伪”形容这项修正案。“虚伪”归虚伪，社会党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1990年2月11日，法国最高法院总检察官贝泽奥发表长篇报告认为，米歇尔法案已部分赦免努西的罪行，至于挪用公款一事，主要是努西的办公室主任查利埃模仿努西的签名所为，所以对努西的指控不能成立。最高法院为此案而成立的5人预审会议也决定中止工作。贝泽奥的报告还指出，审计法院的调查表明1984年的第12届泛非首脑会议开销甚大，但努西挪用公款主要是用于支付竞选费用。

努西是无罪了，但社会党政府想把右翼前内政部长帕斯库瓦送上审判台也非易事，后来也是不了了之。在“发展路口”案中，受到法律惩罚的只有查利埃一人。

## 法国贝希纳股票案纪实

1988年5月、6月，社会党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双双获胜，弗朗索瓦·密特朗再次登上总统的宝座，米歇尔·罗卡尔受命坐上总理的交椅。从而，社会党以其雄厚的实力结束了左右两翼共处的历史，信心十足地迈开了执政的步伐。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社会党人沉醉在重新执政的胜利之时，一起股票案件突然暴光。案情涉及政界要人，牵连其他国家，执政的社会党顿时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法国选民惊讶异常，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在大选中看错了人？

1988年5月10日，密特朗总统任命社会党人罗卡尔出任法国总理。

1988年6月12日晚，国民议会选举揭晓，社会党在法共的支持下只获得相对的多数，右翼政党也没有获得绝对多数。罗卡尔总理因此辞职。

1988年6月14日，密特朗总统发表电视讲话，表示社会党虽然没有在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但社会党有单独执政的信心和决心，并再次任命罗卡尔为新政府总理。6月29日，罗卡尔组成新内阁。

1988年11月中旬，法国国营贝希纳铝业集团公司决定购买美国三角公司的子公司——美国国民制罐公司(ANC)。双方经过几轮谈判，初步决定以12.58亿美元成交。在谈判接近尾声时，贝希纳公司董事长拜见了法国工业部长和经济部长，要求政府开放绿灯、成全此事。由于这笔买卖涉及到国营公司购买外国公司，报告立即上呈总统和总理过目。

两国公司间的谈判和上呈报告都处于绝密状态中，除了总统、总理和参加谈判的要人外，其他人均不知晓此事。谁知就在法美两家公司正式签署协议前4天，美国三角公司ANC子公司的股票突然“走俏”，有人以每股10美元的低价买走了22.7万股，这笔交易大部分是在法国和瑞士进行的。购买协议公布后，ANC子公司的股票价格大幅度上长，协议签署前被买走的22.7万股股票又以每股56美元的高价抛出，投资者从中牟取了暴利。

稍具股票常识的人都知道，股票投资是一项风险性极大的投资。股市行情变化莫测，它既可能使人获得意想不到的良好收益，也可以使人把投资老本赔上一定的比例。为了减少损失增加收益，股票投资人无不密切关注影响股价升跌的新消息。因为对股票投资人来说，掌握新消息就意味着获得大笔收益(或减少大笔损失)。那么，究竟是谁生就一双慧眼，看好了ANC公司的股票？素有股市“警察”美称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机敏地嗅到“气味不对”，他们派出素质高超，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进行秘密调查，认定有人泄露了谈判机密，搞股票“情报走私”，于是向法国方面发出警报，并要求调查。刹那间，“贝希纳股票案”成了法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丑闻暴露后，法国的报刊记者迅速行动起来，其中以《问题》周刊、《快报》周刊、《费加罗报》、《法兰西晚报》尤为积极。

法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接到美国同行的报告后，也开始进行调查。财政部下令“务必查清”此事。证券交易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确认，有人在股票交易中搞“情报走私”，6人从中受益。但是没有披露泄密者的姓名。新闻界则顺藤摸瓜，穷追猛打，终于使案件又有所进展。

新闻界披露了4个与此案有牵连的人，他们是：

沙米尔·特拉布尔西：黎巴嫩人，45岁，是美国三角公司卖方的顾问。

他否认有过任何购买和任何透露消息的事情，一口咬定自己只领过代理费。

马克斯·泰雷：76岁，亲社会党政府，是全国商业代理人联合会的前董事长兼总经理。他领导的巴黎投资公司在收购三角公司股票的公告公布前3天买进了3.23万股，渔利880万法郎。他承认购买了股票，但他一口咬定是由于自己很熟谙股市行情才下决心购买的。

阿兰·布伯利尔：41岁，经济、财政和预算部长皮埃尔·贝雷格瓦的办公室主任，是所有传谣的焦点。他与沙米尔·特拉布尔西、马克斯·泰雷以及罗歇·帕特里斯·佩拉过从甚密。他因涉嫌此案，被迫辞职。

罗歇·帕特里斯·佩拉：密特朗总统40年来的密友和心腹，他通过奥坦盖银行直接在法国购买了1万股股票，获利220万法郎。他承认是根据他朋友马克斯·泰雷的建议才购买股票的。

新闻界的这一披露，使此案的严重性进一步升级，许多“政界要人”涉嫌此案，这不能不说是执政的社会党政府的一个严重打击。

右翼政党在总统和议会选举中惨败，正愁找不到把柄攻击对手，贝希纳股票丑闻给他们创造了天赐良机。于是，便集中火力向社会党及其政府发起了猛攻。

为了保护社会党和政府的威信，社会党的头面人物立即作出反应，进行自卫还击。经济部长表示，此案一定要提交司法部门继续审理，一直追查到底。内政部长若克斯指责有人搞“政治利用”，声称政府部长和社会党议员无一人与此案有关。

双方争吵谁是谁非，一时虽难以明了，但丑闻的的确确在法国发生了，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丑闻一暴光，最难堪的要数总统密特朗了，因为他的老朋友和心腹罗歇·帕特里斯·佩拉与此案大有牵连。1989年2月12日，密特朗在“7天中的7天”电视讲话中表示，他为他的这位朋友受到牵连而感到难过。他是在德国集中营认识佩拉的，他说：“在贫困和孤独的情况下，能够表现得象佩拉那样坚强、那样有个性和那样重情义的战犯是不多的。佩拉过去很穷，后来变得富裕了，不过不是作为富商，而是作为富有的工业家。难道我应该因为他由穷变富而同他闹不和吗？不。”密特朗又说：“如果事实证明帕特里斯·佩拉只是象成百万法国人那样从事交易投机买卖，我是不会责怪他或为他的行为感到遗憾的。但是，如果他是在我的职权范围内犯错误，我认为，我是不会继续保持我长期以来对他所持的友好态度的。”

从密特朗总统的电视讲话中可以看出，密特朗是很敬佩佩拉的，他希望能与佩拉保持这种友谊，但是作为政治家，在必要的时候他似乎也有勇气抛弃他这个多年的朋友。

密特朗在电视讲话中还谈到了丑闻的另一个涉嫌者马克斯·泰雷。他说，泰雷不是我的朋友，甚至同我也没有什么交往。但是我不想让我的话对他产生压力。凡是认识他的人都是尊重和信任他的。

在谈到对该案的处理时，密特朗要求司法部门“严肃处理，不管犯罪人是谁”。他说：“我的职责是维护谨慎持重的法国人的利益，反对各种投机者。”

密特朗的讲话听起来很是冠冕堂皇，然而，事件的发展表明，他的这番讲话，只是不疼不痒地向世人说说罢了。他是否真下决心追查此案，只有他本人知道。

与密特朗总统的讲话相反，新闻媒介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全国的大小报刊，如数家珍一样摆出历史上各种丑闻，并围绕着该案对法国的政治生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其中最具有份量的分析当数《问题》周刊的评论。

《问题》周刊评论道：事实是，法国贝希纳公司购买美国 ANC 子公司时，几个身居要职的法国人轻而易举地把数千万法郎装进腰包。是他们深谙股市行情，凭自己的学识和能力挣来的吗？绝对不是！他们只能通过总统府、总理府、主管部（财政部和工业部）、巴黎国民银行、贝希纳公司领导层或中间人得到这个情报。难道这还不清楚吗？

周刊评论说，这桩金融丑闻有损总统的威信，因为他的私人朋友帕特里斯·佩拉受到了牵连。正如总统的一名亲信所说：“对总统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正当密特朗总统提出外国移民权利问题并建议重新确定人权概念，以使自己的政治使命具有道德灵感之时，丑闻在他身边爆炸，这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场灾难。

无论此案司法调查的结果如何，从政治角度讲，它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前总理莫鲁瓦办公室成员蒂埃里·普菲斯特在抨击文章中写道：“右翼不道德，左翼违反道德。”这句话虽然令人不快，但现在可能无情地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该刊还详述道，贝希纳案件之所以严重，并不仅仅因为案情本身，而是本案突然证明了最近几个月人们对政界人士以权谋私所产生的怀疑。例如银行总公司案，尽管有人以确凿的证据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但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不想调查马索尔投资公司董事长乔治·佩贝鲁“捞取”股票的内情。相反，佩贝鲁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获得了这家银行资本的 10%。还有卧铺车公司案，也让人记忆犹新。当时信托局以低价把一部分股票转让给乔治·佩贝鲁，而信托局监察委员会对此不闻不问。在帕泰公司案中，人们也不禁要打个问号：马克斯·泰雷的 10 多亿法郎来自何处？

《问题》周刊接着评论说，尽管政治丑闻在法国历史上接连不断，但是都没有贝希纳案件丑闻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首先，它影响国家最高当局的声誉。身居高位的官员受到怀疑，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对政府的信任是一个民族具有凝聚力的基础，而如今，政府正在失去这种信任。人们惊奇地发现，贝雷格瓦等正人君子式的部长与黎巴嫩人沙米尔·特拉布尔西这样的军火贩子勾搭在一起；社会党头面人物基莱斯同可疑的意大利金融家贾恩卡洛·帕雷蒂有牵连；财政部长的办公室主任同军火贩子一起共度周末；这难道不很可怕吗？这些政客的所做所为，不要说为礼仪所不许，更为道德所不容。

其次，贝希纳案件影响左翼形象。长期以来，许多法国人的头脑中对左右两翼已形成了固定的观念，他们认为，右翼讲求效率，左翼讲求道德。左翼领袖密特朗从青年时代起就发起运动，反对“杀人、腐蚀人的灵魂的金钱”。左翼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有能力向世人表明：它能象右翼一样管理国家，而且会管理得更好。然而，今天的左翼是否在证明，在它最能吸引善良百姓的道德伦理方面，它已与右翼没什么两样？左翼政府一个接一个以权谋私的丑闻，迫使法国人自问：左翼与金钱究竟是什么关系？它还象以前那样视金钱如恶魔吗？1986 年以前，左翼十分厌恶金钱，而如今，左翼突然逆转，受到金钱的引诱。这种引诱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左翼以前并不精于此道，没有对金钱引诱的免疫力。正如一名见多识广的金融家嘲讽的那样：“那些从未

看到过一沓三张 500 法郎钞票的可怜虫，一有机会便会扑上来。”社会党左翼是否在重蹈 100 年前激进左翼的覆辙？当年，激进左翼开始也是大讲思想、大谈原则，而后来却成了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一个流传已久的笑话说：“金钱和激进有什么区别？毫无区别，都是里红外白、吃白食。”那么，陷入金融丑闻的社会党人是否也逃脱不了这种可怜的命运呢？

《问题》周刊最后论述道，太阳落下山了，每个人都点起了照亮自己的灯，法国人是否可能在“大家都是耗子”的歌声中重新陷入彻底的犬儒主义（即玩世不恭）？人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法国人似乎在同金钱和解，总统可能也接受这种普遍的思想。但是，所有法国人包括政府高官们千万要牢记：与金钱和解并不是可以赚取不义之财，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做生意是从不拿道德冒险的！法国再也不能长期被自己的伙伴视为高官们以权谋私的共和国了！

《问题》周刊的出色评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然而，案情的调查并不乐观。经过漫长的调查，案件的关键人物、总统的密友罗歇·帕特里斯·佩拉终于受到起诉。人们冷漠的心里又升起了一线希望。可是，无独有偶，佩拉在受到起诉后，突然死亡。警方一开始对佩拉之死惊慌失措，但最后宣布，佩拉之死与案件无关。

这样，仅有的一点线索也中断了，案件变得越发扑朔迷离，司法部门也束手无策。轰动法国政坛的贝希纳案件只得以虎头蛇尾而告终。

## 法国前总理贝雷戈瓦自杀之谜

皮埃尔·贝雷戈瓦是在法国社会党摇摇欲坠的背景下出任法国 1993 年立法选举前社会党最后一届总理的。他出任法国总理，一开始就笼罩着一种悲壮的气氛。他必须创造奇迹才能挽救社会党衰败的命运，但他又不具备创造奇迹所必须拥有的党内外的权力和足够的时间。

1992 年 3 月，面对内外的强大压力，法国历史上首任女总理、58 岁的埃迪特·克勒松招架不住了。

这位一头褐发、风度优雅、有着迷人的微笑的女总理，因脾气火爆、作风雷厉风行，而被人誉为法国的“铁娘子”。1991 年 5 月，面对危机四伏的国内经济及社会形势，她由密特朗总统点将执掌相印，受命要给在政治、经济和精神上“萎靡不振”的法国来一个“强刺激”，以迎接 1993 年的全国立法选举和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到来。也就是说，她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重振社会党的士气，避免再现 1986 年至 1988 年右翼政党与密特朗“分权”的局面，同时还要抑制衰退、复苏经济，使法国以政治经济强国的姿态进入欧洲大市场。然而 10 个半月来的国家运营情况表明，这位曾令法兰西上下喝彩一时的巾帼总理并无回天之力。经济增长缓慢，复苏前景渺茫，国家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年度预算赤字将突破 1310 亿法郎。由于受欧洲共同体统一农业政策的影响，法国农牧产品出口受阻，农民收入大幅度下降。从 1991 年 9 月底 20 万农民聚会巴黎艾菲尔铁塔下抗议示威之后，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农民拦截进口农产品运输车辆、捣毁粮仓酒库和冲击地方政府等暴力事件。工业经济专家出身的克勒松总理上任后曾采取一系列振兴工业的措施，但其结果是，工业生产投资越发锐减，企业竞相裁员，失业队伍急剧膨胀，全国失业人口已从原来的 260 万向 300 万靠近，失业率高达 10.1%。失去就业保障和社会安全感的各行各业职工成千上万地走上街头，罢工示威浪潮方兴未艾。同时“假发票案”、“输血感染案”、“社会党经费案”等一桩桩政治丑闻接连曝光，更使她和密特朗所领导的社会党政府威信扫地。在这样的情况下，遇上 1992 年 3 月下旬的两次地方选举，社会党自然是遭到了“空前的惨败”。其中在 22 个大区议会的选举中，社会党得票率仅为 18.2%，创下了这个党在地方选举中得票率最低的历史纪录。社会党内怨声载道，也开始向克勒松总理施加压力。克勒松总理面临着下台的危险。

1992 年 4 月 1 日上午 9 时 30 分，一辆棕色雷诺 25 型防弹轿车驶入总统府，车上坐着克勒松总理。稍稍振作了精神的克勒松总理跨出车门，快步登上了爱丽舍宫的台阶，她要去见密特朗总统。她刚在密特朗总统面前坐下，就以她通常的坦率方式直言不讳地诉说贝雷戈瓦部长的“过错”，“贝雷戈瓦一直给我制造麻烦，因为他对自己没能当上总理感到气恼。”克勒松总理在诉说了她对贝雷戈瓦一系列不满后表示，她希望领导一个更加紧密团结并摆脱了这个“身体臃肿笨拙的家伙”的政府。

尽管“铁娘子”在爱丽舍宫告了贝雷戈瓦一状，她还是没有能阻挡住这个“身体臃肿笨拙的家伙”走向马提翁大厦（总理府）的步伐。1992 年 4 月 2 日上午 9 时，密特朗总统宣布，正式接受克勒松总理的辞呈，任命经济、财政与预算部长皮埃尔·贝雷戈瓦出任新总理，组织新政府。

4 月 4 日，脸上洋溢着激动之情的贝雷戈瓦来到马提翁大厦，同难免有些沮丧的克勒松夫人举行权力移交仪式。当两位总理出现在高高的台阶上

时，面对新老政府内阁成员，面对拥挤一团的新闻记者，克勒松大方地同新总理贝雷戈瓦握手、拥抱。

仪式结束后，贝雷戈瓦把他那显得笨重的身体放在马提翁大厦的雕花饰金的总理宝座上，长长地嘘出了一口气。

皮埃尔·贝雷戈瓦，1925年12月23日出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的塞纳滨海省鲁昂市郊区的一个小镇上。父亲是乌克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移居法国，在煤矿做工。母亲是位善良的法国妇女，她在家门口拼凑了一个小杂货铺，虽勤苦经营，家中的日子仍是过得很拮据。随着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的相继出生，家境日渐贫寒。头脑聪明、能讲7种语言的父亲，因为家境贫寒，经常愁眉苦脸，甚至时常冲着贝雷戈瓦这个长子大发脾气。

贝雷戈瓦早年丧父，1941年16岁时就辍学就业，开始走入社会。起初，他进入一家毛纺厂当学徒工，先后干过车工、钳工和铣工，一年后转到铁路公司当工人。此时，他加入了反法西斯侵略的抵抗运动，利用职业之便，不断地把德军的军车调动情况报告给抵抗组织，成为抗击纳粹的法兰西“铁道游击队”的战士。在反侵略的战斗洗礼中，贝雷戈瓦受到以法共为代表的左翼爱国力量的影响，曾加入社会主义青年联盟。

二战结束后，贝雷戈瓦又在诺曼底登陆战役的废墟上艰难地谋职糊口。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贝雷戈瓦在参加完当地工会召开的一个会议后急于往家赶。但因雨下得太大，公共汽车停开了。正当淋得象落汤鸡一样的贝雷戈瓦束手无策时，后面驶来一辆小汽车。他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拦截，汽车嘎然而止，当他说明搭车的原因后，车主善意地把他让进车内。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雨夜奇遇竟成了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原来车上的主人是法国电力公司诺曼底地区的头头，在送贝雷戈瓦回家的路上，俩人信口闲谈，贝雷戈瓦的忠厚稳重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临别时，他给贝雷戈瓦留下名片，要小伙子有事时找他。后来，这位说话顶用的负责人引荐贝雷戈瓦到当地煤气公司做了商业技术员，这对贝雷戈瓦来说真是一个福音。贝雷戈瓦没有放过这个大好机会，以勤奋的工作报答命运之神的垂青。50年代初，他已是一个业务熟练、工作成绩突出的商业代理人了，并被推荐到国家煤气公司任职。

在巴黎，这个不知疲倦和饥饿的年轻人拚命地坚持自学，白天以充沛的精力完成本职工作，晚上就跑到大学或企业去听讲座。他广泛地涉猎金融、经济等方面的理论，逐步掌握了企业经营、财经管理方面的知识。这个时候，为了维持全家的生计，他的生活仍然相当困难。有一次，他和一位好朋友读书到深夜，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便到外面去买吃的。可两人掏空口袋，凑的钱才够买一个夹肉面包。于是，一对难兄难弟一阵苦笑后只好各分一半来吃。

然而，陷于贫寒之中的贝雷戈瓦没有向生活屈服。来自社会低层的经历，使他十分重视友谊和人际关系。他深有体会地说，生活中最难忘的莫过于“在人生道路上有人助你一臂之力”，在同事们中，他从不炫耀自己的才能，也从不因为自己受到对方辱骂而怀恨在心。相反，他总是写信给对方，诚恳地与之交换意见，求得理解。这个没有任何家族背景、没有进过高等学府的普通平民，孑然一身地在巴黎奋斗着。靠着个人勤奋自学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的才干不断增长，资历不断积累，最后终于登上了法国国家煤气公司总裁的宝座，与那些来自上层的大亨们平起平坐。

工人出身的贝雷戈瓦是从工会开始涉足社会活动的，他很早就是工会的

积极分子。1946年5月，他正式加入社会党的前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58年，贝雷戈瓦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建了一个新的小党：自治社会党。1960年，该党与社会主义左翼、共产主义论坛等政治组织联合成立“统一社会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法国政界名流米歇尔·罗卡尔。他的才干还得到了当时的法国著名政治家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的赏识。在皮埃尔的智囊班子充当孟戴斯—弗朗斯助手的10年中，他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斗争经验，学会了管理财政经济，更重要的是对法国政治局势及其发展趋势有了充分的了解，为今后的进一步升迁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63年至1967年，贝雷戈瓦担任统一社会党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他曾积极支持密特朗竞选总统。1967年，他又创建现代社会主义俱乐部。1969年，该俱乐部并入密特朗领导的“共和体制大会党”，贝雷戈瓦任党的指导委员会和执行局委员，从此在密特朗的麾下冲锋陷阵。1971年6月，共和体制大会党与社会党合并，组成更加强大的新的社会党，密特朗当选为第一书记。其后不久贝雷戈瓦成为社会党的中央书记处成员，先后负责社会事务和对外关系。1978年，作为经济领域的知名人士，贝雷戈瓦参加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工作。

长时期的并肩战斗、风雨同舟，使贝雷戈瓦成为密特朗的亲密盟友之一。在1981年的总统竞选中，贝雷戈瓦是密特朗竞选班子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密特朗当选总统后，立即任命他负责监督两届政府的权力交接，并同他磋商首届左翼政府的人事安排。紧接着，便提拔他这个“自学成才者”为总统府秘书长。1982年，贝雷戈瓦出任莫鲁瓦内阁的社会事务部长。1984年，他出任法比尤斯内阁的财政和经济部长。

1988年，法国举行7年一次的总统选举。72岁的密特朗对总统宝座恋恋不舍，再次参加总统竞选。贝雷戈瓦被任命为密特朗总统竞选班子领导人。

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前总理希拉克为首的保卫共和联盟与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领导的法国民主同盟发生分裂，严重影响了右翼的竞选实力，为密特朗再次当选总统提供了可乘之机。密特朗连任总统后，任命罗卡尔为法国总理，贝雷戈瓦再次担任财政和经济部长。

充满活力的克勒松1991年5月当上法国总理后，很是欣赏日本将外贸、工业、科研集成一个超级大部的做法，于是就将经济、财政和预算捆在一起，交给贝雷戈瓦管理。这样，贝雷戈瓦成了一名大权在握的“超级部长”。

贝雷戈瓦曾被看成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在任财政和经济部长的6年内，他实行的却是保守派的经济政策。他是社会党领导人中第一个提出采取紧缩政策的人。在他的努力下，几年来紧缩政策取得一些明显成果。法郎日趋坚挺，对美元的比价由社会党执政初期的10比1变为十年后（1992年）的5.5比1。法国股票市场也呈上升态势。他还成功地使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大幅度下降，成为欧洲共同体各国中最低的国家之一。他还使法国的外贸逆差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任何一种经济政策都难免有不利的一面，经济紧缩政策也是如此。由于紧缩政策不刺激消费，不利于增加投资，难以刺激产业发展，因此不但不能创造就业机会，反而导致大批工厂和企业裁员，这对于为失业问题所困扰的社会党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自学成才、靠个人奋斗在法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贝雷戈瓦以前做过当总理的梦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出言谨慎的他也曾不打自招过：那是在1982



年，他初次进入内阁荣任社会事务部长不久，在同旧时工会里结交的一个蓝领朋友会面时，不设防的贝雷戈瓦谈话间没头没脑地在朋友面前冒出了几句：“昨晚，我做了一个美梦，梦见我当了总理，莫鲁瓦（总理）把他的权杖交给了我。”

在同僚们的眼中，贝雷戈瓦老成持重，锋芒藏而不露，做事板眼分明，说话深思熟虑，人际关系又好，是块当总理的料子。他长期主掌财经大权，控制了工业化国家人人头痛的通货膨胀，保持了法郎比价的坚挺，行家们对此有口皆碑。这样一个政绩斐然、有竞争实力的人物想做马提翁大厦的主人，自然不是白日做梦。然而，幸运之神几次与他擦肩而过，让他在总理府外徘徊、再徘徊，以致于他的心差点都冷了。

据一位总统私人顾问透露，早在1983年，贝雷戈瓦的名字曾经出现在密特朗总统的总理候选人名单上，密特朗甚至一度让他悄悄地背着莫鲁瓦总理提出他的政府成员名单。但后来密特朗鬼使神差似地又改变了主意，见了他的面后哼哼哈哈地敷衍他，绝口不提此事。1984年，莫鲁瓦风雨飘摇、地位不保，贝雷戈瓦成了呼声甚高的继任者。但密特朗以他太“老”为由相拒，另选年轻宠臣、年仅38岁的法比尤斯组阁。贝雷戈瓦听到这消息后，颇为沮丧，伤心地说：“这次没我的份儿，恐怕来日也不会轮到我了。”1988年，凭着贝雷戈瓦保驾的赫赫战功，人们猜测他是最有希望出任总理之职的人选。可密特朗这次却嫌他太“左”，对他旁敲侧击地说，社会党需要找一位右倾人物出任总理，以争取中间派。这次，密特朗选中了57岁的米歇尔·罗卡尔，贝雷戈瓦再次与马提翁大厦无缘。1991年5月，密特朗再次更换总理，由贝雷戈瓦接替罗卡尔的传言像巴黎的晨雾一样弥漫在大街小巷，一切迹象都表明贝雷戈瓦十拿九稳要出任新总理。可是，密特朗却又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旁人，将贝雷戈瓦冷落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克勒松登上总理宝座，贝雷戈瓦失望极了。他实在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一气之下，流露了打算辞职的想法。在出现贝雷戈瓦辞职的谣传后，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大幅度下跌。密特朗闻讯后，急忙好言相劝、抚慰一番，并许诺给他以更大的权力。这样，他才同意在财政部留了下来。

贝雷戈瓦虽然于1992年4月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法国总理，但这时的社会党政府已经危机四伏，他的任期也只有11个月。明知社会党已被密特朗总统领入歧途，但贝雷戈瓦还是出任了立法选举前的最后一届社会党政府总理。

贝雷戈瓦有一个美满温暖的家。他和妻子吉尔贝特是在当年反法西斯的斗争中认识的，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他们结婚成家。40多年来，贝雷戈瓦夫妻二人相敬如宾，情意浓浓。他们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贤惠淑静的吉尔贝特对丈夫关心照料体贴入微，而贵为一国之相的贝雷戈瓦依旧早早地起床，为喜欢晨睡的老妻备好早餐。同法国的上流社会不同，这对平民出身的夫妻很少出入餐馆、时装店，更很少周旋于宴会之中。他们喜欢带着全家避开城市的喧嚣，在乡下别墅欢度周末。而在政坛角逐不息的贝雷戈瓦只有在家里，在他的亲人中间，才真正感到做一个人的自由自在。视家庭如生命的贝雷戈瓦工作再忙，也要抽出一些时间与家人团聚，用弥漫在家庭的温馨冲淡工作中的忧愁和烦恼。他记得家里每个成员的生日，家中举行的喜庆活动，他从未缺席过，而且每每送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礼品。即便是有时因出国访问或参加会议不能回家，他也总是想方设法买些礼物送到家人面前，让亲人们感觉到他就在他们身边。

贝雷戈瓦被任命为总理的消息一经公布，这位在财经和金融界反应良好的政治家便向公众宣布：他将组成一个“面目一新，年轻化和团结一致”的社会党政府。他果断地从旧政府中剔除了10名不受公众欢迎的部长，另从社会党遴选了6名新人入阁。

上任伊始，贝雷戈瓦便全力以赴地抓经济，以遏制法国经济每况愈下的态势。在他的积极努力下，法郎坚挺、通货膨胀率继续降低、外贸也出现了盈余。由于经济形势有所好转，贝雷戈瓦的威信开始上升，得到近60%的支持率。

但是，贝雷戈瓦无法抹掉法国经济的巨大阴影——高失业率，这是克勒松夫人倒台的主要原因，不能不令贝雷戈瓦心有余悸。他执政100多天后，失业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一直在上升。贝雷戈瓦为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出台了一些“大胆措施”：降低银行基础利率，以促进投资；降低增值税，以刺激消费的增长；推出刺激建筑业发展的修房、建房计划等。令人瞩目的是，他宣布了“部分私有化”计划，通过出售国有企业部分股票来为扩大就业集资。贝雷戈瓦本来期待这些高招能初见成效，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就业市场在近几个月内难以好转”。

贝雷戈瓦领导的政府开始运营后，碰上的头一件事便是法国的修宪辩论，政府提出的修宪草案最终在参众两院以压倒多数通过，这使他在内政上赢得了重要的一分。一向老成持重、从不偏激的贝雷戈瓦为了息事宁人，在涉及内政的其它一些问题上不得不出让让步。如他刚走马上任，就宣布法国停止在南太平洋的核试验；3个月后，又宣布1987年发生液钠泄露的超凤凰核电站虽已修复，但暂不启用，以作进一步的安全检测。这些措施从“绿党”和“生态一代”组织那里博得了稀稀拉拉的掌声。但贝雷戈瓦也遇到了许多麻烦。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刚把抗议示威的码头工人从巴黎街头打发回去，1992年7月上旬卡车司机们又找上门来，而且把麻烦闹大了。

事情的起因非常简单：法国每年在公路交通事故中都有1万人丧生，20万人受伤，一直保持着“欧洲记录”。贝雷戈瓦为了中止这种“公路上的屠杀”，决定对所有司机实行计分法管理：每个驾驶证为6分，根据司机违反交通规则的轻重程度扣分，扣满6分即吊销驾驶执照。此令一出，立即引起了卡车司机们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自己整天在公路上跑运输，公路里数比一般司机大得多，风险也随之而增加。实际上，他们更担心的是面临失业威胁。因为没有其它特殊技能，驾驶执照一旦吊销，便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

于是，他们便联合行动，开始驾车游行示威，并在全国各地主要高速公路及国家公路上用卡车设置路障，连续数日封锁公路。1992年7月6日，贝雷戈瓦下令出动1.2万名军警、12辆重型坦克和装甲车、21架直升飞机消除路障，警方还逮捕、拘留、处罚了1500名示威的司机。但是，旧的路障刚刚消除，新的路障又出现了。第二天，法国的主要公路上共出现了150多处障碍，使原来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全部陷于瘫痪。

法国80%以上的物资流通靠公路运输，公路的堵塞使许多城市的食品和日用品供应中断，一些超级市场的鲜货也被抢购一空。前阵子因为农产品卖不出去举行过抗议示威活动的农民们，也参加进来发泄对政府的不满，南方的一些农民在铁路上设置了障碍，使里昂到南部沿海和东部山区的铁路运输中断。数万名法国度假者和欧洲游客被困在公路上或车站里，叫苦不迭。由于交通中断，法国的各行各业纷纷停工待料，法国的经济损失使巴黎股市的

价格平均水平降到近 5 个月来的最低点。同时，危机也波及邻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国家通过法国运往中欧各国的物资都被堵在路上，进退不得。西欧一些国家的政府和舆论界都在以强烈的措词敦促法国政府采取行动。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贝雷戈瓦在马提翁大厦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计分驾驶证”是一项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措施，它的实行将不会推迟”。但卡车司机的示威行动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是贝雷戈瓦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所没有料到的。他赶忙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同助手们商讨对策。法国的全国公路运输联合会等工会组织已宣布从 7 月 7 日起举行总罢工，要求政府撤销计分驾驶证法规。这当然为贝雷戈瓦所难以接受。但贝雷戈瓦决定派出代表同工会进行谈判，并指示谈判代表做出适当的让步。

7 月 7 日至 8 日凌晨，法国政府同工会进行艰难的谈判。

7 月 8 日凌晨，在贝雷戈瓦的授意下，大批防暴警察乘着晨雾出其不意地向堵路的卡车司机发起进攻，用催泪瓦斯驱散示威司机，逮捕一批示威者，并没收示威司机的驾驶执照，强行拆除了主要公路上的路障。

老谋深算的贝雷戈瓦采用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迫使工会做出让步，与政府签署了协议。协议除了改善工作条件、缩短工时外，还包括保证给吊销执照的卡车司机提供职业培训和其它替代职业的机会，使卡车司机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满足。示威浪潮终于渐渐平息了下来，贝雷戈瓦重重地松了一口气。

1993 年 3 月，法国要举行 5 年一次的立法选举。随着大选的临近，贝雷戈瓦执政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1993 年 2 月初，竞选运动已经开始。此时，法国《鸭鸣报》报道了一则消息，说贝雷戈瓦利用职权于 1986 年 9 月以无息的条件，向他的朋友、企业家贝拉借得 100 万法郎，用以购买在巴黎 16 区一套 100 平方米的住宅。此事一出，贝雷戈瓦立即反击，说贷款是通过经纪人办的，并向税务部门申报过，登记在案，合乎法律手续；而且，1986 年他还不是执政党议员，谈不上是对他行贿。公众在这件事上也对贝雷戈瓦表示同情，认为借钱买房纯属个人私事，100 万法郎并非大数目，发生在朋友之间更不必小题大作。但反对党不甘罢休，非要搞出个名堂，并以此作为一桩“丑闻”向社会党发难。虽然贝雷戈瓦一再解释他已还清了这笔钱，但记者仍穷追不舍。

作为社会党竞选总指挥和政府总理的贝雷戈瓦，是右翼政党击垮社会党要攻击的重要目标。右翼政党不仅在贝雷戈瓦 100 万借款上大作文章，而且大肆攻击贝雷戈瓦几年来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这是选举竞争中各政党惯用的手段。

在 1993 年 3 月的立法选举中，贝雷戈瓦所在的社会党的议席由 277 席陡跌至 57 席，社会党痛失政权，贝雷戈瓦被迫辞职。此后，社会党发生内讧，罗卡尔乘机夺权，原第一书记法比尤斯拂袖而去，社会党一时支离破碎。

贝雷戈瓦是在 1993 年 5 月 1 日自杀身亡的。

1993 年 5 月 1 日，法国中部涅夫勒省的小城纳韦尔市，市长、前总理贝雷戈瓦忙碌了一个白天。他接见了纳韦尔市的工会组织代表，参加了好几项公益活动。下午结束工作以后，也许是为了轻松一下，他让司机把车开到郊外卢瓦尔河谷一条小运河边上。来到河边，他让司机先开车去兜一圈，然后再来找他，说要单独散一会儿步，司机驾车和警卫先走了。

大约 17 点 50 分左右，司机驾车返回，警卫发现市长有些焦躁。贝雷戈瓦在汽车上打电话给他的办公室主任，但没有人接。于是他留了话，让办公室主任尽快来会他。贝雷戈瓦放下电话后，命令其贴身警卫留下来等候办公室主任，自己则让司机送他到公爵宫去。但汽车刚开出不久，贝雷戈瓦却改变了主意。他让司机走开一会儿，自己要打个电话。几分钟后，贝雷戈瓦又让司机把他送往纳韦尔市。在经过市郊那条小运河的一座小桥时，贝雷戈瓦再次要求停车，并对司机说，你去接我的警卫，然后一块来这里接我。

满腹狐疑的司机找到警卫时，警卫突然发现他放在车上的一支 357 型大口径手枪不见了。司机立即意识到刚才市长是借打电话之机取走了手枪，两人赶紧驱车回到小运河边市长下车的地点，却已不见贝雷戈瓦的身影。他们跳下车来，分头寻找，结果在一片茂密的草丛中发现了躺在血泊里的前总理，他头部中弹，身边丢着那支 357 型手枪。

当时，贝雷戈瓦尚存一息，司机和警卫赶紧把贝雷戈瓦送往市里的医院。但由于小市内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医生决定将其送往巴黎。求援电话打给了总统密特朗和现任总理巴拉迪尔，很快，一架军用直升飞机从巴黎飞到了纳韦尔市。可惜，就在飞往巴黎的途中，贝雷戈瓦停止了呼吸。

贝雷戈瓦死后未发现只言片语，人们在震惊之余都试图揭开这个谜。

法国各界人士对此议论纷纷：政界指责这是新闻界“用笔杀人”，新闻界回敬说是政界“昏暗无情”，社会党斥责右翼政党“恶语逼命”，右翼则反唇相讥说这是社会党“迫害忠良”。各执一辞，莫衷一是。

贝雷戈瓦是在 5 月 1 日劳动节自杀的，场所又是他竞选用的招贴画的衬景处，这似乎是他奋斗一生的缩影，同时也给世人留下了评说的空间。

综合法国各报的报道，贝雷戈瓦最终走上绝路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 社会党在 1993 年 3 月立法选举中惨败和随后的走向衰落。这使从 16 岁就为之奋斗的贝雷戈瓦感到很失望。

2. 右翼政党 1993 年 3 月上台后借“清算经济实况”为名，把法国当前的经济困难完全归罪于贝雷戈瓦，并恶毒地进行人身攻击。这使贝雷戈瓦十分沮丧和厌倦，整日郁郁寡欢。

3. 长期执政使社会党也深陷权钱交易的泥潭，腐败现象迭出，丑闻不断，“贝希纳股票泄密案”和“兴业银行金融舞弊案”都牵涉到贝雷戈瓦主管的财经部，并导致他的前后两任办公室主任被迫辞职。更有甚者，1993 年 2 月法国《鸭鸣报》又披露了他曾经接受贝拉 100 万法郎无息贷款一事。贝雷戈瓦一生追求廉洁奉公，这些事却弄得他不明不白、有口难辩。

4. 虽然以上诸事使贝雷戈瓦近来忧心忡忡，时日难熬，但尚不足以导致他这样一位久经风浪的政坛老手怯步轻生。看来推动他走上绝路的是最新发生的事态。据法国报刊报道，前不久，法院决定传贝雷戈瓦 1993 年 6 月 2 日在审理“贝希纳股票案”时出庭作证。贝雷戈瓦心知与其相关的各案牵涉到政党高层，因此急欲请见密特朗总统商讨对策。不料，总统竟拒而不见，甚至连电话也不接，只是叫人传话要他在家“静思修身”。到此时，贝雷戈瓦似乎明白了“替罪羊”的处境。

贝雷戈瓦究竟为何自杀，只有他自己和个别知情人最清楚。既然贝雷戈瓦带走了这个隐秘，还有谁愿意把它说清呢？

在笔者看来，政治家象企业家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社会职业，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令人崇拜的东西越来越少。

## 阿尔巴尼亚前总统阿利雅

素有“山鹰之国”美称的东欧高山小国阿尔巴尼亚，在恩维尔·霍查的领导下曾度过40多年艰难困苦的岁月。霍查执政40多年，虽然把一个落后不发达的国家改造成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但他同时也使阿尔巴尼亚深深陷入孤独封闭之中，成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1985年4月2日，霍查病逝了。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阿利雅没有象他所期望的那样使社会主义事业大放异彩，相反，阿利雅执政仅仅7年便丢失了政权；不仅使社会主义制度和劳动党的领导在今日阿尔巴尼亚被彻底否定，而且阿利雅本人也被当作罪犯投入监狱和被判刑。

这一切发生得就象潮水涨落那么快、那么难以阻挡！

拉米兹·阿利雅，1925年10月18日生于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斯库台市，在地拉那进入中学学习，1942年加入共青团。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在第七突击旅担任政治和军事指挥职务，以后又任第五师政治委员等职。1943年4月加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8年11月改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1944年8月，当选为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青年联盟书记处书记、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1946年1月以后，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组织书记、总书记。1949年9月，当选为劳动青年联盟中央第一书记。1955年任政府文化教育部部长，1957年毕业于莫斯科苏共中央高级党校，1958年任党中央宣传部长。1960年，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1年，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负责意识形态工作。

当时，阿利雅在党的领导人中的排名仅处于第六位，与第一把手的位置是相当遥远的，他似乎也不可能成为霍查的接班人。因为在霍查的身后紧跟着巴卢库、卡博、谢胡等有威望的领导人，阿利雅尚属党的领导层中的“小字辈”。

然而，政治是变幻莫测的，政治家的命运也是不可捉摸的。1975年，霍查的得力助手、国防部长巴卢库忽然被宣布为反革命和间谍，遭到枪决。1979年，卡博病逝于巴黎。1981年，谢胡又因“精神错乱”而“自杀”。这样，阿利雅便在政治局内来了个“三级跳”，一跃成为霍查之后的党内第二号领导人。阿利雅开始被霍查作为接班人加以精心培养，1982年根据霍查的安排出任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1985年4月2日霍查死后，阿利雅便顺理成章地接替了霍查的位置。

当时阿尔巴尼亚的国内形势是：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是整个欧洲国家中的倒数第一；政治生活，少数人专断，死水一潭，广大公民既无实质性的民主权利，更无自由可言；文化生活，充满意识形态色彩，单调无味，令人厌烦。当时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是，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认识到传统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正在展开潮水般的改革运动。

阿利雅执政以后，继续奉行霍查的极左路线，坚决反对改革，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引进改革，改革是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手中危险的政治武器。在对外政策方面，强调要继续坚定地开展反帝反修斗争，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阿利雅将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概括为“四不允许”和“三不让步”。“四不允许”是：决不允许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恢复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剥削；决不允许削弱人民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允许削弱马列主义政党的

领导作用，不搞所谓的多元化；决不允许损害国家的自由、独立和主权。“三不让步”是：不在任何领域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做任何让步；不对宗教思想做任何让步；不对错误表现做任何让步。

这些政策措施本来是用来抵制苏联东欧改革潮流冲击、维护阿尔巴尼亚国内政治秩序和原有社会制度的，然而，面对日益开放的世界和飞速发展的时代，已很难奏效。相反，使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各种危机也在加深。

在经济方面，由于极左路线和官僚主义的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停滞不前。连续不断的严重干旱，使农业连年歉收，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人民生活水平与其邻国的生活水平的差距日益拉大，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政治上，党政官员腐败行为猖獗、践踏人民的民主权利、工作方式死板僵化，办事效率低下，激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在思想上，政治色彩浓厚，人们没有表达独立见解的自由，人们感到无比的压抑。整个国内局势是，经济萧条、人心浮动、怨声载道。对此，连阿利雅本人也公开承认：“阿尔巴尼亚面临着不断增长着的、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人们思变心切”。

对于阿利雅 1985 年至 1989 年间的所作所为，自由欧洲电台的一位研究员形象地称之为“阿尔巴尼亚在轻轻晃动”。

就在阿利雅犹豫、彷徨、徘徊不前之际，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89 年秋冬以来，东欧上空风云变幻，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相继更迭，给阿尔巴尼亚造成巨大冲击。

面对国内外紧张局势的压力，阿利雅不得不考虑调整自己的政策。1989 年 11 月 20 日，英国《卫报》刊登文章说，阿利雅声称：“我们将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慢慢地实行改革”。这表明阿利雅对改革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即由坚决抵制改革转向有条件地接受改革。11 月 28 日，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查尔查尼在阿解放和人民革命 45 周年庆祝集会上则表示，阿将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原则范围内进行变革，“决不走修正主义改革之路和资本主义之路”。显然，这是在承认，阿将要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而不是象以往那样拒绝一切改革。

从 1990 年 1 月到 4 月，阿劳动党连续召开两次中央全会（即 9 届 9 中全会和 9 届 10 中全会），讨论东欧剧变后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掀起了阿利雅称之为民主化的进程。这些改革举措主要是：在经济领域，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大利用经济方法和经济杠杆的范围，改进劳动报酬制度，实行计件、包干、定额等新的计酬办法，重视农业发展，全面恢复农村自由经济，开放城市自由市场，改进外贸体制，打破国家对外贸权的垄断，使部分企业获得了直接外贸权。在政治领域，放弃原来的极端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不再搞“阶级斗争”，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发扬民主、加强监督，改革干部制度，对干部的任命、任期作了重大修改，在党内提倡不同意见交锋，在社会上扩大了人们表达自己意愿的许可范围，修改刑法典以纠正违反人权的现象，承认尊重赫尔辛基协议以及其它关于人权的国际条约，解除对国外旅行的限制。在思想文化领域，强调新闻宣传的公开性和全面性，解除对宗教活动的限制，提出“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方针。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多方位外交，多交朋友少树敌，提出阿要加入欧洲合作与安全一体化进程并参加有关会议，与欧共体建立外交关系和进

行接触，增加同其成员国的单独合作，同时也要把同美国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提上日程。

至此，阿尔巴尼亚终于做出它的重大选择——改革。由于在旧体制内找不到使阿摆脱危机的出路，阿利雅也只好选择改革。但是，劳动党同群众的矛盾已经积累很久，即使改革，其命运也是一个未知数。这是不以改革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由于政府有关部门在审批许多公民申请护照时拖拉不办，或者设置障碍、附加条件加以限制，1990年7月2日晚一大批阿尔巴尼亚青年闯入地拉那的外国使馆区，强行进入外国使馆，要求出国避难，当局立即派出大批保安部队包围了使馆区，双方发生了冲突，有许多人被捕。西德政府要求阿尔巴尼亚给这些避难者发放允许出国的自由通行证。这一消息传出后，更助长了人们外逃的势头，涌向各国大使馆的人有增无减。到7月6日，仅西德大使馆就涌入了1000多名阿尔巴尼亚人。这之后，又有1万名争取民主的支持者静默地举行抗议游行。

这一突发事件搞得阿劳动党领导人措手不及。阿利雅不可能再只是沉思而不决断了。

1990年7月6日，阿劳动党举行九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解除西蒙·斯特法尼的内务部长职务，将伦卡·楚科开除出政治局，责令政治局委员马尔科、穆拉和穆夫蒂乌退休。7月8日，人民议会主席团撤销了食品工业部长和轻工业部长的职务，还对公共事业部长和国内贸易部长重新作了调动。西方舆论认为，阿利雅在3天内两次改组政府是为了缓解公众的幻灭情绪。

7月7日，人民议会主席团发布命令，宣布将不对进入外国使馆的公民提出公诉，这些公民如提出申请，将获得正常的出国护照。

7月14日，阿《人民之声报》报道，进入外国驻阿使馆的阿公民在获得阿正式护照后离境出国。11月16日，阿内务部副部长雅·普洛达向报界宣布，阿自颁布关于护照问题的法令以来的5个月中，共发出护照41507份。

大批难民的外流，使国内人心浮动，群众与党和政府的隔阂在增加，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党和政府的威信也随之下降。

为了解决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克服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危机，阿劳动党中央于1990年11月6日至7日，在地拉那举行了九届十二中全会。会议对阿党的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利雅代表政治局作了题为《巩固人民政权和完善政治体制，推进民主化发展》的长篇报告，强调指出，“党的领导作用不是靠命令或法令来维持的”，党“不应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建议修改宪法中关于“劳动党是国家唯一政治领导力量”的条款。他还强调要“为思想多元化创造更加有利的组织基础”。

1990年11月12日至14日，阿人民议会在地拉那举行了十一届八次会议。在会上，阿利雅向人民议会发表重要演说，宣布要加强法制和实行党政分开。他还声称要修改1976年颁布的宪法，以保障人权，允许国外投资，并准许政府接受外国贷款。他还表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将放弃宪法所保证的权力垄断地位。

会议最后通过了人民议会选举法，并决定成立以阿利雅为首的宪法审查和修改特别委员会。会议还决定修改和删除宪法中涉及“劳动党是国家唯一政治领导力量”、“禁止与外国建立合资企业和团体及从外国借贷”、“禁止宗教活动”等内容的条款。

1990年12月8日晚，地拉那大学部分大学生因宿舍停电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改善生活待遇，进而又提出了一些政治要求。第二天上午，教育部长和地拉那大学校长同学生们进行了约3个小时的对话，但没有取得成果。上午11点，约2千名大学生走上街头，呼喊“要自由”、“要民主”、“多元政治”、“多党制”等口号，要求阿利雅效法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大批保安部队和警察包围了大学生，阻止他们继续游行。双方发生了冲突，有一些大学生被逮捕。

1990年12月11日，阿利雅亲自同地拉那大学学生代表对话。学生们向阿利雅表示支持民主化改革，说这是他们举行游行的目的。阿利雅则向学生们通报了当天结束的劳动党九届十三中全会作出的一项重要决定：根据目前形势，劳动党中央认为允许根据现行法律成立独立的政治组织有利于国家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有利于实行多元化。12月12日，阿利雅在电视台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公布了党中央关于政治民主化、多元化的改革主张。

既然党中央的改革措施与大学生们的要求完全一致，两者也就无冲突可言。大学生的游行抗议活动随之消失。

1990年12月12日，阿国内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党，宣告成立。12月17日，阿人民议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成立政治组织和团体的法令》，允许在阿成立各种政党和政治团体。12月19日，阿司法部正式批准民主党为合法政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后来当选为该党主席的萨利·贝利沙（心脏医学博士，霍查大学医学教授）在群众大会上声称，阿尔巴尼亚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1990年12月28日，阿部长会议作出决定，允许各社会政治组织和团体出版报纸、刊物和其它出版物。此令一出，民主党即出版自己的报纸《民族复兴报》。

党禁取消以后，新的政党纷纷成立，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仅有300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就成立了19个政党。

1991年1月5日，人民议会主席团举行会议，审议了司法部和内务部的建议，通过了赦免政治犯的法令。到当年7月2日，所有的在押政治犯全部得到释放。

1991年1月16日，阿利雅倡议并主持了全国各政治组织的会议，达成了推迟议会大选的协议。理由是，鉴于目前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政府需要时间研究和制定一系列法律，同时也使新成立的政党有时间推选自己的候选人。大选推至3月份举行。

1991年2月，地拉那“恩维尔·霍查大学”的部分师生要求取消校名中霍查的名字，但遭到当局的拒绝。于是，该校700多名师生宣布罢课、绝食。2月20日中午，数千名到霍查大学声援绝食师生的群众，从“大学生城”向市中心进发。途中，他们与军警发生小规模冲突，军警朝天开枪以示警告，但无人伤亡。

下午1点左右，来自大学生城的人流以及四面八方汇聚到市中心的群众已达数万人。他们聚集在市中心的斯坎德培广场，高呼“打倒霍查”、“拉倒霍查像”等口号，与广场两侧守卫霍查铜像的数百名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对峙。

1点30分，人群开始向霍查铜像冲击。军警用高压水枪向人群冲射，群众则以石块还击。军警同群众反复争夺霍查像基座平台。军警动用了催泪弹、



石块和警犬，群众则使用石块和棍棒还击，双方均有数人受伤。到下午2点，一些群众占领了基座平台，有人爬上霍查铜像套绳索。下午2点5分，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十几米高的霍查铜像被拉倒了。整个广场人声鼎沸，人们高呼胜利了。

此时，军队出动坦克封锁了广场通往劳动党中央、部长会议办公大楼和霍查纪念堂的道路，并包围了电台和电视台，以防止有人冲击这些部门。地拉那市的气氛十分紧张。

斯坎德培广场上的群众用卡车把霍查铜像拖到“大学生城”绝食师生所在大楼旁的小山坡上。铜像被砸扁了，许多人站在铜像上高呼“霍查完蛋了”。

斯坎德培广场上发生的事激怒了一些老战士和老党员，包括部长会议主席阿迪尔·查尔查尼在内的老革命们经批准成立了“恩维尔·霍查自愿行动者协会”。该组织的领导人在致阿利雅的信中，指责反对派势力破坏国家的稳定，并宣誓要捍卫霍查的名字和遗产。他们在全国各地组织集会，威胁说要动员其支持者向地拉那进军，宣布发罗拉市（1912年阿尔巴尼亚的爱国者在此宣布国家独立）为新的首都，并要求在地拉那恢复树立霍查的雕像。阿利雅被指责为“叛徒”，还有人呼吁宣布民主党为非法，并逮捕其领导人。有报道说军队向“思维尔主义者”提供了武器。在地拉那军事学院，劳动党同反对派之间的冲突造成4人死亡，一伙军官向阿利雅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恢复树立霍查纪念像。

面对来自劳动党内和反对派的双重压力，阿利雅左右摇摆。1991年2月22日，阿利雅向全国发表演讲，表示他将继续忠于霍查。他说：“我想再一次强调，恩维尔·霍查是一位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的历史性人物，历史是不会根据被操纵的人们的思想来进行裁判的。雕像可以被除去，但是恩维尔·霍查本人是不会被推倒的，因为他是人民的历史和新阿尔巴尼亚历史的化身。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为有象霍查同志这样的一位领袖而感到自豪。”

同一天，阿利雅又宣布，他已签署法令，决定接受查尔查尼政府集体辞职，成立主席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主席委员会由阿利雅等9人组成，临时政府成员中只保留了前政府中的国防部长和外贸部长两人。部长会议主席由39岁的经济学家法·纳诺担任，据说他比前主席查尔查尼更富有改革倾向。无论是主席委员会还是临时政府中，均没有反对派成员。

就在这种纷乱繁杂的局势下，1991年3月31日，阿尔巴尼亚举行了第十二届人民议会选举。这是阿解放46年来首次举行的多党竞选，同时也是劳动党与反对派之间的一场权力较量。

执政的劳动党利用它手头掌握的大量财力物力，向反对派发起了强大攻势。劳动党有关组织重新对广播和电视施加了严密控制。劳动党政府还通过控制新闻纸、材料供应和发行系统，限制反对派报纸的发行数量，使反对派难以传播他们的观点。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内许多地区的投票人并不清楚反对党的纲领，农村地区尤其突出。

此外，在选举前夕，劳动党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它作出的若干决定，来对选民施加影响。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扩大私人园地，同意让农民拥有数目不限的牲畜；几百名政治犯被宣布释放，外国记者和官员们得到了观察选举的邀请。与此同时，劳动党对民主党等反对派的候选人也发动了攻势。

面对执政党的强大攻势，各反对党派也积极开展竞选活动，对劳动党发

动攻击，并施加压力。在选举期间，民主党等反对派在全国各地介入骚乱。在斯库台的骚乱中，示威群众高呼“斯库台共和国”、“暴力夺取政权”等口号；卡瓦雅、发罗拉等地也发生了反政府示威；全国许多工厂、学校罢工或罢课，要求劳动党下台。尽管反对派采取了各种手段与劳动党较量，但由于财力物力有限，加之时间紧迫来不及建立起全国性的组织网络，因而，最终还是败给了劳动党。

1991年4月8日，选举委员会公布了人民议会选举结果：在250个议席中，劳动党得169席，占67.6%；民主党得75席，占30%；希腊少数民族民主联盟得5席，老战士全国委员会得1席。

自由大选虽然劳动党获胜，但该党中央第一书记阿利雅、中央书记代德、外交部长卡普拉尼等党政重要领导人却纷纷落选。

阿首次自由大选结果公布后不久，1991年4月15日，新选出的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顶着民主党的抵制如期举行。但由于时局动荡，会议时断时续，会期竟长达半个月之久。4月17日，议会选举劳动党议员、教育部长卡·伊斯拉米为议长，选举劳动党议员、列宁高级党校教师卢·珀尔珀利和民主党议员、民主党全国领导委员会成员阿·迈克希为副议长。1991年4月30日，议会选举阿利雅为阿尔巴尼亚首任总统。

同时，新的人民议会在1991年4月29日通过了《宪法主要条款法》，对阿国家体制、社会政治制度等作了重大修改，从而使原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主要内容是：更改国名，将“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改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实行二权分立。实行总统制。

实行党政分离和部分国家机构非党化。

1991年5月3日，阿利雅总统任命法·纳诺为部长会议主席，并授权他组织政府。5月4日，阿利雅在劳动党九届十七中全会上辞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第一书记职务。

1991年5月9日，纳诺组成劳动党一党的“专家政府”。

新政府虽然提出了一份实行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改革纲领，力求解决阿面临的严重危机，但反对党势力仍然不予合作。他们不断制造事端，使阿社会局势日益恶化。

1991年5月15日，在民主党等反对势力策划组织下，独立工会联合会发动了为期半个月余的全国总罢工，大约占全国职工总数一半的35万工人参加了罢工，部分工人还进行了绝食。他们提出的要求是：改善工作条件，提高50%的工资，最后还提出要政府辞职。罢工的持续和蔓延，使阿国内局势全面紧张，经济陷入瘫痪。

1991年6月3日，劳动党被迫与各反对党和独立工会联合会制定了五点政治解决方案。主要内容是：纳诺政府辞职，组成过渡性临时联合政府；提高工人工资50%；1992年5月或6月举行新的人民议会选举（比正常日期提前3年）；联合政府的各部部长必须退出原来所属的各政党，在今后的选举中也不得参加竞选。

根据上述方案，1991年6月4日纳诺政府宣布辞职。

1991年6月5日，阿利雅总统任命前食品工业部部长于·布非为部长会议主席，组织名为“稳定国家政府”的过渡性联合政府。6月11日，总统又任命了24名政府成员，其中劳动党提名12人，民主党、共和党、社会民主党、农民党共提名12人。另外，根据6月3日达成的“五点政治解决方案”，

所有政府成员均要脱离自己的政党。至此，劳动党几十年一党执政的局面宣告结束，阿 40 多年来第一个“非党”政府宣告成立。

在国家改变颜色的同时，劳动党也发生了质变。首先，劳动党取消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其次，劳动党更名为社会党。转变为“欧洲左翼党”。1991 年 6 月 10 日至 13 日，阿劳动党举行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党的第一书记阿利雅已经辞职，同时也未指定由谁来继承他的第一书记职务，所以，会议期间保守势力和改革派进行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最后在大会选举中，以乔尼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失败、改革派经济学家、刚刚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法·纳诺当选为党的主席。新的领导集团几乎由清一色的青年改革派人士组成。前政治局委员们在代表大会上受到谴责，其中 9 人被开除了党籍。大会为了改善劳动党被玷污了的形象，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改名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并以一个 15 人组成的主席团代替了政治局，以一个 81 人的领导委员会取代了中央委员会。这一重大举措标志着劳动党彻底改变了性质。社会党（即劳动党）副主席斯·代德称，“十大”是“分水岭”，它“结束了一个时代，并掀开新时代的一页。”

1991 年 8 月 21 日，民主党、共和党和社民党结成反社会党政治联盟，明确提出要“斗垮社会党”、“铲除共产主义”、1991 年底提前进行新的大选，并首次提出要阿利雅总统下台。社会党虽作了反击，但软弱无力。

1991 年 9 月 27 日至 29 日，民主党在地拉那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反社会党气焰更加嚣张，贝利沙代表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强调，民主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埋葬社会主义专制制度”，“粉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把社会党赶出国家政权”。会议选举贝利沙为该党主席。

1992 年 3 月 22 日，在反对党的一再要求下，阿尔巴尼亚举行第二次多党人民议会选举。参加这次大选的有社会党、民主党、共和党、社民党、农民党等 11 个政党的 521 名候选人和 5 名独立候选人。

3 月 22 日上午，阿利雅来到投票站投票。有记者向他问道：“总统先生，您认为哪一个党将取得胜利？”

阿利雅的回答是：“人民将胜利。”

民主党领袖萨利·贝利沙则直言不讳地回答说：“这一天标志着社会党之夜的结束和民主白昼的开始。上帝保佑阿尔巴尼亚。”

1992 年 3 月 31 日，选举委员会公布选举结果：民主党获全国 62.08% 的选票，获议会 92 席（占 65.71%）；社会党获全国 25.07% 的选票，获 38 席（占 27.14%）；社会民主党获全国 4.03% 的选票，获 7 个议席（占 5%）。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成为执政党；社会党（前劳动党）则成为在野党，丢失了政权。

阿利雅总统见大势已去，只好辞职。1992 年 4 月 3 日中午，阿利雅向全国人民发表辞职讲话：

“我谨通过广播电视台、阿通社等国家新闻媒介发表声明，告知全国舆论及全体人民，我决定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明天我将向新的人民议会正式提出辞呈。

“一年前，为了祖国的利益、人民的团结、国家的政治进步和巩固民主，我担任了国家元首的职务。出于同样的理由和动机，我现在提出辞职，同时希望人民议会把领导国家的责任赋予一个能够引导阿尔巴尼亚走向大多数人所希望的彼岸的新人。

“最微妙的过渡阶段总的说来正常与平静地走过来了，没有发生可能给祖国的命运带来无可挽回后果的内乱。这使我现在在离开政治活动舞台时感到欣慰。”

“3月22日的大选使我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由议会新的多数派组成的政府来解决面临的众多的问题。”

“我祝愿我的祖国阿尔巴尼亚在全面进步的道路上前进，祝愿民主化进程不停顿地发展。”

1992年4月4日，人民议会全体议员一致同意接受阿利雅辞职。

1992年4月9日，人民议会以秘密投票方式选举民主党领袖贝利沙为第二届总统。

贝利沙担任总统后，采取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措施。他签发法令，决定“把非烈士者的遗骸迁出民族烈士陵园”。根据这一决定，霍查、卡博等前劳动党领导人的遗骸从烈士陵园被迁到了地拉那郊区的萨勒公墓。1993年初，贝利沙又指示部长会议作出专门决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著作、霍查的著作、劳动党的文件集等一律销毁。

另一方面，贝利沙开始逮捕并审判前劳动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人。先是霍查的遗孀涅什米叶叶被拘捕判刑，然后又轮到了阿利雅。

1992年9月12日，贝利沙政府以“滥用职权、侵吞国家财产”的罪名，将居住在女儿扎娜家的阿利雅软禁起来。这期间，阿利雅曾提出出国治疗心脏病、为亡妻扫墓等要求，但均被拒绝。

1993年8月19日，在—批武装警察的簇拥下，阿利雅走出他女儿扎娜家，被带上一辆蓝色的警车。他被捕了。随后，阿利雅被关进—间单人牢房。

与阿利雅同时入狱的还有前劳动党的6名高级领导人：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恰米，国防部长穆拉，以及政治局委员策拉瓦、阿斯拉尼、贝克泰西、米斯卡。几天后，除前部长会议主席查尔查尼因病重仍被软禁在家中外，阿利雅执政期间劳动党13名政治局委员中的12人都被关进监狱，其罪名均是：他们在执政时期滥用职权，大量侵吞国家财产。

接替贝利沙担任民主党主席的塞拉米多次宣称，要对所有的前领导人进行政治审判。

阿利雅患有心脏病，但他在狱中也象其他普遍囚犯—样，依靠面包和水维持生命，晚上只能睡在草垫上，而且还要自己打扫厕所。阿利雅难以忍受这种侮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禁潸然泪下，哭诉说：“我甚至得不到纸和笔，不能读书看报，我们还有什么人权可言？”

1994年7月2日，地拉那区法院以“相互勾结、滥用职权、搞特权、践踏人权与公民平等”的罪名，判处阿利雅9年有期徒刑。此时，阿利雅69岁。

这种民主党政府主持的判决从真正的意义上是否合法，很值得怀疑！

不过，这个问题也只能由阿尔巴尼亚国民自己来回答。

##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被判刑

1988年12月30日，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外面，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审判庭内气氛肃穆，鸦雀无声。被告席上，站着一个背部微驼、呆如木鸡的人。这个人就是勃列日涅夫的“驸马”、苏联内务部前第一副部长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

丘尔巴诺夫，1936年11月11日出生于莫斯科。其父是莫斯科某区的党委书记，其母是家庭妇女。丘尔巴诺夫在技术学校毕业后，进了一家飞机工厂当技术工人。他在厂里表现不错，当过小组长和车间团支部书记。后来参加了军，1961年到苏联内务部，任内务部的上尉。1964年他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函授班毕业，文凭到手后就与妻子离了婚，并转到莫斯科布团委任督导员，不久又调到苏维埃团中央宣传处当处长。1970年后重返内务部。

丘尔巴诺夫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平时总是西装革履，皮鞋踩得咔嚓咔嚓响。此外，他还心明眼快，办事机敏。所以，他很快就被看中，挑选来担任勃列日涅夫的千金加琳娜的警卫。

加琳娜虽不特别漂亮，却曾是赫赫有名的风流女郎。她曾与一个马戏团总裁结婚，不久离异。接着她又与莫斯科大剧院的一舞蹈家来往密切，后来虽成为合法夫妻，但却又匆匆分手。这一时期，莫斯科有关加琳娜的传闻不断，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也为此而深感难堪，但又拿女儿没办法。自从丘尔巴诺夫来到加琳娜身边后，这位任性的“公主”才变得有几分规矩。丘尔巴诺夫的英俊潇洒、热情幽默、形影不离、关心备至，使比丘尔巴诺夫大9岁的加琳娜青春焕发、心喜若狂。不久，加琳娜便坠入了这个警卫的情网。

勃列日涅夫知道女儿的心事后，从内心里感到高兴，希望女儿早日再有个幸福家庭。他通过自己的老朋友、内务部长谢洛科夫调查未来女婿的出身和表现，调查结果是，一切都符合要求。

1971年，44岁的加琳娜下嫁35岁的丘尔巴诺夫，婚礼在莫斯科郊外勃列日涅夫阔绰的乡间别墅举行。勃列日涅夫把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送给他的一辆“施科达”牌小轿车送给女婿作为礼物，又吩咐下属为这对新人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政府公寓内安排了一套4间的高级住宅。

丘尔巴诺夫成了苏共总书记的女婿后，千方百计建立与勃列日涅夫的密切关系。为赢得勃列日涅夫的欢心，他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岳父岳母身上，陪伴他们散步、聊天、旅行等，处处让两位老人顺心。久而久之，年迈垂老的勃列日涅夫喜爱女婿胜过喜爱自己的女儿。

有这么一个好女婿，勃列日涅夫当然得关心关心女婿的前途。他亲自出马向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建议，提拔丘尔巴诺夫担任苏联内务部主管人事的副部长。这个建议可难坏了谢洛科夫。他很清楚，丘尔巴诺夫只拿过一张函授毕业文凭，在内务部只是个“七品芝麻官”，本事也有待大幅度提高。照旨办吧，怕人家说三道四；不办吧，总书记的旨意又不好不随。几番思索后，谢洛科夫硬着头皮去向勃列日涅夫面陈利害，反复说明不宜操之过急的道理，并允诺丘尔巴诺夫的今后安排包在他身上了。就这样，勃列日涅夫才点头同意。

勃列日涅夫的“建议”虽没有马上实现，但他的女婿却在短短的几年内连升了数级。丘尔巴诺夫先是当上了内务部内卫军政治部副主任，后提升为

主任；1977 年被任命为内务部副部长，1979 年又晋升为第一副部长。1981 年 10 月，45 岁的丘尔巴诺夫成了苏联军警中为数不多的中将。另外，丘尔巴诺夫在 1976 年的苏共 25 大上，还被选为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1 年的苏共 26 大上，又被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同时兼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

在沽名钓誉方面，丘尔巴诺夫堪称登峰造极之辈。在近 10 年里，他获得过 20 枚外国的和 19 枚国内的各种勋章和奖章。他去了几天阿富汗，便得到红旗战斗勋章。1980 年，在莫斯科举行奥运会时，内务部一批干警因治安有功而获得国家奖金。丘尔巴诺夫仅在贵宾席上坐了一会，竟名列获奖者榜首，而亲自负责这项工作的另一名副部长却屈居其后。

谁都清楚丘尔巴诺夫的发迹，只是不敢说罢了。他依仗岳父，官愈升愈高，野心也愈来愈大。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后来的他目空一切，无所顾忌；对那些对他另有看法的人，他的态度毫不含糊——打倒在地、毫不留情。

1976 年，内务部政治思想工作局局长扎祖林少将主持编写了一本有关内务部总结政治思想工作的小册子。成书后，各方反应不错，都认为是击中了内务部的要害。于是，扎祖林又对原书中某些内容作了必要的修改，准备送去出版发行，可是此书迟迟得不到出版。

扎祖林还对内务部的作风松散、歪风盛行、以及丘尔巴诺夫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一下，却碰到丘尔巴诺夫的老虎屁股了。1979 年 11 月，扎祖林接到内务部已经签署了的解除他职务的通知。扎祖林对此早有预料，但不退缩。他向苏共中央提出了申诉，党中央听完他的申诉后告诉他：内务部解除职务的命令无效，你回去安心工作吧！几个月后，扎祖林又接到解除他职务的通知。当他去找丘尔巴诺夫时，得到的回答是：“你还去中央告状吗？去告好了！中央信任我，不信任你。”此话果然不错，这次解职，党中央再也没人为他说话了。在那权大于法的时代，扎祖林终于被解除职务，还连降了数级。

在遭丘尔巴诺夫迫害的所有人当中，最惨的要算是主持内务部科学院工作的克雷洛夫了。

1967 年初春，当时正在军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克雷洛夫中校，被推荐给内务部长谢洛科夫将军当助手。部长对新来的助手及他的革新计划大加赞扬和支持。在部长的鼎力支持下，克雷洛夫得以在内务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他首先提出了犯罪是一个社会现象，警察机构应与社会各方通力合作，共同与犯罪作斗争；再就是把科学的办法引入内务部，建立了一整套对犯罪材料统计和分析的新方法。此外，内务部还在他的提议下成立了内务部科学院。

正当克雷洛夫一步一步地推行他的革新计划时，丘尔巴诺夫出现了。这位“驸马爷”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几年的时间就由一位上尉晋升到中将，坐了内务部第二把交椅。可是，克雷洛夫从不买他的帐，还常常与他顶牛，有时甚至在内务部办公会议上展开激烈交锋。丘尔巴诺夫为此怀恨在心，并决心要战胜克雷洛夫。再者，丘尔巴诺夫也并不满足于目前的“老二”，他想接替谢洛科夫的部长职务，而眼前的克雷洛夫也是部长职位的候选人，是他的竞争对手。

丘尔巴诺夫在暗算着，而克雷洛夫在努力工作着。但是，渐渐地克雷洛夫发现他的后盾靠不住了。谢洛科夫部长不是不愿意支持克雷洛夫了，而是

没能力再这样做了。因为他很清楚：尽管他与总书记的私交甚厚，但毕竟是旁人，比不得总书记的女婿，一旦冲突起来，部长又怎么样？

在这种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克雷洛夫失败了。不久，他被解职，调到几年前他倡议成立的内务部科学院担任院长。作为多年辛勤劳动的报酬，他被晋升为中将。

克雷洛夫就任新职后，继续同丘尔巴诺夫作斗争。报复心切的丘尔巴诺夫终于下定了狠心，要彻底搞垮他的对手。1979年初，他亲自组织率领一个7人工作委员会到科学院检查工作，很快“发现”了一系列应由克雷洛夫承担的“经济问题”。丘尔巴诺夫当面向克雷洛夫提出两种选择：要么离开内务部，要么到法庭接受审查。在这紧要关头，克雷洛夫求助于谢洛科夫部长，但被拒绝了。1979年4月19日，他被迫退役。次日，这位年轻有为的将军倒在自己的枪口之下。

动不动就拿别人“开心”是丘尔巴诺夫发迹后养成的脾气。一次，他去钓鱼，来到钓鱼场时发现鱼饵还没有给他准备好，便破口大骂一位头发斑白的少校，并威胁要撕下他的肩章将他发配到“冻土带”去。

丘尔巴诺夫不但骄横狂妄，而且无所顾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丰盛的宴会，他经常去，几乎一场不漏。在迎送外国贵宾等隆重仪式上，他也经常露面。然而，最使丘尔巴诺夫感兴趣的莫过于到各地去视察。他每次视察，都受到国家元首般的接待。这位全苏反酗酒运动委员会主席视察到哪里就喝到哪里，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是常有的事。

“视察”对这位当代“醉翁”来说当然要有酒，但比酒更具诱惑力的是地方官员私下塞给他的成打成打的卢布。据历时5年的艰难调查获得的材料表明，丘尔巴诺夫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总共收受贿赂656833卢布（合110万美元），超过一个苏联工人270年的工资。此外，他还收受过高级地毯、精致茶具、文物珠宝等珍贵礼物。

丘尔巴诺夫这样做并非他的囊中拮据，而是在做他的把权势、特殊身份和地位转化为卢布的“试验”。例如，一次，他到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州“检查”救灾工作，在州委书记卡里莫夫陪同下来到加兹利镇的一家商店里。周围的人虽不认得他，但都肯定他是大官，便向他抱怨商品短缺。事后，丘尔巴诺夫面向卡里莫夫，从牙缝里吐出“我要向中央报告这个严重问题”几个字。就这么一句话，吓得州委书记浑身筛糠。书记当晚备宴，悄悄地塞给丘尔巴诺夫1万卢布，直到这时丘尔巴诺夫才露出笑脸。

就这样，丘尔巴诺夫每到一地都几乎要施用这种权势化为金钱的“炼金术”。他自己也承认，他每次“出巡”回来清理行装时，提包里衣兜里到处都有钱。这些钱是谁送的，送多少，他根本记不得，也数不清。

随着丘尔巴诺夫的腰包愈来愈大，加琳娜身上戴的珠宝也愈来愈耀目，而且，各种首饰的花样不断变换。据丘尔巴诺夫交代：“我曾交给妻子30万卢布，被她买首饰用了。”加琳娜的金银珠宝从哪里来，人们很清楚。只不过是在那权大压死人的年代，人们不敢公开讲罢了。

丘尔巴诺夫权有了，钱有了，只是觉得按国家规定配给自己的那辆“伏尔加”牌轿车有失“驸马”的尊严。1980年初，丘尔巴诺夫向谢洛科夫部长诉说他已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与其他小部的副部长不同，坐“伏尔加”有些不太体面，并要求换一辆更高档的。谢洛科夫回答说：“副部长只能配备‘伏尔加’，国家规定不好违反。”丘尔巴诺夫再三要求，部长还是没敢答

应。

此时此刻，丘尔巴诺夫脸色一沉，不由分说地抓起克里姆林宫专线电话，他对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能不能请您给我换辆‘海鸥’牌轿车？我想这件事就不必惊动我岳父了吧。”他说最后一句话时故意提高嗓门，并放慢说话速度。

第二天一早，一辆乌黑锃亮的“海鸥”牌轿车开到了丘尔巴诺夫的门前。车内装有卫星电台和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

“驸马爷”一方面向下级索取，另一方面又向上级“奉献”。1980年11月13日是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的70大寿。和内务部许多人一样，丘尔巴诺夫也打算借此机会给谢洛科夫意思意思。但这笔费用从哪里来呢？丘尔巴诺夫急中生智，想到了要买一块金表送给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一招。但当一块价值4000卢布的金表到手后，丘尔巴诺夫却戴到了谢洛科夫的手腕上。当然，这4000卢布是记在赠送外国宾客礼品的帐单上。

正当丘尔巴诺夫平步青云、驾着“海鸥”牌轿车在大街上大展威风时，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去世了。新上任的安德罗波夫一就职就着手追查“驸马爷”的受贿问题。第二年，丘尔巴诺夫被解除第一副部长职务，改任内务部内卫军政治部主任。谢洛科夫也很快被中央除名，后又被取消大将军衔。谢洛科夫自知罪孽深重，1984年12月身着饰满勋章和奖章的将军制服，用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

可是，决心追查“驸马”案的安德罗波夫总书记1984年2月病逝了。勃列日涅夫亲自栽培的契尔年科当上新总书记后，对老上级的女婿的受贿等问题迟迟不作处理。这段时间里，丘尔巴诺夫逍遥法外。1985年3月，契尔年科病逝，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是勃列日涅夫在世时进入中央书记处的，但在改革浪潮冲击下，他顾不得那位前任总书记的面子，丘尔巴诺夫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1986年9月，丘尔巴诺夫被拘留审查；1987年1月被依法逮捕。

1988年9月5日，内着黑色无领衬衫，外套灰色西服的丘尔巴诺夫被押上了被告席。10点整，身着戎装、端坐在庄严的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判席上的首席法官宣布：“现在开庭审理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的罪行。”审判开始。

此时的丘尔巴诺夫似乎不失往日的骄矜，高昂着头，目光正视前方。但当他回答法官的提问时，显得有气无力，旁听席上的听众屏息静气，才勉强听清他的回答：“我是俄罗斯人，曾经是苏共党员。”

在“验名正身”后，法官开始宣读经过5年调查整理而成的起诉书。起诉书有110卷，长1500页，上有证人501名。这些材料详细地记录了这位曾权倾全苏的“驸马”的发迹与没落史，以及与他同时出庭受审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的8名前高级官员的罪行。

1988年12月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对丘尔巴诺夫审判结束。审判结果，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罪判处丘尔巴诺夫有期徒刑12年，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 韩国老总统朴正熙殒命记

每个国家都有一部腐败史，了解韩国的腐败需要从韩国前总统朴正熙开始。

靠发动 1961 年 5 月 16 日军事政变起家的朴正熙总统，又死于 1979 年 10 月 26 日的军事政变，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对他的最严厉的惩罚。

朴正熙，1917 年 9 月 30 日生于朝鲜庆尚北道善山郡龟尾面的一个小山村——山末里。他的父亲朴松平、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农民。朴正熙排行第 8，有 5 个哥哥和 2 个姐姐。朴正熙的家境同当时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家庭没有什么两样。

朴正熙小时候文静，很少言笑，也不像许多同龄的男孩子那样淘气。上小学后，他依然腼腆、内向。虽然因不能按时交学费常常受到老师的批评，但他勤奋好学，常常在班里拿第一名。小学毕业后，朴正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附近的大邱师范学校。

1937 年师范毕业后，他被分派到庆尚北道的一所乡村小学教书。在当时，一个农家子弟能做一名乡村教师已很不容易。然而，作为一个对未来抱有美好希望的知识青年，朴正熙并不安心于乡村小学教师的工作，他讨厌这里的闭塞、贫穷、落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呆在这个令人厌恶的小镇，我觉得自己象一只被关在笼中的雄鹰，浑身不自在。我要出去，在那属于我的蓝天里翱翔！”

机会终于来了。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陆军士官学校，1940 年在朝鲜招生。朴正熙报名应试，并以他师范毕业的功底一举考中。他清楚，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朝鲜半岛，象他这样普通的朝鲜青年，想不冒风险而升官发财是根本不可能的。对他来说，只有不怕艰难到外面的世界去拚搏，才有可能出人头地。

在伪满陆军士官学校期间，朴正熙继续保持了他在勤奋好学的吃苦精神。1942 年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名列榜首。毕业后，他被保送到日本东京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44 年他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伪满第六军区第 8 步兵团任少尉排长，在河北遵化、玉田一带配合日军屠杀中国抗日军民。因“作战有功”，被提升为连长。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朴正熙化装成商人混入北平。1946 年 6 月，由天津乘船返回南朝鲜。同年，考入南朝鲜军事英语学校（南朝鲜陆军士官学校的前身），成为南朝鲜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军官。1946 年 12 月毕业后，留校担任教官。不久，担任南朝鲜第十四团参谋长。

朝鲜分裂后，李承晚在美国的扶植下建立了南朝鲜政府，对人民实行高压统治政策，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 1948 年 10 月的“丽水起义”。丽水起义的主力是朴正熙所在的南朝鲜第十四团的爱国官兵。该团当时驻防在全罗南道的丽水附近。1948 年 10 月 16 日，李承晚命令该团派一个营的兵力去济州岛讨伐游击队，遭到十四团全体爱国官兵的反对。在朝鲜劳动党地下组织的支持下，这个团的官兵成立了“拒绝出兵济州岛军人委员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军占领了丽水，解放了顺天。在美李集团优势兵力的围攻下，起义最后失败。当时任第十四团参谋长的朴正熙，自始至终参加了起义的全部活动。起义失败后，朴正熙被捕。为了保全性命，他供出了南朝鲜劳动党党员、爱国官兵和进步人士，受到美李集团

的信任。据当时的南朝鲜报纸报道，朴正熙参加丽水起义时，加入了南朝鲜劳动党，起义失败后叛变。

起义失败后，朴正熙被调到军事情报部门工作，但晋升很慢。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为朴正熙提供了晋升的机会。战争期间，朴正熙的地位迅速上升，曾先后担任第九师参谋长、陆军作战教育局次长、第二军炮兵司令等职。1953年，朴正熙晋升为准将。

停战以后，他作为炮兵军官被派到美国美军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被任命为南朝鲜炮兵学校校长。后又调到韩国第五步兵师任师长。1957年他被晋升为少将，任南朝鲜陆军第一集团军参谋长。1959年，朴正熙任第六军管区司令。1960年，担任南朝鲜军需基地司令、第一军管区司令、陆军本部作战参谋次长、陆军第二集团军副司令。朴正熙终于在左右南朝鲜政局的军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此时，继李承晚上台的民主党张勉内阁已无法控制日益动荡的南朝鲜政局。1961年5月16日，在美国的支持下，朴正熙和他的侄女婿金钟泌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南朝鲜的政权，结束了文人政权，开始了军人统治。

政变以后，朴正熙成立了由清一色的军人组成的南朝鲜最高权力机构“重建国家最高会议”（原称“军事革命委员会”）。为了取得军队内部其他各派势力对政变的支持和稳定局势，朴正熙把南朝鲜陆军参谋长张都映推选为“重建国家最高会议”的议长和军人内阁的“总理”，并让尹谱善继续担任总统。他只担任了“重建国家最高会议”的副议长。1961年7月，朴正熙在军事政权趋于稳定后，对军队内部的其他派系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他首先解除了张都映的一切职务，自己出任“重建国家最高会议”的议长。接着，又以“阴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嫌疑”，逮捕了张都映和担任军政要职的高级军官40余人，清除了有可能同他争权的主要政敌，开始了他长达18年之久的军事独裁统治。

“5.16”政变的当天，他便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紧急戒严令”，解散了国会、所有政党和社会团体，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在南朝鲜全境实行军事管制。

为了加强对南朝鲜的全面控制，1961年6月，朴正熙设立了一个由他直接控制的特务和情报机构——中央情报部，委派他的亲信金钟泌担任部长。这时朴正熙还颁布了“重建国家非常措施法”、“中央情报部法”、“特别犯罪处罚法”、“反共法”等反动法令，动用大批军队、警察和特务，对南朝鲜人民反对军事独裁和要求民主的斗争进行血腥镇压，并查封了南朝鲜1200多种报刊。据不完全统计，1961年5月中旬到9月中旬，遭到朴正熙军事独裁政权逮捕、监禁和屠杀的进步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多达10万人以上。

在血腥镇压的同时，朴正熙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还对南朝鲜人民采用欺骗的手段。1961年8月12日，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1962年3月以前公布宪法修改草案，1962年5月恢复民主政治。这个声明还说，军事政权原来的计划就是准备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把政权交给文人政府。但是，朴正熙出尔反尔，并没有在1962年3月公布“宪法”修改草案。相反，他又颁布了一个继续加强镇压和扩大清洗的“净化政治活动法”。并根据这个法令，先后将4400多名民主人士列为审查对象，剥夺了参加政治活动的资格。这时，尹谱香因对“净化政治活动法”不满，辞去了总统职务。1962年3月

24日，朴正熙又兼任了南朝鲜的代理总统。

朴正熙在国内实行的高压政策和血腥统治，激化了国内矛盾，引起了美国的忧虑。为了缓和美国的压力和军队内部的矛盾，朴正熙答应在1962年年底以前修改宪法。1962年12月17日，朴正熙集团采取“国民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宪法修正案”。12月27日，朴正熙正式宣布：“1963年4月上旬举行总统选举，5月下旬举行国会选举，8月中旬恢复民主政治”。接着，又公布了政党法，恢复了一部分被剥夺参加政治活动人士的自由，准许民间人士参加政治活动，制造了民主的假象。朴正熙这时候也开始为他竞选总统做准备，他让金钟泌退出现役，负责筹建民主共和党。

正当南朝鲜在野的各派势力纷纷组建新党，准备通过竞选同朴正熙展开政权的角逐时，朴正熙于1963年2月18日却突然宣布他“不准备参加总统的竞选”。3月16日，宣布把军政的时间再延长4年。他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他在政变上台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很不得人心，如果立即进行选举，他很可能在选举中失败。其次，朴正熙集团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继续实行军政，强烈反对民主政治。

朴正熙延长军政的声明一发表，舆论哗然。声明公布的当天，汉城等地便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延长军政，要求立即实行民主。在野各党派也纷纷要求朴正熙撤销其决定。美国对这一决定也感到十分意外。总统肯尼迪当天通过美国驻南朝鲜大使转交给朴正熙一封信，要求朴正熙结束军政，尽快实行民主选举。在南朝鲜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1963年4月18日朴正熙宣布：10月中旬举行总统选举，11月下旬举行国会议员选举，12月中旬召开国会会议。

这次，朴正熙没敢食言，1963年10月15日举行了总统选举。朴正熙以民主共和党领袖的身份参加竞选。由于朴正熙在选举中对在野势力的候选人进行了多方面的压制，最后以微弱多数取胜。在进行国会议员的选举中，由于他大肆舞弊，他领导的民主共和党取得了国会175个议席中的110个席位，占据了绝对的多数。朴正熙当选为民选总统之后，继续推行独裁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人民民主运动的镇压。他加强了警察和特务机构，对人民进行严密的控制。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南朝鲜中央情报部已拥有特务40万人，每年的活动经费高达4亿美元。朴正熙在南朝鲜只是恢复了民主政治的形式，并没有真正实行民主。南朝鲜仍是一个军警横行、特务遍地的专制腐败社会。

根据南朝鲜1962年宪法的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朴正熙在1967年5月当选为总统后，为了再次连任总统，1969年10月又对1962年的宪法进行了修改，把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规定改为可连任两次。在此期间，南朝鲜在野的党派和民主势力为了击败朴正熙，加强了联合与合作。民众党和新韩党首先合并，成立了新民党，发展极快，势力一天天壮大。在1971年4月举行的第七届总统选举和同年5月举行的第八届国会议员的选举中，新民党得到的选票数仅次于执政的民主共和党，成为国内第二大党。

新民党势力的壮大，直接威胁到朴正熙的独裁政权。1971年选举结束后，朴正熙进一步加强了对新民党的打击。朴正熙以违反“反共法”、“选举法”等罪名，大肆迫害新民党领袖。新民党总裁金大中，被迫离开了南朝鲜，流亡日本、美国等地。但是，这并没能阻挡住人民反对独裁斗争的发展。相反，朴正熙的军事独裁政权却日益不得人心。

在玩弄完修改宪法、总统可连任两次的花招后，朴正熙于1972年10月17日撕去“恢复民主政治”的伪装，以“来自北方的南侵威胁”为借口，发布了“紧急戒严令”，解散了国会，禁止所有政党和社会团体的一切政治活动，在南朝鲜实行了军事管制。接着，又于11月21日出动大批军警，强迫南朝鲜选民投票，通过了他炮制的“宪法修正案”，即臭名昭著的“维新宪法”。

“维新宪法”加强和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取消了总统连任的届数限制，并改变了选举总统的程序和方法。“维新宪法”的本质，是恢复总统的终身制、一党执政的终身制，是披上民主外衣的专制。

“维新宪法”生效以后，朴正熙首先操纵的是“统一主体国民会议”议员的选举。接着，又于1972年12月22日，操纵“统一主体国民会议”第一次会议把他选为任期6年的第八届总统。从此，南朝鲜的“国会”也完全被朴正熙所控制。

1973年，流亡在日本的新民党领袖金大中出版了《独裁和我的斗争》一书，继续抨击朴正熙的独裁行径。1973年8月8日，南朝鲜中央情报部5名特务，在日本东京皇宫大饭店绑架了金大中，企图把金大中在国外秘密处死。因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及时发现，才将金大中押回汉城。金大中被扣以“叛国”、“颠覆政府”、“违反选举法”等罪名判刑五年。

1974年8月15日，旅日朝侨文世光在汉城举行的“庆祝光复节三十周年大会”上，突然从观众座位上站起，向朴正熙开枪射击。朴正熙未被击中，其妻陆英修中弹身亡。文世光当场被捕，1974年12月17日被朴正熙集团判处死刑。

1975年5月13日，朴正熙为了进一步加强军事独裁统治，颁布了“第9号总统紧急措施”。

1976年3月1日，金大中、尹谱善等人在汉城明洞天主教堂举行“三·一节”纪念会，联名发表了“民主救国宣言”，要求废除“第9号总统紧急措施”，释放被捕人士，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实行司法独立。朴正熙认为这个宣言是“煽动颠覆政府”和“煽动学生闹事”，将金大中、尹谱善等人逮捕、判刑。

1978年12月，朴正熙当选为第九届总统。此时，已是朴正熙毙命的前夕。

朴正熙从1962年开始施行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进入70年代后，南朝鲜经济发展较快，年均经济增长为10%左右。到197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460多亿美元，人均1200多美元；出口额达12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15位。南朝鲜的经济支柱是“四外”，即外援、外资、外债和外贸。它是靠以美国、日本为主的援助，以及它们提供的原料、设备、半成品和债务建立起来的，对外依赖性很强。

1979年，经济根本来就不牢固的南朝鲜，受到了第二次能源危机和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终于爆发了经济危机。企业大批倒闭，失业人口大量增加，通货膨胀严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朴正熙集团的独裁统治更加不稳定。

1979年3月，金大中同尹谱善、咸锡宪等人一起在汉城和其它地方成立反朴团体“争取民主和民族统一国民联盟”，金大中等三人当选为主席团主席。这时，金泳三任顾问的新民党的斗争力量开始壮大。

1979年6月，美国总统卡特趁参加东京七国首脑会议之际访问汉城，同朴正熙举行了一次“摊牌会谈”，希望朴正熙在美国地面部队撤出南朝鲜之前，先改革政治制度，以稳定朝鲜半岛局势。在汉城期间，卡特总统同新民党总裁金泳三进行了长达1小时20分钟的密谈。

美国总统对朴正熙的直接压力和同金泳三的会谈，大大鼓舞了新民党和在野民主人士的士气。在7月23日的定期国会上，金泳三发表长篇演说，强烈要求修改“维新宪法”，废除“第9号总统紧急措施”，并强调“朴正熙总统应该准备移交政权”。

为了反对朴正熙的独裁统治，新民党还利用“YH贸易公司”解雇女工事件，制造广泛的社会舆论。1979年8月9日，新民党让“YH贸易公司”的200多名女工搬到新民党总部大厦，举行无限期的静坐示威斗争。

8月11日凌晨2点，朴正熙的侍卫长车智澈派遣1000多名武装警察冲进了静坐示威现场。守卫在门口的新民党员和示威女工，用桌椅、花盆、瓶子作武器同警察厮打，当场打伤了30多名警察。在这场斗争中，30多名新民党员和12名闻讯赶来采访的记者被打伤，一名女工跳楼自杀，其余女工被绑架到21个警察派出所，金泳三等十几名国会议员被扭送回家。随后，朴正熙发表“特别谈话”，表示要严惩煽动女工闹事的后台势力，并逮捕了文东焕、徐京锡、印各镇等人。

朴正熙集团的镇压引起了各阶层群众的强烈反抗，工人、学生、记者协会、宗教团体相继举行集会、散发传单、发表声明，愤怒声讨朴正熙集团的暴行。新民党趁热打铁，由国会议员和党的最高委员们带头，自8月11日起在其总部大厦继续举行为期18天的静坐示威，抗议朴正熙的野蛮行为。

8月14日，美国国务院为此破例发表声明，要求朴正熙给这次肇事的警察头口以“应得的处分”。8月20日，美国大使格莱斯廷同金泳三进行了会谈，听取这次事件的全部经过，表明了美国的立场。

9月9日，汉城地方法院无理判决，撤销金泳三新民党总裁的职务，撤销其他四人副总裁的职务，擅自指定亲朴人物郑云甲为代理总裁。由法院决定停止政党代表的职务，这在南朝鲜政党史上还是第一次。9月27日，“争取民主主义和民族统一国民联盟”主席团主席金大中、尹谱善、咸锡宪发表声明，表示“为了保护金泳三和恢复民主而掀起全民性的救国斗争”。

10月4日，斗争进一步升级，朴正熙集团调动数百名警察，在只准民主共和党和维政会议员参加的情况下，国会强行通过对金泳三的“惩戒动议案”，悍然剥夺了金泳三的议员资格。为此，新民党66名国会议员集体向国会辞职，以示抗议。原“民主统一党”的三名国会议员，也递交了辞职书。美国国务院10月4日发表声明，对金泳三被开除一事向朴正熙集团提出抗议，并在第二天下令召回驻南朝鲜大使格莱斯廷。

10月17日，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去汉城，在举行“韩美军事会谈”之际，把卡特的一封亲笔信带给了朴正熙。信中严重警告朴正熙必须停止“高压政策”，要维护人权。在“韩美”国防部长会谈时，布朗曾与国防部长卢载铉、陆军参谋长郑升和以及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多次接触，直接或间接地透露了美国的这一意向。

在美国的公开撑腰下，金泳三再次敦促朴正熙“要下决心为和平移交政权铺平道路，否则将难免用不幸的方式移交政权”。金大中、尹谱善、咸锡宪等在野民主人士也发表声明，“如不接受广大群众对独裁体制的严重警告，

朴正熙的悲剧将是不可避免的”。

釜山一向是在野党的地盘，金泳三又是这里选出来的国会议员。所以，和李承晚倒台前的情况一样，群众的反朴运动首先在釜山、马山等地爆发了。

10月16日上午10点，釜山大学500名学生举行抗议集会，发表宣言，要求朴正熙下台。下午3点，釜山大学和东亚大学3000多名学生涌向市中心的光复洞和南浦洞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独裁政权滚下台”，“废除维新宪法”，“停止对在野党的镇压”，“消除贫富差别”。

示威学生同前来镇压的武装警察进行了英勇的搏斗，一次又一次地冲破警察的防守线，向釜山市政厅前进。在马路两侧高楼大厦的阳台和窗台上，群众拍手叫好，热烈欢呼。市民们给示威群众供应开水和汽水，有的给示威者提供避难场所。

10月16日晚8点，釜山市工人、职员、居民也纷纷加入斗争行列，刹那间游行队伍扩大到1万多人。他们以激烈的方式袭击了庆尚南道政府大厦、市政厅和民主共和党党部，捣毁了市中心的11个警察所，放火烧毁25辆警车，袭击了釜山日报社、广播电台、电讯电话局和税务署，并用石头、棍棒、自制的枪支、燃烧瓶与全副武装的警察队伍英勇搏斗，直到第二天清晨3点钟。

朴正熙在汉城听到这些情况后，惊慌失措，暴跳如雷。10月17日撤换了釜山市警察局长，调派内务部长官具滋春亲临现场，直接指挥警察、特务。10月17日深夜，朴正熙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决定在10月18日零时宣布釜山市实施“非常戒严令”，任命朴赞兢陆军中将为釜山戒严司令。

10月18日上午，朴正熙发表“特别谈话”，强调“釜山出现的骚动是反国家、反社会的行动，是危及国家基本秩序和安全的严重行为。因此，根据宪法宣布紧急戒严令”。朴赞兢到了釜山，相继发布第1号、第2号戒严布告，延长宵禁时间，禁止示威和集会，封锁釜山市所有大学和专科学校，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并出动大批军队，用坦克、装甲车守卫政府机关和公共场所。

10月18日上午，2000多名工人和市民不顾“紧急戒严令”的威胁，涌向当地最繁华的街道南浦洞举行示威游行。釜山女子大学500多名学生也在该校门口举行示威。

釜山民众的抗议斗争很快波及到马山、汉城、大邱、清州、晋州、蔚山等大中城市。

10月18日，马山市国立庆南大学2000多名学生，涌向市中心的“三·一五起义纪念塔”（推翻李承晚独裁政权斗争的发源地）庄严宣誓：“为了民主，为了自由，要推翻朴正熙独裁政权”。之后，示威群众高呼口号向市中心进发，沿途的工人、市民也纷纷加入斗争行列。他们多次同警察展开搏斗，袭击民主共和党党部、广播电台和派出所，放火烧毁警车、消防车等。接着，朴正熙又在马山市发布“紧急戒严令”，投入军队，抓了505人。

10月19日，汉城大学300多名学生集会，散发“争取校园民主斗争宣言”。同日，汉城市神学大学、大邱市庆北大学、清州市忠北大学、晋州市大学等，用各种形式的斗争来声援釜山民众的反朴斗争。朴正熙又逮捕了4200多名示威群众。

然而，朴正熙的血腥镇压没有吓倒在野政党和民众，他们准备在10月29日，在南朝鲜五大城市同时掀起更大规模的斗争，推翻朴正熙独裁政权。

在釜山风暴发生前后，朴正熙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也达到了高潮。以总统侍卫长车智澈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以高压的血腥政策维护统治；以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为首的“稳健派”主张用温和的方式延缓危机，维持统治。到1979年10月，由于总统警卫室室长车智澈的步步紧逼，金载圭与车智澈、朴正熙的矛盾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

象其他独裁者一样，朴正熙也是一个刚愎自用、冷酷无情、诡计多端、惟我独尊的人。在他执政的18年里，他换了8个总理、13个内务部长、8个中央情报部长、10个陆军总参谋长。用没有什么基础的新人，替换掉根深蒂固的老部下，一向是朴正熙维持内部稳定的政治权术。为了当一个终身的总统，他要绝对杜绝来自内部的一切威胁。他的侄女婿金钟泌是1961年发动“5·16”军事政变的9名校级军官之首。政变成功后，金钟泌首创了中央情报部，对巩固朴正熙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1971年至1975年金钟泌任南朝鲜总理时，就因朴正熙听到美国和日本政界不少人对他赞扬、对朴正熙抱怨，被朴正熙一脚踢出了政界。金钟泌只能快快不乐地回到老家忠清南道的农庄里，经营一些果园、牧场度日。

总统贴身侍卫长车智澈，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大老粗，他原是一个职业军人，小学毕业后再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更没有政治经验。但由于他在美国炮兵学校和步兵学校学得了一手好枪法，成了神枪手，便被朴正熙看中了。朴正熙的夫人陆英修1974年被枪击身亡后，朴正熙一气之下踢开了原来的侍卫长朴锤圭，起用了这位神枪手。车智澈四年来效忠的结果，换来了朴正熙的格外宠爱和绝对信任。随着地位的提高，车智澈已不满足于只当有利无名的“家奴”了。他下决心要插手政治，锄掉身居要职的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青瓦台秘书室室长金桂元、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使自己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二号人物。

1978年冬，车智澈曾几次向朴正熙进言，把当了八年总统秘书长的金正濂赶出了青瓦台总统府，让他出任驻日大使。金桂元接替金正濂，出任总统府秘书长。金桂元虽然曾担任过陆军参谋长、中央情报部长的要职，并在军界、政界有一定的威望和势力，但他只是具有“学者风度”的文人，对于在青瓦台内胡作非为的车智澈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因此，车智澈在青瓦台总统府里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二号人物。

郑升和1926年生于庆尚北道金陵镇，1975年任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77年任前线第一军司令，1979年2月由于金载圭的推荐，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博览群书，被人们称为“儒将”。郑升和的故乡金陵镇与朴正熙、金载圭的故乡相去不远，由于这种同乡的关系，使他成为金载圭的老友。加之金载圭推荐他出任陆军参谋总长，他与金载圭的关系更加密切。

1979年春，车智澈借口一旦有事，光靠青瓦台总统府警卫部队难以采取应急措施为名，经朴正熙点头，把陆军本部的空降特种作战部队从郑升和的手里夺了过来，控制在自己手里。同时，拨出巨额款项用最精锐武器加以武装。釜山、马山地区发生反朴风暴后，车智澈不经郑升和的同意，就从汉城用飞机直接派遣这支部队去进行镇压，引起郑升和等高级将领的极大不满。

车智澈控制了卫戍部队、空降特种部队后，他又同郑升和争起“首都警各部队”的指挥权来。汉城的城防部队和青瓦台总统府卫戍部队不同，理应由陆军本部管辖，但车智澈非要亲自管辖不可。争抢的结果是，这支部队的

指挥权也落到了车智澈的手中。从此，郑升和虽然身为陆军参谋总长，然而汉城的所有部队都属车智澈管辖，郑升和实际上反倒成了车智澈的“瓮中之鳖”。

这样，车智澈没有控制住的要人，只有朴正熙的同乡同学、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了。

金载圭虽然在1976年才出任中央情报部部长，但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以军职和文职的身份于情报工作，被认为是搜集情报的专家。金载圭和比他大8岁的朴正熙，不只是同乡，也是陆军士官学校第二期同班同学。金载圭离开军校后，官运亨通，曾经先后在军中担任无数重要职务和其他政府职务。1968年至1971年，金载圭出任陆军保安司令部司令。这是军方的情报部门，在朴正熙的独裁统治下只有朴正熙最信任的人才会被委任这个要职。因为按陆军保安司令部的职能讲，它不仅是一个搜集情报的组织，还有监视军方内部活动、及时排除军内反朴势力的任务。1973年金载圭退役，当时的军阶是陆军中将。1974年金载圭入阁，出任建设部部长。1976年，接受朴正熙的邀请，担任中央情报部部长。

金载圭出任中央情报部部长之职后，中央情报部虽然还在南朝鲜内外无孔不入地进行着间谍活动，但金载圭鉴于中央情报部的名声很臭，就致力于改革，尽量限制它的过分活动。他自己也尽量不出头露面，避免象前任部长那样飞扬跋扈、横行霸道。金载圭的改革，博得了美国政府和朴正熙集团内部“稳健派”的支持和赞扬。

自从卡特访问汉城同朴正熙举行“摊牌性的会谈”之后，美国政府对朴正熙越来越不满，竟至最后失去了一切希望。而美国中央情报局由于工作上的联系，向金载圭和南朝鲜中央情报部直接或间接地透露了美国政府的这种不满。金载圭仗着有美国政府的撑腰，开始逐渐抵制朴正熙的内外政策。

在对外政策上，金载圭代表了一部分“稳健派”的主张，认为南朝鲜政府必须适应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意图，支持美国关于朝鲜半岛的总政策，逐步改善同北朝鲜的关系。在对内政策上，主张必须顺应卡特政府和南朝鲜各阶层人民要求“改善人权”、“实行民主”的历史潮流。他们强调，应该从现行政策的改革着手，采取较温和的办法，缓和内外的不满情绪。

金载圭是一个职业军官，“陈情”不如政客那样婉转，而且自恃与朴正熙是老同乡、老同学兼老战友，因而坦率直言。金载圭“陈情”的结果，引起了朴正熙的猜忌和不满，从此，金载圭的地位逐渐被车智澈所代替。总统警卫室开始凌架于中央情报部和军队之上。车智澈成为地地道道的南朝鲜第二号人物，并准备有朝一日去接朴正熙的班。

由于最近在看待釜山、马山群众造反事件上，朴正熙与金载圭发生一些分歧，在车智澈的鼓动下，朴正熙授权车智澈起草改组内阁的计划，决定进行人事变更。车智澈当然明白朴正熙的意图，他大笔一挥，就把金载圭、金桂元的名字一笔勾销了，他还要撤掉国防部长卢载铉的职务，把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调任他职，然后由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接任中央情报部长一职。

此时，作为总统府秘书长的金桂元，虽然没有担负朴正熙所说的改组内阁的任务，但他毕竟是“近水的楼台”，不仅听到风声，而且了解到车智澈改组计划的内容。他经过考虑，很快告诉了金载圭。因为金桂元知道，郑升和、卢载铉无力采取应急措施，能够改变计划的只有金载圭一个人。他考虑到，平时金载圭同郑升和、卢载铉等人关系密切，几股力量合在一起去对付



车智澈、朴正熙，也许还有一线希望。

当金载圭知道这个消息后，感到自己同车智澈、朴正熙的斗争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熟悉朴正熙刚愎自用、寸步不让性格的金载圭，感到除了置对方于死地之外，已经别无它法了。在这种情况下，金载圭就下了狠心，要干掉朴正熙和车智澈。

定下决心以后，金载圭想到要动手首先要动员中央情报部的人马。金载圭就任中央情报部部长时，曾从军队中调来一批军官，替换了原来的各局、处头子。这批军官都是他在军中从事情报工作时的老部下，金载圭对他们推心置腹，倍加信任。特别是车智澈揽权后，处处和中央情报部作对，早已使中央情报部上下同心。当金载圭向他们发泄对朴正熙、车智澈的不满时，这些老部下更是牢骚满腹、摩拳擦掌。金载圭从这些老部下的情绪里得到了鼓舞，坚定了他的决心。但是，干掉车智澈容易得到别人同情，干掉朴正熙则又是另一回事了。他经过再三考虑，刺杀朴正熙和车智澈的想法没有敢跟任何人商量，怕泄露出去误了大事。他只是暗暗地设想了一个枪杀朴正熙、车智澈的计划，等待时机的到来。

同时，金载圭为了得到军方的支持，还从中央情报部活动经费中拨出巨额款项，拉拢收买郑升和、前线主力部队第三军司令李建荣中将、空降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郑炳宙少将等人，以便到时候能顺利地调动兵力。

1979年10月26日16时，车智澈在电话里通知金载圭，说今天晚上总统阁下要在宫井洞与金载圭共进晚餐，让金载圭做好接待准备。宫井洞是一座两层高的建筑物，外面围以约3米高的砖墙，砖墙顶端是白色锋利箭头的金属栏杆，在别致的楼房里，第二层设有金载圭的办公室和寝室，底层则设有餐厅和会客厅。这是金载圭的办公别墅。

26日18时5分，朴正熙、车智澈一行抵达宫井洞，金载圭和金桂元出迎，同到餐厅。

在晚宴就餐期间，宫井洞内响起一阵阵枪声，朴正熙、车智澈被当场击毙。

刺杀朴正熙后，国防部长卢载铉命令陆军参谋总长郑升和逮捕金载圭。随后，郑升和指示陆军保安司令全斗焕和宪兵总监金晋基逮捕金载圭。当晚的零时40分左右，金载圭被宪兵逮捕。

朴正熙死后，总理崔圭夏当选为“过渡总统”，并在新的铁腕人物郑升和以及美国的支持下逐步实行政治改革。然而，军方内部的权力争夺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日趋激烈。1979年12月12日，在金钟泌的幕后策划下，全斗焕领导包括卢泰愚在内的“少壮派”军人集团，发动了军事政变。此后，南朝鲜的大权落在了新的军事独裁者全斗焕的手里。

1980年5月24日，全斗焕不顾群众和在野党的反对，下令绞死了金载圭等人。

## 主要参考文献

杨江华主编：《八十年代西方政坛丑闻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1 年版。

陈伟源、刘水明编著：《世界政坛丑闻集》，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0 年版。

孔繁轲、孙秋英、孔祥华：《大人物失误录》，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宋振国、卫灵主编：《权与法的较量：各国反腐败要案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

杨华主编：《东欧剧变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洪韵珊主编：《一代首脑沉浮录》，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王仲田、高金海编著：《历史剧变：社会主义的挫折及其教训》，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宪生、晓亮主编：《十大下台元首》，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5 年版。张福兴、汪占坤：《被告席上的统治者》，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丁品余主编：《国外腐败丑闻与廉政之鉴》；中国劳动出版社 1995 年版。

姜士林、鲁仁、刘政主编：《世界政府辞书》，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1 年版。

熊复主编：《世界政党辞典》，红旗出版社 1986 年版。

王克勤、田文进、朱烈、肖扬主编：《世界知识大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版。

